SDX & HARVARD-YENCHING ACADEMIC LIBRARY



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

刘跃进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三联 ◉ 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

“永明文学”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
一个转折的时代。
凡是转折的时代，
无不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
特殊的承前启后的作用。
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层次
对永明文学进行研究，
有助于深入地、准确地
阐释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规律。
刘跃进同志这本专著的贡献，
即在于此。

宏观研究曾是学术界一个热门的话题。
有人仿佛认为，
只有对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
作鸟瞰式的观察和描述，
才是宏观研究的起点，
这可以算是一种偏见。
真正的有价值的宏观研究，
必须以微观研究为基础。
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
方能产生学术性、科学性。
刘跃进同志这本专著的特色，
即在于此。

——刘世德

ISBN 7-108-00897-1

9 787108 008978 >

ISBN 7-108-00897-1/I·176 定价19.80元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

刘跃进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Our Academic Books
are subsidized by
the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nd we hereby express
our special thank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刘跃进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3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ISBN 7－108－00897－1

Ⅰ. 门… Ⅱ. 刘… Ⅲ. 永明体－诗歌史－南宋－文学研究 Ⅳ. I207.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5570 号

责任编辑 许医农
封面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　　编 100706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新知电脑印制事务所
印　　刷 彩虹印刷厂
版　　次 1996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张 12.25
字　　数 270 千字
印　　数 0,001—7,000 册
定　　价 19.80 元



刘跃进 1958年出生于吉林。1981年南开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后，任教于清华大学。1987年获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文学硕士学位。1991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副教授。已发表论著《〈金瓶梅〉中商人形象透视》、译作《开发你的记忆潜能》及有关中国古典文献学、魏晋南北朝文学方面的学术论文四十余篇。

本丛书系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丛书，
面向海内外学界，
专诚征集中国新进中青年学人的
优秀学术专著（含海外留学生）。

•

本丛书意在推动中华人文学术与
社会科学的发展进步，
奖掖继起人材，鼓励刻苦治学，
倡导基础扎实而又适合国情的
学术创新精神，
以弘扬光大我民族知识传统，
迎接中华文明新的腾飞。

•

本丛书由哈佛大学燕京学院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共同负担出版资金，
保障作者版权权益。

•

本丛书邀请国内资深教授和研究员
在北京组成丛书学术委员会，
并依照严格的专业标准
（原则上要求参选书稿高于一般博士论文水准），
按年度评审遴选，
决出每辑书目，保证学术品质，
力求建立有益的学术规范与评奖制度。

序

从唐代以来，当人们谈到六朝文学时，几乎无人使用“宋齐文学”的概念，而常把“晋宋”并称；也较少有人使用“梁陈文学”的提法，只是限于谈论“宫体诗”时，才把“梁陈”合为一谈。在绝大多数场合，人们总习惯于使用“齐梁文学”或“齐梁诗”的说法。在不少时候，“齐梁”几乎成了六朝的代名词。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大约和齐梁之际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大转折时代有关。这一点，当时的一些文学批评家和文学总集的编者们，已经有所认识。例如，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两大杰作——《文心雕龙》和《诗品》，都产生于这个时代；而现存最完整的文学总集《文选》，其成书年代亦与此相差不远。在短短的几十年中，接连着这三大名著，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更应注意的是，《诗品》所评论的作家，截至于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沈约逝世为止；《文心雕龙》论文学，着重评论自上古至刘宋的变迁，而对齐代文学只是在《时序篇》中空泛地说了几句颂扬帝王的话，其实是存而不论；《文选》的选录作品，基本上也只收录到沈约以前的作家为主，只有三个作家的六篇作品是例外。但这些作品中有五篇皆可考定为天监十二年以前所作；仅一篇尚难确定，但作于天监年间则无疑问(详见拙作《关于〈文选〉中六篇作品的写作年代》，载

《文学遗产》1996年2期)。

不管钟嵘和萧统的以天监十二年为断限也好,刘勰的以宋末为断限也好,他们总是把南齐的"永明体"创始人王融、谢朓和沈约的出现作为文风转变的标志。所不同的只是钟、萧把他们作为一个时代的终结;而刘则认为是一个新时期的开始。不管刘勰、钟嵘和萧统的文学观有什么不同,但他们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对文学史上这个大转变时期作出总结和提出各自不同的看法。从历史上看,每一个转折时代的大作家,都大抵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他们往往既是前一个时代集大成者;又是后一个时代的开风气者。以谢朓、沈约为例,在他们的代表作中,既受了建安到鲍、谢诸家的深刻影响,也为唐人导夫先路;他们另一些作品,也开启后来"宫体诗"之端。近人骆鸿凯先生在《文选学》中,把班固、张衡、潘岳、陆机、颜延之、谢灵运等人和梁代的柳恽、吴均等对立起来,认为《文选》所录,"高文典册十之七,清辞秀句十之五,纤靡之音百不得一"(第32页)。"永明体"作家的诗文,在这里显然应属"清辞秀句"之列。《隋书·文学传序》是唐代官修之史,其论六朝文学时,对梁代天监以前作家都作了很高的评价,而对梁后期文学则加以严厉的指责。在这种影响下,唐代应进士科考试的人,无不以《文选》为典范,甚至乡学之中,也讲《文选》(见唐张鷟《朝野佥载》;到宋代还有"《文选》烂,秀才半"(见陆游《老学庵笔记》)之语。可见齐梁之际的文风,实际上影响到了千余年以来的文风。

所谓"齐梁之际"文风的代表人物,实即指南齐永明年间出现的文人集团,其中包括王融、谢朓、沈约;也包括另一些著名文人如范云、任昉和陆倕等。这些人物虽大部分死于梁代(只有王融死于永明十一年,谢朓死于齐末),但绝大多数都成名于南齐

永明年间，并曾入齐竟陵王萧子良的府邸，同为“竟陵八友”中的人物。这些文人所聚集的竟陵王“西邸”，即是永明政坛的一个重要据点，也是当时的文化中心。在这里出入的除了文士之外，还有很多名僧。萧子良和这些名僧曾创梵呗新声于此。在这同时，名士周颙遂创“四声”之说，而沈约则很快地把这学说运用到文学创作中去，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的“永明体”和“声病说”，后来流行了千年以上的“近体诗”，正是由此导发的。随着“声病说”的兴起，不但诗歌，连辞赋、骈文等等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不光表现在讲求声律一个问题上，而是使诗、文和辞赋一变过去的典雅古奥之风，而逐步趋向平易和流畅。这种转变显然与《南史·王筠传》载沈约述谢朓语：“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是相合的。但谢朓此语，却又令人想起了《大子夜歌》的“歌谣数百种，子夜最可怜；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作为中原高门出身的谢朓在艺术趣味上竟和南方的“街陌讴谣”的观点相一致。再就音律问题而论，吴兴沈氏的沈约采用了汝南周氏的周颙所创的“四声”说，并以此指导创作。不但如此，历代所用的韵书，其源也多肇自沈约。正如清人牟应震所说：“四声之分，始于周颙，而切韵类谱实始于沈约，则今之所行即沈本也。”（《毛诗质疑》，齐鲁书社版页369）沈约所分的韵部，虽以当时朝廷中流行的语音——西晋的洛阳音为基础，事实上却已经夹杂了不少吴音。举例来说，在现在所见的《广韵》等韵书中，“西”字均归入“齐”韵；而在汉魏古诗中，它却与“真”、“文”、“寒”、“元”、“删”、“先”等通叶，并且直到刘宋袁淑的《效白马篇》中还是这样。然而在《神弦歌》等南朝民歌中，“西”字早已入了“齐”韵。这种从语音到艺术趣味的变化，到处都显示了当时中原士族与南方土著的融合。这种融合，不但使地域的偏见趋向泯灭，也使原来的门第

观念发生了变化。以南方的士族而论，在陆机的《吴趋吟》中说："八族未足侈，四姓实名家"。"四姓"即朱、张、顾、陆四家，而吴兴沈氏则还算不了什么著姓，直到晋宋之际，还不过是一个"武力强宗"。但自从刘宋的沈林子、沈庆之等人显达之后，钟嵘在《诗品》中已把沈约和王融、谢朓，并称"贵公子孙"。这四字出于颍川钟氏的人手笔，更反映出人们观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所以"永明文学"的出现，不光是多种意识形态方面发展变化的共同结果，也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变化造成的。当然，这里所说的"社会现实"应该包括很多内容，不能局限于前一段时间所仅仅着眼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同时，我们在从多种社会因素来解释"永明文学"这一文学现象时，还必须紧密地联系到"永明文学"本身的特点，论述和阐明它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刘跃进同志的《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一书，就很好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他这部专著的一大特色就是避免了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内论述文学发展的原因时，只是简单地归结为社会基础的原因而忽视种族、区域文化等等重要因素。在这部专著中论到永明文学产生的原因时，就紧紧地扣住所谓"竟陵八友"的活动。把他们的出现，和南北士族从隔阂到融合的过程联系起来，把他们和当时的政局、宗教、哲学、文学、艺术以及目录学等等各种文化领域的变化联系起来。这就使他对社会存在的论述和关于文学发展本身的研究融为一体，毫无机械拼凑之感。更主要的则是从"竟陵八友"在学术、志趣和性格方面的相同或相似来论证这个集团出现的必然性。这样，对东晋南朝的"侨姓士族"和"吴姓士族"的从隔阂到融合的过程以及原来的"士"、"庶"界线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的升降变化作了深刻的分析。这种论述有很多是独到的新见，发前人所未发，使我们对这个时代的文学发展的关

系有了更细致和深刻的认识。

但是刘跃进同志的研究并不到此为止，他进一步从“永明文学”的思想和艺术特点方面对“永明体”几位创始人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实践作了深入而全面的分析。例如：关于谢朓、沈约的诗歌，我们经常论到的往往是“大江流日夜”或“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和“野棠开未落，山樱发欲然”或“千仞写乔树，百丈见游鳞”等名句，而忽视了他们另一些作品。在本书中，则进一步论到了他们一些咏物诗，指出其“开拓诗歌题材的新领域”的贡献；还注意到了像沈约的杂言诗在诗歌发展史上的作用。使人对这些作家的理解更为全面深刻，使人耳目一新。尤其可贵的是刘跃进同志对王融、谢朓和沈约的许多诗，在平仄声律方面作了细致的研究、分析，统计其入律之句和特殊律句的大量例子，指出两种句式的不同作用。特别有意义的是，根据他的统计，在三人中入律句最多的是谢朓，其次才是沈约和王融。这与我们经常想像的声律说的倡导者是沈约，其中合律句应以沈约为多的想法是大有区别的。

刘跃进同志所以能取得这许多成绩，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不但有比较深入和宽广的思路；而且能够刻苦地钻研历史文献，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他的这许多独到之见，无不是建立在《永明文学系年》及对永明作家的大量作品进行逐字逐句的深入探讨的基础上得出的。因此言必有据，不作空谈，这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和优点。

在谈到本书的这些特点时，使我想起了许多往事。回忆起当年我在北大中文系读书时，先师　游泽承先生多次教诲我们要认真读书，掌握大量的原始材料；但同时，游先生还特别对我指出，光是记诵材料是不够的，还必须学习新的思维方法，掌握

新的观点，才能在学术上有所创新。这些教诲对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使我感到愧疚的是几十多年来，由于某些客观的因素，再加上自己努力不够，在学术上并无所成，有负师训。我没有能做到的，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比我年轻的同志身上。前年，我为吴先宁同志的《北朝文学研究》一书作序时，曾引用了一句成语："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这是我衷心的祝愿。我们这一代人岁月蹉跎，没有能接好前一辈的班。现在的条件不同了，大量的新科学、新材料涌现在我们面前，跃进同志又具有坚实的学术基础，加上他的刻苦努力而且富于春秋。正如荀子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功是完全可望的。对此我充满着信心！

曹 道 衡

一九九五年四月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前　　言

公元二十五年，汉光武帝刘秀建都洛阳。从此，整个文化中心迁移，由西而东。与前汉相比，政治体制虽然一脉相承，但是学术文化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儒家文化定于一尊的局面开始瓦解，佛教传入，道教兴起，士人阶层由此而迅速分化：尊孔读经者固然有之，而佞佛信道者也日益增多。一时期，或隐逸于山林，标榜高蹈；或寄身于翰墨，纵横扬厉；或混迹于魏阙，心在江湖；或脱略于行迹，声歌征逐。如此等等，标志着一代士风的巨大变化。其流风余韵，整整影响了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学术文化的发展；而唐代文化高潮的到来，又与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汉、唐两大文化高峰之间，近四百年的魏晋南北朝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真正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一般地描述这种文化变迁的轨迹，也许并非难事。但是，具体而微地阐释这种变化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机缘，仅靠朝夕之功，或凭一、二部著作，是很难说明什么问题的。为此，我选定了两个长远的研究项目：一是“中古文学思潮”，一是“中古学术思潮”，目的就是想通过对若干专题的考察，试图回答这一文化史上的重要问题。从一九八七年开始，我就着手作资料长编工作。我希望自己的所有论述都尽可能地以资料长编作为基础，求实、

求精、求细。这是我既定的问学目标。

《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是"中古文学思潮"的一个专题。

众所周知，永明诗歌是唐代近体诗发展的源头，理应得到充分的重视。但是由于传统的"诗教"说的影响，学术界对于这个时期文学的研究几乎是空白。本书详细地考察了永明文学产生的历史渊源、文化背景以及"永明体"的确切内涵等，从而得出如下结论：

一、从古诗十九首到南朝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有两次重要变化：第一、从乐府古辞到古诗十九首，以抒情方式的转变作为显著标志，说明文人诗歌已经逐渐摆脱了乐府诗的影响而形成自己的特色；第二、从魏晋文学到南朝文学，随着文学观念的日益明确，抒情技巧的日益完善，文学创作活动已逐渐摆脱了经史附庸的地位而走向独立。经过这两次历史性的变化，中国古代文人创作的基本态式已初步确立。这是永明文学得以发生的历史前提。

二、作为文人集团，"竟陵八友"在永明文学发展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所以能够形成并发挥重要影响，除了思想性格、文化素养等因素外，还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唯其如此，"竟陵八友"的文化活动，就其影响而言，已远远超出了文学创作本身的范围：第一、促进了南北士族走向真正融合；第二、推动了文化事业的繁荣；第三、引领士族命运的转折。这是永明文学得以发展的文化背景。

三、关于"永明体"问题：第一、从元嘉体到永明体的确立，以子夜吴歌为代表的南朝民歌在其间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第二、永明体的特征包括：句式渐趋于定型，以五言四句、八句为多；律句大量涌现，平仄相对的观念比较明确，但是还没有形成"粘"的

概念。此外，用韵由疏而密，押平声韵居多，押仄声韵很严，至于通韵，很多已经接近唐人，对仗方面追求自然与情理的完美的结合；第二、永明诗人以沈约、谢朓、王融为杰出代表，而三位诗人的贡献又各不相同。

从本书的题目中就可以看出，我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受到陈寅恪先生的影响，尝试从宗族文化和区域文化的角度重新审视门阀士族在推动近体诗发生、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平心而论，从种族、环境、时代等方面研究文学艺术的发展历史，十八世纪以来的学者早有精到的论述，自然已不再是什么新鲜提法。但是，时至今日，我们却依然旧话重提，不免要生出几多感慨；感慨中不时还夹杂着少许滑稽的味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过于强调文学艺术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而对于其他相关因素，诸如宗族与区域文化等却多所忽略。甚至，有时还对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横加指责，不以为然。当然，嘲弄历史最终被历史所嘲弄。就中古文学研究而言，客观地巡视本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不能不承认，我们现在所做的研究工作，在很多方面，包括研究方法的更新，基本史料的辨析等，实际上并没有超出陈寅恪那一代学人所厘定的范围。尽管他们曾受到过不公正的批判，尽管他们的著作曾受到过相当的冷遇，但是历史终究不会忘记他们。即使站在今天的立场来看问题，他们的著作仍不失最重要的参考价值。事实上，要想进一步推进中古文学研究的深入，就不能不站在他们的肩膀上继续前进。这是因为，他们的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时代的政治氛围的阐释，而是特别注重考察中古时期比较突出的宗族文化和区域文化的种种复杂现象，追踪蹑迹，探微抉奥，从整体上建构了宗族——文化批评的研究框架，给后来者开启了中古文化研究的不二法门。

从汉末到隋代，前后四百余年，门阀士族的地位屡有升降，他们对于文学艺术的影响，程度上自有浅深的差异，方式上也不尽相同。因此，各个专题的研究，角度自然不可能完全一致，但总的原则没有变化。目前，我正在从事《昭明文选》和《玉台新咏》的研究，比较强调文人集团的作用和学术风气的影响。我想把这一研究专题的下限伸延到初唐。这可以说是永明文学研究的继续。之后，再翻回魏晋，上溯东汉，对若干专题作深入研讨。希望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完成"中古文学思潮"的各个专题的研究工作。

有人说，写作永远是一个令人遗憾的过程。"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实而难巧"。落到笔下，每每言不尽意。就永明文学的研究而言，不尽人意的地方还很多。好在我目前还在继续从事《中古文学思潮》《中古学术思潮》的资料收集及各个专题的研究工作，同时协助曹道衡先生、沈玉成先生编著多达百万字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编年史》，但愿能对这些阙憾有所弥补。

一九九五年八月作者自识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目　　录

上　编

永明文学综论

导 论

从古诗十九首到南朝文学

——中国古代文人创作态势的形成

历史往往是螺旋式地向前发展。

如果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来鸟瞰中国古代文学，那么不难发现，迄今为止的一部中国文学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螺旋向上发展的历史。就诗歌而言，先秦诗歌以四言为主，古朴活泼，《诗经》中的“小雅”及十五“国风”大多属于古代白话诗。东汉末叶，五言兴起，形式日趋齐整；至齐梁间，出现了格律诗的雏形。隋唐以后，格律诗一跃而成为文坛最主要的诗歌形式，从而占据诗坛一千多年。其间，宋词显然是对唐代律诗的一种突破、一种发展，而元曲则是在唐诗宋词基础上的又一次突破和发展。五四运动前后，现代白话诗兴起，与先秦古代白话诗遥相衔接。历史又在更高的起点上前进。再就散文而言，先秦文章除《尚书》外，大多散体单行，灵便简洁，可以说主要是以当时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古代白话散文。但是自秦汉之际，散体渐渐退落，而骈体勃然兴起，以至酿成了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的汉赋。东汉以后，抒情小赋活跃一时；齐梁之际，骈赋盛行，嗣后流衍而成为唐

代律赋，声词和对偶的讲求几乎登峰造极。然而物极必反，至中唐有古文运动兴起，历宋元明清，传薪添火，余绪未绝。二十世纪初叶，文风巨变，"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在"五四"运动中受到严厉的批评。至此，古代散文有似历史的陈迹一样，几乎就要销声匿迹了，现代白话散文又与先秦文章遥相呼应，似乎又在原有的起点重新起步。

从古代诗文的发展轮廓来看，中国古代文学实际上兜了一个大圈子。它的转向，确切地说，是从汉末开始，至齐梁变其本而加其厉，并初步确立了中国古代文人创作的基本态势。这突出表现在抒情方式、抒情技巧以及创作倾向等方面，由此而形成一个较为封闭的系统。从汉末以至明清，中国诗文发展可以说基本上没有超越这个范围。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中国古代文学是如何从奔放自由的开放系统退缩到严密细微的封闭系统中去的呢？在这个封闭系统的形成过程中，汉魏六朝文学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当会有助于重新认识汉魏六朝文学的历史地位。

第一节　抒情方式的转变

论述不妨先从具体作品入手：

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郁累累。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秋风萧萧愁杀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令我白头。胡地多飚风，树木何修修。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乐府古辞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古诗十九首之一

上引三诗，前两首收在宋人郭茂倩编《乐府诗集》中，分别题为《悲歌》、《古歌》。逯钦立先生以为这两首诗"当为同篇残文"（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289页），我以为是有理由的，所以把它们列在一起当作一首诗来考察。后一首诗收在梁代萧统所编《文选》中。这两组诗，作者都已失考。其创作年代，古今学者大多认为是在东汉。其所写内容也比较接近，同是抒写了游子思归的悲哀。当然，这种表面上的相近并不能掩盖实质上的差异。从句式上看，乐府古辞长短不拘，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而古诗十九首则是严整的五言诗。再就遣词用字来说，乐府古辞"质而不鄙，浅而能深"，古诗十九首则"随语成韵，随韵成趣"（胡应麟《诗薮》）。"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乍看起来，纯似议论语气，朴素浅显，但所表达的意蕴却相当深邃。本来，悲歌不可以代替哀泣，远望也不可能代替归返，但是这些游子却只能以这种不可能的方式寄托乡情。这种情状，反映出了人们的情感活动与表现方式的某种游离，实际表达出了一种极度的悲哀。阮籍丧母而痛饮不哭，莎士比亚则要"对着悲哀微笑"，拜伦也说：最悲惨的故事莫过于"它竟然使人听了微笑"。所有这些情感的变态表达方式，柳宗元曾给予过明确的阐释，他说："嬉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哀，过于痛哭"。这首乐府古辞所抒写的正是这种"长歌之哀"，字词虽然浅显，意蕴却很深远。

值得注意的是,乐府古辞与古诗十九首不仅在句式及遣词用字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两者在情感的抒发方式上也有所不同。乐府古辞往往是按照情感发展的自然顺序来安排诗篇结构,形成一种平铺直叙式的抒情方式。相比较而言,古诗十九首则是按照情感起伏的节奏剪裁诗思,让读者从各个侧面去领悟诗人的情思。"行行重行行"与"悲歌可以当泣"在内容方面似乎没有多大差别,但它在抒情方式上却显示出极大的独创性。前六句描写的是天涯游子对分手话别场面的追忆,特别强调了"重"字和"生"字的分量,用以渲染离别的久远和相思的痛苦。"胡马依北风"四句则由回忆转入现实,描绘了天涯游子的现实生活情景。而这,正是《古歌》《悲歌》着力咏叹的部分,所以它仅仅借用了乐府古辞的成句,将"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直接照搬过来。不过,全诗并未就此止笔,而是笔锋一转,从一己的感受,四方铺开,多角度地渲染,于是后六句笔墨又落到对方的身上,推想对方的种种情怀,摇曳多姿,回环往复,令读者的心情随之婉转起伏。这首诗所以能产生这种神奇的艺术效果,其实主要得益于两重对比的巧妙运用。今与昔是纵向对比,极写分别的久远,而彼与此为横向对比,渲染双方心心相印的情怀。

由于抒情方式的不同,乐府古辞与古诗十九首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以"悲歌可以当泣"为代表的乐府古辞明显呈现出一种慷慨悲凉的美学风貌。我们从深受乐府古辞影响的建安诗歌以及北朝乐府民歌中时常能够强烈感受到这种美学风貌的巨大的影响。"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陇头歌》),显然与汉乐府诗歌属于同一风范。曹操《蒿里行》、《薤露行》、《苦寒行》,曹植《送应氏》、《吁嗟篇》,王粲《七哀诗》,陈琳《饮马长城

虎》等，无不继承乐府古辞"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文心雕龙·时序》），形成了炳彪诗坛的慷慨诗风。不无遗憾的是，建安以后，这种慷慨诗风日渐衰歇，虽然在民间创作中还不时可以领略到它的遗风余绪，但似乎再也没有掀起过震撼人心的时代波澜，所以这种诗风并没有成为中国古代诗坛的主流。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以"行行重行行"为代表的古诗十九首。它将叙事与抒情合二为一，词意婉转，诗思纤密，明显呈现出一种绵密细巧的美学风貌。汉末建安时代，除曹操诗"犹是汉音"（沈德潜《古诗源》卷五）外，曹丕以下，其创作风格与古诗十九首十分接近，甚至有人怀疑古诗十九首"是建安中曹、王所制"（钟嵘《诗品》卷上）。自此以后，中国古代的文人诗以及宋词元曲，绝大多数作品基本上没有超出这种氛围。其实不仅是诗，古诗十九首出现前后，散文创作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抒情小赋大量涌现。张衡《归田赋》、王粲《登楼赋》、曹植《洛神赋》、陶渊明《闲情赋》等，或感叹人生之短暂，或悲泣身世之不遇，或描摹人情之变态，或讥刺世道之衰微，绘声绘色，细腻传神，与当时诗风彼此辉映。

从乐府古辞与古诗十九首的种种差异中可以明显看出，汉末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经历了一个重要变化：中国古代诗人已经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创作阶层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已开始在民间创作的基础上，努力寻找着自己的基点，精心构筑着自己的世界。毫无疑问，抒情方式的转变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那种意象遥深、幽微婉约的美学风貌则是这种历史变迁的最显著标志。

正如前边所指出的那样，以乐府古辞为代表的民间创作，其抒情方式常常是线型的、单一的，而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文人创作，其抒情方式往往是网状的、复合的。抒情方式的这种转变并不是偶然的。汉末诗人所以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后者，显然是受到了当时社会的、历史的种种条件的制约。概括起来，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一、独特的社会心理

汉代选拔人才，首倡察举，而察举则必重识鉴，进而形成了东汉以来的人物品藻之风。王充著《论衡》首先阐述了有关人的"命"与"性"的关系问题，继之则讨论骨相，认为一个人的命与性体现在身体上就是骨相。骨相的不同，体现了富贵贫贱、寿命长短以及操行好坏的不同。他说："贵贱贫富，命也；操行清浊，性也。""性命系于形体，明矣。"因此，他主张应"察骨节之法，察皮肤之理，以审人之性命。"王符著《潜夫论》也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相列篇》说："人之有骨法也，犹万物之有种类，材木之有常宜。"又说："人之相法，或在面部，或在手足，或在行步，或在声响。""身体形貌皆有象类，骨法角肉各有分部，以著性命之期，显贵贱之表。"这些论述无妨视为品藻识鉴的理论说明。

魏晋以还，随着玄学的兴起，此风尤甚。不过，魏晋评论人物与汉代以道德评论人物很不相同，而是倡导道家重视精神、崇尚天才的主张。他们不仅重视人的仪表之美，更重视人的"情性之理"（刘劭《人物志》），即人的精神世界。刘劭说："盖人物之本，出乎情性，情性之理，甚微而玄。"又说："物生有形，形有神精，能知精神，则穷理尽性。"所谓"能知精神，"也就是当时人津津乐道的"得神，"乃是识鉴品藻的最高境界，即所谓"神鉴。"《抱朴子》说："料之无惑，望形得神，圣者其将病诸。"可见"得神"并

非易事。为此，他们从不同角度提出如何"得神"的途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正如刘劭所说"徵神见貌则情发于目"，即眼睛最能传神。故蒋济撰《眸子论》，提出了观其眸子以知其人的著名论点①。

东汉以来，特别是魏晋玄学注重精神的理论主张，对当时以至后来的艺术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世说新语·巧艺》载："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精。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引《北堂书钞》所载《俗说》云："顾虎头为人画扇，作嵇、阮，都不点眼睛，便送还扇主，曰：'点睛便能语也。'"他为嵇康《送秀才入军》诗意作画，认为画"手挥五弦"易，画"目送归鸿"难，因为前者只要勾勒出形体就行，而后者则必须传神写意，方能绘出境界。不仅绘画如此，书法、诗歌、音乐等也同样以"入神"为最高境界。傅玄《历九秋篇》："穷八音兮异伦，奇声靡靡每新。微披素齿丹唇，逸响飞薄梁尘，精爽眇眇入神。"蔡邕《篆势》："体有六篆，巧妙入神。"陆云《南衡》："丰华非妙，得意惟神。"郑丰《南山》："华文伤实，世上所营，达入神化，反之混冥。"张载《赠司隶傅咸诗》："於赫洪烈，实子厥真，虑该道机，思穷妙神。"都可以说明这种境界。又如鲍照《飞白书势铭》："君子品之，是最入神。"这里所说的"入神"云云，就是要求文学艺术应当传达出人类最精微的情感变化。唯其如此，才能"至感畅入神"（王浚《从幸洛水饯王公归国诗》）。根据这种美学标准，传统的抒情方式已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必须要寻找新的方式，以便于深微地表达出人类精神世界的底蕴。

二、强烈的忧患意识

"回首人间忧患长"（苏轼诗）。汉末诗人对于这种"忧患"似

乎有着更深沉的体验，他们与西汉的贾谊和司马迁的"忧患"有所不同。贾谊虽然为现实再三"流涕"，再三"长太息"，司马迁虽然"意有所郁结"而发愤著书，但他们毕竟生长在从忧患中奋起，并转危为安，走向盛世的汉代鼎盛时期，他们的"忧患"表现为促使内忧外患的压力转化为发愤图强的动力。而东汉末叶的诗人，他们所遭遇的情形就全然不同了。社会的急剧动荡，使整个国家迅速陷入一种无秩序的混乱状态。传统的信念早已失去维系人心的力量。汉帝国已濒临崩溃的边缘。世乱年荒，生命不保。那些"终日驱车走、不见所问津"的下层诗人，真正体验到了人生的悲苦、绝望。他们似乎有那么多的愁情要向世人倾诉，有那么多的反省要向后人交待，于是在古诗十九首中，人们可以理解到，正是现实的苦难与深刻的思索迫使汉末诗人选择了这种回环往复的抒情方式，来抒写他们的失落感和怀疑精神。

三、传统的思维习惯

汉末诗人所以选择网状复合式的抒情方式，除了社会的、政治的原因外，传统的思维习惯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中国古代，存在着两种逻辑思维方式，一种是以《墨经》为代表的形式逻辑思维，另一种是以《荀子》为代表的辩证逻辑思维。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说："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秦汉以来，辩证逻辑思维方式一直在中国居于主导地位。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多义性与整体性，每一个概念，都可以从不同的侧面给予解说，所以经常出现同一概念却有不同理解的现象②。"诗无达诂"可以说是这种传统的思维习惯在文学领域的典型表述。在中国诗家看来，倘若诗的意象凝固不变，语意确切不疑，那就很难称得上是好诗。梅尧臣说"作者会以心，读者览以意，"

王夫之说："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得之，"其实就是要求诗歌给读者留下更大的想象空间，引导读者去思索，去补充。网状复合的抒情方式正是顺应了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在作者和读者之间架起了互为理解、共同创造的桥梁，所以备受历代文人的青睐。

由于这些社会的、政治的以及历史的原因，汉末以来，以抒情方式的转变作为一个重要标志，中国文人的诗歌创作已经开始摆脱了民间创作的固有规范，继而找到了自己的创作基点，这个选择对中国古代文人来讲具有重要意义。历唐宋元明清，在这一千多年间，尽管诗歌形式几经变化，但是在抒情方式上却未出现根本变化。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自汉末起中国古代诗歌始终沿着一个圆周型运动的基本原由。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文学所以从奔放自由的开放系统退缩到严密细微的封闭系统，汉末开始的这种抒情方式的转变，可以说起到了最初的奠基作用。

第二节　独立精神的寻求

抒情方式的转变，确实表明了中国古代文人的诗歌创作从民间创作的樊篱中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这并不意味着诸事皆备。事实上，它还远没有完全独立开来，因为在它的身后，政治的巨大影响依然在牢牢地限制着它的独立发展，它还远没有从附庸的地位中解放出来。

中国古代文学从它产生之日起，似乎就与政治结下不解之缘，具有强烈的功利目的。可以说，这是中国历久弥盛的文学传

统。这固然有它的长处，可惜其严重缺陷也因此而显现出来。最明显的是，这个文学传统由于过分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因而常常抹杀文学的独立性。文学仅仅是政治的工具、时代的传声筒。关于这一点，汉人说诗表现得最为明显。《诗经》本来是民间吟咏性情之作，但在汉人心目中，其政治教化作用远远超过其本身的艺术价值，被目为"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的经典而加以顶礼膜拜。如果说《诗经》还有一点自己的文学特征的话，那么汉人只能拈出美刺比兴而已。《关雎》本来是写男女的恋情，毛传标"兴"，认为这只是字面意义，其微言大义有待进一步发掘，于是小序和郑笺便具体承担了这个解说任务。似乎很自然，这样一首恋诗很快便被曲解成政治诗："乐得淑女，以配君子，爱在进贤，不淫其色。"《卷耳》本来是写情人相思之情，但毛传以为是"忧者之兴，"含有政治内容，是后妃担心君王不能求贤审官，以至朝夕忧虑。《桃夭》本来是描写女子出嫁的欢乐场面，毛传却认为这是歌颂天下和平，人心思乐。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凡是这类情诗，毛传郑笺都无一例外地认为与政治有关。诗中所写的仅仅是字面意义，其政治含义需由他们予以解说，目的在于"见今之美""见今之失、"从而给予必要的"美刺，"树立楷模，匡正天下[③]。《诗经》是如此，就连屈原独创的《离骚》也被汉人视为"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王逸《离骚经章句》）。于是在具体解说过程中，也采用解说《诗经》的办法——牵强比附。先秦两部最杰出的诗篇就这样被"必缘经术"（刘师培《中古文学史讲义》）的汉儒阉割了其艺术特性。

直至汉魏之际，这种情形并未得到根本的改观。本世纪二

十年代，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此论一出，几成定谳。后来者发挥引申这个论点，似乎最有力的证据便是曹丕的《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不过，我总觉得这里所说的"文章"似不是特指文学，因为下文用周文王做《周易》、周公旦制《周礼》来说明文章的巨大功效，可见"文章"主要是指经典著作。在《与吴质书》中，曹丕又说：徐干著《中论》二十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此书内容主要是阐述儒家经义，而曹丕以为传之不朽，可以看出，他所说的"不朽之盛事"是要靠著述留名，特别是经典著述。这一观点其实并不是曹丕的独创，不过是《左传》所说的"三不朽"的翻版和发展。他在《与王朗书》中说："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这是他自己所做的最好的诠释。当然，我的这种解释不一定确切。退一步说，按照通常的解说，以为曹丕所说的"文章""主要是指诗赋、散文等文学作品"(《中国历代文论选》)，乍看起来是把文学提到与事功并立的地位，但细究其实，文学仍旧没有摆脱"经国"附庸的地位。这种看法与曹植所说的"辞赋小道，壮夫不为"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是站的立场不同，表述方法各异而已。

魏晋以后，情形开始发生变化。为了适应抒情方式的变化，魏晋以后的诗人特别着力于抒情技巧的完善。这就促使他们深入考察了文学自身的特性，逐渐自觉地把文学当作独立的实体来看待。晋初陆机著《文赋》，细致论述了创作过程以及文体分类，将传统意义上的"文章"细分为诗赋箴等十类，这就比《汉书·

艺文志》笼统把文章分为诗赋两类细致多了，也比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将文章分为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科准确多了。不无遗憾的是，魏晋诗人虽然一度摆脱了传统的儒家思想的束缚，日益强烈地意识到了文学自身的特性，却没有再往前大跨一步，就被卷进玄言诗风之中，再一次简单地充当了时代精神的传声筒："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诗品序》）。当然，这里引述钟嵘的批评，并不意味着彻底否定玄言诗。事实上，玄言诗人比较有意识地摆脱传统的功利目的，追求"高情远致"（《世说新语·品藻》载孙绰语）的个性自由，这在文学史上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另外，山水诗的兴起也与当时士人祖述老庄、崇尚自然的风气不无关系。《世说新语·文学》载："郭景纯诗云：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云：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在玄言诗人看来，山水之美不只是客观的欣赏对象，而且还是道家所推崇的自然美理想的最高体现。因此，在东晋前期，一些玄言诗人常常在"托意玄珠"（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的诗中穿插一些优美的写景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庾阐的十几首诗，多状绘山水，而《观石鼓诗》则已通篇写景。但是这样的作品毕竟很少。就当时创作的主流而言，钟嵘的批评并不过分，刘勰也持同样观点："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文心雕龙·明诗》）。"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文心雕龙·时序》）。沈约也说："在晋中兴，玄风独盛，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殚乎此"（《宋书·谢灵运传论》）。文学作品已成为老庄的注疏，哪里还谈得上独

立！

历史在热切地呼唤着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的自觉时代"早日到来。

晋宋之际，随着山水田园诗的勃然兴起，中国古典诗歌开始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强烈的变革意识和独立精神起到了先导作用："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文心雕龙·定势》）。所谓"近代辞人"主要是指刘宋作家，他们开始有意识地突破传统窠臼，追求新变，推动了南朝文学的独立发展与成熟。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论，略有三体"：其一是谢灵运所开启："启心闲绎，托辞华旷"；其二是傅咸、应璩（其实还应有颜延之）所开启："辑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其三为鲍照所开启："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魄"。上述三体，只有傅咸、颜延之一派创新不多，且功利目的较强，于后世影响不大。其他两派，似乎有意摆脱教化的束缚，直接影响到南朝文学的发展。可见，自刘宋开始，中国诗歌再一次经历了自身的变革。到了南齐永明前后，强烈的主体意识和变革要求表现得更加显著。《南史·张融传》载，有人说张融书法"殊有骨力，但恨无二王法"。他回答说："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他在《门律自序》中说，文学创作应自成一家，"可师耳以心，不可使耳为心师也"，因为"使耳为心师"只能步人后尘，"因循寄人篱下。"他称许自己的创作"文体英绝，变而屡奇"（《戒子书》），"无师无友，不文不句，颇有孤神独逸耳。"孔稚珪《祭外兄张长史文》也说他"学不师古，因心则睿。"看来他的自负不是没有一定理由的，同时人的评价最能说明问题。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与陆厥书》等文也直言不讳地称许自己的创作独得胸襟，而前贤则"所昧实多。"刘孝

绰善为草隶，"变为别体"（《南史》本传）。至梁代中后期，萧纲甚至明确提出，"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诫当阳公大心书》）。放荡，并不是指淫佚浮荡，而是指不主故常，不拘成法（参赵昌平《"文章且须放荡"辨》，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九辑）。在南朝作家看来，文学"若无新变"，则"不能代雄"（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叙》）。唯有新变，才能使文学真正独立于世，并且历久而弥新。

正是这种强烈的变革意识和独立精神，促使南朝作家从刘宋初年开始、到南齐永明前后，经过几代人数十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将中国古代文学从封建政治的附庸地位中解放出来，并真正深入到了文学内部，探索其发展规律，使之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这一历史性的变革，主要有三个方面作为重要标志：

一、文学独立一科

宋元嘉十六年，在儒学、玄学、史学三馆外，别立文学馆；嗣后，宋明帝立总明观，分儒、道、文、史、阴阳为五部。此后，文学真正作为独立的学科而与经史等划分开来。这种划分在当时的史学著作以及古籍目录中都曾留下鲜明的印记。刘宋以前，现存诸正史并没记载文学家生平事迹的所谓《文苑传》或《文学传》。他们的事迹多羼入《儒林传》中，说明那时学术文章与文学创作并无明显分野。至刘宋，范晔著《后汉书》，特辟《文苑传》，同时仍保留《儒林传》，前者重在词章，属于文学家专传；后者重在学术，纯是学者列传，说明从刘宋时代开始，人们已明确地把文学创作与学术文章区别开来，不再混为一谈。

再就古籍目录的分类来看，《汉书·艺文志》分为六部，"诗赋略"为其中之一部。以下又细分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荀卿

赋之属以及杂赋和歌诗等五类，可以说主要反映了赋体的流变情况，至于其他文体的创作风貌却没有得到反映。魏郑默编《中经》，晋荀勖因之而成《新簿》，变《汉志》六部为甲乙丙丁四部。丁部除诗赋图赞之外，另有汲冢书并列其中。文学似乎只有诗赋，其他文体仍没有从文章中独立出来。刘宋末叶，王俭撰《七志》，将"诗赋"改为"文翰，"以为"诗赋之名，不兼余制，故改为文翰"(阮孝绪《七录序》)，关于文学的观念已趋于明确。再看这个时期的文坛，创作热情也日益高涨起来。裴子野在《雕虫论》中记载，刘宋大明泰始以前，人们多注意经史，而在此以后，属文之风日盛。"闾阎年少，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钟嵘《诗品序》也称："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文学的独立与繁荣，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标志，那就是文集开始有自己的专名，(《南齐书·张融传》："融自名集为《玉海》。司徒褚渊问《玉海》名，融答：'玉以比德，海崇上善。'"张舜徽先生以为，文集而有专名，自《玉海》始。见《中国文献学》)，并且数量激增。王筠《与诸儿书论家世集》云："史传称安平崔氏及汝南应氏，并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世擅雕龙'，然不过父子两世耳。非有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如吾门世者也。"王筠为琅邪王氏传人，为江左第一高门，文采斐然，累世不衰，所以沈约赞叹说："自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者"(《梁书·王筠传》)。这段话同样也适用于江左另一高门陈郡谢氏。东晋南朝，王谢家族不仅在政治上齐名，在文学创作方面也往往并驾齐驱。在梁代文坛曾流传着这样两句话："王有养、炬，谢有览、举。"养、炬指王氏后裔王筠、王泰；览、举指谢氏世胄谢览、谢举。四人并以文学知名，且有专集行世。谢览

受敕与王氏子弟王暕赋诗酬唱，颇得梁武帝赏识，称之"二少实名家。"谢举"年十四尝赠沈约五言诗，为约称赏。"其实，何止王、谢，就连以武功著称的吴兴沈氏家族，在宋齐以后也多有文集行世。沈怀文、沈怀远各有文集十六卷，沈林子、沈璞也各有别集。至于沈约，其他著述不算，仅文集就有一百卷，（关于沈约及沈氏家族的情况，详见附录《从武力强宗到文化士族》及《吴兴沈氏考略》）。难怪阮孝绪感叹道："自江左篇章之盛，未有逾于当今者也。"所以他在《七录》中变王俭《七志》中"文翰"之名为"文集，"认为"倾世文词，总谓之集，变翰为集，于名尤显。"从这部目录来看，占第一位的是"讲法录"中的智慧部，共 2077 种，2190 帙，3677 卷，这反映了江左佛教盛行的情况。占第二位的便是"文集录"中的别集部，共 768 种，858 帙，6497 卷。如果再加上楚辞部 5 种 5 帙、27 卷，总集部 16 种 64 帙，杂文部 273 种 451 帙，3587 卷，则"文集录"，共有"一千四十二种、一千三百七十五帙、一万七百五十五卷，"（这是《七录》中的原文，与我所作的实际统计略有出入）真可谓蔚为大观。其说明的问题，也就不待细言而自明了。

二、文笔的辨析

关于文笔说，文论家多已论及。人们常常征引《南史·颜延之传》的记载："帝尝问以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笔，测得臣文。"又载："长子竣为孝武造书檄，元凶劭召延之，示以檄文，问曰：'此笔谁造？'延之曰：'竣之笔也。'又问：'何以知之？'曰：'竣笔体，臣不容不识'。"由此不难推想，所谓"笔"主要是指符、檄、笺、奏、表、启、书、札、弹事、议对等应用文字，至于"文"大约是指诗赋之类的有韵文字。这一点可以从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得到证实。他说："年少中谢庄最有其分，手笔差易，于文不拘韵故

也。”刘勰《文心雕龙·总术》也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诗书，别目两名，自近代耳。”④

入梁以后，由于对文学特征的认识进一步深入，许多作家已不满足于仅从有韵无韵等形式特征上区分文与笔的差异，因为许多应用文字也用韵，但并不能称之为“文”。所以，萧绎在《金楼子·立言篇》就抛开了有韵无韵的局限，从文学的本质特征加以界定：“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不便为诗如周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很显然，所谓“吟咏风谣，流连哀思”强调的是文学所特有的抒情性质，至于“善为章奏”则是指论事说理。这样，“文”与“笔”的区分，就不仅仅是有韵无韵的问题了。萧统编《文选》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作为一条重要的选录标准。这说明在萧统的观念中，文与笔的区分是比较明确的⑤。当然，在具体编选过程中，收录文章有时并不很严。像伪孔《尚书序》、任昉《奏弹刘整》等，就很难说属于当时“文”的范畴。但是这样的文章毕竟只占少数。随着文学创作的发展，南朝人辨析文章体制确已日益精密。不仅如此，在南朝士人心目中，“文”与“笔”的差异更是显示一个人才学浅深的重要标志。“笔”仅能显示一个人的学，而“文”则更能展示一个人的才。对于学，南朝士人似乎并不怎么重视，甚至有所歧视。陆澄素以“硕学”著称，王俭却以“书厨”目之，讥讽他“于事未能周务。”萧绎在《金楼子》中也说：“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谓之学。”至于文，则为时人所重：“士大夫悉以文章相尚，无以专经为业者”（《资治通鉴》齐纪永明四年）。也许正是因为这些缘故，以文笔兼善的沈约颇为当时士人推崇，而仅以“笔”知名的任昉却很不甘心。《梁书·沈约传》载：“谢玄晖

善为诗，任彦升工于笔，约兼而有之，"以此而成为"一代词宗。"当时人以"任笔沈诗"相称，任昉却"甚以为病"（《梁书》本传）。这些记载非常生动地记录了南朝士人"悉以文章相尚"的时代风气。文学地位的日益提高，于此可见一斑。

三、四声的发现

四声发现于南齐永明年间。这一点从有关史籍约略可以考知。但是发现四声的直接契机是什么，却众说纷纭。其中，陈寅恪先生所提出的关于四声的发现实肇始于佛经转读的观点最有影响。从释慧皎《高僧传·经师论》《唱导论》、释僧祐《梵汉译经音义同异记》等文献记载来看，齐梁人在辨析梵文与汉字语音方面的差异上曾投下很深的功夫，目的是转读佛经、翻译佛教经典。永明年间，竟陵王萧子良、文惠太子萧长懋多次召集善声沙门，造经呗新声，特别是在永明七年的二月和十月，两次集会，参加人数众多，《四声切韵》的作者周颙、《四声谱》的作者沈约、《四声论》的作者王斌更是其中活跃人物。所有这些在《高僧传》《续高僧传》以及僧祐《略成实论记》中有明确记载。陈寅恪先生在《四声三问》及《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中再三强调指出，这些文士都生长在"佛化文学环境陶冶之中，都熟知转读佛经的三声。我国声韵学中的四声发明于此时，并此时运用是自然之理。"

近些年来，又有学者提出，四声的发现不仅受转读佛经的影响，还与魏晋以来的"诵诗"之风颇有关系。如果根据这个思路往下推究，恐怕江南民歌的影响也不能低估。这些问题，下文《调谐金石　思逐风云》将有所论述，此处只是提供一点讨论的线索。不过，所有这些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推测性质。唯其如此，我们也许还可以推出更多的结论。不管这些推测有多大差异，都可以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一个基本事实：四声的发现并不

是哪个人主观想象出来的，而是“文学潮流到这个时候，必然要推出的东西”（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东晋南迁以来，江南文化气氛日益浓郁，音乐尤其受到了南北士族的偏爱，这使得他们的音律素养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南史·萧惠基传》载，萧惠基善解音律，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歌。又《南史》颜师伯、褚渊、谢徇、王冲各传，《南齐书·临川王映传》等并记载他们或善声律，或解音乐，颇以“知音”相尚。特别应当提及的是范晔和谢庄，他们在四声的发现过程中曾起过重要作用。范晔说自己“性别宫商，识清浊，”并对谢庄颇为推崇，以为“年少中谢庄最有其分”（《宋书》本传）。《南史·谢庄传》载，王玄谟问双声叠韵，谢庄回答说：“玄、护为双声，碻、磝为叠韵。”《蔡宽夫诗话》说：“声韵之兴，自谢庄、沈约以来，其变日多，四声中又别其清浊，以为双声；一韵者以为叠韵，盖以轻重为清浊耳。”这段论述指出了四声的发现与双声叠韵的密切关系。不过，这里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双声叠韵的发现和归纳并不在四声之后，而是在四声发现和归纳之前。汉魏之际，反切之说已经产生并流行，这表明当时人已明确分辨出汉字声类与韵类的不同。双声叠韵之说大约就是这种分辨的成果。《南史·羊玄保传》记载羊戎“好为双声，”并与江夏王义恭、宋文帝义隆用双声字对话，颇露机智。又《洛阳伽蓝记·城北》载郭元谦“乐双声语，”与婢女用双声字问答，极富情趣。此外，王融有《双声诗》，沈约、萧衍、何逊、刘孝绰、庾肩吾、徐摛等并有《五字叠韵诗》，说明魏晋南北朝，从士族到庶民，从上到下，人们对于声、韵的认识已相当普及。而汉字语音的要素除了声和韵，还有声调。四声的问题，实质就是一个声调问题。既然声韵方面的基本知识已广泛地为世人所知晓，声调的辨析与归纳也就便利多了。

文学独立一科，文笔的辨析以及四声的发现，这是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极其重要的变化：由于文学独立一科，使得中国古代文学真正从经史附庸的地位解放出来；由于文笔的辨析，使得传统的"文学"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突出了文学抒情写意的特征；由于四声的发现，使得中国古代诗歌逐渐脱离了古朴原始的风貌，一跃而成为近体诗的雏形。以上述三个方面的变化作为显著标志，中国古代文学从此真正步入了自觉时代。这是继汉末中国古代诗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创作阶层登上历史舞台后的又一次历史性转变。这次转变，使中国古代文学从此摆脱了儒学和玄学的束缚，以更为独立的面貌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

第二节　向内收敛的倾向

从汉代末叶文人集团登上历史舞台到南朝前期文学创作走向独立，前后经历了二百余年。在这二百多年间，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日益严密细微，但同时，中国古代文人的创作倾向却日益向内收敛，逐渐形成了传统封闭的发展系统。在汉末，由于绝大多数文人都程度不同地经历过动荡的社会生活，所以他们的创作大多染上浓重的时代色彩，内容比较丰富，视野也比较开阔。魏晋以后，诗歌技巧虽然日益精细，但是其视野却远不及汉魏诗歌，诗风繁冗平缓，"稍入轻绮"(《文心雕龙·明诗》)。东晋偏安江左，创作上的这种向内收敛的倾向更加严重。这恐怕与当时士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心态有直接关系。东晋初年，部分南下士族如周顗、王导等在国破家亡后还有"克复神州"(《世说新语·言语》)的志尚。但是随着历史的迁移，北伐南讨均不成功，

南北对峙已成格局，这种志尚便日益消退，许多士人失去了强烈的危机意识和进取精神，或沉溺于玄风，或纵情于山水，在江南优越的生态环境中，俯仰咏叹，与自然浑为一体。其后，南北士人彼此往来，商讨学问，逐渐忘却了过去曾经有过的引得双方不快的偏见，共同创造着江南的文化。正如本书第一章集中讨论的那样，正是这种不曾间断的文化活动，不仅促进了江南文化的蓬勃发展，而且促使了南北士人从百年隔阂走向真正融合。

既已消除了心理隔阂，南北士人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文学创作中。也许是生活阅历的局限，也许是社会风尚的浸染，江南作家的思维习惯有如当地风光，有高山而不险峻，有平川而不辽阔，起伏错落，总是倾向于情感化和多元化。（第二章着重讨论的永明诗歌创作，这种情感化与多元化的倾向表现得就非常明显）他们或宦游他乡，在山水的描摹中寄寓淡淡的愁绪；或离别酬赠，以委婉细致的笔触抒写人间的真情；或睹物兴感，从日常生活中捕捉诗思，驰骋才华，诗境纤巧而充满情趣。当然，其中有不少名目繁多的咏物诗、回文诗、离合诗、四色诗、八音诗、数名诗、郡名诗、药名诗、姓名诗、宫殿名诗之类，或堆垛故实，或玩弄辞藻，大多属于文字游戏，显得浅薄而无聊。尤有甚者，一些作家开始把目光由物移向人，出现了初步的艳情诗的倾向。此后，宫体诗随之而起，诗艺愈加精致，风格更加纤弱。正因为如此，隋代李谔、王通，唐代陈子昂、李白等先后从不同角度对南朝文学给予严厉的批判。

历史的发展充分证明，隋唐人对六朝文风的清算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它为唐代文学的繁荣发展扫清了障碍。但是，其中也不免有偏激片面之处。平心而论，不管他们怎么看不起六朝文学，但一个基本事实不能否认："六朝人创业，唐人只是守成"（朱

光潜《诗论》)。最突出的表现是四声的发现及其在诗歌创作中的运用。《新唐书·宋之问传》称:"汉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宋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曰沈宋。"这段话十分简洁而准确地勾勒出了自南齐永明以迄唐代律诗发展的轨迹。(为了具体说明这个问题,本文第三章详细考察了永明前后诗歌句式、律句、用韵以及俳偶的运用及其变化情况,试图说明:永明体的出现,标志着五言古诗已暂告一个段落,预示着唐代律诗的来临)闻一多先生曾形象地把中国古代律诗创作戏称作"戴着镣铐跳舞。"应当说,这个镣铐是南朝人开始给自己戴上的。隋唐人不仅没有摆脱开镣铐的禁锢,反而还要在镣铐内塞进许多衬垫、定出许多规则,这就使得禁锢变得越发强烈。唯其如此,唐宋诗人常常为一个字、一个韵,耗尽心血:"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贾岛诗)。"夜读晓不休,苦吟鬼神愁"(孟郊诗)。"清瘦诗成癖"(白居易诗)。就连唐代最伟大的诗人杜甫也是"新诗改罢自长吟","晚节渐于诗律细。"类似这样苦吟的例子多得不胜枚举。其实不仅是诗,魏晋以后,其他艺术门类似乎也无形中受到了影响。书法绘画日益重视布局的周密。工艺美术,特别善长于在极有限的空间创造出无限的美来,甚至方寸之内,精雕细刻,变化无穷,令人眼花缭乱。不能否认,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规矩法度之内驰骋确实也是一种独特的美。

但是,这种艺术再精美,它毕竟还是受到了禁锢,限制了人们的视野。就诗而言,自从齐梁以后,除李、杜、韩、苏等第一流作家外,很少有人能再在近体诗中创造出《诗经》中像《生民》、《公刘》《绵》那样史诗般的作品,也很少见到像屈原《离骚》那样

波澜壮阔的浪漫诗篇，甚至连汉赋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豪迈气魄也日益少见。这就使人们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疑问：四声的发现，近体诗的形成，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来说，是幸，还是不幸呢？

回顾中国文学螺旋式向前发展的历史过程，集中到一点，其实质上也就是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

相对于乐府古辞而言，古诗十九首的出现是对前者的一种否定、一种超越。这种否定与超越主要表现在抒情方式的转变上。它标志着文人诗歌已逐渐摆脱了乐府诗的影响而形成自己的特色。而后，历魏晋以迄刘宋初年，诗歌文人化的色彩愈来愈浓，诗思绮密，语多征实，但是，诗的性灵却被日益扼制。元嘉末叶，以鲍照、汤惠休为代表的青年诗人又开始向民歌回归，从而推动了宋末诗风的变革。永明体的出现，标志着这种诗风革新的完成。从此，民间创作与文人创作又在新的起点上趋于融合。

从元嘉体到永明体，随着文学观念的日益明确、抒情技巧的日益完善，文学创作又逐渐摆脱了经史附庸的地位而走向独立。摈弃了传统的功利目的，注重于个人情性的抒写，应当说，这又是齐梁诗歌对魏晋诗歌的一种否定和超越。但是，由于齐梁诗人过分拘泥于纤细的感受与琐屑的形式，结果极大地限制了他们的视野，这就使得他们的诗歌日益缺乏生机。至初唐，陈子昂首先揭橥“风骨”，倡导“兴寄”，遥接汉魏文学创作传统，使事功与文才并重，从而对南朝专重情性，忽略文学社会性的倾向给予否定。

“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文心雕龙·通变》）。从古诗十九首到南朝文学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这两次历史性变化，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注 释

① 参见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读〈人物志〉》。《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又，《魏晋玄学和文学理论》，收在《理学 佛学 玄学》中。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② 参见李志林《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两重性及变革的艰巨性》。《哲学研究》1989年第7期。

③ 参见拙文《"六义"与诗教——读〈毛诗序〉臆札》。载《杭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④ 详见郭绍虞《文笔与诗笔》，收入《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⑤ 详见朱自清《〈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说》。收入《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第1章

从隔阂走向融合

——论竟陵八友及其在六朝文化史上的地位

东晋南朝文化，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门阀士族文化。将近三百年间，以南北士族为主体的文人集团，自始至终左右着江左文化的嬗变。

南齐永明年间，以文惠太子萧长懋、竟陵王萧子良为核心，以竟陵八友沈约、谢朓、王融、任昉、范云、萧衍、萧琛、陆倕为中坚的文人集团，秉承前代的遗风余绪，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通过一系列文化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偏安江南的渡江士族与东南士族从百年隔阂走向真正融合。这种融合在南朝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促使了从古诗十九首到南朝文学的第二次历史性转变的最终完成，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融合大大加速了高门士族自身命运的历史性转变。

唯其如此，这个文人集团在风云际会、智略辐凑的诸多江左文人集团中，其地位和影响就显得格外引人瞩目。

第一节　竟陵八友的形成及其性质

《梁书·武帝纪》载："(南齐)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萧衍)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并游焉，号曰八友"。据此而知，竟陵八友文人集团的正式形成应当是在齐武帝永明二年竟陵王萧子良兼司徒、开西邸，永明五年正位司徒、并移居鸡笼山之间。《南齐书·武帝纪》载："永明二年春正月乙亥，以竟陵王子良为护军兼司徒。"《萧子良传》并记载其"领兵置佐，侍中如故，镇西州。"又云："五年，正位司徒，给班剑二十人，侍中如故，移居鸡笼山。"据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所考，鸡笼山在南京城东北覆舟山之西二百余步。"其状如鸡笼，因以为名。"刘宋元嘉十五年，立儒学馆于北郊，由当时大儒雷次宗主持，并开讲于鸡笼山。一时间，鸡笼山周围文人荟萃，成为江左的文化中心。史载，萧子良"礼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倾意宾客，"很快便成为众多文人拥戴的中心人物，"天下才学皆游集焉"(并见《南齐书·萧子良传》)。竟陵八友中，范云早在齐初即入萧子良幕府，永明中又为记室参军事。其时，沈约亦"迁中书郎、本邑中正、司徒右长史。"考《南齐书·百官志》："司徒府领天下州郡名数户口簿籍。虽无(中华书局本《南齐书·百官志》校记："此下疑有脱文。")，常置左右长史。"据此，沈约实为萧子良司徒右长史当无疑问。萧衍在这一年亦为萧子良司徒西阁祭酒。《南齐书·礼志》载：永明二年，"司徒西阁祭酒梁王议"云云。检《百官志》，司徒府佐史有从事中郎一人、仓曹、户曹属、东西阁祭酒各一人。大约与此同时，萧琛、任昉任司徒记室，王融为法曹参军。竟陵

八友中年龄最小的是陆倕。《梁书·陆倕传》："年十七，举本州秀才，刺史竟陵王子良开邸延英俊，倕亦预焉。"陆倕卒于梁普通七年，年五十七，十七岁时是永明四年。由此可知，竟陵八友至迟在永明五年前后已经正式形成。（竟陵王开西邸的时间，《通鉴》以为在永明二年。林东海《谢朓评传》驳之，以为在永明五年。见山东教育出版社编《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530 页。日本学者冈祐次以为在永明八年。见兴膳宏《六朝文学论稿·艳诗的形成与沈约》。岳麓书社 1986 年版。）

这里还有一个值得考察的问题。稽诸史籍，我们可以明显注意到，云集在萧子良周围的文士远不止竟陵八友。仅举有姓名可考者就不下数十人之多。既然如此，又何以单以八友名世呢？若以年龄而论，沈约最长，陆倕最少。永明五年，沈约四十七、范云三十七、任昉二十八、谢朓、萧衍二十四、王融二十一、萧琛二十左右（曹道衡、沈玉成先生《中古文学丛考》有专文考证萧琛生卒年，此不详述），而陆倕才十八岁。可见，他们之间年龄相差最悬殊的几近三十岁。很显然，他们所以能形成比较稳定的文人集团，主要还不是由于年龄相近的因素，而很有可能是出于下列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结交时间长久

沈约、范云、任昉等早在宋末就已结识，友情甚笃。泰始三年（467），沈约任蔡兴宗安西外兵参军、兼记室。其时，范云的父亲范抗亦为安西参军，范云十七岁即与沈约友善。这是两人交往的最早记载。又天监二年（503），任昉出任义兴太守，在赴任的途中听到范云病逝的消息，写下了《出郡传舍哭范仆射诗》，"结欢三十载，生死一交情，"说明两人早在宋末业已结交。宋末元徽时期，刘秉、萧道成、袁粲、褚渊"日直决事，号为四贵。"特别

于萧道成."威名既重,"致使"朝野归心"(并见《南齐书·高帝纪》)。任昉、沈约、范云等也先后投靠到萧道成门下,为他们在入齐后政治上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元徽三年(475),任昉时年十六岁,为宋丹阳尹刘秉辟为主簿,因忤怒刘秉之子,乃转投到萧道成门下。元徽四年,后来的齐武帝萧赜被任命为晋熙王镇西长史、江夏内史,行郢州事。萧赜长子萧长懋(即文惠太子)亦随父来郢。是时,范抗、范云父子以及沈约并居郢州。这可以从沈约于元徽三年所作的《栖禅精舍铭并序》得到证明。三人不约而同地又都转到萧赜身边,并与文惠太子萧长懋多所接触。升明二年(478),萧道成平定了沈攸之的反叛,代宋之势已成定局,于是将萧赜、及萧长懋召回京城,"心存嫡嗣"(《南齐书·文惠太子传》)。沈约、范云、任昉等又得以在京城相聚。人齐以后,竟陵八友由于文惠太子和竟陵王子良的奖掖提携,在政治上有了较快的发展。建元初,沈约为文惠太子征虏记室、带襄阳令;建元二年,文惠太子为南郡王,沈约仍在幕下,曾为府主写下多篇文章,深得赏识。齐武帝即位,萧长懋被立为太子,沈约"特被亲遇,每直入见,影斜方出"(《梁书·沈约传》),为步兵校尉、管书记,直永寿省,校订四部图书。这就使沈约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文献资料,学术上日益成熟,加之沈约性情朗畅,结交广泛,所以很快就成为时人瞩目的风云人物。人齐以后,范云始终在萧子良幕下供职,"动相箴谏,"深为萧子良器重。后又转为文惠太子刑狱参军事、领主簿。永明初年,任昉、萧衍、萧琛等先在王俭府中任职,谢朓等在豫章王萧嶷府中任行参军。自永明二年萧子良兼司徒、镇西州以后,以沈约为首的八友又都先后成为西邸宾客。如果把宋泰始三年(467)看作八友中部分士人结交的开始、到齐永明五年八友正式形成,其间整整经历了二十多年。推终

原始，八友的结交，时间可谓长久。

二、才学冠冕当时

《南史·何逊传》载萧绎语曰："诗多而能者沈约，少而能者谢朓、何逊。"《韵语阳秋》亦有类似的记载："诗多而能者沈约，少而能者谢朓。虽有迟速多寡之不同，不害其俱工也"。从现存作品来看，竟陵八友无疑是南齐最有成就的作家。他们的创作成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沈约、谢朓为首的诗歌创作；一是以任昉、陆倕为首的骈体创作。诚如萧纲《与湘东王书》所称："近世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就诗歌创作而言，沈约、谢朓、王融等，在诗歌的句式、韵律、对偶以及情思、意境等方面创新求变，推出了绵密细巧的永明诗体，为唐代近体诗的兴盛铺平了道路（详见第三章《若无新变 不能代雄——永明诗体辨释》）。再看任昉、陆倕等人的骈体创作，尤以思理明朗、文笔练达著称于世。任昉的奏弹文如《奏弹曹景宗》、《奏弹萧颖达》、《奏弹范缜》等，凌厉峻切，义显神畅，骈散相间，词采斐然。其他如《王文宪集序》、《齐竟陵文宣王行状》等，学深笔健，条畅明达。沈约盛称任昉"心为学府，辞同锦肆"（《太常卿任昉墓志铭》），确非虚誉。陆倕的代表作是《石阙铭》、《新刻漏铭》，梁武帝称之"辞义典雅，足为佳作。"除任、陆二人外，沈约、谢朓、王融等人的文章也写得很出色。如沈约的《奏弹王源》、《修竹弹甘蕉文》，谢朓的《齐敬皇后哀册文》、《拜中军记室辞随王笺》、《酬德赋》，王融的《求自试启》、《皇太子哀册文》、《三月三日曲水诗序》等等，都得到过时人和后人的推崇。《南齐书·王融传》载魏使宋弁对王融谈到《三月三日曲水诗序》："在北闻主客此制，胜于颜延年。"又《颜氏家训·文章篇》载：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时俗准的，以为师匠。邢赏服沈约而轻任昉，

魏爱慕任昉而毁沈约。每于谈燕，辞色以之。"《北齐书·魏收传》、《太平御览》卷五九九引《三国典略》并具体载录了二人相互诋毁的口实：邢邵常说"江南任昉，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魏收当然毫不示弱，反唇相讥："邵常于《沈休文集》里作贼，何意道我偷任语。"由此可见，竟陵八友不仅驰名江南，而且还流誉北方。

竟陵八友不仅才华出众，而且还是当时著名的学者。沈约"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梁书·王筠传》)，曾写下大量论著。所谓"四代之史，"大约是指他所撰《晋书》、《齐纪》、《宋书》、《高祖纪》四书，包括晋宋齐梁四代史事。此外，他的主要著作还有《谥例》十卷、《四声》一卷、《新定官品》二十卷、《宋世文章志》、《俗说》三卷、《杂说》二卷、《袖中记》二卷、《珠丛》一卷、《阮嗣宗咏怀诗注》、《竹书纪年注》以及文集一百卷，等等，涉及四部。"善辑流略"(萧绎《金楼子·立言》)的任昉也著有《地记》、《杂传》、《文章始》以及文集共四百余卷。其他如谢朓、王融、范云、陆倕等并有文集行世。萧琛、萧衍也不甘退让。萧琛常言："少壮三好，音律、书、酒。年长以来，二事都废，惟书籍不衰。"《隋书·经籍志》著录有萧琛《皇览抄》二十卷。又《南史》本传："琛所撰《汉书文府》、《齐梁拾遗》，并诸文集，数十万言。"至于萧衍，著述更多。当然，其中有很多是他当上皇帝以后敕令手下文士所编，可以略去不计。但萧衍决不是那种才疏学浅的庸劣之君，"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尺牍、骑射，莫不称妙，"虽然是史臣的颂圣之辞，按其实际，也并没有相去太远。

三、思想性格接近

竟陵八友的思想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儒道佛兼收并蓄，表

现得十分活跃。萧衍自称"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会三教诗》)，所受的是儒家思想的熏陶感染。他曾作有长篇《孝思赋》，倡言"忠孝两全。"《孝子传》所载子路对孔子说的孝事双亲的动人事迹，给萧衍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以至"每感斯言，虽存若亡，父母之恩，云何可极?"登上皇帝宝座后，他在钟山下建大爱敬寺，于青溪侧造大智度寺，"以表罔极之情，达追远之心。不能遗蓼莪之哀，复于宫内起至敬殿。"在宣扬佛教信仰的《净业赋序》中也表达了同样的儒家重孝的思想感情："及至南面，富有天下，远方珍羞，贡献相继。海内异食，莫不必至。方丈满前，百味盈俎。乃方食辍箸，对案流泣，恨不得以及温清朝夕供养。何心独甘此膳。因尔蔬食，不啖鱼肉。"天监四年，他特下《置五经博士诏》："二汉登贤，莫非经术。服膺雅道，名成行立。魏晋浮荡，儒家衰歇。风节罔树，抑此之由。"在《定选格诏》中说："今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罗)、颜(回)，勿限年次。"后来还专门设置"制旨《孝经》助教一人，生十人，专通高祖(萧衍)所释《孝经义》。"从《梁书》本纪中可以看到，萧衍除《制旨孝经义》外，还有几部阐扬儒教的著述，如《周易讲疏》、《孝经讲疏》、《毛诗答问》、《春秋答问》、《尚书大义》、《中庸讲疏》、《孔子正言》等。可见，萧衍对儒家思想自始至终都给予高度重视①。任昉尤以"性至孝"而著称于世。《梁书》本传载："居丧尽礼，服阕，续遭母忧，常庐于墓侧，哭泣之地，草为不生。"任昉的许多文章往往是以正统的儒家思想为准衡，褒贬是非、抑扬轩轾。在《求为刘瓛立馆启》、《王文宪集序》等文中，他对刘瓛"薄身裕德、修行明经，"对王俭"孝友之性"等推崇备至，充分表现了浓郁的儒家思想。正因为如此，任昉始终得到许多儒学大师的赞赏。隋末大儒王通在《文中子》中对晋宋以来的文人多所

贬抑，却对任昉大加称赏，以为"其文约以则，有君子之心。"说明任昉确以儒术知名。道家思想对竟陵八友的影响也很大。一方面，由于魏晋玄学的影响，南朝士人几乎无人不读《老》《庄》，至少要用《老》《庄》来装点门面；另一方面，在道家思想影响下而形成的道教思想也在竟陵八友的思想中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证。沈约出身于世代信奉天师道家庭，萧衍也"中复观道书"（《会三教诗》），"耽事老子"（《舍道事佛文》），就是在舍道归佛后，对于当时著名道士陶弘景依然十分尊重和信任，朝政大事，辄就谘询，陶因有"山中宰相"之称。在诸家思想中，佛学尤其是文惠太子、竟陵王萧子良以及竟陵八友狂热崇尚的对象。关于这一点，将在下节详论。总之，我认为，竟陵八友的结交，有共同的思想作为基础，这是一个重要前提。

此外，竟陵八友在处世态度方面也颇多相通之处。当然，从表面上看，八友的性格各有特点，有时表现得很不一样。譬如沈约，由于家世坎坷，所以老成持重，轻易不肯臧否人物；范云则恰恰相反，刚毅强悍，颇为耿直；而任昉却以儒雅沉稳为时人推许；谢朓口讷，不善言辞；王融气盛，恃才傲物……。尽管他们在性格方面如此不同，但是，他们却都有着强烈的政治热情和仕进要求。沈、范、任三人，年辈高、阅历深，是辅佐萧衍代齐称帝的主要谋士，萧梁王朝建立以后，自然功高名重，得意一时；谢、王二人的命运截然相反，他们出身于南渡头等士族家庭，自视甚高，亟待"绍兴家业，"结果先后卷进皇位继承的政治斗争中而被害。显而易见，竟陵八友在政治方面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了一个事实，即他们热衷功名，不甘寂寞，颇有政治抱负。

说明这一点十分必要。因为正是这种政治上的抱负加速了

竟陵八友的聚合进程。

这里实际上已经开始涉及到了竟陵八友这个文人集团的性质问题。具体说，竟陵八友的聚合，除了思想上、性格上以及文化上的因素外，是否还有其某种政治目的呢？

养士游谈，历来是显宦达官为抬高自己声望、扩大政治影响的一个重要手段。战国时期的游士，多以智谋著名。诸如战国四公子延揽游士，往往与政治有关，显然是一种政治性的聚合。汉初实行诸侯王分封制，为游士提供了自由选择与自由流动的相应条件。以淮南王刘安、梁孝王刘武为两个中心，游士云集，声势颇盛，在政治上竟与当时中央集权构成了某种并峙的局面，同样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不过，这些游士与战国时期又有所不同，他们还兼有作家身份。象枚乘、司马相如等更以文学为主。因此，两汉时期养士游谈，大多具有政治和文化的双重色彩。曹操"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曹植《与杨德祖书》），网罗大批文士，其目的也是如此。此外，还有一种情形，有些显贵养士游谈并没有什么政治色彩，也不是为了崇尚学问，而主要是为了猎取名誉。晋代贾谧召集"二十四友"准备纂修《晋史》，大约就是这个目的（考见张国星《关于〈晋书·贾谧传〉中的"二十四友"》，载《文史》第26辑）。

在上述三种情形中，我以为竟陵八友似乎更接近第二种，即兼有谋士和作家的双重身分。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就府主萧子良而言，他是齐武帝次子，地位仅次于萧长懋，史称他"不乐世务，"性情仁厚，开西邸、纳贤才，似乎全然是为名，但实际上恐有更深的用意。譬如八友中最早追随萧子良的范云，"好节尚奇"、"性颇激厉，有威重。"萧子良对他十分敬重，曾向齐武帝为范云求郡。齐武帝初不以为然，认为范云不过"恒

相奖荐"而已。萧子良又出示范云谏书，"辞皆切直，"使齐武帝"咨嗟良久"。特别是招纳萧衍，尤其可以见出萧子良隐蔽的用心。在永明年间，王融说过："宰制天下，必在此人。"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再就竟陵八友自身而言，尽管齐武帝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仅以文士目之，但他们自己却自视甚高，从不甘心当个文人。沈约家世尚武，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内望为公辅，"为此，他屡陈北伐之计，渴望得到朝廷重视。王鸣盛说："文人轻躁急功名，如谢灵运亦有此陈请，王融之类也"(《十七史商榷》)，洵为的论。至于萧衍，政治色彩尤为浓郁。他的父亲萧顺之为萧道成族弟，曾协助萧道成创立霸业。齐武帝上台前曾对萧嶷说："非此翁，吾徒无以致今日。"因之，当他即位后，对萧顺之十分忌惮，处处抑制，不使高居台辅。在这种背景下，萧衍转投到萧子良门下，便不是偶然的事情，而应当带有某种政治投机色彩。

永明七年，应竟陵王萧子良教，沈约等作《高松赋》，特以"邹枚之客"自喻，又把萧子良比作梁孝王，比较含蓄地点出了拥戴萧子良，他们自己既是文士同时又兼为谋士的双重含义。天下承平，他们是文士，积极从事文化活动；一旦有变，他们马上就能以谋士身份出现。最典型的事例可以举竟陵八友所参与的两次夺权斗争。第一次是永明十一年力争王位继承人的斗争。这年正月，文惠太子萧长懋死，是由嫡长孙萧昭业还是武帝次子萧子良继位，这显然是一件十分尖锐敏感的大事。《通鉴》载："郁林王之未立也，众皆疑立子良，口语喧腾。"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萧子良却失去了齐武帝的信任。据史载，原因在于文惠太子死后，武帝检行东宫，发现太子"服御羽仪过于制度，"因此大怒，又以萧子良素与太子友善，却不启闻，"颇加嫌责。"结果，这年四

月，继承人的地位确定为嫡长孙萧昭业。可以想见，萧子良及其周围的谋士是不会甘心的。据《南齐书·王融传》记载，永明末，正值“虏动”之际，萧子良曾借机“于东府募人，”推荐王融为宁朔将军、军主。王融见时机来临，“大习骑马。才地既华，兼籍子良之势，倾意宾客，劳问周款，文武翕习辐凑之。招集江西伧楚数百人，并有干用，”为辅佐萧子良夺权作准备。这年七月，齐武帝病危，萧子良委派萧衍、萧懿、王融、范云、刘绘、王思远、顾暠之等为帐内军主，夺取帝位之争一触即发。武帝死，王融“戎服绛衫，于中书省阁口断东宫，使不得进，欲立子良，”彻底挑开了矛盾。范云等人也跃跃欲试，只有萧衍表现得非常冷静。他清楚地知道，竟陵八友手中并没有实权，齐武帝根本就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说他们“不堪经国，”沈约王融数百人，“于事何用！”萧衍虽颇有谋略，却又深受猜忌。所以，八友在政治、军事等方面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势力。王融等辈虽自视甚高，其实“才非负图”（《南史·梁本纪》）。当时“太学生虞羲，丘国宾窃相谓曰：‘竟陵才弱，王中书无断，败在眼中矣”（《资治通鉴》）。萧衍亦坐“视其败也”而不予协助。正在僵持之际，素与文惠太子、萧子良不和的西昌侯萧鸾急奔云龙门，“排面入奉太孙登殿”（《南史·王融传》），命左右挟出萧子良。一场宫廷政变就这样失败了。王融被杀，萧子良不明不白的死去，沈约、谢朓等也被排挤外任。唯有萧衍例外，得到重用。在这场宫廷夺权斗争中，萧衍的向背起到了比较关键的作用。萧衍为什么没有辅佐萧子良却反而依附萧鸾（即齐明帝）呢？由于《南齐书》作于萧梁，故每有回忌，未能直书，所以显得扑朔迷离。但管窥蠡测，仍可推知一二。就萧子良而言，虽然曾一度使得齐武帝失望，但他在齐武帝心目中的地位恐亦不低。《南齐书》本传载：“世祖不豫，诏子良甲仗入延昌

殿侍医药。"可以看出，齐武帝对自己身后之事颇有顾虑。他似乎是想让萧子良辅佐嫡长孙以镇住他素不喜欢的萧鸾。再就萧衍而言，他一方面看出萧子良、王融辈之不足以成事，此外还有一层原因可以推知，那就是对齐武帝的不满。《梁书·吴均传》载，吴均作《齐春秋》以梁武帝为齐明帝佐命，盖萧衍父萧顺之之死，与齐武帝有关。《南齐书·武十七王传》载，齐武帝子鱼复侯萧子响为荆州刺史，杀台史、拒台军，"上又遣丹阳尹萧顺之领兵继至，子响部下恐惧，各逃散，子响乃白服降，赐死。"《南史·齐武帝诸子传》记载，萧子响死后，齐武帝颇为悔恨，"顺之惭惧成病，遂以忧卒。"萧顺之死后，萧衍亦颇不得志。后"郁林失德，齐明帝作辅，将为废立之计，帝欲助齐明，倾齐武之嗣，以雪心耻"（《南史·梁本纪》上）。正是这两重因素促使萧衍从萧子良门下又转投到萧鸾麾下。当然，这时他已不愿再充当文士，而以佐命之臣身份活跃在朝廷内外。一方面协助萧鸾篡立，另一方面暗暗扩充自己实力。先是任宁朔将军、镇守寿春，独立一方；萧鸾称帝后，他又被命为冠军将军、军主，曾率军击退北魏进犯，从而赢得了齐明帝萧鸾的信任，晋为右军晋安王司马、淮陵太守。从此，他算是告别了文士兼谋士的特殊身份，而纯然以朝廷重臣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建武四年，北魏孝文帝亲率大军进犯雍州，明帝命萧衍前往应战。由于他率军英勇抵抗，阻止了魏军侵入，不久便被命为都督几乎六个州的军事、辅国将军、雍州刺史。这次任命，对萧衍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为其日后代齐建梁首先在军事上奠定了比较可靠的基础。雍州为长江上游的政治中心和军事重镇，直接控制着京城建康。（参阅陈寅恪先生《金明馆丛稿初编》第63—64页）萧衍驻守雍州以后，随即开始着手准备第二次夺权斗争。特别是在齐明帝萧鸾死后，更加快了步伐。

这次夺权不同于永明末，已经不是要扶持别人上台，而是要自己当皇帝。这时，竟陵八友中年长的沈约、任昉、范云等见风使舵，遂纷纷转向萧衍，为之出谋划策。从上述情况来看，竟陵八友的活动显然不仅仅局限在文化的范围，实际上，他们是把政治领域看作自己最终的落脚点。

也许，他们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时尚毕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他们都想在政治上大有作为，可惜其时不与。本来，竟陵八友之一的萧衍当上了皇帝，其余诸友可以有机会在政治领域大显身手，但结果却并非如此。可以说，他们在政治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特殊贡献，而在文化领域却成就卓著，影响极为久远。竟陵八友在六朝江东文化史上的这种特殊际遇，确实是一个颇耐人回味的问题。

第二节　竟陵八友在永明年间的文化活动

南齐永明年间，实际上至少有四个文人集团活跃一时。依先后次序是：王俭集团、萧子良集团、萧嶷集团、萧子隆集团。竟陵八友中大多和王俭发生过密切关系。譬如说，任昉最先依附其门下，以文义见许。《南史·任昉传》载："俭每见其文，必三复殷勤，以为当时无辈。曰：'自傅季友(亮)以来，始复见于任子。若孔门是用，其人室升堂'。于是令昉作一文，及见，曰：'正得吾腹中之欲'。乃出自作文，令昉点正。昉因定数字。俭拊几叹曰：'后世谁知子定吾文'。其见知如此。"永明七年王俭死，任昉以旧属的身份，特意"缀辑遗文，永贻世范，"并写下长篇《王文宪集序》，叙述生平、表彰业绩，最后又特别拈出知遇之恩："昉尝以

笔札见知，知恩以薄技效德。"除任昉外，永明初年，萧衍、谢朓亦为卫军将军王俭东阁祭酒。王俭曾对何宪说：萧衍"三十内当作侍中，出此则贵不可言"(《梁书·武帝纪》)，足见相知之深。萧琛起家即投身于王俭门下。《梁书》本传载："起家齐太学博士。时王俭当朝，琛年少，未为俭所识，负其才气，欲候俭。时俭宴于乐游苑，琛乃着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俭坐，俭与语，大悦。俭为丹阳尹，辟为主簿。"王融与王俭为从叔侄。永明初，王俭为卫军将军，王融曾作有《赠族叔卫军俭诗》十五章，盛称王俭"威德惟馨"、"唯旦唯公，唯公唯旦，"具有周公之德。这是一首干谒诗，其本意是渴求援引。王俭自然能够领悟。《南齐书·王融传》载："融赠诗及书，俭甚奇惮之，笑谓人曰：'穰侯印讵便可解？'"结果是王融成为王俭的代笔人。《艺文类聚》卷四十六所载王融《为王俭让国子祭酒表》三篇大约就是这时所写。这些人倾心于王俭，可能有两个原因：其一，王俭为琅邪王氏，家族地位十分显赫。东晋王朝所以能在江东立稳脚跟，王导实为第一功臣；刘裕篡晋，王弘又为佐命，威望日隆；萧道成代齐，弘弟王昙首之孙王俭则为首倡，王俭后"以佐命之功，封南昌县开国公"(任昉《王文宪集序》)，并掌吏部、进三公。如前所述，竟陵八友绝不甘心以单纯的文人自居，他们总想在政治上飞黄腾达，所以在宋齐之际便不约而同地依附在王俭门下，也是很自然的事。其二，王俭学问渊博，号一代宗师。《南齐书》本传载，其幼年即"专心笃学，手不释卷"，对历代典籍十分熟悉，二十余岁即撰有《七志》及《元徽四部书目》，"其中朝遗书，收集稍广"(阮孝绪《七录序》)。宋齐之际，"俭为佐命，礼仪诏策，皆出于俭"(《南齐书》本传)。永明三年又于王俭私宅"开学士馆，悉以四部书充俭家。"故此，王俭常以谢安自许，俨然又是一个"江左风流宰相。"这对于书生本色

的竟陵八友自然有莫大的吸引力。王俭研习学问带有明显的功利目的。这里可以略而不论。重要的是，王俭博闻强记，每以隶事用典相炫耀。史载，他曾广集"才学之士，总校虚实，类物隶之，谓之隶事，自此始也"(《南史·王摛传》)。可以说，卖弄学问，缉事比类，是这个文人集团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风尚，反映在诗文创作中，即表现为涂绘古典，竞须新事，甚至拘挛补衲，转为穿凿。竟陵八友中尝依附在王俭门下的任昉、萧衍、萧琛、王融、谢朓等人也不免受其影响。《诗品》称"彦升(任昉字)少年为诗不工，故世称沈诗任笔，昉深恨之，晚节爱好既笃，文亦遒变，善铨事理"。"但昉既博物，动辄用事，所以诗不得奇。少年士子，效其如此，弊矣"。《南史·任昉传》也说其"用事过多，属词不得流便，自尔都下士子慕之者，转为穿凿，于是有才尽之谈矣。"萧衍、萧琛亦以博洽闻名，尤其是萧衍，特别喜欢"多策事"(《太平广记》卷一百九十七)。《梁书·沈约传》曾载，有豫州献栗，萧衍策以栗事，"与约各疏所忆，少帝三事。出谓人曰：'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王融诗亦被视为使事用典的推波助澜者，正如《诗品序》所说："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寖以成俗。"看来是与任昉一样，属词比事，常常崎岖牵引以示博洽。

从上述情况来看，王俭文人集团在创作方面往往是以学问相尚，羌多故实，质朴典正。齐武帝曾问王俭："当今谁能五言？"王俭的回答很耐人寻味："(谢)朏得父膏腴，江淹有意。"谢朏诗已不存，我们无从置论。至于江淹，其诗作多完成在仕宦未盛之时，具体说，实在宋齐之间。仕齐以后，"名位益登，尘务经心，清思旋乏"(姚鼐《惜抱轩笔记》卷八)，遂有"江淹才尽"(《诗品》)之说(详见曹道衡先生《江淹及其作品》、《论江淹诗歌的几个问

题》。见《中古文学史论文集》)。因此,若以永明年间而论,诗名最高的恐排不上江淹,而应推沈约。《诗品》说:"永明相王爱文,王元长等皆宗附之,约于时谢朓未遒,江淹才尽,范云名级故微,故约称独步。"从现存的一些资料来看,钟嵘的这段话无疑是有根据的。《梁书·张率传》云:"率年十二,能属文,常日限为诗一篇,稍进作赋颂。至年十六,向作二千余首。"《南史》本传还记载:"有虞讷者见而诋之,率乃一旦焚毁,更为诗示焉,托之沈约。讷便句句嗟称,无字不善。"张率生卒年史有明文,其十六岁为永明八年。由此可知,沈约在永明年间已诗名大盛,为时人仰重。而王俭只字不提沈约,却推举了古奥劲拔的江淹,这多少反映出王俭的审美情趣,与萧子良文人集团追求平易清丽的创作特色有所不同。正因为如此,当永明二年竟陵王萧子良兼司徒、开西邸,特别是王俭实权多被武帝剥夺之后(考见下章),任昉、萧衍、萧琛、王融、谢朓等先后离开王俭集团。永明七年五月王俭死,这个文人集团也就风流云散,不复存在了。

再看萧嶷文人集团。萧嶷的地位比较特殊,是萧道成的第二个儿子,即齐武帝的弟弟,深为萧道成喜爱。建元元年受封豫章郡王,二年夏,于南蛮园开馆立学,广延才学之士。这里多少有扩大声誉的目的,进而可能包含有某种政治野心。不过,萧嶷的所作所为虽然得到了乃父的赏识,却不可避免地要招致当时为太子、后为齐武帝的萧赜的猜忌。恰好在这时又发生了一桩使双方都感到不安的事:萧赜任太子时,听信张景真,"朝事大小皆专断。"此事为司空谘议荀伯玉所密启。萧道成杀死张景真,并召萧长懋、萧子良负敕诘责其父萧赜。此后,萧道成曾有"以豫章王嶷代太子之意。"这件事使得豫章王萧嶷和齐武帝父子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加紧张。萧赜即位后,为显示自己宽宏大量,曾

作出过一些和解的姿态，比如说，把自己的儿子萧子响过继给萧嶷作为嫡嗣，又为他晋升官爵，等等。但是双方很明白，心存芥蒂，成见很难排除了。永明八年，萧子响被齐武帝所杀，给萧嶷的震动尤其强烈。此后，萧嶷更加畏惧，终日如履薄冰。由于这种政治上的原因，萧子良幕下的文人与萧嶷及其追随者如刘绘、乐蔼、张稷等在永明年间始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而且没有一个人曾再入萧嶷府中任职。永明十年，萧嶷病死，乐蔼请求沈约为撰碑文，沈约竟婉言拒绝。其中隐情，《南史·齐高帝诸子传》透露过一点内幕："嶷死后，忽见形于沈文季曰：'我未应便死，皇太子加膏中十一种药，使我痈不差，汤中复加药一种，使利不断。吾已诉先帝，先帝许还东邸，当判此事'。因胸中出青纸文书示文季曰：'与卿少旧，因卿呈上。'俄失所在。文季秘而不传，甚惧此事。"据此，王鸣盛寻绎道："约谦避作碑，当亦知齐武帝之子文惠太子与豫章王有嫌故耳"（《十七史商榷》）。此言极是。其实，就个人关系而言，刘绘、张稷、乐蔼等与竟陵八友的关系是相当融洽的。如《梁书·刘孝绰传》就称沈约、范云为刘孝绰的"父党"。据《南齐书·刘绘传》载：永明末，京邑人士盛为文章谈议，皆凑竟陵王西邸，绘为后进领袖。"说明刘绘亦尝游西邸，谈文论诗。刘绘有《入琵琶峡望织布矶呈玄晖》诗，谢朓奉作《和刘中书》；刘绘作《咏博山香炉诗》，沈约奉作《和刘雍州绘博山香炉诗》；此外，刘绘还作有《同沈右率诸公赋鼓吹曲二首》（和沈约）、《饯谢文学离夜诗》（和谢朓）、《和池上梨花诗》（和王融），等等，足见往来酬唱之密切。又如张稷，曾为萧衍代齐立下汗马功劳，但入梁后颇受萧衍猜忌。以"昏家"的特殊身份，沈约曾代为辩解，竟惹得萧衍龙颜大怒。仅此又可看

出沈约与张稷的关系亦非同寻常。至于乐蔼，也与沈约交好。据《梁书·乐蔼传》，乐蔼的儿子法才、法藏“少游京师”，“约见而称之。”说明沈约与乐蔼父子相当熟悉。尽管沈约与萧嶷门下文士交往不疏，但在当时却不敢为萧嶷作碑文，除了府主间相互矛盾这个原因外，不可能有其他解释。今存沈约集中有《齐丞相豫章文宪王碑》是应萧嶷第二子萧子恪之请，于建武年间所写。其时，萧赜与萧长懋、萧子良父子都已不在人世，自然不再存在什么违碍的顾虑。

再有一个就是萧子隆文人集团了。在永明八年以前，这个文人集团与萧子良文人集团几乎混同一起，许多文化活动是共同进行的。永明九年春，萧子隆为镇西将军、荆州刺史，竟陵八友中的萧衍、谢朓随赴荆州，这个文人集团才算正式独立开来。除萧、谢二人外，西邸宾僚庾於陵、宗夬等人也是其中重要成员。隆昌元年，萧子隆被害，这个文人集团随之不复存在。

与上述三个文人集团相比较，毫无疑问，以文惠太子萧长懋、竟陵王萧子良为核心的文人集团活动时间最长，参加人数最多，而且影响最大。即以永明年间的文化活动来说，至少可以举出下列几个方面。

一、商讨学问　弘扬释教

《南齐书·萧子良传》载：“子良少有清尚”，“善立胜事，夏月客至，为设瓜饮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贵辞翰，皆发教撰录”。永明五年，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可见规模相当大。此外，他还使宾客各呈技艺，发挥特长，如荐举谱牒名家贾渊，使撰《见客谱》；援引弹琴高手柳恽，乃著《清调论》；推许善解音律的萧惠基，与之品棋论艺……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里特别应当叙及的是

永明年间开始的五礼修撰工作。永明三年，伏曼容表求制定一代礼乐，于时参议置新旧学士十八人，止修五礼，由王俭总其成。永明七年王俭死，徐孝嗣、张绪、何胤等先后参与其事，由萧子良总其成。此后，西邸宾僚如沈约、刘绘等数十人参加了这项工作。直至梁天监十一年底，五礼修撰工作才告完成，共"一百二十秩、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十九条"（详见徐勉《上修五礼表》）。

以上所述，还只是一小部分。事实上，萧子良文人集团最活跃的文化活动是对佛教的弘扬。竟陵王、文惠太子素以佞佛著称，"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南齐书·萧子良传》）一时间，东宫、西邸以及鸡笼山邸成为当时佛教的中心。从现存资料来看，他们的礼佛事佛活动最主要的有下列四次：

1. 永明初年：根据沈约《为齐竟陵王发愿讲疏》、《为齐竟陵王解讲疏》等文，永明元年，萧子良曾"置讲席与上邸，集名僧于帝畿，"规模一定不小。大约与此同时，文惠太子、竟陵王又召开众僧大会，论辨释道异同。据《南史·顾欢传》记载，宋齐间顾欢著《夷夏论》辨析二教之异，"而意党道教"。当时袁粲、明僧绍等参加了论战。永明以后，以文惠太子、竟陵王为佞佛一派，孟景翼为尚道的另一派，再次展开论战。现存孟景翼著《正一论》、张融《门律》、《以门律致书周颙等诸游生》、《答周颙书并答所问》、《与周颙书论释法宠》以及周颙《答张融书难门律》、《重答张融书难门律》等文就是这次论战的部分成果。

2. 永明五年：这一年，萧子良正位司徒、移居鸡笼山，又一次大规模地掀起一场事佛礼佛活动，"亲为众僧赋食、行水，世颇以为失宰相体。"在西邸门客中，唯有范缜"盛称无佛。"子良诘难

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贵贫贱？"范缜针锋相对："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中。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后又"退论其理，著《神灭论》。"此书一出，朝野喧哗，"子良集僧难之而不能屈"。（《梁书·范缜传》）子良又诱以高官厚禄，范缜坚持决不"卖论取官"（《南史·范缜传》）。在这场大论战中，竟陵八友多被卷了进去，像沈约、萧衍、萧琛等还是其中攻击范缜的急先锋。特别是萧衍，人梁后又以帝王之尊纠集和尚法云、东宫舍人曹思文以及沈约、范云、陆倕等六十六人，先后写了七十余篇文章，围攻神灭论。可见永明年间开始的这场论战持续之久远。

3.永明七年：《高僧传·释僧辩传》载："永明七年二月二十九日，司徒竟陵文宣王梦于佛前咏《维摩》一契，因声发而觉，即起至佛堂中，还如梦中法更咏古《维摩》一契，便觉韵声流好，有工恒日。明旦即集京师善声沙门龙光（寺）智知、新安（寺）道兴、多宝（寺）慧忍、天保（寺）超胜及僧辩等，集第作声。"陈寅恪先生认为这次集会"是当时考文审音的一件大事。"这次集会，陈寅恪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及《四声三问》引证甚详，不拟赘述。这年十月，还有一次众僧集会，这在释僧祐《略成实论记》中有过详细记载：

> 齐永明七年十月，文宣王招集京师硕学名僧五百余人，请定林僧柔法师、谢寺慧次法师，于普弘寺迭讲，欲使研覆幽微，学通疑执，即坐，仍请祐及安乐智称法师，更集尼众二部名德七百余人，续讲《十诵律志》，令四众净业还白。公每以大乘经渊深，漏道之津涯，正法之枢纽。而近世陵废，莫或敦修，弃本逐末，丧功繁论，故即于律座令柔次等诸论师

抄比《成实》，简繁存要，略成九卷，使辞约理举，易以研寻。八年正月二十三日解座，设三业三品，别施奖有功、劝不及。上者得三十余件，中者得二十许种，下者数物而已。即写略论百部流通，教使周颙作论序，今录之于后。

所谓《成实论》，为古印度诃梨跋摩所作，十六卷。萧子良集众僧将其删定为九卷本，以便流通诵读。周颙为此节本所作序文仍还保存下来。本年两次集会，道俗之士多达数千人，竟陵八友及西邸宾僚大多参加了这两次集会（详见《高僧传·法献传》等），并且是其中相当活跃的人物。

4.永明十年：《续高僧传·释明彻传》："齐永明十年竟陵王请沙门僧祐，三吴讲肆。"又《僧旻传》："文宣尝请柔次二法师于普宏寺共讲《成实》……永明十年始于兴福寺讲《成实论》。"显然，这次开讲，紧承永明七年，僧祐，僧旻为当时最要人物。

礼佛事佛不仅表现在口议上，萧子良文人集团所做的工作更多的是集中在抄录注疏方面。萧子良自名净住子，著有《净住子净行法门》二十卷，王融作颂；又抄录《华严》、《大集》诸经律凡三十六部、注《遗教经》一卷，著《维摩义略》五卷、《杂义记》二十卷、《会稽荆雍江郢讲记》一卷、《西州法云小庄严普弘寺讲》并《述羊常弘广斋》共一卷。其所著弘法文字在梁时集为十六帙、一百十六卷（详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萧衍依附于萧子良，与名僧及佞佛文士多有交往，深受影响。其登基的第三年即宣布舍道归佛，亲率僧俗二万人在重云殿发愿信佛，并推广天下，不啻把佛教抬到国教的位置。翌年又命释宝唱"总撰集录，以拟时要"（《续高僧传·释宝唱传》）。五年，"搜访术能"从事译经工作（详《续高僧传·伽婆罗传》）。从《续高僧传》等书中知道，萧衍曾命宝亮著《涅槃经疏》、《经律异相》、僧朗（法朗）、建元

著《涅槃经注》、僧旻编《众经要抄》、智藏集众经义理为《义林》，等等。萧衍还三次敕编有关佛经目录，其中第三次由僧祐编《出三藏记集》是我国现存较古而且较完善的经录。不止于此，萧衍还亲为撰著，"诸经义记，复数百卷。"至于沈约、王融等人，亦曾研讨众经，多所著述，于佛法笃信弥坚。

二、诗歌创作

《南史·王僧孺传》载：虞羲、丘国宾、萧文琰、丘令楷、江洪、刘孝孙、徐寅等并游萧子良门下，子良夜集文士，"刻烛为诗。四韵者则刻一寸，此以为率。（萧）文琰曰：'顿烧一寸烛，而成四韵诗，何难之有？'乃与令楷、江洪等共打铜钵立韵，响灭则诗成，皆可观览。"这段记载具体而微地描绘出了西邸文士的诗歌创作情状。其实，这几个人的诗名在当时并不显赫，与沈约、谢朓等人相比，颇为逊色。真正能反映当时诗坛盛况的，主要还应该看竟陵八友的创作。

竟陵八友或奉诏而作，或相互唱和，其集中创作而又有时间可考的主要有下列四次：

1.永明三年：是年三月诏立国学，其冬，皇太子讲《孝经》。武帝下诏："皇太子长懋讲毕，当释奠。王公以下可悉往观礼。"当时有司徒萧子良、国子祭酒王俭以及沈约、任昉、何胤、陆琏、王思远、阮彦、王僧令、袁浮丘等人并作有《侍皇太子释奠宴诗》，均四言。《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永明三年《释奠诗》一卷，惜已失传，仅存上述诸人诗作。

2.永明五年：萧子良正位司徒以后，门下宾僚日多，是诗歌创作最丰赡的时期。象比较著名的乐府诗《永明乐》大约就作于这年前后。沈约有《谢齐竟陵王示永明乐歌启》，说明这是同题酬唱之作。《南齐书·乐志》载："《永明乐歌》者，竟陵王子良与诸

文士造奏之，人为十曲。道人释宝月辞颇美，上常被之管弦而不列于乐官也。"可惜释宝月之作失传。谢朓、王融各十首仍存，沈约仅残存一首②。

3.永明八年：萧子良作《登山望雷居士精舍同沈左卫过刘先生墓下作》，诗序有"益深宿草之叹。"宿草代指一年。刘瓛卒于永明七年，则此诗当作于永明八年。刘瓛在齐梁士人心目中地位颇高，时人把他和东汉所谓"关西孔子"杨震相比拟（刘峻《辨命论》），所以西邸文人与之多有过从，如任昉有《求为刘瓛立馆启》，刘绘曾从求学，颇受其思想影响。是年，经刘瓛墓并奉和萧子良诗作的人一定不在少数，但大多失传，仅存沈约、谢朓、虞炎、柳恽、萧子隆等人的和诗。

4.永明九年：这年春天，谢朓随萧子隆赴荆州，以沈约、任昉为首为之饯行。沈约、范云、刘绘、虞炎、王融、萧琛作诗送行，题为《饯谢文学离夜》，谢朓答诗题为《和沈右率诸君饯谢文学》。大约与此同时，萧衍亦赴荆州。任昉、宗夬、王融、虞羲、萧琛等又作《别萧咨议衍诗》，萧衍作《答任殿中宗记室王中书别诗》以为酬答。

在永明九年以前，竟陵八友的诗歌创作当然远不止于此。譬如说，在八友诗作中占有相当大比例的咏物诗、游仙诗、集名诗、艳情诗以及联句等，绝大多数作于永明年间，不可能逐一叙述。上面所列，只是几次比较集中的同题诗歌创作。

三、辞赋创作

永明年间，竟陵八友曾写下大量的章、表、疏、启、奏等各体文章，而且大都文采华美、骈散兼行，具有较高的欣赏价值。只是这类文章多为实用文体，同题竞写的非常少见。作为一种酬唱往来的文学活动，除诗歌外，主要体现在辞赋创作上。竟陵八

友参加写作的同题赋作主要有以下四篇：

1.《高松赋》：参加者至少有萧子良、萧子恪、谢朓、沈约、王俭诸人。又沈约、范云并有《咏寒松诗》，估计亦同时所作，而范云的同题赋不传。此赋的创作年代约略可考。据《梁书·萧子恪传》载："年十二，和从兄司徒竟陵王《高松赋》，卫军王俭见而奇之。"萧子恪十二岁为永明七年。又王俭永明七年五月卒。王俭亦有同题赋《和竟陵王子良〈高松赋〉》，说明此赋必作于永明七年，且在五月以前。

2.《梧桐赋》：参加者至少有萧子良、王融、沈约诸人。又沈约、王融、谢朓并有《咏梧桐诗》，当亦同时所作，而谢朓同题赋失传。

3.《拟风赋》：参加者至少有萧子良、王融、沈约、谢朓诸人。又谢朓有《咏风诗》，大约亦作于同时。

4.《七夕赋》：参加者至少有萧子良、谢朓诸人。

此外，谢朓有《杜若赋奉随王教于坐献》，也是永明年间应教之作，可惜仅存此篇。

以上，我们仅就萧子良文人集团在永明年间的文化活动作了极其粗略的描述，不难看出，其活动范围之广泛，参加人数之众多，成果之丰赡，确实是当时其他文人集团所不可比拟的。何况，这个集团的文化活动显然又不仅仅局限在永明十一年间。事实上，正如上文介绍，这个集团的重要成员如竟陵八友中一些人早在宋末即已结交，几十年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风云变幻的齐梁之间，自始至终扮演着重要角色，对当时和后来都曾发生过重要的影响。

第三节 竟陵八友的评价

竟陵八友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特别是他们对于当时政界及文坛的影响,尤其引人注意。唯其如此,以往的研究自然也就常常围绕这些问题而展开,曾提出过许多独到见解,给后来者以很大的启迪。不过,学术研究永无止境,仅仅满足于已有的结论显然是不够的。基于这点认识,我想更换一下研究角度,把竟陵八友置于六朝文化演进过程中加以综合观照,那么便可以得出下列三个方面的初步结论。

一、促进南北士族的融合

中国古代文化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系统:一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北方文化系统,一是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南方文化系统。在春秋战国时期,两大文化系统经过长时间的较量,逐渐从对立走向交融,最终孕育出了秦汉大一统文化。但是到了东汉末叶,随着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南北方文化又处于一种相对隔离状态。饶有兴趣的是,历来以经世致用的儒学传统相标榜的北方文化思想界,特别是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地区却被南方文化系统的老庄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而老庄文化发源地的南方文化思想界,却笼罩着浓郁的儒学色彩。这种阴差阳错状态是由许多复杂的历史原因造成的。关于这一点,唐长孺先生《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见《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何启民先生《中古门第研究》(台湾学生书局 1982 年再版)等著述都曾作了充分的论述,可以参看。

公元 280 年,晋武帝司马炎渡江平吴,统一了全国。南北文

化在经历了近百年的隔绝后开始了第一次正面冲撞。当然，作为文化主体的南北士族在这次冲撞中的表现是颇不相同的。对于北方士人来讲，他们是战胜者，在文化心理方面带有强烈的优越感；南方士人恰恰相反，他们自感是战败者，时势将迫使他们离开自己所熟悉的文化背景，过江北上，俯首称臣，其屈尊自卑之情不难想见。这种心理使得许多吴郡大姓如顾荣、蔡洪、陆机、陆云等在亡国后沉隐多年才肯出仕。尤其使他们感到难堪的是，初到北方，很多中原士人很看不起他们，盛气凌人，出言不逊。《世说新语·言语篇》载：

满奋畏风，在晋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实密似疏，奋有难色。帝笑之。奋答曰："臣犹吴牛，见月而喘。"

蔡洪赴洛，洛中人问曰："幕府初开，群公辟命，求英奇于仄陋，采贤儁于岩穴。君吴楚之士，亡国之余，有何异才，而应斯举！"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于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于昆仑之山。大禹生于东夷，文王生于西羌，圣贤所出，何必常处？昔武王伐纣，迁顽民于洛邑，得无诸君是其苗裔乎？"

很显然，满奋和所谓"洛中人"是以极鄙夷的神情和口气来嘲弄南人。据刘孝标注："今之水牛，唯生江淮间，故谓之吴牛。南方多暑，而此牛畏热，见月疑是日，所以见月而喘。"满奋用"吴牛喘月"这个故实讥讽吴人的落后和愚昧。这种成见在北方士人中并不少见。入洛的吴人，在洛中人的心目中属于文化上的"仄陋"与"岩穴"之人，政治上的"亡国之余。"但是不少吴人并不甘心于屈辱，类似蔡洪的反唇相讥也不少见。《晋书·周处传》："及吴平，王浑登建邺，置酒既酣，谓吴人曰：'诸君亡国之余，得无戚

乎?'处对曰:'汉末分崩,三国鼎立,魏灭于前,吴亡于后,亡国之戚,岂惟一人?'浑有惭色。"陆机、陆云兄弟由于张华的延誉和荐举,曾获得了很高的声望,但同时也招来了很多忌恨,致使"人多恶之"(《太平御览》卷四百二十三引《十国春秋》),常常抛来冷言冷语,使出身于南方望族的陆机兄弟不得不进行自卫和反击:

> 陆机诣王武子,武子前置数斛羊酪,指以示陆曰:"卿江东何以敌此?"陆云:"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
>
> ——《世说新语·言语篇》
>
> 卢志于众坐间问陆士衡:"陆逊、陆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于卢毓、卢珽。"士龙失色。既出户谓兄曰:"何至于此。彼此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鬼子敢尔。"
>
> ——《世说新语·方正篇》
>
> 陆士衡初入洛,咨张公所宜诣,刘道真是其一。陆既往,刘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礼毕,初无他言,唯问:"东吴有长柄壶卢,卿得种来不?"陆兄弟殊失望,乃悔往。
>
> ——《世说新语·简傲篇》

上述材料虽然不能完全说明南北士人之间存在着什么水火不融的尖锐对立,但它告诉我们,由于多年地理上的闭塞,势必造成南北士人心理上的隔膜。这种隔膜不仅仅在气质、习俗、乃至方言等方面表现得有所不同,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思想观念、价值标准以及处世态度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西晋统治的五十余年间,中原士人固已志得意满,扬眉吐气,而吴姓士人也从未甘拜下风。《晋书·左思传》曰:"陆机入洛,与弟云书曰:'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关于左思

《三都赋》写作年代，历来认为是在陆机入洛以后。但据高步瀛先生《文选李注义疏》及傅璇琮先生《左思〈三都赋〉写作年代质疑》考证，此赋当作于280年平吴之前傅文见《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辑）吴亡后，陆机"自以吴之名家"，"不附中国人士"（《晋书·张华传》），隐居家乡，"积有十年"（《晋书·陆机传》）。其实又何止陆机，这种心理状态在吴人中是十分普遍的。《晋书·刘颂传》载有刘颂《除淮南相在郡上疏》，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夫吴越剽轻，庸蜀险绝，此故变衅之所出，易生风尘之地。且自吴平以来，东南六州将士更守江表，此时之至患也。又内兵外守，吴人有不自信之心，宜得壮王以镇抚之，使内外各安其旧。又孙氏为国，文武众职，数拟天朝，一旦堙替，同于编户。不识所蒙更生之恩，而灾困逼身，自谓失地，用怀不靖。"这颇能反映出当时吴人的对抗情绪。

然而有趣的是，历史就好像有意要摆出一副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似的，也给了北方士人一点难堪。公元317年，司马睿建都江南，一大批中原士族随之渡江南下，揭开了南北士族第二次冲突的序幕。这回，北方士人的心态可全然不像西晋初年那样以胜利者自居而坦然自负了，而是有一种"寄人国土"的卑屈感。再说吴人由于在西晋初年受到排挤，本来对北方士人就没有多少好感，这时更不愿意把他们放在眼里。《世说新语·方正篇》载："王丞相（导）初在江左，欲结援吴人，请婚陆太尉（玩），对曰：'培塿无松柏，薰莸不同器。玩虽不才，义不为乱伦之始。'"与北人通婚，竟被吴人目为"乱伦"，南北士人情绪之对立，于此可见一斑。所以在江东建国之初，"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晋书·王导传》）。更有甚者，当时由情绪对立竟发展为军事对抗。《晋书·周处传》载："时中国亡官失守之士避乱来者多

居显位，驾御吴人，吴人颇怨，勰因之欲起兵，潜结吴兴郡功曹徐馥，馥家有部曲，勰使馥矫称叔父札命以合众"，以讨王导、刁协为名而起兵反叛。由此可见，吴姓士族与侨姓士族的矛盾确实很尖锐，是当时不可忽视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下，王导力劝晋元帝不惜屈尊去笼络吴姓望族"以结人心。"《晋书·王导传》载王导之论曰：'古之王者，莫不宾礼故老，存问风俗，虚己倾心，以招俊义。况天下丧乱，九州分裂，大业草创急于得人者乎？顾荣、贺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结人心。二子既至，则无不来矣"。晋元帝接受了王导的倡议，恩威并施，很快平抚了江东的军事反叛。（参阅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载《金明馆丛稿初编》）同时他又"务在清静"，重开谈座，使渡江士族逐渐忘却身在他乡。肥水之战后，东晋大胜，司马氏和北方士族遂在江南站稳了脚跟。此后，南北士族的对立情绪从表面上来看开始有所缓和。《世说新语·雅量篇》载：

> 许侍中（璪，义兴阳羡人）、顾司空（和）俱作丞相从事。尔时已被遇，游宴集聚，略无不同。尝夜至丞相许戏。二人欢极。丞相便命使入己帐眠。顾至晓回转，不得快熟；许上床，便自咍台大鼾。丞相戏谓诸客曰："此中亦是难得眠处。"
>
> 谢安南（奉，会稽山阴人）免吏部尚书还东，谢太傅（安）赴桓公司马（温）出西，相遇于破冈。既当远别，遂停三日共语。太傅欲慰其失官，安南辄引以他端，虽信宿中涂，竟不言及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尽，谓同舟曰："谢奉故是奇士。"

南北士人的关系有所改善是不言而喻的。但我们总是感觉这种

和好还显得很不自然，心里的隔阂并未完全消除。这种情形直至南朝初年仍复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表现。《南齐书·文学·丘灵鞠传》载，永明二年，丘灵鞠领骁骑将军。他不乐武位，发牢骚说："我应还东，掘顾荣冢。江南地方数千里，士子风流，皆出此中，顾荣忽引诸伧渡，妨我辈涂辙，死有余罪。"史家常引这条材料用来说明南北士族的矛盾长期存在，只是在宋齐以后，其影响越来越小罢了。

这里实际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南北士人的矛盾在宋齐以后变得越来越小？不同的研究者会有不同的结论。我个人以为，以竟陵八友为中坚的萧子良文人集团在南北士人融合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应当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从竟陵八友的籍贯及门荫来看，他们本身堪称是南北士人的典型代表：沈约，吴兴人；陆倕，吴郡人，同属东南望族。稍有不同的是，吴郡陆氏在魏晋时期声望最显，而吴兴沈氏则发迹于东晋刘宋年间。钟嵘《诗品序》称沈约、谢朓、王融"三贤或贵公子孙。""或"字，吕德申《诗品校释》据《吟窗杂录》本校订作"咸"，所见极是。这说明齐梁之际，沈约已与王、谢子弟并称，可见其社会地位的提高。王融，琅琊人；谢朓，陈郡人，同属侨姓头等士族；萧衍、萧琛，兰陵人，系渡江后起士族；范云，南乡人；任昉，乐安人，《三国志·王昶传》裴注：乐安任嘏"世为著姓"，亦为渡江大户。在漫长的交往过程中，他们彼此坦诚相待，汇聚西邸而成为挚友。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似乎有理由把竟陵八友的结交看作是南北士族逐渐从对立走向融合的一个缩影。

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活动才格外引人瞩目。加之他们中的一些人如沈约、范云、任昉等对后进常奖掖提携，从而吸引了大批南北文人和学士，或酬赠往来，或追随依附，云蒸霞蔚，盛

况空前。从南朝五史的记载以及有限的齐梁诗文中可以约略考知，与竟陵八友相过从的当时名流不下百余人，其中有不少人关系相当密切。即以南朝五史的记载为例：

先看侨姓士人——

沛国刘瓛、刘显等（沈约、任昉、萧子良等与之游）。

彭城刘绘、刘孺、刘孝绰、刘孝孙、到溉、到沆、到洽、到沼等（沈约、任昉、陆倕、谢朓、萧子良等相与过从）。

平原刘峻等（沈约曾与策经史事）。

东莞刘勰等（沈约曾为之延誉）。

兰陵萧几、萧子显、萧惠基、萧文琰、李元履等（沈约、王融、萧琛、萧子良等与之多有往来）。

东海徐孝嗣、何逊、王僧孺、徐勉、何思澄等（沈约、任昉、王融等与之关系非常密切）。

陈郡谢举、谢景、谢览、殷钧、殷芸、周兴嗣等（沈约、谢朓、任昉、萧琛、陆倕等多加赞誉）。

琅琊王筠、王规、王思远、王亮、王峻、王籍等（沈约、陆倕、萧琛、萧子良等多与品题唱和）。

新野庾杲之、曹景宗（景宗曾以"竞病"入韵为诗，使沈约"惊嗟竟日"）。

颍川钟嵘（尝求誉于沈约）。

河东裴子野、柳恽等（沈约、任昉、范云、陆倕、萧琛、萧子良等曾为延誉）。

济阳范岫、江革、江洪等（沈约、谢朓、王融、萧子良等多与酬唱答赠）。

清河崔慰祖（沈约、任昉、谢朓等颇称服其"硕学"）。

南阳乐蔼、宗夬、刘之遴等（沈约、萧子良等多所褒奖）。

河内司马褧(以"强力专精"而为任昉推重)。

平昌伏曼容、伏暅等(与任昉世交,也曾与沈约共事)。

范阳张缅(陆倕与游)。

高阳许懋(范云与游)。

南乡范缜(沈约、范云、萧琛等与之相聚于西邸)。

汝南周颙(沈约、萧子良等并与之友善)。

高平徐寅(以文义为萧子良欣赏)。

北地傅昭(萧子良、陆倕与游)。

再看吴姓士人——

吴郡张稷、张充、张融、张率等(沈约、任昉、陆倕、萧子良等与之关系十分密切)。

吴郡陆慧晓、陆厥等(沈约、萧子良等多与过从)。

吴郡范述曾、杜京产、朱异等(沈约曾为荐举延誉)。

吴兴沈驎士、沈峻、沈瑀、丘国宾、丘令楷等(沈约、范云、萧子良等曾与往来酬答)。

会稽虞炎、虞羲、虞阐、虞荔等(沈约、陆倕、萧子良等多与交游)。

会稽孔休源、孔稚珪等(沈约、萧子良等相与友善)。

丹阳陶弘景(沈约曾多次赠诗文以表钦慕)。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上述诸人,很多都出身于当时士族大家,如北人汝南周氏、东海徐氏、南人吴郡顾氏、陆氏等,出身都较高。当然也有门户较低的,如彭城到氏,但这样的人不多。章宗源、姚振宗的《隋书经籍志考证》分别著录了很多族谱家传之类的书目。与上述人物有关的如沛国有《刘氏谱》,陈郡有《谢氏谱》《殷氏谱》及《殷氏家传》,琅琊有《王氏谱》《王氏江左家传》,河东有《裴氏家传》,济阳有《江氏家传》,清河有《崔氏谱》《崔氏

五[illegible]家传》、河内有《司马氏系本》，高阳有《许氏谱》，南乡有《范氏谱》，汝南有《周氏谱》，北地有《傅氏谱》，吴郡有《张氏谱》《陆氏谱》，吴兴有《沈氏家传》，会稽有《虞氏谱》《虞氏家传》及《孔氏家传》等等，可见这些家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都以门第相标榜，自视甚高。他们能不约而同地汇聚到西邸，来往揄扬，赋诗游宴，形成了一个以竟陵八友为中心的士族网络，在客观上促进了南北士族的融合，逐渐消除彼此间久已形成的隔膜。

二、推动文化事业的繁荣

心理隔膜的消除，这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它为南北士人在思想观念上的交融，为当时学术文化上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东汉以来，儒释道三教为取得意识形态上的正统地位而有过激烈的争斗。东晋南朝初年，随着南北士人在思想观念上的广泛交流，这种论争才渐趋平缓。当时学者更关心的问题似乎已不是揭示三教之异，而是寻找三教之同。《世说新语》多次记载东晋高僧支遁不仅精研佛理，对于老庄之学也能"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文学篇》）。东晋孙绰作《喻道论》也说："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外内名之耳。"刘宋宗炳作《明佛论》也说："孔老如来，虽三训殊路，而习善共辙也。"又刘宋大儒雷次宗的礼学即传自慧远。《高僧传》卷六："时远讲丧服经，雷次宗、宗炳等并执卷承旨。次宗别著义疏，首称雷氏。宗炳因寄书嘲之：'昔与足下共于释和尚间面受此义，今便题卷首称雷氏乎？'"按同卷称慧远"内通佛理，外善群书。""博综六经，尤善庄老。"又宋齐间顾欢又作《夷夏论》称"道即佛也，佛即道也。"这些论点反映了晋宋之际三教已有所趋同的情形。特别是到了南齐永明年间，以竟陵八友为主体的南北士人，徘徊于道论释典之间，出入于内外两教之际，加速了这种融合的趋势。当时

素以儒学闻名的刘瓛，对释惠基"申以师礼，"于释法安"禀服文义，共为法友"(《高僧传》卷八)，表露出高度的景仰之情。又以"泛览百家，长于佛理"著称的周颙，同时还"兼善《老》《易》，"与张融相遇，"辄以玄言相滞，弥日不解。"自称"吾门世恭佛"的张融又主张"道与佛也，逗极无二，寂然不动，致本则同"(《门律》)，临死时又遗命入殓时要"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南齐书》本传)。而道教徒孔稚珪则认为佛道同源殊途，"推之于至理，理至则归一；置之于极宗，宗极不容二"(《答萧司徒书》)。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萧衍集诸家之说，于天监初年明确提出了"三教同源"的主张，将持续了近五百余年的这场论争，以政治力量宣布暂告一个段落。

思想界的活跃，势必带来学术文化的繁荣。齐梁之际，以竟陵八友为代表的南北士人以流览典籍为乐事，以勤奋著述为荣耀，撮要搜奇，研精覃思，在魏晋南北朝文化发展史上曾写下较为绚丽的一页。《隋书·经籍志序》载："齐永明中，秘书丞王亮、监谢朏，又造《四部书目》，大凡一万八千一十卷。齐末兵火，延烧秘阁，经籍遗散。梁初，秘书监任昉，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内列藏众书，华林园中总集释典，大凡二万三千一百六卷，而释氏不豫焉。梁有秘书监任昉、殷钧《四部目录》。又《文德殿目录》。其术数之书，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暅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录》。"按王亮、谢朏所撰《四部目录》，阮孝绪《古今书最》题作《齐永明元年秘阁四部目录》，并说"五千新足，合二千三百三十二帙，一万八千一十卷。"此"五千新足"当是指在《宋元徽元年秘阁四部目录》编成以后至永明元年以前十年间的著述。又任昉等撰著目录，在《梁书·刘峻传》《任昉传》《张率传》《殷钧传》《到洽传》等均曾叙及。此目录至天监四年始校定完毕，故《古今书最》

著录为《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目录》及《术数书目录》两种，合“二千九百六十八帙、二万三千一百六卷。”如果把这两份目录略加比较就会看出，从永明元年至天监四年，其间共有二十二年，而书籍增加六百三十六帙、五千零六十卷。但是有两点必须注意：第一、这五千余卷书籍仅仅是这二十二年间很少的一部分。阮孝绪《七录序》说：“齐末兵火，延及秘阁，有梁之初，缺之甚众。”说明南齐著述绝大部分都毁于兵燹。第二、这五千余卷书籍，一部分可能是继续搜罗的前代遗佚，其余部分则作于永明年间。永明以后到齐亡共八年，其间统治阶级内部的厮杀越演越烈，人人自危；边境战火不息，国无宁日。在这种情况下，著书立说的各种条件已远不及永明年间。如果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我们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五千余卷著述虽然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数目，但却从整体上反映了南齐文化发展与繁荣的盛况。

还需要指出的是，南齐文化上承刘宋余绪，下启梁陈先河，是南朝文化发展变化的关键时期。其中最显著的标志是，以南齐为轴心，在宋齐之际以及齐梁之间曾有众多带有总结式的巨著相继问世。仅就现存的书籍来看，《文心雕龙》和《诗品》被学人誉为“体大而虑周”、“思深而意远”（章学诚《文史通义》）的文学理论双璧；《古画品录》以及《续画品》《书品》被后世目为“万古不移”之作（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评谢赫“六法”）；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世说新语》为轶事小说渊薮；释僧祐编《出三藏记集》及《弘明集》是现存最早的佛藏编目和佛学论文集；慧皎著《高僧传》是现存最古的佛徒传记；《昭明文选》及《玉台新咏》是现存最早的诗文选集；陆修静《三洞经书目录》是现存最早的道藏编目；又后来列入廿四史的《宋书》《南齐书》都是齐梁人的杰作。至于今已失传的大著作如目录类有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与文

学批评相关的有王微《鸿宝》、沈约《宋世文章志》《集钞》；此外，类书有刘峻《类苑》、萧子良组织编写的《四部要略》、萧衍组织编写的《华林遍略》、萧纲组织编写的《法宝联璧》等，更是多得不胜枚举。“这种总结式的大著作成批出现，标志着一个长期文化时代的开端而不是结束。看来，可以承认梁代及其前后是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关键时刻之一”（金克木《〈玉台新咏〉三问》，见《文史知识》1986 年第 2 期）。而在这个“关键时刻”，竟陵八友不仅自己勤奋著述，而且与当时作家学者广泛交流，辩难质疑，权书衡论。这些活动对后来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我认为，南朝文化的发展与繁荣，除了政治、思想以及经济的大背景以外，竟陵八友的活动确实也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三、引领士族命运的转折

在南北士族从对立走向融合的历史进程中，他们自身也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

在《从武力强宗到文化士族——吴兴沈氏的衰微与沈约的振起》一文中（见附录），我集中考察了东南豪族，特别是吴兴沈氏在东晋南朝的兴衰际遇，并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吴兴沈氏在政治上的衰微及沈约在文化上的振起为显著标志，东南最有影响的豪族都已纷纷弃武从文，先后从武力强宗转向文化士族。”这里还要进一步强调，这种历史性的转变显然不仅限于东南豪族。事实上，时势业已把侨姓士族推向了这种转变的关口。

其实，早在晋宋之际，这种转变即已略见端倪。琅琊王氏、陈郡谢氏自是南渡头等士族，但在“寒人”刘裕掌权后，他们的实权已被大大剥夺。其原因后面还要论及。这里只需指出这样一个事实：王、谢后人很多在刘宋以后转向文史领域，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影响越来越小。其他如济阳江氏、汝南周氏等，晋代即属

高门甲族，颇有政治势力，但在宋齐以后，其活动也更多地趋向文史领域。渡江甲族，大多类此。刘宋统治者汲取东晋"政出多门"的历史教训，为抑制世代阀阅势力，启用了很多包括北府兵旧部在内的兵家将种来支撑自己的权力机构。耐人寻味的是，在齐梁之际，那些勇冠三军的武将后代竟也紧步王、谢后尘，相继加入到文人的行列。

平原刘怀珍：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率数千人讨平司马顺则，声名鹊起。宋孝武帝大明中，参与讨平桂阳王休范、建平王景素的反叛，后又辅佐萧道成代宋建齐。齐建元元年封霄城侯，成为宋齐之际著名将领。其后人有刘峻、刘杳等，均以博综群籍而闻名于世。《梁书·刘杳传》载，沈约、任昉等饱学之士"每有遗忘，皆访问焉。"其学问之博于此可见一斑。

东莞刘穆之：东晋末年以平桓玄功而封西华县五等子。刘裕辅政，愈加信任，使之总理朝政，外供军旅。刘裕称他"戎车远役，居中作捍，抚宁之勋，实洽朝野，"是刘宋初年朝廷中数一数二的重臣。曾孙刘祥却"少好文学"，以著《宋书》及《连珠》十五首闻名于世。

彭城刘勔：刘宋大将，曾参与平定竟陵王诞的反叛，被封为金城县五等侯。后人刘孺"少好文章，性又敏速，尝在御坐为《李赋》，受诏便成，文不加点，"有文集二十卷；刘遵，被萧纲誉为"文史该富"、"辞章博赡"；刘绘，永明中重要作家。《南齐书·刘绘传》载，"永明末，都下人士盛为文章谈义，皆凑竟陵西邸，绘为后进领袖。"刘绘子刘孝绰在永明中颇得王融赏异，号为神童。入梁后为昭明太子赏接。"太子文章，群才咸欲撰录，太子独使孝绰集而序之。"据曹道衡、沈玉成先生考证，刘孝绰又是《昭明文选》的最主要编纂者（详《有关文选编纂中几个问题的拟测》，见

《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8 年版)。孝绰子刘谅,"少好学,有文才,尤悉晋代故事,时人号曰'皮里晋书'。"孝绰弟刘潜亦"并工属文。"

彭城到彦之:刘宋大将。刘裕讨伐孙恩,"以乡里乐从每有战功","后以军功封佷山县子。"后人到沆,"善属文,工篆隶"。梁初,文德殿置学士省,"沆通籍焉";到洽,常与萧琛、任昉、到沆等游宴赋诗,颇得梁武帝激赏。其他如到溉、到镜、到沼、到荩等,均为一时之选,难怪梁武帝感叹"诸到可谓才子。"

河东柳元景:"少便弓马,数随父伐蛮,以勇称。"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元景为建威将军,总统军帅。后平定鲁爽、臧质反叛,以本号加开府仪同三司,封晋安郡公,进司空。被时人目为中兴第一功臣。其从子柳世隆亦以"文武兼资"而深得萧道成、萧赜父子赏识。宋末以平定沈攸之功而封贞阳县侯。常自谓"马稍第一、清谈第二、弹琴第三,"仍以武功为主。其子柳惔,"好学工制文,尤晓音律;"柳恽尤多才艺,善尺牍,工诗书,青年时所写的"亭皋木叶下,垅首秋云飞,"深为王融嗟赏,书于斋壁及所执白团扇上。入梁又为武帝赏接,其和武帝《登景阳楼篇》起句:"太液沧波起,长杨高树秋,翠华承汉远,因乡辇风游。"当时咸共称传。又善音律、围棋、通医术。梁武帝曾对周捨称赞柳恽:"分其才艺,足了十人。"

南阳宗悫:"任气好武,"少有"乘长风破万里浪"的大志。元嘉二十二年伐讨林邑大胜,名著一时。元嘉三十年宋孝武帝讨伐刘劭,其领中兵,功次柳元景。大明三年豫讨竟陵王诞,颇得孝武帝嗟赏。后人宗夬,为西邸重要学士之一。

类似这样的材料还可以举出很多,它们所反映出来的基本情势是显而易见的:宋齐以来,同东南豪族一样,绝大多数侨姓

士族也相继弃武从文，逐渐走上文化士族的道路。至齐梁之际，这种转变已经大体完成，所以任昉对梁武帝说："臣常窃议，宋得其武，梁得其文"（《梁书·到洽传》）。这里，任昉说的只是到氏一家，但无妨认为，他无意中道出了这一现象的普遍性。而南齐则是从"宋得其武"到"梁得其文"的过渡阶段。上述武将的后裔，或是萧子良西邸的重要宾僚，或释褐起家于永明年间，大都与竟陵八友有着密切关系。他们涉世伊始，就置身在以竟陵八友为代表的南北士人所共同创造的文化氛围中，声歌征逐，诗酒流连，既深受永明文化的影响，同时又积极参与了永明文化建设工作。他们正是以此为基始，引领了各自家族完成了这种由武向文的历史性转变。

在对南北士族风尚的这种嬗变深感惊异之余，我们不能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以竟陵八友为代表的南北士族为什么在晋宋以后"常恶武事"而纷纷转向文化士族呢？

就一般情形而言，影响并推动这种历史性转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譬如说，魏晋以来鄙武尚文的士人风尚就是其中一个比较明显的因素。秦汉时期，许多文士多以武功相尚，与魏晋以后的士风很不相同。司马相如不仅"好读书，"也好"学击剑"（《史记》本传）。班超投笔从戎，其少子班勇"少有父风。"其他如赵充国、马援、张骞、东方朔等，都以修习战备、勇武慷慨而为世人称道。东方朔曾不无自负地说："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汉书》本传）。但是，自汉末以来，这种尚武精神发生了逆转。那些创立了赫赫战功的兵家将子，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竟常常为时人所轻视，显得十分尴尬。《三国志·蜀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载："张飞尝就巴宿，巴不与语。飞遂忿恚。诸葛亮谓巴曰：'张飞虽实武人，敬恭足下。

王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虽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处世，当交四海英雄，如何与兵子共语乎？'"又《吴志·孙坚传》注引《吴录》："（王睿）与坚共击零桂贼，以坚武官，言颇轻之。"晋武帝娶手下大将胡奋女为贵妃，却鄙视她为"将种"（《晋书·后妃传》）。又《世说新语·方正篇》载王述不欲婚于桓氏：

> 王文度为桓公长史时，桓为儿求王女，王许咨蓝田。既还，蓝田爱念文度，虽长大犹抱著膝上。文度因言桓求己女婚。蓝田大怒，排文度下膝曰："恶见，文度已复痴，畏桓温面？兵，那可嫁女与之！"

进入南朝以来，这种鄙薄武夫之风更加盛行。《南齐书·刘绘传》载，刘绘虽为刘宋大将刘勔之子，性亦豪侠，却"常恶武事，雅善博射，未尝跨马。兄悛之亡，朝议赠平北将军、雍州刺史，诏书已出，绘请尚书令徐孝嗣改之。"又《南齐书·文学·丘灵鞠传》载："永明二年领骁骑将军，灵鞠不乐武位。谓人曰：'我应还东，掘顾荣冢。江南地方数千里，士子风流，皆出此中。顾荣忽引诸伧渡，妨我辈涂辙，死有余罪。"很显然，江南风尚多以"士子风流"相标榜，而对于所谓"武位"多所鄙薄。

与此适成鲜明对照，魏晋以来尚文之风却日益强烈。上面引录的曹丕《典论·论文》《与吴质书》等，就颇能反映当时士人的一般心理状态。再后，不仅士人如此，就是起自行伍，"本无学术"的刘裕，在以文章相尚的时代，也要表现出"颇慕风流"的样子。有两件事情比较典型：一是《宋书·刘穆之传》所载刘裕学书事。刘裕书法素拙，为遮丑，他接受刘穆之的建议，"纵笔为大字，一字径尺"，"一纸不过六七字便满。"二是《宋书·郑鲜之传》

所载刘裕谈玄事。沈约曾说刘裕"好清谈于暮年"(《武帝集序》),人皆依违附和,唯郑鲜之每每"难必切至。"刘裕虽时有惭恧,但仍"以此感之。"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他看来,自己能与士人谈玄论难本身就是一种"尽人之意"的快事。以帝王之尊,刘裕却以自己素无学术而感到缺憾。至于那些阀阅世家则多以能文而感到自豪。譬如王筠,祖上"爵位相继,"固然值得夸耀,但最使他感到自负的还是琅琊王氏累世有文才,以至"人人有集。"江左士人如此尚文而鄙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风尚的转变。那些兵家将种欲厕人上流社会,势必要企慕风雅,涉猎文苑,借此显示其文经武纬的济世之才。

不过,话说回来,鄙武尚文,毕竟还只是一种表象。事实上,在其背后还有着更深层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多重因素在起着决定性作用。经济的逐年发展与文化积累的日益丰厚,是这种鄙武尚文风尚赖以形成并发展的坚实基础,其缘由不言自明。曹文柱《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的变迁》(载《历史研究》1988年2期)主要从宗教哲学及文化心理等方面探讨了这种由武向文风气转变的内在原因,颇有思致,读后很受启发。由此我想,还可以再进一步探讨这种社会风气变迁的外在原因。若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东汉以来在选拔人才方面所实施的察举制度,无疑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再从政治的角度看,统治阶级的积极倡导与其所推行的士族政策的制约,实际是促进这种士人风尚形成的最直接因素。赵翼《二十二史札记·齐梁之君多才学》条称:"创业之君兼善才学,曹魏父子,固以旷绝百代。"这就与秦汉的开国君主迥然有别。《文心雕龙·时序篇》说:"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三国时期,众多文人不约而同地汇聚邺下,"咸蓄盛

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宋书·谢灵运传论》），其主要原因是曹氏父子“提倡于上”（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西晋紧承魏统，文风日盛。东晋偏安江左，把持朝政的高门大族如王、谢等，更是文采斐然。刘宋开国君主尽管起自武夫，但如上文所述，实亦不甘逊色。至于齐梁以下君主及皇室子弟，尤笃志好学，以文采相尚。赵翼《二十二史札记·齐梁之君多才学》条，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宋齐梁陈文学概略》曾辑录了大量的原始材料，认为“齐梁文学之盛，虽承晋宋之绪余，亦由在上者之提倡”（刘师培语）。

当然，一种社会风尚的形成，统治阶级的舆论导向固然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如果缺少某种制度上的制约，这种舆论导向可以为社会所普遍接受，但同时也不能排除被公众所普遍反感，甚至厌弃的可能。魏晋以来，特别是宋齐以后，许多高门甲族及中小士族所以鄙武尚文，乃至弃武从文，其实还决定于统治阶级对士族所采取的软中有硬的特殊政策。所谓软，是充分授以特权。譬如享有免役特权，“百役不及，高卧私门”（沈约《上言宜校勘谱籍》）。还可以按官品高低侵占山田及佃客。不仅如此，对于士族的社会地位，当权者也给予充分的保护，不轻易侵夺。《宋书·路太后传》载，路太后弟路琼之“家累千金，居处服器，与帝子相侔。”自以为不凡，遂“盛车服卫从造（王）僧达，僧达不为礼。”路太后闻讯大怒，欲罪僧达。孝武帝则劝说道：“琼之年少，自不宜轻造诣。王僧达贵公子，岂可以此事加罪。”又《南史·江夷传》载，齐武帝宠臣纪僧真请求武帝允许他作士大夫。武帝说：此事由江敩、谢瀹认可，“我不得措此意。”没想到，纪僧真到江敩处，却碰一鼻子灰，“丧气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说明连皇帝有时都拿士族也无可奈何。所谓硬，是

尽量剥夺实权。最主要的办法是启用寒人执掌机要，刘宋时有戴法兴、徐爰、阮佃夫、王道隆等，南齐有纪僧真、刘系宗、茹法亮、吕文显等。刘宋时，中书通事舍人戴法兴威权在握，江夏王刘义恭虽录尚书事，但"积相畏服，""凡诏敕施为，悉决法兴之手，尚书中事无大小，专断之，颜师伯、义恭守空名而已"（《宋书·恩幸传》）。南齐时太尉王俭曾对人说："我号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南史·茹法亮传》）。总管朝政的录尚书事，三公之一的太尉，权力远不及帝王亲信的中书通事舍人。永明时代，齐武帝不仅宠信茹法亮，纪僧真亦是宫中要人。武帝常说："人何必计门户，纪僧真常贵人所不及"（《南齐书·幸臣传》）。这些政策的实施，实际上是抑制了门阀士族的从政特权，是由门阀政治向帝王专制过渡的一个必要手段。晋宋以后的这种权力的交替更迭，其实质是中下士族与高门甲族之间的权力较量。就高门本身而言。较量的结果，是使他们失去了王导、谢安执政时期所具有的政治雄心和军事实力。他们只能安于现状，设法保持既得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譬如说区分士庶，查考谱牒等。除此之外，他们便是把绝大部分精力投放到文化事业中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门阀士族由武向文的历史性转变，实际标志着这一阶层统治权的严重削弱。

有趣的是，宋齐以后，一些衰落的门阀士族为了寻求政治势力的庇护，不得不放下架子，趋奉新贵，婚于武将。谢灵运孙谢超宗与张敬儿做亲家，谢朓娶王敬则女，王弘子王锡嫁女与沈文季，等等，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例证。不仅如此，一些没落士族甚至不再顾及士庶区别，与商人联姻。东海王源嫁女与富阳满氏，就是典型的一例。③从另一方面来看，那些武将，或者富商，有钱有势以后，也愿意与士族通婚，因为婚姻关系可以直接影响

到他们的社会地位，这与巴尔札克小说中新兴资产阶级求婚于贵族，我国小说中经常描写的暴发户攀附破落户的情形非常接近。所有这些婚姻情况较之东晋确已有了极大的变化，而这种婚宦失类恰恰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整个门阀势力的消长。

随着士风嬗变的完成，诸多"文义之士，多迂诞浮华，不涉世务"，终日"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持，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呈现出日益明显的颓败之势。梁末侯景之乱时，这些"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的疲弱文士，不堪一击，"坐死仓促者，往往而然"（以上引文并见《颜氏家训·涉务》。从此，盘踞江东数百年的高门大族终于结束了它的历史命运。

注 释

① 拙文《昭明太子与梁代中期文学复古思潮》对于萧衍代齐建梁后崇尚儒术的政治背景有过深入的探讨。见《文选学论集》，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2 年版。又收入《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中华书局 1994 年版。

② 此据陈庆元《谢朓诗歌系年》。收入《中古文学论稿》，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③ 详见沈约《奏弹王源》，载《昭明文选》卷四十。

第 2 章

调谐金石　思逐风云

——永明文学思潮概说

永明文学，如果仅从其字面意义来理解，似乎是指永明年间的文学。但是，这种理解显然过于狭窄。事实上，永明作家如竟陵八友等，除王融在永明十一年被杀外，其余诸人在永明以后乃至梁初依然活跃一时。他们后来的创作仍然是永明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于永明文学的时间断限，钟嵘著《诗品》以沈约为入评的最后一位作家，萧统编《文选》也主要收录的是沈约以前的创作。由此看来，他们似乎是把天监十二年沈约之死视为文学上一个历史段落的标志。近来，曹道衡、沈玉成二位先生在《有关文选编纂中几个问题的拟测》等文中明确提出，这个历史段落的文学，实际就是概指永明文学。

第一节　永明文学背景

公元 482 年 3 月称帝仅四年的齐高帝萧道成病死，其子萧赜即位，是为武帝。翌年改元永明元年。至 493 年齐武帝病死，

永明共得十一年。这段历史虽然很短，却是南朝政治、经济及文化相对稳定发展与繁荣的重要时期。它直接孕育了永明文学的成熟，对后世影响很大。

《南齐书·良政传序》说："永明之世，十许年中，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炫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百数。"史书作者萧子显是南齐皇室后裔，其撰著时间是在梁代，萧衍又与南齐皇室同族，因此，这段描述肯定有不少溢美的成分，但也多少在某些方面反映了一些历史真实情况。萧赜早年曾随其父萧道成征战南北，历任州郡，并协助乃父夺取帝位。萧赜即位时已经四十多岁，确已积累了不少统治经验。在政治方面，萧赜特别注意协调统治阶级内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以及南齐与北方之间的关系，减缓了各种矛盾带来的压力，使社会政治得以平稳发展。

萧赜主要从三个方面调整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第一，恢复百官禄田俸秩。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北伐，战争耗费颇巨，百官减俸。至宋明帝时，财政愈益困难，百官并断俸禄。萧赜即位不久，就在永明元年正月恢复了百官的俸禄，平抚了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满情绪。第二，笼络皇室成员。刘宋末叶皇室成员争权夺利，互相残杀，迅速导致了刘宋政权的败亡。这段血腥的历史给当时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萧道成称帝伊始，曾向刘瓛征询为政之道，刘瓛的回答简洁明了："政在《孝经》"。萧道成深表赞同。这说明他们都已充分注意到了刘宋末叶的惨痛教训，试图以儒家的孝悌之道来作为维系皇族的凝聚力。萧赜也是如此，对皇室成员实施安抚重用的政策。在上一章曾论述过他与豫章王萧嶷的微妙关系，可以算是典型的例证。如果仅读《南齐书·豫章文献王传》，读者会感到萧赜对这位胞弟关怀备至，无以复

加，超出了一般的兄弟情谊。可是谁会想到他们之间原来还存在一段彼此心照不宣的芥蒂呢？萧赜所以如此，正反映了他的用心之深。总的来说，萧赜的安抚皇室的政策是成功的，稳固了皇权的统治基础。当然，在这方面他也有颇多可议之处。譬如说，他虽然注意汲取前代皇室相互残杀的教训，但照样继承了监视诸王的典签制度。虽然不能把这种典签制度的继承简单归罪于萧赜，因为这是大趋势下的必然现象，但是不可否认，它确实流弊不小。范云曾不无讥讽地说过："诣长史以下皆无益，诣签帅便有倍本之价"（《南史·齐武帝诸子传》）。其所以如此，因为"刺史行事之美恶，系于典签之口"，"于是威行州郡，权重蕃君"（《南史·吕文显传》）。永明八年，萧赜第四子萧子响（过继给豫章王为嗣）与典签发生矛盾，盛怒之下杀掉"行事刘等。"萧赜得讯后对群臣说："子响遂反。"于是派兵讨伐。戴僧静则认为"诸王都自应反"，因为他们本来"无罪，而一时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浆，皆谘签帅。不在则竟日忍渴。诸州唯闻有签帅，不闻有刺史"（《南史·齐武帝诸子传》）。萧子响死前上奏说："可使齐代无杀子之讥，臣免逆父之谤，既不遂心，今便命尽。"由此推知，萧子响被杀确有冤情。这是萧赜所杀的第一个皇室成员，也是唯一的一次。虽然如此，它的影响是颇为恶劣的。后来齐明帝凭借典签之手，大开杀戒，将萧道成，萧赜子弟残杀殆尽。如果推终原始，可以说萧赜亲信典签已为自己的后人埋下了祸根。第三，继承刘宋统治者的用人政策，即士庶并用，使其相互钳制。对于名门望族，给他们不少特权，并委以高官，如永明元年启用陈郡谢朏为通直散骑常侍就很耐人寻味。此人在建元元年曾得罪过萧道成，当时萧赜曾奏表要求杀掉谢朏，而一旦即位，却又启用谢朏。看来，他是想以此吸引士族归依，支持他的统治。此外，

他还任用王俭为太尉，王僧虔为侍中，褚渊为司空，其用意无不如此。对于寒门素族，他则更多地授以实权。这些人大多起自吏胥、土豪、商客、门生，社会地位不高，官位也不显赫，但却多创军功，颇能实干，远比高门易于驾御，所以萧赜视他们为得力助手。

再看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萧赜主要是想依靠减免百姓赋役的办法来加以调节。为达到这个目的，他屡次劝农课桑，严禁奢侈。庐陵王子卿"营造服饰，多违制度"，萧赜反复训导他"不得乖体格服饰"，并警告说："后有所闻，当复得痛杖"（《南齐书·萧子卿传》）。文惠太子"性颇奢丽，宫内殿堂，皆雕饰精绮，过于上宫"。萧赜见状大怒，"收监作主帅"（《南齐书·文惠太子传》）。他在临终前还下诏说："凡诸游费宜从休息，自今远近荐献，务存节俭，不得出界营求，相高奢丽。金粟缯纩，弊民已多，珠玉玩好，伤工尤重，严加禁绝，不得有违准绳"。可见他对这个问题相当重视。所有这些措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对立情绪。

至于南齐与北方之间的关系，萧赜采取了较为开放的政策，促使南北往来。建元元年，刘善明曾上表陈事，建议"宜时择才辨，北使匈奴。"只是由于天下草创，似乎还无暇顾及于此。齐武帝萧赜即位，才真正付诸行动。从史书记载来看，永明元年开始南北往来。"自此岁使往来，疆场无事"（《南齐书·魏虏传》）。孔稚珪《上和虏表》也说："建元之初，胡尘犯塞；永明之始，复往通和。十余年间，边候且息"。岁使往来，疆场无事，给南齐政治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外部条件。同时，南北文化的交流也给南齐文化界输入了新鲜活力。

萧赜在政治方面用心较细，用力亦勤，而对思想领域则比较

宽松，很少进行干预。这就使得诸家学说能够在比较平等的条件下论难辨疑，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当时思想界的活跃。与此相适应，文学及其它姊妹艺术能在前人基础上得到长足的发展。即以书画而言，能书善画，可以说是东晋以迄南朝的普遍时尚。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南北士人，大都沉溺于此道而不疲。特别是书法艺术，这一时期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一座高峰，不仅出现了王羲之、王献之、羊欣、王僧虔等书法大家，更重要的是书法艺术出现了一次飞跃，即由注重个体的结构之美上升到追求整体的神韵以表现作者的精神风貌。这种风尚甚至强烈地影响到帝王。上章所引《宋书·刘穆之传》记载刘穆之向刘裕论及书法的重要性，建议书法素拙的刘裕"纵笔为大字"以遮丑，就是典型的一例。又齐高帝萧道成"工草隶书，奕棋第二品"，甚至还要和书法大家王僧虔试比高低（见《南史·王僧虔传》）。齐武帝萧赜本人是否能书，不详，但他酷爱书法，珍视书艺。他曾命韩兰英为女博士，让她在后宫教授"书学"（《南齐书·裴皇后传》）。其长孙萧昭业"好隶书，武帝特所钟爱，敕皇孙手工不得妄出以贵之"。南齐皇室中间，江夏王萧锋"工书，为当时蕃王所推"（《南史》本传），武陵王萧晔亦"工篆法"。竟陵王萧子良西邸文人中尤多书法名家。谢朓"善草隶"，庾肩吾《书品》列之为中下品。王融"图古今杂体，有六十四书，少年崇效，家藏纸贵"（庾元威《论书》）。周颙"少从外氏车骑将军臧质家得卫恒散隶书法，学之甚工"（《南齐书》本传）。张融"善草隶书，自号其能，太祖尤善之，见融尝笑曰：此人不可无一，不可有二"（《建康实录》）。刘绘也同样自负，曾"撰《能书人名》，自云善飞白，言论之际，颇好矜知"（《南齐书》本传）。他的儿子刘孝绰亦"善草隶，自以书似父，乃变为别体"（《梁书》本传）。其他如萧惠基、崔偃

等也以善书法而驰名当时。这里还应提到曾是西邸文人的梁武帝萧衍，好草书，又尝评论古今书家。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录有他的《论钟书十二意》、《与陶隐居论书启九首》等。

至于东晋南朝的绘画艺术，一方面继承了丰富的历史遗产，另一方面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空前的繁荣，这突出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是以宗炳为代表的山水画派，一是以顾恺之为代表的人物画派。前者重在观察体验，后者强调笔墨传神。宋齐以来的画家如陆探微、张僧繇等无不在此基础上增事踵华，变本加厉，创造出自己的风格。

东晋以迄南朝，书画创作名家辈出，书画理论也颇多建树。顾恺之《论画》，宗炳《画山水序》，王微《叙画》，王僧虔《论书》《书赋》等名篇，强调"以形写神"，注重绘画的基本技巧，同时推崇"骨势"，反对"媚趣"，表现出高雅脱俗的审美情趣。萧子良作《答王僧虔书》提出书法当以"精隽灵奥"为美，其命意与上述理论大体接近。特别要提及的是谢赫的《古画品录》，除对前代绘画家分六等品评外，更重要的是提出了系统的绘画要旨，堪称一代名著，其所定绘画六法，把古代书画理论推到了新的阶段，从而得到了后世极高的评价。

如果说书画艺术具有明显的贵族化倾向的话，那么，风行一时的"新声杂曲"则表现出了典型的平民化特色，是南朝艺术殿堂的珍品。尽管这些新声杂曲在当时以至后来时常受到严厉的批判，但真正的艺术则并不是教条伦理和守旧的文艺观所能限制的。《南齐书·王僧虔传》载"僧虔好文史，解音律"，由于朝廷礼乐多违正典，民间竞造新声杂曲，为此，王僧虔曾上表提出批评，称："自顷家竞新哇，人尚谣俗，务在噍杀，不顾律纪，流宕无涯，未知所极，排斥典正，崇长烦淫"。《太平御览》卷五百六十九

引裴子野《宋略》,称当时"王侯将相、歌妓填室;鸣商富贾,舞女成群。竞相夸大,互有争夺。"又郭茂清《乐府诗集》卷六十一论《杂曲歌辞》说:"自晋迁江左,下逮隋唐,德泽寖微,风化不竞,去圣逾远,繁音日滋,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哀淫靡漫之辞,迭作并起,流而忘返,以至陵夷。原其所由,盖不能制雅乐以相变,大抵多溺于郑卫,由是新声炽而雅音废矣"。上述诸说显然是对传统的"雅乐正声,鲜有好者"(《南史·萧惠基传》)现象深表不满,这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代新声的兴起。《乐府诗集》中的《清商曲辞》收录有《吴歌》、《神弦歌》、《西曲》,就是这些"新声"的歌辞记录。《南史·王俭传》载:

> 帝幸乐游宴集,谓王俭曰:"卿好音乐,孰与朕同。"曰:"淋浴唐风,事兼比屋,亦既在齐,不知肉味"。帝称善。后幸华林宴集,使各效技艺,褚彦回弹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弹琴,沈文季歌《子夜来》,张敬儿舞。

《子夜来》当属吴声,在晋宋之际即已在社会上盛行,并且已经堂而皇之地步入了上流阶层。发源于长江上流的西曲,在宋齐之际也紧步吴声而为上层社会所普遍接受。宋末,齐武帝萧赜在郢州任晋熙王镇西长史、江夏内史,开始接触到西曲。当上皇帝后,萧赜回顾郢州那段生涯,特以西曲调作《估客乐》。以帝王之尊而倡导这种"新声杂曲",就加速了西曲在永明以后于朝廷内外的流行。沈约本来不喜欢西曲,以为不典,但是后来也改变看法而拟作西曲。其他如王融、谢朓等均有拟作。文人竞相拟作新声已成风气。

正是这种活跃的政治文化氛围,给永明文学的产生与发展带来了三个方面的重要影响。

第一，社会的稳定，给永明作家提供了比较舒适的物质条件，使他们能够潜心创作，切磋技巧。由于承平日久，在永明年间出现的四个文人集团，实际上已成为了四个文学中心，联络了众多作家，推动了创作的繁荣。

第二，思想的活跃，使永明作家较少受到传统窠臼的束缚。创新求变，寻求自立，成为他们共同追求的目标。

第三，艺术的繁荣，给永明作家开辟了许多用武之地，在姊妹艺术天地获取灵感。在书画艺术方面，他们注意到如何在规矩之内寻求变化的奥秘，即“形绵靡而多态”，“迹乘规而骋势”，充分体现了他们对艺术形式方面精巧完美的不懈追求。新声杂曲对于永明作家的影响尤为直接。他们不仅大量摹拟创作了具有江南民歌风味的乐府小诗，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歌者之抑扬高下”之间，会不会注意到“四声可以并用”（顾炎武《音学五书·音论中》）这个基本的音乐规律呢？换一句话说，在歌唱中同样一个字，是可以“随其声讽诵咏歌”而有不同的音调，其结果“亦皆谐适”（江永《古韵标准》）。我想，对于善识音律的永明诗人来讲，这种基本的辨音能力应当是具备的。如果这个推断成立的话，那么可以认为，四声的发明，不仅肇始于佛经的转读，江南新声杂曲的影响也是不能低估的。

第二节　永明诗歌创作

逯钦立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其中《全齐诗》共337首。其作者大多生活在永明前后，竟陵八友中两个重要作家谢朓和王融也包括在内，谢朓146首，王融93首。另外六人因为活到

梁代，其作品列入《全梁诗》。他们是：沈约183首，萧衍95首，范云42首，任昉21首，陆倕与萧琛各4首。这六个人的作品加上《全齐诗》所收作品，总计六百余首。但是必须说明的是，第一，在所统计的这六百余首诗中，有些可能是其他诗人的作品，有些干脆是后人伪托之作。前者如沈约《夜夜曲》，《玉台新咏》题作萧纲，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不少。至于伪作，可以试举题沈约所作的《登北固楼诗》为例。此诗出自晚唐张读所著《宣室志》，大意是：陆乔在唐宪宗元和初与沈约、范云的鬼魂相见。沈约召唤其子青箱拜谒陆乔，并说："此子亦好为诗，近从吾与仆射同过台城，因命为感旧，援笔立成，甚有可观"。于是诵诗"六代旧山川，兴亡几百年"云云，这就是所谓《登北固楼诗》，显系唐人伪托之作。北宋初编《太平广记》卷三四三辑录此条，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又抄录《宣室志》或《太平广记》之文，而把沈约儿子青箱的鬼魂误作沈约的鬼魂。逯钦立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又从《舆地纪胜》中辑出此诗，未经核查，就编录在沈约名下，遂致此误。第二，在所统计的这六百余首诗中，还有一些作于天监十二年以后。萧衍当皇帝长达四十八年，陆倕卒于梁普通七年。在这些年间，文坛风尚几经变化，他们的作品很难全都列入永明文学的考察范围。第三，《全齐诗》中的《杂歌谣辞》、《清商曲辞》由于多是无名氏作品，创作年代很难确考，所以没有列入统计数字。又《全齐诗》、《全梁诗》中的《郊庙歌辞》、《舞曲歌辞》虽然有很多出于永明作家的手笔，但大都味同嚼蜡，没有什么欣赏价值，所以也没有列人统计数字。当然，如果严格按照上述要求重新统计现存永明诗歌的数字，就现有的资料来说，很难做到精确，而且也没有必要。上述的统计数字虽然比较粗疏，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反映出永明诗歌创作的一般倾向的。

具体来看，这六百余首诗可以分为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四类。五言诗最多，其次是杂言诗，四言诗和严格的七言诗最少。四言是比较古老的诗歌形式，战国以降已呈衰落趋势。汉末至魏晋，曹操、嵇康、陶渊明等人的四言诗的创作，为这种已经衰微的诗体注入了一点活力，但终究大势已去。从永明诗人的创作来看，当时的四言诗主要是侍宴应诏之作，其次是酬答唱和之作，另有几首是张融、陆厥的乐府诗，略为清新可诵。从诗体的演进过程来看，七言诗与四言诗正好相反，在永明时代还属于新起的诗体。如果溯其渊源，虽然可以举出《楚辞》中的《桔颂》，旧题汉武帝的《柏梁诗》，(《柏梁台诗》系伪托。游国恩先生已论定。见《游国恩学术论文集》。)此外还可以举班固《竹扇赋》等例子。不过，这些文字在形式上虽接近七言，或全然是七言，但毕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七言诗。《桔颂》是四言七言错落相间，《柏梁诗》是众人联句，《竹扇赋》虽是七言形式，却是赋体。又，汉人为启蒙识字而编的《急就章》中也有一些七言句式，但那仍不能视之为诗。较早写作七言句式诗的应当推张衡《四愁诗》。此诗多用“兮”字，明显受到《楚辞》影响。此外，东汉桓帝时童谣《小麦青青大麦枯》，中间除两句三言外，其余均是七言。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作为正式登上文坛的七言体诗作要从曹丕的《燕歌行》算起。这首诗用的是乐府古题。也许是受此影响，曹丕以后的七言诗有不少用乐府古题。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鲍照的七言诗，全是乐府古题，但在形式上还不十分严整。永明诗人的七言作品形式上已经比较整齐，而且大多数也用乐府旧题。文惠太子七言诗仅存一句：“磊磊落落玉山崩”，王融有和作，题《奉和纤纤诗》，似乎是摹拟汉代乐府民歌“两头纤纤中间长”一首。萧衍共五首七言诗，除《清暑殿效柏梁体》是追步所谓汉武帝旧作外，

其余四首都脱胎于汉乐府民歌，他们是：《白纻辞》二首，《河中之水歌》《东飞伯劳歌》，但这四首诗作者问题尚有异说。沈约的《四时白纻歌》五首亦明显是用乐府古题。不过，沈约另有《上巳华光殿》诗与上述诸篇有所不同，是另立题目。另外，王融又有《努力门诗》《迴向门诗》，虽属说教论理之作，但在形式方面似乎有意摆脱了乐府诗的影响。然而这些诗作在艺术上实在没有什么更多的创造，显得平板无味。

比较值得注意的是现存的三十余首杂言诗。

所谓杂言诗，主要是指那种句式长短相间、韵律灵活多变的诗体。东晋偏安江左以来，这种诗体颇为流行，而且有趣的是，许多诗人似乎有意采用楚辞句式入诗，显得文雅峭拔，不同凡俗。东晋时有湛方生的《怀归谣》、《秋夜诗》、《游园咏》，何瑾《悲秋夜》等；刘宋时有谢晦的《悲人道》，王韶之《咏雪离合诗》，袁淑《咏寒雪诗》，汤惠休《赠鲍侍郎诗》，谢庄《怀园引》、《山夜忧》、《瑞雪咏》，鲍照《拟行路难》，徐爰《华林北涧诗》，等等，无不如此。但是应当指出，上述作品有些很难归类，譬如湛方生、谢庄之作就颇近于赋体，却也难否认是诗。但是不管归类如何，这些作品明显受到《楚辞》的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能是与晋宋士人偏爱《楚辞》有很大关系。《世说新语·任诞篇》载："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可见，能熟读《离骚》是充当名士的一个起码条件。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晋宋时代的《楚辞》研究也很盛行。魏晋南北朝时期《楚辞》研究著作，绝大多数都是晋宋人所著。晋郭璞、宋何偃的《楚辞注》，皇甫遵在王逸、郭璞、何偃三家注基础上所撰《参解楚辞》七卷，徐邈、诸葛氏又各撰《楚辞音》等，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述。晋宋士人不仅以能

熟读《楚辞》相标榜，而且还有意在文学创作中以搬弄《楚辞》相炫耀。当然，凡事不可一概而论。有些诗人所以采用《楚辞》句式入诗，很可能是受到《楚辞》创作精神的启迪，而借此抒写他们的不平之气，对鲍照的创作似应作如是观。宋齐之际，作为从元嘉体向永明体过渡的重要诗人，江淹的杂言诗创作仍能反映出《楚辞》的深刻影响。他的杂言诗今存 19 首，包括《去故乡赋》、《倡妇自悲赋》、《莲花赋》、《学梁王兔园赋》等赋体之后所系六首歌谣，又有《杂三言》五首（《构象台》、《访道经》、《镜论语》、《悦曲池》、《爱远山》）、《应谢主簿骚体》、《刘仆射东山集学骚》、《山中楚辞六首》等，无一例外全是骚体。（其实不仅是杂言诗，许学夷曾列举很多诗句说明江淹的五言诗亦“善用骚体语”。见《诗源辨体》卷八）这说明元嘉时代“文多经史”的创作风尚仍在江淹的诗歌中多有反映。

这种情形，在永明作家的杂言诗创作中就明显少多了。齐梁以后，这种骚体逐渐变为短赋，如萧绎《秋风摇落》等就是一例。此后又转化为五七言句占多数的小赋。仅就现存永明诗人的杂言诗来看，沈约的《八咏诗》还带有骚体的影响，其他作家则很少用骚体从事杂言诗创作。沈约生长在刘宋中后期，诗歌创作多少还受到元嘉诗风的影响，《八咏诗》又是他在出任东阳太守期间所作，失意烦闷，借用骚体以抒写自已郁抑不平之气，也在情理之中。但是，这种情形在沈约以及其他永明诗人的杂言诗创作中毕竟是个例外。事实上，他们的杂言诗绝大多数都已摆脱了前代文人创作的影响，而有意追摹江南民歌的风貌。在内容方面，更多地抒写相思离别之情，或者描绘与之相关的各类事物；在形式方面，渐渐形成了某种固定的格式，句式变化多有规律可寻。即使沈约的《八咏诗》虽用骚体创作，但在形式上比

较整齐，八首均以三言起句，中间以五言、七言相错落，与元嘉诗人的杂言诗创作显然有别。沈约晚期的杂言诗，格式更趋于固定。如《乐府诗集》所收《江南弄》四首，就很有代表性：

邯郸奇弄出文梓，萦弦调急切流徵。玄鹤徘徊白云起。白云起，郁披香，离复合，曲未央。

——赵瑟曲

罗袖飘缅拂雕桐，促柱高张散轻宫。迎歌度舞遏归风。遏归风，止流月，寿万春，欢无歇。

——秦筝曲

杨柳垂地燕差池，缄情忍思落容仪。弦伤曲怨心自知。心自知，人不见，动罗裙，拂珠殿。

——阳春曲

阳台氤氲多异色，巫山高高上无极。云来云去常不息。常不息，梦来游，极万世，度千秋。

——朝云曲

这四首诗，《文苑英华》题为梁元帝萧绎所作。但据《乐府诗集》所引《古今乐录》，此诗实为沈约于天监十一年所作。梁武帝萧衍也有七首，即《江南弄》、《龙笛曲》、《采莲曲》、《凤笛曲》、《采菱曲》、《游女曲》、《朝云曲》，总题《江南弄》，其句式与沈约之作全同，都是三个七言句，四个三言句，格式已经定型。又譬如沈约《六忆诗》（今存四首）："忆来时，灼灼上阶墀，勤勤叙别离，慊慊道相思。相看常不足，相见乃忘饥"。这是第一首，以下三首均以三字领起，继之以五个五言句，格式显然也是固定的。永明作家的杂言诗创作大多数都是如此，格式基本定型，铺陈排比，婉转细腻，颇近于中晚唐五代兴起的小词。朱弁《曲洧旧闻》说：

“词起于唐人，而六代已滥觞也”。杨慎《词品序》也说：“诗词同工而异曲，共源而分派。在六朝看陶弘景《寒夜怨》，梁武帝之《江南弄》，陆琼之《饮酒乐》，隋炀帝之《望江南》，填词之体已具矣。填词必溯六朝，亦昔人穷探黄河源之意也。”近代王国维也持同样观点：“诗余之兴，齐梁小乐府先之”(《戏曲考源》)。这些论断可能主要是就永明以后盛行的那种具有某些固定格式的杂言诗体而言的。

从这个简单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永明作家的四言、七言以及杂言诗的创作具有明显的承前启后的特点。四言与七言显然以继承为主，创获不多，杂言诗则多所创新，对后代影响也较大。当然总的来说，不管是四言、七言，抑或是杂言，在永明作家的诗歌创作中毕竟仅占一小部分。真正占据诗坛主流的无疑当推五言诗创作。

永明作家的五言创作可以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来考察，就五言诗形式而言，永明诗人的最大贡献是把声律论直接运用到五言诗的创作实践中，使这种风靡诗坛数百年的诗体渐渐趋于规范，遥开唐代律诗的先河。因为涉及的问题比较多，这个问题拟在下一章专门讨论。至于说到永明诗歌的内容，应当承认，实在缺少震撼人心的力作。这主要是受到了他们的生活经历以及社会风尚的局限，视野比较狭窄，没有发现多少新的题材，所以诗歌内容显得比较贫乏。不过与元嘉诗歌相比较，永明五言诗在抒情状物方面能够探幽入微，细腻感人，还是有一些自己的特色。具体来说，这种灵婉细微的创作特色主要是通过下列三个方面的题材表现出来的。

一、宦游他乡，在山水景致中寄寓淡淡的愁情

萧子良在《游后园诗》中说：“丘壑每淹留，风云多赏会。”又

《行宅诗序》云："备历江山之美，名都胜境，极尽登临，山原石道，步步新情，回池绝涧，往往旧识，以吟以咏，聊用述心"。这里所说的"赏会"与"述心"比较典型地反映出了永明诗人对山水的热爱之情。所谓赏会，亦即谢灵运所说的"良辰、美景、赏心、悦目"，是对山水自然之美的一种静态观赏，带有某种超然物外的色彩。南齐永明年间，天下承平，文士云集。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移居鸡笼山，备极风物之美；文惠太子开拓玄圃园，"多聚奇石，妙极山水"，并于钟山下立馆，号曰东田，"制度之盛，观者倾京师"(《南齐书·文惠太子传》)。所有这些，都对世风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王俭在《竟陵王山居赞》中有"濠梁在兹，安事遐想"二语，很形象地状绘出永明诗人对于山水景致静观默赏的审美心态，充满了怡然自适之情。谢朓有一首《游东田诗》就是这种心境的具体写照："戚戚苦无悰，携手共行乐。寻云陟累榭，随山望菌阁。远树暖阡阡，生烟纷漠漠。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不对芳春酒，还望青山郭"。通过视角的变换，极其生动地描绘出一幅幽奥隐约的感人画面，并由此表现出诗人那种恬淡怡乐的心境，十分逼真而传神。对于山水自然之美的这种超然自得的"赏会"，显然不是个别偶然的现象，而是这个时期普遍存在的审美风尚。

永明末以王融为首的西邸文士欲拥立萧子良继位，结果事败，王融被杀，不久，萧子良亦抑郁而死。竟陵八友大多受到牵连，如沈约出守东阳，刘绘、谢朓等亦先后外任。建武元年末叶，刘绘为安陆王萧宝晊长沙内史，行湘州事。二年，谢朓出为宣城太守。从此，他们失去了清风朗月般的平静生活，创作上也相应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他们的心目中，山水自然之美似乎已不再单单是为他们的"赏会"而存在，而是随着他们心境的变

化染上了浓重的主观色彩。以沈约为例，他在离开京城前往东阳任的路上，写下了《新安江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游好》、《早发定山》、《泛永康江》等诗，寄寓了自己矛盾的心情。一方面，刚刚过去的平静岁月犹如晓梦一般令他回味，使他留恋；另一方面，政治生涯的巨大变化，统治阶级内部的自相残杀又叫他迷惘，让他惊恐。他渴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却又急于远离政治漩涡。“洞澈随清浅，皎镜无冬春。千仞写乔树，百丈见游鳞”。此四句极写山水之美，仍带有永明年间常见的那种“赏会”的情调，但后四句陡然变化：“纷吾隔嚣滓，宁假濯衣巾？愿以潺湲水，沾君缨上尘”。很明显这不是“赏会”，而是在“述心”，是说自己已离开京邑，和尘嚣相隔，不必再借清水洗尘，而陷入京邑的同好却仍需用此水濯缨。这当然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慰之词。在东阳期间，他还写有《游金华山诗》、《登玄畅楼》以及上文提到的《八咏诗》等，都借山水自然之美的描写反映矛盾心情。这个时期的山水诗不再宁静客观，而是有所寄慨与自慰。山水的宁静无法冲淡诗人们内心的不宁静。这种情形在谢朓的后期创作中尤其有着明显的反映。谢朓出守宣城，曾写下《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始之宣城郡》、《宣城郡内登望》等名篇，格调颇为低沉，与写《游东田》时的谢朓简直判若两人。比如《之宣城郡》这首诗，开篇即以“江路西南永，归流东北骛”领起，以“西南”对“东北”，将两个截然相反的方位词构筑在一个画面中，从而逼真地反映出诗人背离京城时的矛盾心情。宣城在建康的西南，诗人赴任，逆水行舟，故而“江路西南永”。这里一个“永”字既写出长江浩浩荡荡的气势，也映衬出仕途悠长的孤苦。“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是全诗警句，气势恢宏，视野阔大，表面写景，其主旨仍在抒情。由于不时有叶叶归舟浮现，顺流而下，直奔京邑，相形

之下，诗人越发意识到了自己背井离乡、征旅遥遥的孤苦，所以紧接“旅思倦摇摇，孤游昔已屡”二句。最后六句引用《列女传》的典故来安慰自己，既然冥思苦想了无益处，则还是象玄豹那样，终隐南山雾中，全身远害。这种写景抒情的特色，与晋宋以来某些“托辞华旷”但“酷不入情”的山水诗形成鲜明对照。《文心雕龙·情采篇》批评两晋那些伪装清高的文人说：“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机务，而虚述人外”。这种情形至晋宋之际仍未有根本改观。以扭转玄言诗风，开创山水诗派而著称于诗坛的谢灵运，其纵情山水往往是在声色狗马之外寻求感官上的满足，并以此掩饰其对政治的热中。因此，他的山水诗虽然能够用艳丽精工的语言细微地描绘一些自然景物，却很难见出内心的情感。永明诗人虽然也热衷于政治，而且在山水诗创作中也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元嘉诗风的影响，但他们的山水诗清新流丽，较少繁芜词句，并常常寄寓淡淡的愁情。应当说，这是永明诗人对于山水诗创作的可贵贡献。

二、离别酬赠，以委婉细腻的笔触抒写人间的真情

“分弦饶苦音，别唱多凄曲”（范云《饯谢文学离夜诗》）。永明诗人，特别是竟陵八友，由于思想性格的接近，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以文义赏会，结下深厚友谊。每当临别之际，每每有分弦别唱之作，抒写依依惜别之情，十分细腻而感人。

永明九年春，谢朓随萧子隆赴荆州，沈约等赋诗饯行，作《饯谢文学离夜》，同赋者有任昉、范云、刘绘、虞炎、王融、萧琛等，谢朓答诗题为《和沈右率诸君饯谢文学》。大约与此同时，萧衍亦随赴荆州，任昉、宗夬、王融、虞羲、萧琛等又作《别萧咨议衍诗》，萧衍有酬答作《答任殿中宗记室王中书诗》。

这些作品称得上词清句丽，意邈情深。特别是上文所引范

云诗句，音苦曲凄，尤为细腻委婉。随着上层统治者内部矛盾的加剧，转瞬之间，故友亲朋，凋零离散，执手话别，前途未卜。这时他们开始真正感受到友情的珍重与别意的绵长："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尔同衰暮，非复别离时。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这是沈约与范岫分别时的名作，剖析心迹，感人肺腑。范岫虽不在竟陵八友之列，但与沈约的交往非常密切。早在宋末泰始年间，两人即已结识，尔后时聚时散，几多分手，但并未感到离别之情竟如此镂心刻骨。这也许是因为青年时代常感"岁月易得"，故"别时容易"。而今垂垂老矣，此时一别，或难再见。全诗以梦中相寻不得收束，将这种生离死别之情抒写得淋漓尽致，感人至深。

在沈约的晚年，这一类作品的数量比较多，给读者印象最深的当推怀念谢朓的一系列诗作。在竟陵八友中，沈约与谢朓的关系似乎最为密切。他们同为声律说的积极倡导者，在诗歌创作方面又相互切磋，彼此推重。特别是在政治上同受打击，失意不遇之时，彼此之间的酬答之作，感情自然更为真挚深沉。建武二年，谢朓外任为宣城太守，沈约时在东阳，曾寄诗以示慰藉。后来谢朓作《在郡卧病呈沈尚书》，抒写郁闷孤独之情与对过去游宴赋诗的怀想："良辰竟何许，夙昔梦佳期。坐啸徒可积，为邦岁已朞。弦歌终莫取，抚机令自嗤"。其时，谢朓出守宣城已逾一年，而沈约刚从东阳调回京城任五兵尚书。谢朓此诗，似有祈望沈约代为荐举之意。事实上，沈约也从来没有忘记这位滞留西南的友人，《酬谢宣城朓诗》可为明证。永元元年谢朓被杀以后，沈约有《怀旧诗》，其中《伤谢朓》一诗，对谢朓的诗品作了高度评价："吏部信才杰，文锋振奇响。调与金石谐，思逐风云上。岂言凌霜质，忽随人事往。尺璧尔何冤，一旦同丘壤"。前四句，

"美其才高，"后四句"惜其冤死"（并见张玉谷《古诗赏析》）。入梁以后，沈约仍时时沉湎于故友情愫之中，难以自制。他曾对王筠说："自谢朓诸贤零落已后，平生意好，殆将都绝，"流露出深深的怀念之情。

"促生悲永路，早交伤晚别"（任昉《赠徐征君诗》）。在经历了人事沧桑的巨变之后，永明诗人真正掂量出人生"晚别"的分量，所以他们创作出那么多动人的诗篇，去抒写这种黯然伤神的复杂情感。当我们读到"结欢三十载，生死一交情"（任昉《出郡传舍哭范仆射诗》），"一罢平生言，宁知携手日"（沈约《怀旧诗·伤刘沨》），"昔去雪如花，今来花似雪"（范云《别诗》）。"欲识离人悲，孤台见明月"（张融《别诗》），"相思将安寄，怅望南飞鸿"（刘绘《送别诗》）等动人诗句时，不能不承认，永明诗人对人生别情，特别是"晚别"之情，确实有着比较深刻的体验，所以能探微抉奥，以委婉细腻的笔触抒写人间的一段深情。应当说，这也是永明诗人对于诗歌创作的一个贡献。

三、睹物兴情，开拓诗歌题材的新领域

命题咏物的写作风气在建安时代颇为盛行。这类咏物之作，今存不少，但仅限于赋体。《三国志·朱异传》注载张纯著《赋席》，张俨著《赋犬》，朱异著《赋弩》，也是这类同题状物之赋。咏物诗的真正兴起，实际是从南齐永明年间开始的。其作者大多是萧子良西邸文人。他们常常指物命题，应酬唱和，力求穷物之情，尽物之态。这里所说的"物"，主要是指自然界之风花雪月，鱼虫禽兽以及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到的一些物品。一般说来，这里所说的"物"与自然界之山川景物固然有所不同，但又很难遽然一分为二。刘勰《文心雕龙》以"物色"并举，称："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看得出来，刘

勰虽然没有明确标举"物"与"色"的差异，但他似乎有意以"风景"概指山川景致，即所谓"色"，而把"草木"归入"物"的范围。这说明两者毕竟还是有区别的。反映在诗歌创作方面，前者为山水诗，后者则为咏物诗。

如果这个界说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我们不妨对永明诗人的咏物诗作更具体的考察。结果发现：第一，今存咏物诗最多的诗人是沈约，39 首；其次是谢朓，16 首；再次是王融、范云，各 6 首；萧衍，5 首。无疑，竟陵八友是永明咏物诗的主要作者。第二，所咏之物非常琐细。譬如，乐器类有笛、琴、笙、筝、篪、琵琶等；器物服饰类有幔、帐、席、帘、灯、烛、镜台、七宝扇、槟榔、竹火笼、柟榴枕、领边绣、脚下履、乌皮隐几等；植物类有梅、竹、桃、柳、蔬、梨花、梧桐、女萝、栀子、蔷薇、兔丝、浮萍、水竹、紫兰、桂树、寒松、园桔、麦李、青苔、荷花、山榴、芙蓉、杜若、鹿葱、甘蕉等；鱼虫禽兽类有鸂鶒鸡、大雁、蝉等；至于风花雪月，尤多吟咏，不必赘述。

平心而论，这些诗作大多精微细巧，个别篇章甚至还写得相当别致。这可能是因为许多咏物诗作于文人聚会场合，作者在遣词、审音、取境、构思等方面下过不少功夫，所以一些作品在艺术上有自己的特点。但是由于这些诗人多出身于阀阅世家，生活的圈子本来就很窄小，加之南朝偏安江左，地域有限，更加限制了他们的视野。他们很少有机会，而且也不愿意去接触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故此，只能从身边寻找诗料，把精力耗费在这种"嘲风雪、弄花草"的文字上面。为弥补生活阅历的不足，他们又都沉湎于书袋中，熟记典故，以示渊博，引短争长，以为炫耀。《梁书·沈约传》载沈约与梁武帝比"栗事多少"典故，就是其中的一例。一时间，像这种"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裴子野《雕虫

论》的创作风气竟成为诗坛的主流。至梁朝后期，那些宫体诗人变本加厉，由物及人，把目光又停留在女人身上，运用绮丽的笔调状绘女人的形体、服饰、神态等，诗境更加狭窄，诗风更加纤弱，引来了后世许多严厉的批评。

从总体上说，这些批判无疑是有道理的。正因为具有这种强烈的批判意识，唐代诗人才能够超越齐梁诗风的束缚而创作出无愧于那个时代的壮丽诗篇。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来看，唐代诗人又在很多方面继承了齐梁诗歌的丰富遗产。诗歌形式方面的继承非常明显，自不必详述，仅就咏物诗而言，唐人也多所继承。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咏物诗自有它独立存在与不断发展的意义。不可否认，齐梁咏物诗常常诱导诗人远离现实生活，这是它的严重缺陷，但同时它又能促使诗人从日常生活中寻找"性情卓绝"的诗思，把诗歌从言志述怀的传统窠臼中引导出来。这本身又意味着某种创新，因为它毕竟又为诗坛开辟了一个新的题材领域。从这个意义上看，永明诗人的咏物诗功过参半，其积极的一面不应该被忽视①。

当然，能够表现永明诗歌灵婉细微的创作特色并不仅限于上述三个方面的题材。事实上，还有许多述怀之作如思妇诗，伤春悲秋诗，游宴诗乃至刚刚开始的绝诗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自己的这种创作特色。永明诗歌创作，既不像东晋玄言诗那样"淡乎寡味"，又与"操调险急"、"倾炫心魂"的元嘉诗歌有所不同。永明诗歌看似平淡，但可以借用沈德潜评谢朓诗的话来说，读过之后，使人"觉笔墨之中，笔墨之外，别有一段深情妙理"（《古诗源》）。这是永明诗歌的特色。这种创作特色的形成，固然可以从上文叙述的政治文化背景中找到某些答案，但还远远不够。晋宋以来，特别是南齐永明年间，人们对于诗歌艺术的认

识曾产生了一个飞跃。其中比较明显的标志是，他们已经日益明确地把握住诗歌创作在抒情状物方面的某些特征，形式方面注重声调和谐，内容方面讲求表达含蓄，风格方面追求清省遒丽。这种时代追求不仅表现在诗歌创作上，而且也具体反映在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想中。

第三节　永明文学思想

一个时期的文学思想往往具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态。有时，由于社会地位以及生活道路的不同，一些理论家对同一种文学现象可能会有不同的参照系数，得出某些看来是截然相反的结论。即使处于同一阶层，他们也会因为学术修养、审美理想的差异而对某些具体问题看法不一，不可能都是同一副面孔，同一种色调。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如果这些理论主张产生于同一种政治文化背景之下，不管它们之间的差异有多么明显，总要留下一些时代的烙印，总要从不同侧面反映出历史真实的某一侧面，总会得出某些相近、甚至相同的结论。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考察永明文学思想，我们自然会首先想到沈约和刘勰。

沈约并没有文学理论专著。他的文学理论主张多散见于史论、书信以及奖掖品题的一言半语之中，而以《宋书·谢灵运传论》最为重要。《宋书》作于永明中，不列"文苑传"。《谢灵运传论》就取代了"文苑传论"的作用，因为这一传论不仅论及谢灵运，而且历数历代重要作家及文学现象而加以褒贬，与全书体例颇有歧异。又《南齐书·陆厥传》载有沈约《答陆厥书》亦为重要文论材料。陆厥卒于齐末永元元年，此书必作于此年前无疑。

又陆厥《与沈约书》称沈约为尚书。沈约建武元年十月为五兵尚书，则此书又必作于建武元年十月之后。沈约又有《答甄公论》，专论四声。《文镜秘府论·天卷》载："魏定州刺史甄思伯，一代伟人，以为沈氏《四声谱》不依古典，妄自穿凿，乃取沈君少时文咏犯声处以诘难之。又云：'若计四声为纽，则天下众声无不入纽。万声万纽，不可止为四也。'"沈约为此而作答书。这说明在齐梁之际，沈约的一些论著已流播北方。刘勰《文心雕龙》作于齐末之说已为学术界广泛接受，几成定谳[②]。由此，无妨把这些论述和意见看成南齐时代，或者再缩小一点，即永明年间的理论成果。尽管所论并不局限于这一时期，但是理论的基础却建立在永明年间文学创作实践之上。

但是稍加比较就会发现，两个人的文学思想有许多明显的不同，特别是在文学史观方面，差异尤大。沈约厚今薄古，而刘勰恰恰相反，带有明显的厚古薄今的倾向。沈约评价屈原、宋玉的功绩是"导清源于前"，贾谊、司马相如则"振芳尘于后"。但同时他又强调指出："自兹以降，情志愈广"，说明文学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日益完善，屈、宋显然并不是作为最高典范而被顶礼膜拜。刘勰则以为屈、宋"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故作《辨骚》以为"正末归本"。至于对所谓"近世"文学，两人的评价尤其大相径庭，沈约评宋代文学："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评齐代文学，则认为声律说的发明及其在文学创作中的运用，永明诗人"妙达此旨"，"自骚人以来，此秘未睹"。一扫复古潮流，对当代文学的贡献推崇备至。刘勰的观点正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文心雕龙·明诗》）。这里似

仅是客观描述，对其"穷力而追新"没有褒贬。但《通变》说："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澹"。看来，"新"常与"讹"相关联，似乎不是褒扬之意。再看《定势》："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由此可以看出，刘勰的所谓讹与新，几与"穿凿""诡巧"相等同，带有贬抑的感情色彩。对宋代文学评价如此，他对于当代文学即南齐文学的态度也约略可以推知了："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通变》）。"今才颖之士"是指永明作家。他们紧步宋代文学，竞今疏古，追求"新变"。对此，刘勰似乎很不以为然。

这种现象颇耐人寻味。

表面上看，刘勰著《文心雕龙》是针对着宋齐以来"穿凿取新"的形式主义文风而来的。结果，长期以来，人们在无形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沈约为代表的永明文学放在了刘勰的对立面，似乎判若泾渭。但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刘勰的《文心雕龙》首先是由沈约的延誉而广为流传的。抛开这一点不谈，就两家的思想体系本身而论，也有很多相通之处。沈约家世信奉天师道（详附录《从武力强宗到文化士族——吴兴沈氏的衰微与沈约的振起》）。天师道对刘勰的思想是否也有影响呢？季羡林先生认为"刘勰家世好像也信奉天师道"，从而对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似持有肯定的态度（详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第二版跋）。不仅如此，两人又同信奉释教。当然，从思想渊源上讲，儒家的文学主张对于他们的影响似乎尤其明显。刘勰著《文心雕龙》首倡《原道》、《征圣》、《宗经》，以为"文之枢纽"。在写作《文心雕龙》之时，刘勰入居定林寺已有八、九年，而在《序志》中仍"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称颂"自生人以来，未有如

夫子者也"。其心志之虔诚，不亚于正统的儒生。沈约对于儒学也抱有同样虔诚的态度，这特别表现在他的交往上。范岫"事母以孝闻"、"名行为时所与"，沈约与之莫逆相交三十余年；沈骥士以博涉儒家经典而为世人推重，沈约与之交往，并荐于朝廷；刘瓛的儒学冠于当时，被称为"今世曾子"，沈约则虚心拜谒；刘瓛的养子刘显也以信奉儒学而闻名于世，沈约作为尚书令而"命驾造焉"，并"引为五官掾"，足见礼遇之重；萧子显著《鸿序赋》，沈约以为"得明道之高致，盖《幽通》之流也"。《幽通赋》为班固所著，宣扬的是儒家守道安命的思想，沈约称这类作品"得明道之高致"，其思想倾向一目了然。从这些材料来看，沈约与刘勰的思想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儒释道兼收并蓄，在他们之间很难找到什么明显的分歧。但是，沈约与刘勰对于所谓"近代"文学的不同态度该作如何解释呢？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很可能出在两个人截然不同的社会地位上。沈约出身于东南豪族，入齐以来，出入于东西宫邸之门，往来于南北士族之间，充当了永明作家的核心人物，特别是到齐梁之际，实际已被公认为"一代辞宗"。作为永明文学的积极参与者及其领导者，沈约对这一时期的创作实践自然会感到自足自喜。至于刘勰的处境则全然不同了。史载："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据此，王元化先生提出刘勰实属于庶族出身，社会地位相当卑微[3]。而在东晋南朝，"士庶之际，实自天隔"。像刘勰这样的庶族文士是很难跻入上层文学圈子中的。刘勰从僧祐入定林寺，约在永明八年前后（详见牟世金《刘勰年谱汇考》），嗣后一直协助僧祐整理佛经，阐扬释教。永明十年，释超辩卒，葬于上定林寺南。"僧祐为造碑墓所，东莞刘勰制文"（《高僧传·超辩传》）。这说明僧祐与刘勰的关系比较密切。其时，僧祐

与萧子良、沈约等永明作家的来往也很频繁。上面提到僧祐应萧子良之请，永明七年十年两次讲说佛法。后来，僧祐又为萧子良及其子萧昭胄"撰录法咏"，并作《齐太宰竟陵文宣王法集录序》和《齐竟陵王世子抚军巴陵王杂集序》以表怀念之情。又建武末，释法献卒，"献弟子僧祐为造碑墓侧，丹阳尹吴兴沈约制文"（《高僧传·法献传》）。这又说明僧祐与永明作家的关系也比较密切。按照常理，沈约应与僧祐的一些弟子有所过从，特别是像刘勰这样的饱学之士，至少总该有所耳闻。但事实却是刘勰书成后，甚至还要装作"货鬻者"干之于车前，"欲取定于沈约"。对这一段记载，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刘勰人微言轻。在创作风尚极盛的齐梁时代，以刘勰的学识和才力似不能不染指创作，但是我们今天却看不到他的一首诗，一篇文学散文。至于这部《文心雕龙》，如果没有像沈约这样"贵盛"士人的延誉，其命运恐怕也会像他的创作一样湮没无闻。这种处境使他不能不悲哀，不能不忿懑。他常常是站在一个下层失意文人的角度，冷眼旁观那喧嚣一时的当代文坛，心情比较黯淡。但是，正如我们前边所论述的那样，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想，表面看来可能千差万别，不过，作为同一时代的产物，不论这种差别多么明显，它们终究会从不同的侧面去反映那个时代的文学风貌。如果不带有先入为主的成见去考察刘勰的文学思想，就会感到他在很多方面都受到当代文学的重大影响。对于永明文学，在抽象否定之余，他更多地给予了具体的肯定。他的很多主张与沈约颇为接近，实际上比较客观地总结了永明文学的成就。集中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

一、倡导平易自然的审美理想

倡导"自然之道"以为作文之本，这是刘勰的基本主张。《明

诗篇》云:“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诔碑篇》论及蔡邕碑文,认为“察其为才,自然而至”。《体性篇》认为人的性情不同,风格自然各异,“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定势篇》讲求作文当“因情立体,即体成势”,犹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丽辞篇》阐述对句原理,以为“高下相须,自然成对”。《隐秀篇》则提出“自然会妙,譬卉木之耀华”,所有这些论述,与老子所主张的“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所讲的梓庆削木为鐻、轮扁斫轮、庖丁解牛等一系列寓言故事一样,强调了创作当顺乎天理、妙造自然的重要性。纪昀认为:“齐梁文藻,日竞繁华,标自然以为宗,是彦和吃紧为人处”。说刘勰“标自然以为宗”无疑是颇有见地的。不过,纪昀的话也不无片面之处。按照他的理解,似乎齐梁诗人一味“日竞繁华”,唯有刘勰能超越时人,独自揭橥了自然之说这个命题,用以正本清源。永明诗人在创作上确有搬弄事典,追求辞藻的倾向,特别是永明文学的后期,即齐梁之际这种倾向表现得尤其明显。沈约、范云晚年游宴赋诗,常常“引短推长”(《梁书·刘峻传》),以博学相炫耀。任昉晚节好著诗,每以“用事过多,属辞不得流便。自尔都下士子慕之,转为穿凿”(《南史·任昉传》)。难怪钟嵘批评他们“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诗品序》)。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总的创作倾向来看,永明诗人还是把平易自然作为他们的审美理想,孜孜以求。萧子良曾提出,不管是人品还是诗品,都应以“含真抱朴”(《与南郡太守刘景蕤书》)为美。所谓“真”者,亦即《庄子·渔父篇》所说的“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真”所以动人,就在于它本于真情,本于

自然，不假雕饰。在文学创作上能淳真自然而又不失之粗率，确实是一种高层次的艺术境界。所谓“朴”者，亦即《颜氏家训·文章篇》所引沈约的“三易”说：“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诵读三也”。易见事，即文章隶事用典当以平实为本。谢灵运喜用典故，但经常能自然熔铸，仿佛“直举胸情，非旁诗史”（《宋书·谢灵运传论》）。《颜氏家训·文章篇》记载：“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深以此服之，祖孝征亦尝谓吾语曰：‘沈诗云：崖倾护石髓。此岂似用事耶？’”这说明沈约在创作中努力实践着自己的主张。与此相联系，“易识字”，即文学创作当造语平易，反对生硬的藻饰。天监初年，沈约作郊庙歌辞，一反晋宋典重旧习，而代之以较为浅显的语言。大同二年，萧子云上书说，沈约所撰歌辞“全不用经典”，“弥复浅杂”。为此梁武帝下诏：“郊庙歌辞，应须典诰大语，不得杂用子史文章浅言”（《梁书·萧子云传》）。萧子云的不满，恰恰从反面说明了沈约对诗歌语言的改革，确实做得比较彻底。郊庙歌辞尚且如此，其他可以概见。至于“易诵读”，又是以前两点为前提的。唯有较少事典，用语浅近，诵读才有可能变得容易。我国古典诗歌本来是以唱为主，称为歌诗。汉魏以还，诗乐日渐分离，结果诗以诵为主，称为徒诗。诗既然要诵，就有一个抑扬起伏的声调问题。沈约等永明诗人发现了四声，并在诗歌创作中有意识地运用了四声的原理，要求诗歌创作不仅赏心悦目，还要琅琅上口。基于“三易”的主张，沈约特别推崇谢朓所说的“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一语，因为弹丸脱手，“精圆快速”，“动无违碍”，用以状喻“输写便利”（《石林诗话》），确实十分生动而形象。作为永明作家的最重要代表，萧子良、沈约、谢朓等提出的上述主张，可以说与刘勰的自然之说相互映衬，比较鲜明地反映出了永明作家对于平易自然

的审美理想的追求精神。

二、追求艺术形式的完美和谐

魏晋以来，文学逐渐摆脱了经史附庸的地位而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许多作家、理论家深入探寻了文学自身的内部规律，提出了许多新的命题。永明文学秉承前代遗风余绪，特别又在遣词、炼意、声律等方面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正如"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文心雕龙·情采篇》)，任何思想内容的表达，都离不开必要的形式。为此，《文心雕龙》特辟《声律》、《章句》、《丽辞》等专篇，总结了永明文学的创作经验。比如诗文用韵，刘勰认为："贾谊枚乘，两韵辄易；刘歆桓谭，百句不止"，即两句韵转太快，百句不止又太慢，最好"以四句为佳"。又如遣词炼意，刘勰提出"四字密而不促，六句格而非缓"，这些恰恰是柳宗元所说"骈四骊六"的骈文形式上的最重要特征。此外，刘勰还总结了永明文学的对偶规律，作出了所谓言对、事对、反对、正对等细致的辨析，至初唐又发展成所谓"六对"或"八对"。但是同时刘勰又指出，形式毕竟是为内容服务的，"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体性》)。以情理为基础，这是追求艺术形式完美和谐的前提。他在《情采篇》中把"为情而造文"与"为文而造情"作了明确的区分：前者"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故为文能"要约而写真"；后者则"苟驰夸饰，鬻声钓世"，其文章必然"淫丽而烦滥"。为情造文，形式诸要素才能搭配得宜，相得益彰；反之，为文造情，只能造成矫饰虚假，对于形式完美的追求，也必定事与愿违。类似的观点，沈约也多有表达。《梁书·刘杳传》载有沈约《报刘杳书》，评价刘杳文章"辞彩妍富，事义毕举，句韵之间，光影相照。便觉此地，自然十位。故知丽辞之益，其事弘多"。又《梁书·王筠传》载沈约《报王筠书》云："览所示诗，实为

丽则，声和被纸，光影盈字"。显然，在沈约看来，论词藻，当以"妍富""丽则"为美；论事义，以"毕举"为尚；论声韵，以"声和被纸"、"光影相照"为极。乍看起来，沈约全是从形式上着眼，所以很容易被后人扣上形式主义的帽子。但事实并不尽然。沈约认为，文学的发展，本以"情变"；而文学的创作，尤以"情态"为本，所谓"天机启，则律吕自调；六情滞，则音律顿舛也"（沈约《答陆厥书》），就是明显的例证。天机与六情，是指作家的灵感与情思，它们显然是形式创新的一个基本前提，因为离开了情感的活动，任何文学形式都是徒劳无益的。这一点，已被文学发展史所证明。

三、崇尚清新遒丽的艺术风格

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从建安风骨到小谢清发，其间经历了近三百年。在这期间，文坛风尚几经变化，但总的趋势是从"风骨"向"清发"过渡。"风骨"与"清发"是两种不同的美，前者给人以一种力度感，而后者则表现出一种柔和感。这种具有不同时代特色的美学风貌所据以转化的政治文化背景，许多学者已经作了深入的研究，这里只想说明，谢朓的出现，标志着这种转变的完成。这是当时人的普遍看法。沈约就曾说过，谢朓的诗歌别具风貌，所谓"二百年来无此诗也"，正是看到了谢朓诗歌划时代的意义。李白所说的"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他应当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评价谢朓的。

对于这种"清发"美的追求并不止限于谢朓，而是永明诗人的普遍风尚。《梁书·何逊传》载，何逊"弱冠州举秀才，南乡范云见其对策，大相称赏，因结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咏，云辄嗟赏，谓所亲曰：'顷观文人，质则过儒，丽则伤俗，其能会清浊，中今

古，见之何生矣'。沈约亦爱其文，尝谓逊曰：'吾每读卿诗，一日三复，犹不能已'"。范云、沈约所以特别欣赏何逊诗歌，就在何诗能出之于"质""丽"之间，表现为清省之美。何逊虽然并非永明诗人，但是他的诗歌创作深受永明诗风的影响。在永明诗人的创作中，以清为美，表现得特别突出："遵渚泛兰觞，乘漪弄清曲"（王融《渌水曲》），"清歌共南楚"（谢朓《江上曲》），"清文忽景丽，思泉纷宝饰"（谢朓《答张齐兴》），"清氛掩行梦"（沈约《江蓠生幽渚》），"玉柱扬清曲"（沈约《咏筝》），"俯仰弄清音"（沈约《夕行闻夜鹤》），等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永明诗人对于清新之美的不断追求也在《文心雕龙》中得到了鲜明的反映。《宗经》标举"六义"，其二即"风清而不杂"。《体性》："文洁而体清"。《风骨》："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这里所说"风清""体清"云云，似都是指风格的清新。而《明诗》中所说的"若夫四言为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尤其值得注意。所谓流调，即流行的调子，主要是指晋宋以来盛行不衰的五言诗创作。刘勰认为，五言诗创作当以"清丽居宗"。这种主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可以说是对永明诗歌艺术风格的最准确的概括。《南史》称谢朓"文章清丽"，《文镜秘府论》称王融"清而丽"，沈约倡言"遒丽之辞"，这都说明，永明诗歌既不同前代"丽而多气"的鲍照，也有别于后来"清机自引"（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的何逊和"文体清拔有古气"的吴均，而是清丽并举，承前启后。相对于元嘉文学来讲，永明文学的这种时代特色，既有继承前代文学的一面，更有所发展。就梁陈文坛而言，永明文学的这种"清丽"风格似乎影响更大，实际开启了两个重要诗派：何逊、吴均得其"清"，同时又注入更强烈的情感色彩，状景必幽，吐情能尽，使得他们的诗歌具有清新隽永的特色；而萧纲萧绎兄弟似乎更注重于发

展永明诗歌"丽"的一面，最终推动了轻艳诗风的形成。

注 释

① 参见葛晓音《八代诗史》第八章《齐梁诗风的功过》。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② 近年有学者提出，《文心雕龙》成书于梁初，但并未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详见拙文《〈文心雕龙〉成书年代问题的回顾与展望》，载《文史知识》1994年第5期。

③ 参见拙文《刘勰的身世与生卒年》。载《古典文学知识》1994年第4期。

第 3 章

若无新变　不能代雄

——永明诗体辨释

作为近体诗的雏形，永明诗体在中国诗歌史上有着它独特的地位。“永明体”之称在齐末梁初即已形成。萧子显《南齐书·陆厥传》载：“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当然，对这种新兴诗体的具体解释，历来的认识也许并不统一，不过，对这种诗体基本特征的理解还是比较一致的。正如《梁书·庾肩吾传》所说“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由此看来，在齐梁以后的文人心目中永明体的最基本特征是“始用四声，以为新变。”使用四声是方法问题，而追求“新变”则是目的。永明诗体所以能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它独特的地位，其独具特色的方法以及追求新变的目的，无疑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

第一节　永明诗体的内涵及其研究范围

在进入正题以前，我们首先面临一个概念界定问题：什么是永明体？关于这个问题，历来有两种理解。从狭义的角度来看，永明诗体似应与声律说相联系。譬如上边引用过的《南齐书》、《梁书》都谈到了永明作家"始用四声"并"以此制韵，不可增减"等问题。《宋书·谢灵运传论》在叙及晋宋以来的文学发展时，主要着眼点之一也在于声律问题。这说明当时文学界主要是从声律的角度来理解永明体的。但是，自隋唐以降，四声之外，蓦然又冒出个"八病"之说，《封氏闻见记》、《诗式》、《文镜秘府论》等书均有记载。宋明以来，对于"八病"的解释尤其繁冗，歧见纷纭。久而久之，这种纷纭记载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永明诗体的内涵仅限于四声八病。换句话说，似乎四声八病的理论是专为永明诗歌而发明的。这显然是一种不够准确、不够全面的意见。四声的变化，本来就是汉语固有的特征，自古而然（详谢纪锋《从说文读若看古音四声》，文载《罗常培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永明诗人的功绩主要是总结概括出这种特征而已。但是四声的发现与文学创作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详见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韵书之作本不施于文学》条，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所以永明诗体的内涵不可能仅限于四声的运用。至于八病之说，尤其令人难以信从。纪昀作《沈氏四声考》（畿辅丛书本），曾将沈约诗文逐一排比，认为"宋人所说八病，微有不同，然皆不详何所本。大抵以意造之也。考休文所作亦复不合。"启功先生也认为唐宋学者对于八病的"解释多不近

情理"(《诗文声律论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上述学者对于八病之说的质疑辩难无疑是很有道理的。笔者也认为,"八病严于沈约"(严羽《沧浪诗话》)的说法是靠不住的,因为:第一,从永明诗人,特别是沈约的传世论著中并没有见到八病之说;第二,关于八病的文献记载越到后来越详尽,这很有可能是后人的附会;第三,沈约所推崇的作品多犯八病;第四,沈约自己的创作亦不拘泥于八病(详见附录《四声八病二题》)。因此,仅仅用四声八病来涵盖永明诗体特征不免似是而非。现代学者已不再拘限于这种成见。他们能够放开视野,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永明诗体。葛晓音的《八代诗史》、王钟陵的《中国中古诗歌发展史》对永明诗体问题都曾作了有益的探索。譬如王钟陵提出,永明诗体包含四项内容:一、声韵的研讨和篇幅的缩短;二、对流转圆美和平易艺术风格的追求;三、诗境的婉美与巧思;四、自觉的意境诗的初步形成。从理论上讲,这些分析是相当完美的,可以说涵盖面极广。不过,美中不足的是,这种分析又过于宽泛,因为艺术风格的流转平易以及诗境的婉美巧思显然并不是永明诗体所独擅,因此,它仍不能给永明诗体以具体准确的解释。

早年,罗常培先生整理刘师培遗说而作《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独立出版社1945年版),曾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历代文章得失,后人评论每不及同时人评论之确切。"那是因为,"去古愈近,所览之文愈多,其所评论亦当愈可信也。"至少,就对现象的概括而言,罗先生的话不失为一条平凡的真理。我想,描述永明诗体的历史本来面貌,最可信的办法还是根据当时学者的认识,以声律说为中心,考察其句式、韵律、丽辞、节奏等形式方面的特征,从而对其追求"新变"的具体含义能有一个比较确切的把握。可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当时学者的评论已属凤毛麟角,所存

已经非常有限，它只能起到提示的作用，具体的工作还得从当时的创作入手。当然这也有很多困难。上一章具体分析了永明诗人的创作情况，认为竟陵八友是永明诗人的最重要代表。但除此之外，象刘绘、张融、周颙、丘迟、何逊、吴均等也与永明体有重要关系。周颙活跃于永明年间，是四声论的主要倡导者(详见附录《周颙卒年新探》及《四声八病二题》)，可惜诗已不存(《文镜秘府论》收有周颙诗一首，有人怀疑非是[1])。张融、刘绘的诗歌与沈约、谢朓、王融的作品十分接近，理应列入永明体作家中。但是如果把这些作家都划入考察范围，限于篇幅，这篇论文无法容纳。因此我想根据《南齐书》及《梁书》的记载，以沈约、谢朓、王融的作品作为考察的对象，旁及竟陵八友中其他诗人的创作。所据作品，大多出自《文选》及《玉台新咏》[2]，因为这两种选本的成书年代距永明时代最近。此外，清人王闿运《八代诗选》有三卷"新体"诗，选录了齐梁以来俪事切而入律者凡 505 首，其中南朝 372 首，北朝(包括庾信等)133 首。王闿运为晚清著名学者兼诗人，他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后人对永明新体诗的认识，所以也值得注意。

根据上述认识，笔者对《文选》《玉台新咏》《八代诗选》所收沈约、谢朓、王融等诗人作品，特别是对其中五言四句、五言八句、五言十句式作了比较详尽的考察。此外，为便于溯源寻流，笔者又对《文选》及《玉台新咏》所收元嘉诗人颜延之、谢灵运的诗作以及《玉台新咏》所收宫体诗人萧纲、萧绎兄弟的诗作略作纵向比较。至于诗作统计的原则，是以最早选本为基点。比如，《文选》《玉台新咏》同收一首，此诗计入《文选》名下；《玉台新咏》《八代诗选》同收一首诗，则此诗计入《玉台新咏》名下。就是说，《八代诗选》名下所列诗作都是《文选》及《玉台新咏》所未收的。

这部分诗作可以说是王闿运对于“新体诗”的补充选篇。

第二节　永明诗体的句式辨释

吴小平曾对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作过一番统计，就南北朝诗而言，篇制在十句以下的就有2182首，约占总数的75%。其中五言八句竟占993首，居各种句式的首位（《苏州大学学报》1986年2期）。王钟陵的统计大致相近：“首为八句式，次为四句式，再次为十句式”（《中国中古诗歌发展史》）。这个统计数字不能说是没有意义的。它至少向我们说明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魏晋南北朝的诗歌发展逐渐由长变短，句式渐渐趋于定型。永明诗体的句式情况，其发展脉络与魏晋南北朝诗的总趋势正相吻合。

表一　竟陵八友诗歌统计

句式 / 选集	4句	6句	8句	10句	12句	14句	16句	18句	20句	22句	28句	30句	34句	36句	总计
文选	0	1	4	7	5	6	2	1	8	1	1	2	0	1	39
玉台新咏	48	2	32	14	5	2	1	1	2	1	1	0	1	0	110
八代诗选	1	1	14	13	0	1	0	0	0	0	0	0	0	0	30
总计	49	4	50	34	10	9	3	2	10	2	2	2	1	1	179

从这个抽象的统计来看，竟陵八友的五言诗，八句式最多，50首，约占总数28%；其次四句式，49首，约占总数27%；再次为十句式，34首，约占总数19%。再对萧纲、萧绎兄弟的诗歌作统

计，可以得出近似的结论。

表二　萧纲、萧绎诗歌统计

句式 选集	4 句	6 句	8 句	10 句	12 句	14 句	16 句	18 句	20 句	22 句	24 句	26 句	28 句	30 句	36 句	总 计
玉台新咏	25	15	34	9	4	5	0	5	2	1	1	1	0	1	1	104
八代诗选	11	2	21	12	9	3	1	1	1	1	0	0	1	0	0	63
总　　计	36	17	55	21	13	8	1	6	3	2	1	1	1	1	1	167

这个表说明，萧纲、萧绎兄弟的五言诗仍以八句式居多，55首，约占总数的27%；其次是四句式，36首，约占总数的22%；再次是十句式，21首，约占总数的13%。很明显，自永明以后，五言八句、四句及十句的诗体已成为当时诗坛的主要形式。相比较而言，长篇句式日渐减少。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拿颜延之、谢灵运的诗歌作一比较。

表三　颜延之、谢灵运诗歌统计

句式 选集	4 句	8 句	14 句	16 句	18 句	20 句	22 句	24 句	26 句	32 句	34 句	40 句	42 句	90 句	总 计
文　　选	0	5	3	4	4	11	12	3	6	3	2	1	1	1	56
玉台新咏	2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3
总　　计	2	5	4	4	4	11	12	3	6	3	2	1	1	1	59

五言二十二句居各种句式之首，12首；第二位是二十句式，11首；第三位是二十六句式，6首。这说明，颜、谢的五言诗创作仍以长篇为主，不过，他们对于五言四句及五言八句已经有所染指，而且影响颇大。

从五言四句诗的发展过程来看，这种诗体经历了由少到多、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发展演变的过程。汉代五言四句古诗有"采葵莫伤根"、"南山一树桂"二篇，前者收入《艺文类聚》，后者见于《玉台新咏》。许学夷以为此二篇是"五言绝之始也"(《诗源辨体》)。魏晋人踵事增华，对这种诗体表现出日益浓厚的兴趣。《玉台新咏》专辟有五言四句诗一卷，除卷首古绝句四首外，其余都是魏晋以后作品，尤以齐梁之作居多。为什么五言四句诗在魏晋以后日益兴盛呢？陆云曾说："四言转句，以四句为佳"(《文心雕龙·章句》引)。这里虽然是指"四言，"但魏晋诗人已明显意识到，四句式在韵律方面可以构成一个独立的单位，五言四句之兴恐怕与此有关。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就《玉台新咏》卷十所收魏晋五言四句诗而言，其署名之作除贾充《与妻李夫人联句诗三首》之外，其他如孙绰《情人碧玉歌二首》、王献之《情人桃叶歌二首》、桃叶《答王团扇歌三首》，均属吴声歌曲。至于无名氏之作，如《近代西曲歌五首》、《近代吴歌九首》、《近代杂歌三首》等均系子夜吴歌与西曲歌。这说明，魏晋以来，特别是东晋以来，江南民歌对五言四句诗的兴起似乎产生了比较重要的影响。晋宋以后，这种影响表现得日益明显。素以"繁富"著称的谢灵运亦有《东阳谿中赠答二首》，民歌风味很浓，与他的其他作品很不相同。当然，这样的短诗不仅在谢灵运的作品所占比例甚少，而且在元嘉初年的诗坛也不多见。谢灵运死于元嘉十年。在这前后，诗风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元嘉二十年以后，鲍照初露头角，其创作风格已与颜谢颇不相同。最明显的变化是，鲍照很欣赏吴歌的文学价值，并模仿这种诗体，作为新的尝试。今存《吴歌三首》、《采菱歌七首》、《中兴歌十首》等五言四句诗明显受到江南民歌的影响。与鲍照同时的汤惠休亦复如是。其五言四

句诗如《江南思》、《杨花曲三首》等亦源于江南民歌。休、鲍二人所作的这种新的尝试与恪守传统规范的颜延之很不相同，因此在休、鲍与颜延之之间，彼此菲薄、互致不满便不是偶然的现象了。《南史·颜延之传》载："延之尝问鲍照己与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绘满眼'。"《诗品》亦载："汤惠休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采缕金，'颜终身病之。"由此来看，鲍照、汤惠休主张文贵独创，反对因循守旧；重视天才，反对徒恃功力。因之，颜延之的创作正好成为他们批评的对象。因为颜延之"尚巧似，体裁绮密，情喻渊深，动无虚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弥见拘束"(钟嵘《诗品》)，仅能恪守陆机以来华丽工炼的传统。对这种批评，颜延之当然不能接受，所以反唇相讥说："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谣耳，方当误后事"(《南史》本传)。又因"忌鲍之文，故立休、鲍之论"(钟嵘《诗品》引羊曜璠语)。很明显，他们之间争论的焦点之一，是该不该学习民歌。而历史的发展则日益肯定了这个问题。刘宋后期"大明、泰始中，鲍、休美文，殊已动俗"(钟嵘《诗品》)，可以推想，宋齐士人所以能够欣赏鲍照的创作，主要是因为他的诗歌给诗坛带来了清新的气息，使人们越发认识到了民歌的文学价值。

再就民歌而言，既然是民间歌谣，所以往往以唱为主，而且多为即兴创作。其对象多是"听者，"而不是案头文学的读者，故其内容不宜复杂，其句式也不宜过长。晋宋以来的民歌以五言四句居多，很可能跟它的这种实用功能有直接关系。文人拟作虽然不再完全受到所谓"听者"的限制，但既然是拟作，形式方面的摹拟总是最基本的步骤。

鲍照以后，五言四句诗已流行于诗坛。对竟陵八友的诗歌

统计，就比较明显地反映出这种情形。又《南齐书·高帝十二王传》载：萧晔“与诸王共作短句”以呈萧道成，萧道成回报有：“见汝二十字”云云，说明所谓“短句”即指五言四句。至梁代，萧纲、萧绎兄弟尤其钟意于这种诗体。萧纲《与湘东王书》称：“吾辈亦无所游赏，止事披阅，性既好文，时复短咏。”这里所说的“短咏”当即南齐流行的“短句，”主要是指五言四句诗。

至于五言八句诗，大约与五言四句诗同时步入诗坛。从现存作品来看，古诗十九首中的《涉江采芙蓉》与《庭中有奇树》是较早的两首五言八句诗。至魏晋时代，这种诗体渐渐流行开来，比如刘桢的《赠从弟二首》、王粲的《杂诗》以及曹植的《泰山梁甫行》等，从立意构思到谋篇布局，都已经较为完整。元嘉时代的五言八句诗以颜延之《五君咏》为代表。从这组诗的创作来看，当时诗人似乎已不像是偶然写作，而是有意为之。当然，在此前，五言八句毕竟还未占据诗坛主流。到了永明以后，五言八句诗突然振起，以一种不可阻挡之势，一跃而成为文坛主流。

魏晋南北朝诗歌发展的历史，也就是近体诗从发生到发展的历史。仅就诗歌句式的演变而言，从两汉五言古诗到建安诗歌，这是一变。太康时代，五言句式又发生新的变化，那就是四句八句式明显见多。至元嘉时代，又是一变，元嘉诗人似乎有意开始尝试创作五言四句八句诗，虽然只是尝试，而且数量不多，却影响久远。永明诗人则在句式方面，将五言四句八句诗渐渐归于定型，使之成为文坛比较主要的诗歌样式，这就为近体诗的形成，在句式上做了奠基性的工作。

第三节 永明诗体的律句辨释

如果说唐人作律诗比较考究的话，其实主要集中在平仄问题上。他们提出那么多细则，比如诗的粘与对问题、孤平与三平调问题等，都与平仄有直接关系。简而言之，律诗的最基本要求便是在每一联内、每句的平仄应当相间错落，而上句的平仄与下句的平仄则必须相对。

关于这一点，恰恰是永明诗人最重要的发现。

永明中，沈约作《宋书·谢灵运传论》就已明确提出："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此后，他又在《答陆厥书》中强调指出："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以累万之繁，配五声之约，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学，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颠倒相配，字不过十，巧历已不能尽，何况复过于此者乎？"虽然他没有直接运用四声的称呼来论述诗律问题，只是把人类的发音划分为"低"与"昂"、"轻"与"重"、"浮声"与"切响"这相互对比的两个类别，但许多音韵学家都认为，这实际上是用比喻性的术语来讨论平仄问题。顾炎武说："其重其疾，则为入为去为上；其轻其平，则为平"（《音论》）。钱大昕也说："古无平上去入之名，若音之轻重缓急，则自有文字以来，固区以别矣。""大率轻重相间，则平侧之理已具。"具体到平仄问题上，他认为"缓而轻者，平与上也；重而急者，去与入也"（《潜研堂集·音韵答问》）。何焯《义门读书记·文选》第五卷云："浮声切响即是轻重。"邹汉勋《五韵论》说："为文皆用宫商，犹云为文皆用平仄焉尔。"陈澧《切韵考》也说："《宋

书·范蔚宗传》云：'性别宫商，识清浊。'此但言宫商，犹后世之言平仄也。"在这些学者看来，在沈约时代，人们在韵理上已对四声作了初步的辨析。所谓浮声、轻声、或曰低声，其实都是平声的代名词，指声音轻缓而浮；所谓切响、重声、或曰昂声，其实都隶属于仄声的范畴，指声音重疾而浊。当然，这个结论并非定谳。一些学者不时还提出异议。我觉得，在现代学者中，郭绍虞先生的看法最为通达合理。他在《再论永明声病说》(载《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中指出，平仄概念是唐人提出的，因此，将宫羽、轻重、浮声、切响等比喻性说法完全等同于平仄，固然不妥；但说它与平仄全无关系，亦非的论。这些比喻性说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当时人想"使四声二元化的要求。"因此，"这些术语是都可以统摄到平仄二类中去的，所以可以相通；也都可以看作平仄的先声的，所以也可以看作是平仄二类的问题。"永明以来，这种辨析虽然还不普及，但也并不像沈约所说的"此秘未睹。"作于齐末的《文心雕龙》专设《声律》一篇，就是用"飞"与"沉"表达同样的认识："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扬不远。"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说："飞谓平清，沉谓仄浊。"很明显，黄侃认为，刘勰所说的，轻声而飞，重响而沉，实际论及的都是平仄问题。因此我认为，刘勰的观点与沈约所说，"前有浮声，后须切响"云云，不过是同一内容的不同表达方式而已。具体运用到诗歌创作中，要求在一句之中，平仄调配得宜，这样才能"音韵尽殊，"而在一联之内，又须"颠倒相配，"即平仄相对，这样诵读起来就会感到"轻重悉异，"真正显示出汉语言所具有的抑扬顿挫之美。刘永济先生在《文心雕龙校释》一书中精辟指出："平仄以相间为重为美，一句之中，平声太多，或两句之内，平仄不协，则诵之不能谐适。此事必

在四声既定之后。"这段论述准确说明了四声发明之后，其在诗文创作中的运用，主要是通过平仄这两大类别的变化来实现的。

永明诗人是如何在诗歌创作中运用平仄的变化来显示诗歌声韵之美呢？它在什么程度上为唐代近体诗在声律方面奠定基础呢？与唐代近体诗相比，它又在哪些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呢？具体地回答这些问题，对我们细致认识永明诗体在声律方面的某些特征，或许不是没有意义的探讨。

一、人律句

1. 严格律句

所谓"严格律句，"是以唐代律诗为标准、由后人总结出来的近体诗的平仄形式。根据一般的解释，近体诗主要有四种句式，即平起两种，仄起两种：

1. 仄仄平平仄

2. 平平仄仄平

3. 平平平仄仄

4. 仄仄仄平平

基于上述四种基本句式，还可以推出几种变调，启功先生认为：

1. 平仄仄平平

2. 仄平平仄仄

3. 平仄平平仄

也应归于严格律句，因为唐宋诗人多采用这几种变调写作近体诗。这样看来，五言律句，从严格意义上说，实际有上述七种基本句式。这七种基本句式主要反映了五言诗在本句之中的平仄调配情况。

根据这种理解，我们可以明显注意到，汉魏以来，尽管五言律体远未成熟，但在五言古诗中，入律的句子却已经常形诸诗人

笔下。譬如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所推举的："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以及钟嵘《诗品序》中所引阮瑀、曹植两句诗，无一例外都与律句有密切关系。所谓"函京之作"是指曹植的《赠丁仪王粲诗》，其首句为"从军渡函谷，驱马过西京，"其平仄为"－－|－|，－||－－；"又"霸岸之篇"是指王粲的《七哀诗》，其中两句为"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其平仄为"－－|－|，－||－－；"又"零雨之章"是指孙楚的《征西官属送于陟阳侯作诗》，其首句为"晨风飘歧路，零雨被秋草，"其平仄为"－－－－|，－||－|；"又"朔风之句"是指王赞《杂诗》，其首句为"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其平仄为"|－|－|，－||－－。"沈约所引这四联诗，下句都是律句，这不像是偶然的巧合。再看钟嵘所激赏的阮瑀《杂诗》"置酒高堂上，"曹植《七哀诗》"明月照高楼"，前者为"||－－|，"后者为"－||－－，"平仄形式比较严整，这好像也不是偶然的巧合。它至少说明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魏晋时期，五言古诗夹杂律句的现象已经时常出现，虽然不是有意为之，且数量不多，但却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新现象。

元嘉时代的代表诗人鲍照、谢灵运、颜延之等在诗歌格律方面较之魏晋诗人有了更多的创获。举其要者，譬如鲍照的诗句："归华先委露，别叶早辞风"（－－－||，|||－－）、"蜀琴抽白雪，郢曲发阳春"（|－－||，|||－－）、"珠帘无隔露，罗幌不胜风"（－－－||，－||－－）、"扬芬紫烟上，垂彩绿云中"（－－|－|，－||－－），等等，除了"扬芬紫烟上"一句外，其余诸句都是律句。在上节我们曾统计过颜延之、谢灵运的五言四句、八句诗凡七首，共四十八句，其中严格入律句有九句，占总统计数的18%。这九句严格入律句是：谢灵运《东阳谿中赠答》其一："明

月在云间"(－||－－)；其二："缘流乘素舸"(－－－||)与"月就云中堕"(||－－|)；颜延之《五君咏》"阮步兵"诗："长啸若怀人"(－||－－)；"嵇中散"诗："寻山洽隐沦"(－－||－)；"刘参军"诗："刘灵善闭关"(－－||－)；"阮始平"诗："实禀生民秀"(||－－|)；"向常侍"诗："探道好渊玄"(－||－－)、"交吕既鸿轩"(－||－－)等。我们虽然还不能说这些诗句是诗人有意调配平仄，但确实是比魏晋诗人运用得更加自如了，尽管还带有很大的自发性。另外，这种平仄也仅限于句而非联。

这种情形到了永明以后，则发生了很大变化。

这种明显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从理论上讲，永明诗人在发现四声基础上，已经比较明确地意识到了诗歌平仄变化的重要性，并作出了初步的归类，不仅在一句之内、而且更强调在一联之中讲究平仄变化，强调颠倒相配，可以说这是一种理论上的自觉。同时，永明诗人不仅局限于理论上的探讨，他们还进一步把这些理论与创作实践结合起来，这就使得他们的诗歌至少在诗歌韵律方面较之前代有了明显的变化，或者说，具有自己比较鲜明的创作特色。

《文选》《玉台新咏》及《八代诗选》所选沈约、谢朓、王融三人的五言四句、八句及十句诗共92首。其中沈约32首(四句4首、八句22首、十句6首)，谢朓44首(四句6首、八句19首，十句19首)，王融16首(四句6首、八句6首、十句4首)，试将这92首诗逐一标识平仄，结果发现，沈约的32首诗共252句，严格入律句有118句，占47%；谢朓的44首诗共366句，严格入律句有177句，占48%；王融的16首诗共112句，严格入律句有46句，占41%。严格入律的句子在他们各自的创作中占有这么高的比例，这确实是前所未有的现象。不仅如此，永明诗人

的创作还不是偶用严格律句，有时一首诗绝大多数是入律句。譬如沈约的《襄阳白铜鞮》及《夜夜曲》：

分首桃林岸， —｜——｜
送别岘山头。 ｜｜｜——
若欲寄音息， ｜｜｜—｜
汉水向东流。 ｜｜｜——

北斗阑干去， ｜｜——｜
夜夜心独伤。 ｜｜—｜—
月辉横射枕， ｜——｜｜
灯光半隐床。 ——｜｜—

这两首诗，除“若欲寄音息”和“夜夜心独伤”非律句外，其余诸句均是入律句。另外，还有不少作品竟能做到句句入律：

残朱犹暖暖， ———｜｜
余粉尚霏霏。 —｜｜——
昨宵何处宿， ｜——｜｜
今晨拂露归。 ——｜｜—

——沈约《早行逢故人车中为赠》

渠碗送佳人， —｜｜——
玉杯要上客。 ｜——｜｜
车马一东西， —｜｜——
别后思今夕。 ｜｜——｜

——谢朓《金谷聚》

落日高城上，　||——|
余光入繐帷。　——||—
寂寂深松晚，　||——|
宁知琴瑟悲。　|——|—

——谢朓《铜雀悲》

琼闺钏响闻，　——||—
瑶席芳尘满。　—|——|
要取洛阳人，　—||——
共命江南管。　||——|
情多舞态迟，　——||—
意倾歌弄缓。　|——||
知君密见亲，　——||—
寸心传玉碗。　|——||

——谢朓《听妓》其一

上引诸诗，句句入律。虽然《铜雀悲》中的“宁知琴瑟悲”一句按唐宋诗人的标准当属于拗句，不过这种句式在唐诗中并不少见，王力先生干脆把这类句式称为平仄特殊形式而归入变例，但仍属于律句(详后)。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诸诗不仅句句入律，而且粘与对，有些已接近唐人创作。譬如沈约诗句“残朱犹暖暖，余粉尚霏霏”，谢朓诗句“落日高城上，余光入繐帷”等，已完全符合唐人心目中的对句标准。另外，谢朓《听妓》(其一)诗的后两联，平仄完全相同，对句十分严整。当然，按照唐诗标准，这两联成了“顺风旗”，失粘。这说明，永明诗大抵注意两句平仄相对，但对于全诗格律还不很注意。换句话说，他们充分注意到每联之内的“颠倒相配”，而尚未虑及全篇。类似这种严整的对句，

我们随手还可以拈出不少，譬如：

王融诗例——《咏火》："冰容惭远鉴，水质谢明辉"（— — — | |，| | | — —），《咏琵琶》："丝中传意绪，花里寄春情"（— — — | |，— | | — —），《临高台》："花飞低不入，鸟散远时来"（— — — | |，| | | — —），《萧谘议西上夜集》："徘徊将所爱，惜别在河梁"（— — — | |，| | | — —），"寸心无远近，边地有风霜"（| — — | |，— | | — —），"勉哉勤岁暮，敬矣慎容光"（| — — | |，| | | — —），等等。

谢朓诗例——《玉阶怨》："夕殿下珠帘，流萤飞复息"（| | | — —，— — — | |），《春游》："置酒登广殿，开襟望所思"（| | — — |，— — | | —），《同谢谘议铜雀台诗》："穗帏飘井榦，樽酒若平生"（| — — | |，— | | — —），《咏烛》："暖色轻帏里，低光照宝琴。徘徊云髻影，灼烁绮疏金。恨君秋夜月，遗我洞房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咏席》："遇君时采撷，玉座奉金卮"（| — — | |，| | | — —），《赠王主簿》："徘徊韶景暮，惟有洛阳隅"（— — — | |，— | | — —），《奉和随王殿下》十："宴私移烛饮，游赏藉琴台"（| — — | |，— | | — —），其十五："新萍时合水，弱草未胜风"（— — — | |，| | | — —），《游东田》："远树暖纤纤，生烟纷漠漠"（| | | — —，— — — | |），《落梅》："亲劳君玉指，摘以赠南威"（— — — | |，| | | — —），"日暮长零落，君恩不可追"（| | — — |，— — | | —），《咏邯郸故才人嫁为厮养卒妇》："生平宫阁里，出入侍丹墀"（— — — | |，| | | — —），《和刘西曹望海台诗》："临川徒可羡，结网庶时营"（— — — | |，| | | — —），等等。

沈约诗例——《应王中丞思远咏月》："月华临静夜，夜静灭氛埃（| — — | |，| | | — —），《冬节后至丞相第诣世子车中》："高车尘未灭，珠履故余声（— — — | |，— | | — —），《游钟山应西阳王教》："山中咸可悦，赏逐四时移"（— — — | |，| | | — —），《咏柳》：

"楚妃思欲绝，斑女泪成行"（|——||，—||——），《领边绣》："紫丝飞凤子，结缕坐花儿"（———||，|||——），《脚下履》："裾开临舞席，袖拂绕歌堂（———||，|||——），《泛永康江》："山光浮水至，春色犯寒来（———||，—||——），《携手曲》："所畏红颜促，君恩不可长"（||——|，——||—），《咏桃》："风来吹叶动，风去畏花伤"（———||，—||——），《咏篪》："江南箫管地，妙响发孙枝"（———||，|||——），等等。

不论是魏晋诗人，还是元嘉诗人，尽管在他们的作品中间或出现律句，但他们都没有像永明诗人那样大量创作律句，而且在粘与对，特别是在"对"的方面如此考究。这说明，永明诗人确实是在比较自觉地追求诗歌韵律之美，而且在创作过程中，已经初步归理出某些带有规律性的法则。他们大量地创作律句和对句，就是最好的证明。

2.特殊律句

近体诗兴起后，唐人并不一定完全依据上述严格律句从事创作，有时该用平声的用仄声，该用仄声的为平声，如果是偶然一见，或可视为拗句，但是假如这种违反常格的句子反复出现，且约定俗成，甚至有时出现在应试的排律中，那么这些句子便不应该再以拗句目之，而已经成为一种特殊律句。王力先生在《汉语诗律学》中列举了四种句式：

第一，把本该是"平平平仄仄"改为"平平仄平仄。"

第二，把本该是"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改为"仄仄平仄仄，平平平仄平。"

第三，把本该是"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改为"仄仄平仄仄，仄平平仄平。"

"平平仄平仄"与"仄仄平仄仄"为上句特例。前者头节上字

以避免仄声为原则，后者第二字须仄声，末二字须仄仄，才能与对句构成一联。后两例，即“平平平仄平”与“仄平平仄平”为下句特例，变动一三字，合通常所谓一三五不论之例（五律中为一三不论）。这四种特殊句式并不是唐人独创，而是经常出现在晋宋以来的五言诗歌中。唐人采用这种特殊句式，是在律诗定型以后，所以是有意为之，而且在一联之内，或联与联之间，常辅以拗救。而晋宋以来的诗人则不像是有意为之，因此这些特殊句式的出现常常是孤立的，当然无所谓拗救之说。晋宋以来，特别是永明诗人经常采用这些特殊句式入诗，很可能是因为这些特殊句式主要在一三字上调整，均属双音节上字，读时相对为轻，所以可以适当放宽限制。颜谢七首诗，这种特殊句式占7例，即《五君咏·向常侍》：“向秀甘淡薄，”即“||－||”式，同首“流连河里游”为“－－－|－”式。又同首“深心托豪素”，“观书鄙章句”及“刘参军”诗：“怀情灭闻见”，“韬精日沈饮”四句为“－－|－|”式。而“阮始平”诗“达音何用深”则是“|－－|－”式。

在永明诗人中，沈约、谢朓、王融尤其善于运用这种特殊律句入诗，显得古朴峭直。其中所占比例最大的是“－－|－|”式，在所统计的92首730句诗中占去69句：

王融诗例——“相思早春日”，“含情结芳树”（《芳树》），“春江夜明月”（《饯谢文学离夜》），“烟霞乍舒卷”，“秋风下庭绿”（《巫山高》），“低吹杂纶羽”（《回文诗》），“游禽暮知反”，“嚬容入相镜”，“秋风度函谷”，“当轩卷罗縠”（《古意二首》），等等。

沈约诗例——“香随远风入”（《为邻人有怀不至》），“高楼切思妇”（《同王中丞思远咏月》），“廉公失权势”，“宾阶绿钱满”，“谁当九原上”（《冬节后至丞相第诣世子车中》），“魂交睹容色”、“潺湲泪沾臆”（《梦见美人》），“群浮动轻浪”（《咏湖中雁》），“衿

中庁行泪"(《春咏》),"参差互相望","崚嶒起青嶂","春光发垄首","于焉仰镳驾"(《游钟山诗应西阳王教》),"生平少年日"(《别范安成》),"腰中合欢绮"(《洛阳道》),"空床寄杯酒"(《拟青青河边草》),"长河隔长路"(《效古》),"斜簪映秋水"(《携手曲》),"佳人共携手","空中信杨柳","含情寄杯酒"(《初春》),"新知乐如是"(《秋夜》),"雕梁再三绕"(《咏篪》),等等。

谢朓诗例——"思君此何极"(《玉阶怨》),"翻潮尚知恨"(《离夜诗》),"方舟泛春渚","安知慕归客"(《送江兵曹檀主簿朱孝廉还上国诗》),"玲珑类丹槛,苕亭似元阙","垂龙挂胡月"(《咏镜台》),"山中上芳月","回流映千丈","花枝聚如雪","何嗟异风壤"(《别江水曹》),"因炎入貂袖,怀温奉芳襦","文斜性非曲"(《咏竹火笼》),"抽茎类仙掌","飞蛾再三绕"(《咏灯》),"红妆好颜色"(《赠王主簿诗》),"低枝讵胜叶","参差不俱曜"(《咏蔷薇诗》),"无为淡容与"(《和王中丞闻琴》),"行云故乡色"(《奉和随王殿下》),"南邻捣衣急"(《秋夜》),"逢君后园宴"(《落梅》),"锵锵玉銮动","飞甍夹驰道","凝笳翼高盖","云枝紫微内","夫君迈惟德","方衢控龙马","王孙尚游衍","旌旗散容裔"(《随王鼓吹曲》),"春心淡容与","朝光映红萼","江垂得清赏","江皋倦游客","归途岂难涉"(《和何议曹郊游》),等等。

占第二位的是"－－－|－"式,共37句:

王融诗例——"金炉香不然","中宵空自煎"(《代徐干》),"怀情殊复情","龙门空自生"(《咏琵琶》),"兰缸当夜明"(《咏幔》),"江山千里长"(《萧谘议西上夜集》),等等。

沈约诗例——"秋风生桂枝"(《游钟山诗应西阳王教》),"聊承云鬓垂"(《领边绣》),"葡萄应作花"(《有所思》),"葳蕤徒可怜"(《咏青苔诗》),"佳人殊未来"(《洛阳道》),"丹诚君讵知"

（《咏篪》），等等。

谢朓诗例——"无论君不归"（《王孙游》），"佳期期未归"（《同王主簿有所思》），"宁知琴瑟悲"（《铜雀悲》），"闻风伊夜来"、"瓯华兰殿明"（《奉和随王殿下》），"桑园荫道周"（《和徐都曹》），"娇羞余故姿"，"犹言承宴私"（《咏邯郸故才子嫁为厮养卒妇》），"充庭罗翠旗"，"瑶堂琴瑟惊"，"垂杨荫御沟"，"功名良可收"，"沈沈寒水波"，"明明时戒哉"，"红尘朝夜合"，"萧条边马烦"，"山川时未因"，"潺湲伤别巾"，"云行芳树低"（《随王鼓吹曲》），"微风吹好音"，"嗟行方至今"，"扬舲浮大川"（《和何仪曹郊游》），等等。

占第三位的是"||-||"式，共 14 句：

"每聚金炉气"（王融《咏幔》），"忽觉非在侧"（沈约《梦见美人》），"北斗横复直"（沈约《夜夜曲》），"逆转珠佩响"（沈约《脚下履》），"薄暮空徙倚"（沈约《洛阳道》），"但令舟楫渡"（沈约《江南曲》），"草色犹自菲"（沈约《初春》），"噎噎萤入雾"（《秋夜》），"玉座犹寂漠"（谢朓《同谢谘议铜雀台》），"发翠斜汉里"（谢朓《咏灯》），"上客光四座"（谢朓《听妓》），"发萼初攒紫"（谢朓《咏蔷薇》），"夜夜空伫立"（谢朓《秋夜》），"玉露沾翠叶"（谢朓《随王鼓吹曲》），等等。

在这四种特殊形式的律句中，所占比例最小的是"|--|-"式，仅得 12 句：

"桂钗当自陈"（王融《少年子》），"念君凄已寒"（王融《古意》），"客心伤此时"（沈约《春咏》），"不声如动吹"（沈约《领边绣》），"燕裙傍日开"（沈约《洛阳道》），"寸心终不移"（沈约《效古》），"木生朝夕地"（谢朓《咏席》），"共知千里情"（谢朓《奉和随王殿下》），"水还江汉流"，"茂陵将见求"（谢朓《新亭渚别范零陵

诗》),"北窗轻幔垂"(谢朓《秋夜》)、"寸心宁共知"(谢朓《随王鼓吹曲》),等等。

以上,我们就永明诗歌中的严格律句和特殊律句分别作了具体的考察,结果表明,永明诗体在声律方面确实较之前代有了长足的进步,直接开启了梁陈诗体,并遥导唐诗先河。如果把上述特殊形式的平仄规则也称之律句的话,那么可以把它和严格律句综合起来一起考察,并比较其先后继承关系,那么结论就比较清楚了:

	作品篇数	严格律句	特殊律句	总　计	比　例
颜、谢	7首48句	10	7	17	35%
王　融	16首112句	46	19	65	58%
沈　约	32首252句	118	42	160	63%
谢　朓	44首366句	177	71	248	64%
萧纲兄弟	31首230句	128	33	161	70%

这个统计表格反映了两个基本事实:第一,诗歌律句超过半数以上,是从永明诗人开始的。第二,从元嘉诗人到宫体诗人,诗歌律句的比例越来越高,象萧纲、萧绎兄弟的诗歌,已有三分之二的律句。这个比例确已不小。这说明梁代中后期,大量律句的运用已非偶然现象,而是一种普遍风尚。有些作家如庾信、徐陵等,他们的一些作品已经非常接近初唐律诗了,像庾信《奉和山池》共五韵十句,若把中间任何一联删去,就很像是一首完整的五言律诗了。至于徐陵,顾学颉先生早年即撰文称他为"律诗首创人"(见《顾学颉文学论集》)。可以说,肇始于永明时代的律

诗，到梁陈时代已经渐趋于成熟。称永明诗体为近体诗的源头，确实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二、非律句

按理说，考察了入律句的使用情况，本节的目的应当说是达到了，不过，对那些非律句的使用情况似乎也不应该有所忽略。这就像赛跑一样，观众对那些领先的运动员往往投注更多的目光，而对那些落后者则多不予重视。但是，如果是一个有心的教练，他不仅要总结成功的经验，更要找出落后的原由。作为近体诗的源头，永明诗体中的入律句虽已占去一半以上，但毕竟还有近一半的句子属于非律句。问题是，这些非律句是否全是杂乱无章，从而无规律可循呢？事实恐非如此。先看下表：

	诗句	三平	三仄	五平	五仄	一平四仄	一仄四平	四平一仄	四仄一平	平仄相间
颜、谢	48	2	6	0	1	1	2	1	1	2
沈约	252	6	19	1	2	2	1	2	1	8
王融	112	9	9	0	0	0	0	3	0	3
谢朓	366	28	30	4	0	5	1	3	0	12
萧纲 萧绎	230	8	16	0	0	3	3	5	3	6
总计	1008	52	80	5	3	11	7	13	5	31

从这个统计表中不难发现，从元嘉诗，到永明诗，到宫体诗，无一例外都以三平、三仄句式为多，尤以三仄式居首。

1. 三仄式

关于三仄式，有几种情形值得注意：

第一，两联之间，上联"对句"为入律句，下联"出句"用三仄式；或相反，上联"对句"为三仄式，下联"出句"用入律句：

月华临静夜，　|——||
夜静灭氛埃。　|||——
方晖竟户入，　——|||
圆影隙中来。　—||——

——沈约《应王中丞思远咏月》

群浮动轻浪，　——|—|
单泛逐孤光。　—||——
悬飞竟不小，　——|||
乱起未成行。　|||——

——沈约《咏湖中雁》

珪贽纷成序，　—|——|
鞮译憬来思。　—||——
分阶赩组练，　——|||
充庭罗翠旗。　———|—

——谢朓《随王鼓吹曲》

清吹要碧玉，　———||
调弦命绿珠。　——||—
轻歌急绮带，　——|||
含笑解罗襦。　—||——

——谢朓《赠王主簿》

本生朝夕池，　|——|—
落景照参差。　|||——
汀州蔽杜若，　——|||
幽渚夺江蓠。　—||——

——谢朓《咏席》

第二，两联之间，上联“对句”为三仄式，下联“出句”为三平

式；或相反，上联“对句”为三平式，下联“出句”为三仄式：

云枝紫微内，　— — | — |
分组承明阿。　— | — — —
飞艎溯极浦，　— — | | |
旌节去关河。　— | | — —

——谢朓《随王鼓吹曲》五

暮春春服美，　| — — | |
游驾凌丹梯。　— | — — —
升峤既小鲁，　— — | | |
登峦且张齐。　— — | | —

——谢朓《随王鼓吹曲》九

殪兽华容浦，　| | — — |
张乐荆山台。　— | — — —
虞人昔有谕，　— — | | |
明明时戒哉。　— — — | —

——谢朓《随王鼓吹曲》六

花枝聚如雪，　— — | — |
垂藤散似网。　— — | | |
别后能相思，　| | — — —
何嗟异风壤。　— — | — |

——谢朓《别江水曹》

勿言一樽酒，　| — | — |
明日难重持。　— | — — —
梦中不识路，　| — | | |
何以慰相思。　— | | — —

——沈约《别范安成》

第三，一联之内，三平式和三仄式相对：

离情隔远道，　— — | | |
叹结深闺中。　| | — — —

——王融《回文诗》

君王挺逸趣，　— — | | |
为旆临崇基。　| | — — —

——沈约《游钟山诗应西阳王教》

霡霂青莎被，　| | — — —
潺湲石溜泻。　— — | | |
寄语持笙簧，　| | — — —
舒忧愿自假。　— — | | |

——谢朓《和何议曹郊游诗》

差池远雁没，　— — | | |
飒沓群凫惊。　| | — — —

——谢朓《和刘西曹望海台》

分悲玉瑟断，　— — | | |
别绪金樽倾。　| | — — —

——谢朓《奉和随王殿下》十四

第四，一联之内，三仄式对入律句：

蛾眉已共笑，　— — | | |
清香复入襟。　— — | | —

——谢朓《听妓》

轻歌急绮带，　— — | | |
含笑解罗襦。　— | | — —

——谢朓《赠王主簿》

东都已俶载，　——｜｜｜
言归望绿畴。　——｜｜—

——谢朓《和徐都曹》

怀春发下蔡，　——｜｜｜
含笑向阳城。　—｜｜——

——王融《阳翟新声》

去来徘徊者，　｜｜——｜
佳人不可遇。　——｜｜｜

——王融《芳树》

以上所举，主要是三仄式的诗句。至于三平式的诗句，情形大体类似，不必赘举。从这些例句来看，不管是一联之内，还是两联之间，永明诗人充分注意到了平仄的调配，即所谓"对"的问题。沈约所说的"十字之文，颠倒相配，"确非虚语，而是对当时在诗歌创作中平仄运用的准确总结。当然还应指出，永明诗人虽然注意到了"对"的重要性，却不无遗憾地忽略了联与联之间"粘"的必要性。不用说，这并非是苛求永明诗人，而是只想指出这个事实，用以说明近体诗在其发展成熟过程中，对与粘的考究，并非同时起步。事实上，永明诗人在诗歌格律方面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对"的方面，至于"粘"，那是后来者的任务。

2.平仄相间式

如果说三仄式(或者三平式)主要体现了十字之文的颠倒相配的情况，那么，平仄相间式则反映了平仄关系在五字之中的变化。所谓平仄相间式，是指—｜—｜—，或｜—｜—｜式，在我们所统计的非律句中，句数占第二位：

所知共歌笑。　｜—｜—｜

——王融《饯谢文学》

空度明月辉。　—|—|—

——王融《古意》

网轩映珠缀。　|—|—|

——沈约《应王中丞思远咏月》

露葵已堪摘。　|—|—|

——沈约《古意》

临眺殊复奇。　—|—|—

——沈约《游钟山诗应西阳王教》

玉绳隐高树。　|—|—|

——谢朓《离夜诗》

携手趋上京。　—|—|—

——谢朓《送江兵曹檀主簿朱孝廉还上国诗》

井冰粲成玉。　|—|—|

——谢朓《咏竹火笼》

挂钗报缨绝。

——谢朓《听妓》

蕙风入怀抱。　|—|—|

——谢朓《和王中丞闻琴》

金风鸣素枝。　—|—|—

——谢朓《随王鼓吹曲》十

未尝远离别。　|—|—|

——谢朓《和何议曹郊游》

3. 一平四仄式、一仄四平式、四平一仄式、四仄一平式。

这四种平仄形式在所统计的诗句中占第三位，比例不能算小。表面上看，这些平仄形式距后来的近体诗平仄形式相去甚

迹，不过，它们的运用似乎也并不全是杂乱无章的。譬如谢朓《咏邯郸故才人嫁为厮养卒妇》："憔悴不自识，"是一平四仄，下句为"娇羞余故姿"（－－－|－），大体上是平仄相对。又如沈约《游钟山诗应西阳王教》："合沓共隐天，参差互相望"（||||－，－－|－|），《泛永康江》："临睨信永矣，望美暖悠哉"（－||||，||－－－）等，似乎也都考虑到平仄相对的因素，只是对句的位置还不十分严整而已。

总括上述三种非律句情况，我们明显感到，永明诗人在创作过程中努力实现他们的主张，在五字之内（每句）轻重悉异；在十字之中（一联）颠倒相配，十分强调平仄相对，只是粘的观念还未形成，因为沈约等人着眼只在五字一联。粘的观念是后来者发现了四句之间的音节规律以后才形成的。上述这些句式虽然没有发展成为后来所谓入律句式，但应当承认，这些非律句仍旧可以反映出永明诗人在诗歌平仄方面孜孜探寻的轨迹，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

第四节　永明诗体的用韵辨释

谈到永明诗体，就不能不涉及其用韵情况，因为诗歌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要押韵。永明诗体所以能有别于前代创作，并且能开启近体诗的先河，其用韵的细密考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这里有两个问题应该说明：

第一，所论及的作品仍按本章体例，只限于《文选》《玉台新咏》及《八代诗选》所收沈约、谢朓、王融的五言四句、八句、十句诗，但这并不意味着所得结论仅适用于这三种句式。事实上，其

用韵情况不管是四句也好、四十句也好，总的时代背景都是一样的，因此不可能再根据句式的长短来细分用韵的异同。我所以仅取这三种句式，其原由一如上文，目的是尝鼎一脔、以小见大而已。

第二，论述永明诗体的用韵情况，必然要涉及到整个南北朝的用韵变化。这实际上已经接触到我并不十分了解的音韵学领域。在这个领域，罗常培、周祖谟先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王力先生《南北朝诗人用韵考》等对南北朝的韵部演变作了深入系统的考察，成果显著。永明诗体的用韵情况似不应出此范围，再作论述，不免有叠床架屋之嫌。但我想，前辈学者纯粹是从音韵学的角度对这一时代的韵部进行归纳，至于永明诗体的押韵问题，属于诗律学范围，故未曾具体论述。从文学的角度来看，研究永明诗歌，特别是研究永明诗体的形式特征，其押韵情况如何，确实是一个不能绕过的问题。

与元嘉诗歌相比较，永明诗歌在用韵方面的细密考究主要体现在下列三个方面。

一、多押宽韵，但也押窄韵

关于诗歌的押韵，历来有所谓宽韵、中韵、窄韵、险韵之说。这是根据每个韵部的字数多少大致划分的。宽韵、中韵字数多，可供选择的范围宽；而窄韵、险韵字数少，使用时很容易出韵。使用这些韵部的字入诗，大多是那些比较讲究用韵的诗人。永明诗人用韵日益考究，但他们对于声韵的辨析毕竟没有唐宋人那么细微，所以绝大多数押宽韵、中韵，押窄韵的很少。根据王力先生《汉语诗律学》所总结出来的标准，有六首押窄韵：

沈约《江南曲》：潭南谙（覃）嵌（衔）。

沈约《秋夜》：分氲云裙闻（文）。

沈约《早行逢故人车中为赠》：霏归（微）。

谢朓《同王主簿有所思》：归机稀（微）。

王融《咏火》：辉归（微）。

王融《古意》：归辉衣稀飞（微）。

上面这六首诗，押文微覃三韵，尤以文微二韵为多。这两个韵部尽管字数不多，但永明以后诗人很爱用。象萧纲《咏中妇流黄》："机飞衣晖"，《金闺思》："依飞"，萧绎《和刘上黄》"飞衣晖归"等都用的是微韵。至于唐人尤其爱用文微二韵，这也许是继承了永明诗人的传统。但南朝诗人绝少用"江佳肴咸"等险韵的，至少在所统计的二百多首诗中，没有一首用险韵。尽管如此，永明诗人较之前代用韵仍然要细致得多。从所统计的颜谢诗作中，连一首窄韵诗都没有，而永明诗人竟占有六首之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

二、以押平声韵为主

近体诗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要押平声韵。凡是押仄声韵的，根据传统的看法，往往归入古体诗类。考察永明诗体与近体诗的关系，看它的平声韵是多少，仄声韵又是多少，或许不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

从《文选》《玉台新咏》所收录的颜延之、谢灵运的七首五言四句八句诗来看，押平声韵的诗仅有一首，即颜延之《五君咏·嵇中散》，其余六首全押仄声韵（上声韵五首，入声韵一首），说明元嘉诗歌仄声韵居多。永明以后，情形发生了很大变化：

从下面统计表来看，沈约押平声韵的诗有 24 首，占所收诗 75%，押仄声韵的诗 7 首，约占 23%（另有一首换韵，详下）。王融押平声韵的诗 13 首，约占 81%，押仄声韵的诗 2 首，约占 13%（另有一首换韵，详下）。谢朓押平声韵的诗有30首，约占

作者＼四声	平	上	去	入
沈约 32 首	24	2	1	4
谢朓 44 首	30	4	2	8
王融 16 首	13	0	1	1
总计 92 首	67	6	4	13

69%，押仄声韵的诗 14 首，约占 31%。综括这三位诗人的作品，押平声韵的诗占 73%。在押仄声韵的诗中，押入声韵的诗居于首位，约占 14%。萧纲、萧绎兄弟的诗歌大体亦如是：

作者＼四声	平	上	去	入
萧纲 27 首	24	0	0	3
萧绎 4 首	2	0	0	2
总计 31 首	26	0	0	5

萧纲兄弟押平声韵的诗共 26 首，约占所统计诗的 84%，而押仄声韵的诗仅 5 首，才占 10% 左右。在押仄声韵的诗中，全押入声韵。这说明江南入声字的运用很普遍。

上面两个统计表告诉我们：从元嘉诗，到永明诗，到宫体诗，以至于近体诗，押平声韵的诗越来越多，特别是从元嘉到永明这一时期，变化更为明显。近体诗确立之后，则将押平声韵定为正则，而押仄声韵则成为变例了。从唐代近体诗的创作来看，虽有极少数诗押仄声韵，但限制很多，最主要的一点是，仄声中的上、

去、入三声绝不能通押，这样，押仄声韵而不出韵就很不容易了。从上面统计的诗作来看，永明诗人虽然押仄声韵的诗还不少，但他们对三声辨析很细，很少通押，且又不出韵，说明他们对于四声的辨析确实已相当细致。

三、押本韵甚严、押通韵多已接近唐人、转韵之诗应摈除在永明诗体之外

近体诗用韵甚严，无论绝句、律诗、排律，必须一韵到底，除非《切韵》或《唐韵》注明"同用"的韵，是不能允许换韵的，只能用本韵。

1.转韵

转韵可以说纯粹是古体诗的最显著的特征。从所选的92首永明诗中，属于转韵的诗仅两例，即沈约的《拟青青河边草》：尘人(真)、忆息(职)、仪离(支)、久酒(有)，另一首是王融的《古意》二：谷毂沐(屋)、闻氲纷(文)。这两首诗，作者明确标明是拟古之作，说明应该摈除在"新变"诗之外。

2.通韵

由于时代不同，各个时期所得韵部自然也很不相同。某一个韵部字在此时可以和另一韵部字通押，但在彼时却不行。关于南北朝的韵部，王力先生早年分为五十四部(见《南北朝诗人用韵考》)，后来又合为四十二部(见《汉语语音史》)。虽然南北朝诗人用韵远比唐人分二百零六韵要粗略得多，但从永明诗人的创作来看，他们的通韵很多与唐人接近，譬如：

歌戈同用：谢朓《随王鼓吹曲五·出藩曲》：阿河(歌)波(戈)歌(歌)和(戈)。王融《饯谢文学离夜》：歌(歌)莎波(戈)何(歌)。

灰咍同用：谢朓《离夜》：台哀裁(咍)杯(灰)。《奉和随王殿下诗》十：来开台(咍)枚(灰)。王融《临高台》：台开来(咍)徊(灰)。

侯尤同用：沈约《襄阳白铜鞮》：头(侯)流(尤)。谢朓《随王鼓吹曲·入朝曲》：州(尤)楼沟(侯)辀收(尤)。

阳唐同用：沈约《咏柳》：章央长(阳)行(唐)乡(阳)。《脚下履》：锵响(阳)堂(唐)床(阳)。《咏桃》：伤(阳)光(唐)裳肠(阳)。《古意》：光(唐)肠裳香伤(阳)。《咏湖中雁》：塘(唐)翔浪(阳)光行(唐)乡(阳)。王融《萧谘议西上夜集》：梁长霜(阳)光(唐)芳(阳)。

庚清同用：谢朓《同谢谘议铜雀台诗》：生(庚)声情轻(清)。《送江兵曹檀主簿朱孝廉还上国诗》：京(庚)情(清)鸣(庚)声(清)。《奉和随王殿下诗》十四：倾(清)明(庚)情声(清)。《和刘西曹望海台诗》：平生惊(庚)城营(清)。沈约《冬节后至丞相第诣世子车中》：盈(清)平(庚)声(清)生(庚)城(清)。王融《咏琵琶》：明(庚)清情声(清)生(庚)。《咏幔》：楹轻声(清)明(庚)。

真谆同用：谢朓《随王鼓吹曲·送远集》：人(真)轮(谆)陈因巾(真)。

元魂同用：谢朓《随王鼓吹曲·从戎曲》：辕源翻(元)昏(魂)烦言(元)。

仙先同用：沈约《咏青苔》：绵联钱(仙)怜(先)。谢朓《随王鼓吹曲·郊祀曲》：泉埏旋虔(仙)年(先)。

上述通韵，与刘渊"平水韵"相同。王力先生《南北朝诗人用韵考》曾具体的论述，以上只是补充了一些具体实例而已。此外，永明诗歌的通韵还有一些与唐人用韵不尽相同者，譬如：

清青同用：沈约《游钟山诗应西阳王教》：灵(青)城(清)坰青(青)。按：《广韵》《平水韵》均庚清同用，青独用，说明青韵在唐宋以后严格分开，但南北朝多与清韵通韵。

覃衔同用：沈约《江南曲》：潭南谙簪(覃)嵌(衔)。按：这两

个韵部在唐代是分开的，而《平水韵》是覃与谈同用，衔与咸同用。覃衔同用，是南北朝常见的现象。

缓换同用：谢朓《听妓》：满管缓（缓）腕（换）。按：《平水韵》，缓，上声，与旱同用；换，去声，与翰同用。

3. 本韵

在所统计的永明诗人的全部作品中通韵只占很小的比例。沈约不过11首，谢朓14首，王融6首。其余大部分是严格押本韵，很少出韵。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许多后来才逐渐独立开来的韵部，在永明诗歌中已初具端倪。王力先生在《南北朝诗人用韵考》曾举出"《切韵》所能分的而南北朝韵文所不能分"的二十组韵部共四十六个韵目，包括："歌戈、灰咍、萧宵、尤侯幽、冬钟、阳唐、庚耕清、真谆臻、元魂痕、先仙、寒桓、盐添、沃烛、药铎、陌昔麦、质术栉、月没、屑薛、曷末、叶帖。"总的来看，王力先生的结论是可以成立的。不过，具体考察，上述一些韵目，永明诗人已经开始独立使用，不是不能分，而是分辨得比较细微。譬如：

月部：谢朓《王孙游》：发歇。《咏镜台》：阙月发歇。不杂没韵字。

钟部：谢朓《咏灯》：峰龙重缝。不杂冬韵字。

铎部：谢朓《游东田》：乐阁漠落郭。不杂药韵字。

尤部：谢朓《新亭渚别范零陵诗》：游流犹求忧。《和徐都曹》：州流浮周畴。此外《艺文类聚》所收沈约《东武吟行》：浮辀流休。《乐府诗集》所收《湘夫人》：流修洲。《艺文类聚》所收《伤王谌》：求舟留丘。另首《秋晨羁怨望海思归诗》：流浮丘，等等，均是尤部独用例，不杂侯幽韵字。

仙部：王融《代徐干》：然煎。此外，《艺文类聚》所收沈约《侍宴谢朏宅饯东归应诏诗》：踶蝉筵，等等，均仙部独用，不杂先韵

字。

先部：《文选》《玉台新咏》所收沈、谢、王五言四句八句十句未有独用例，但《玉台新咏》所收沈约《六忆诗》二、四：前弦怜；眠劝辇前；又《乐府诗集》所收沈约《乐未央》：年莲前，均是先韵独用，不杂仙韵字。

庚部：王融《拟古》：生明，不杂清耕韵字。

阳部：王融《秋夜》：央梁。沈约《携手曲》：床妆长亡。此外，《玉台新咏》题为萧纲，但《乐府诗集》题为沈约的《夜夜曲》：伤床。《隋书·音乐志》所载沈约《梁宗庙登歌》二：筐王梁方忘疆。《玉台新咏》所收沈约《悼亡》：梁芳亡张床伤，等等，均阳部独用，不杂唐韵字。

真部：王融《少年子》：人陈。此外，《艺文类聚》所收沈约《咏杜若》：亲人。《隋书·音乐志》所收沈约《梁雅乐歌》一：宾神亲。《梁三朝雅乐歌》五《需雅》第八曲：珍薪陈神垠，等等，均真部独用，不杂谆，臻韵字。

咍部：沈约《应王中丞思远咏月》：埃来才苔哉。《泛永康江》：苔来哉栽，不杂灰韵字。

清部：王融《阳翟新声》：城声。不杂耕庚韵字。

此外，沈约《西地梨》：隈徊，是灰部独用，不杂咍韵字。又《梁雅乐歌》一《皇雅》第二曲：一毕谧；《奉华阳王外兵》：质日出；《咏竹槟榔盘》：一密实毕，等等，均质部独用，不杂术栉韵字。又《永明乐》：客陌；《咏菰》：泽客，等等，是陌部独用，不杂昔麦韵字。又《酬孔通直逷怀蓬居》：辟籍役，昔部独用，不杂陌麦韵字。类似这种独用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虽然所占比例还不算多，或许他们的方音如此，或许偶然使用，还不足以涵盖永明诗体乃至南朝诗歌的用韵情况，但它们的存在毕竟说明，永明诗人

在用韵方面较之前代确实更加细密，这实际上是为近体诗的成熟，在声韵方面铺平了道路。也正因为如此，永明诗体充分显示了自己“新变”的特点，从而引领了中国古典诗歌经历了历史性的转变。

第五节 永明诗体的俳偶辨释

刘师培《论文杂记》讲到诗文俳偶的形成和演变，认为西汉时“邹枚扬马之流，咸工作赋，沉思翰藻，不歌而诵。”“若贾生作论、史迁报书”，“大抵皆单行之语，不杂骈丽之词”。“东京已降，论辨诸作，往往以单行之语运俳偶之辞，而奇偶相生，致文体迥殊于西汉。建安之世，七子继兴，偶有撰著，悉以俳偶易单行。”从现存诗文来看，魏晋以来俳偶的运用确实日趋繁缛。我们读曹植和陆机的诗，属对已相当工整，与东汉的五言古诗大异其趣。至刘宋，颜延之、谢灵运等，“其体尽俳偶”（许学夷《诗源辨体》）。谢灵运的《登池上楼》句句俳偶，曲尽其工，可以说是典型的属对佳作。日本学者古田敬一称谢灵运为诗歌俳偶的真正奠基者（详见《中国文学的对句艺术》，李淼译，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确非过誉。

永明诗人紧步颜、谢，诗尚俳偶。不仅如此，《文心雕龙·丽辞篇》又正式提出四对，即言对、事对、反对、正对，从理论上初步总结了元嘉、永明诗歌在俳偶运用方面的基本经验。

当然，永明诗歌的对仗方式远不止这四种。根据王力先生在《汉语诗律学》中所厘定的“对仗的种类”，永明诗歌的对仗艺术至少可以列举下面十种最常见的类别和方式。

一、花鸟对

在永明诗人的创作中，咏物诗占有极大的比例。所谓"物"，永明诗人的注意力似乎集中在"草木"方面，所以他们的诗作对于花草禽虫的描摹歌咏为数尤多。关于这点，在上一章已经作了论述。这里想要说明的是，即使是那些本不属于咏物诗的作品，永明诗人也常常通过对偶句来表达他们对于花草禽虫的情趣：

井莲当夏吐，窗桂逐秋开。

——王融《临高台》

花飞低不入，鸟散远时来。

——同上

垂条逐絮转，落蕊散花丛。

——王融《回文诗》

无事逐梅花，空中信杨柳。

——沈约《初春》

绿草蔓如丝，杂树红英发。

——谢朓《王孙游》

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

——谢朓《游东田》

桃李成蹊径，桑榆荫道周。

——谢朓《和徐都曹》

威凤来参差，云鹤起凌乱。

——谢朓《随王鼓吹曲》三

差池远雁没，飒沓群凫惊。

——谢朓《和刘西曹望海台诗》

香风蕊上发，好鸟叶间鸣。

——谢朓《送江兵曹》

花枝聚如雪，垂藤散似网。

——谢朓《别江水曹》

蜻蛉草际飞，游蜂花上食。

——谢朓《赠王主簿》

新萍时含水，弱草未胜风。

——谢朓《奉和随王殿下》

从这些对偶句可以看出，永明诗人对于花鸟的观察是多么的细微：花蕊的飘落、游峰的觅食、蜻蛉的低飞……，无不栩栩如生，宛在耳目之际。刘勰所说的"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用以形容永明诗歌的花鸟对可谓确切不移。

二、地名对

在永明诗歌中，地名对所占比例很大。这可能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与晋宋以来地理学的深入研究有关系。这些地理学著述往往要涉及许许多多的地名，比如范晔《后汉书·郡国志》记载地名四千多，沈约《宋书·州郡志》记载地名二千多，《南齐书·州郡志》亦记二千多地名③。诗人们采用地名入诗，特别是使之形成对仗，易于拓展诗的空间。其二，中国古代地名很多包含有丰富的历史内容，采之入诗，也便于增加意蕴的深度。譬如：

怀春发下蔡，含笑向阳城。

——王融《阳翟新声》

想象巫山高，薄暮阳台曲。

——王融《巫山高》

巫山彩云没，淇上绿条稀。

——王融《古意》

霜气下孟津，秋风度函谷。

——同上

分手桃林岸，送别岘山头。

——沈约《襄阳白铜鞮》

翠苔已结洧，碧水复盈淇。

——沈约《春咏》

终南表秦观，少室迩王城。

——沈约《游钟山诗应西阳王教》

南瞻储胥观，西望昆明池。

——同上

棹歌发江潭，采莲渡湘南。

——沈约《江南曲》

洞庭张乐地，潇湘帝子游。

——谢朓《新亭渚别范零陵诗》

云去苍梧野，水还江汉流。

——同上

广平听方籍，茂陵将见求。

——同上

[illegible]华容浦，张乐荆山台。

——谢朓《随王鼓吹曲》六

升峤既小鲁，登峦且怅齐。

——谢朓《随王鼓吹曲》九

要取洛阳人，共命江南管。

——谢朓《听妓》

这些地名涉及的地域相当辽阔，而且许多还暗用了历史典故，给人以纵深的历史感。

三、色彩对

东晋南朝是书画艺术繁荣复兴的时代。很多诗人作家能兼擅众长，不仅能诗文，而且善书画。在艺术感觉日趋灵敏的时代氛围里，诗人们对于色彩往往特别敏感，并且在诗歌创作中表现出来。在这方面，谢灵运表现得比较突出。（详见古田敬一《中国文学的对句艺术》一书中《谢灵运的对句》）说到永明诗歌的色彩对，下列诗句比较有代表性：

离轩思黄鸟，分渚菱青莎。

——王融《饯谢文学离夜》

宾阶绿钱满，客位紫苔生。

——沈约《冬节后至丞相第诣世子车中为赠》

白云随玉趾，青霞杂村旗。

——沈约《游钟山诗应西阳王教》

关树抽紫叶，塞草发青芽。

——沈约《有所思》

长枝荫紫叶，清源泛绿苔。

——沈约《泛永康江》

红尘朝夜合，黄沙万里昏。

——谢朓《随王鼓吹曲》七

每聚金炉气，时驻玉琴声。

——王融《咏蝉》

锵锵玉銮动，溶溶金璋旋。

——谢朓《随王鼓吹曲》

残朱犹暧暧，余粉尚霏霏。

——沈约《早行逢故人车中为赠》

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

——谢朓《随王鼓吹曲》

郁律构丹巘，崚嶒起青嶂。

——沈约《游钟山诗应西阳王教》

所谓玉、粉，指白色，金指黄色，朱、丹指红色，此外还有上文引用过的“翠苔已结洧、碧水复盈淇”，翠与碧指绿色。上面的例句给人的感觉是，永明诗人似乎偏爱红、黄、绿、紫等强烈色彩。唐人似与此稍近，今存唐墓壁画，多用强烈的亮色调；而宋明人则与此颇异，其山水人物画，多喜淡色、暗色。看来，对亮色调或暗色调的偏爱，时、地、人不同而各有差异。

四、服饰对

细致地描绘各种艳丽的服饰，特别集中于女人的服饰，这与艳体诗的兴起不无关系。譬如：

萦丝飞凤子，结缕坐花儿。

——沈约《领边绣》

裾开临舞席，袖拂绕歌堂。

——沈约《脚下履》

领上蒲萄绣，腰中合欢绮。

——沈约《洛阳道》

罗衣织成带，堕马碧玉簪。

——沈约《江南曲》

开笥方罗縠，窥镜比蛾眉。

——谢朓《咏邯郸故才子嫁为厮养卒妇》

因炎入貂袖，怀温奉芳褥。

——谢朓《咏竹火笼》

挂钗报缨绝，堕珥答琴心。

——谢朓《听妓》

轻歌急绮带，含笑解罗襦。

——谢朓《赠王主簿》

五、数目对

群浮动轻浪，单泛逐孤光。

——沈约《咏湖中雁》

势随九疑高，气与三山壮。

——沈约《游钟山诗应西阳王教》

八解鸣涧流，四禅隐岩曲。

——同上

淹留访五药，顾步伫三苔。

——同上

雕梁再三绕，轻尘四五移。

——沈约《咏篪》

二仪启昌历，三阳应庆期。

——谢朓《随王鼓吹曲》一

六宗禋配岳，五时奠甘泉。

——谢朓《随王鼓吹曲》二

远山翠百重，回流映千丈。

——谢朓《别江水曹》

飞蛾再三绕，轻花四五重。

——谢朓《咏灯》

六、方位对

枝大柳塞北，叶暗榆关东。

——王融《回文诗》

南瞻储胥观，西望昆明池

——沈约《游钟山诗应西阳王教》

西征登陇首，东望不见家。

——沈约《有所思》

北窗轻幔垂，西户月光入。

——谢朓《秋夜》

北梁辞欢宴，南浦送佳人。

——谢朓《随王鼓吹曲》八

怅望南浦时，徙倚北梁步。

——谢朓《临溪送别》

丹墀上飒沓，玉殿下趋锵。

——沈约《脚下履》

明月弓外照，宁知心内伤。

——沈约《古意》

七、天文对

相思早春日，烟华杂如雾。

——王融《芳树》

抱月如可明，怀风殊复清。

——王融《咏琵琶》

日华照赵瑟，风色动燕姬。

——沈约《春咏》

河汉纵且横，北斗横复直。

——沈约《夜夜曲》

因风结复解，沾露柔且长。

——沈约《咏柳》

燕裙傍日开，赵带随风靡。

——沈约《洛阳道》

日华川上动，风光草际浮。

——谢朓《和徐都曹》

日起霜戈照，风回连骑翻。

——谢朓《随王鼓吹曲》

玉绳隐高树，斜汉映层台。

——谢朓《离夜》

八、时令对

池莲照晓月，幔锦拔朝风。

——王融《回文诗》

昨宵何处宿，今晨拂露归。

——沈约《早行逢故人车中为赠》

春光发垄首，秋风生桂枝。

——沈约《游钟山诗应西阳王教》

岁暮异栖宿，春至犹别离。

——沈约《效古》

斜簪映秋水，开镜比春妆。

——沈约《携手曲》

九、重叠对

缘阶已漠漠，汎水复绵绵。

——沈约《咏青苔》

嘻嘻萤入雾，离离雁初度。

——沈约《秋夜》

远树暖纤纤，生烟纷漠漠。

——谢朓《游东田》

眇眇苍山色，沈沈寒水波。

——谢朓《随王鼓吹曲》五

往往孤山映，处处春云生。

——谢朓《和刘西曹望海台诗》

十、副词对

烟霞乍舒卷，蘅芳时断续。

——王融《巫山高》

因风结复解，沾露柔且长。

——沈约《咏柳》

微根如欲断，轻丝似更联。

——沈约《咏青苔》

除上述十类，还有一些对偶形式，譬如联绵对："掩抑有奇态，凄怆多好声"（王融《咏琵琶》）；人名对："清吹要碧玉，调弦命绿珠"（谢朓《赠王主簿》）；反义词对："飞甍夹驰道，垂杨荫御沟"（谢朓《随王鼓吹曲》四）；同义词对："游禽暮知反，行人独不归"（王融《古意》）；宫室对："轻阴拂建章，夹道连未央"（沈约《咏柳》）；流水对"衿中万行泪，故是一相思"（沈约《春咏》）。等等，不可能一一详举。仅从上述例句我们已经可以明显看到，永明诗人崇尚俳偶，紧步颜、谢，又有不少创新。与元嘉诗相比较，永明诗在对偶方面至少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元嘉诗的对偶没有声韵方面的限制，所以选择余地比较宽，往往对仗十分工整严密。永明诗的对偶则有声律方面的考虑，既要对仗工巧，又须平仄相间。有时二者不能得兼，他们

往往更重平仄而较轻对偶。因此，仅从丽辞的角度看，永明诗的对偶表面上不及元嘉诗那样严格周密。

第二，元嘉诗的对偶“语多经史”，典雅凝重，书卷气极浓。同时，元嘉诗“合掌对”颇多，似乎是为对而对。从刘宋中后期到南齐永明时代，许多文人有意识地学习民歌（包括音乐），深受影响，从此，对偶艺术开始发生明显变化。这突出表现在永明诗的对偶多取资于日常生活，平易清新，民歌味很重，有时你甚至感觉不到它是在用对，而其实对句最工，像上文引用过的“舞袖拂明烛，歌声绕凤梁”，“裾开临舞席，袖拂绕歌堂”，“情多舞态迟，意倾歌弄缓”，“丝中传意绪，花里寄春情”等等，堪称工对。

第三，元嘉诗的对偶比较客观，诗人的思想感情往往被隐藏在冷静的对句后面，使人捉摸不定；永明诗的对偶则倾向于主观，使人感到在对句中已熔铸了浓烈的感情。

从纯技术角度看，永明诗的对偶艺术显然要比元嘉诗更成熟。唐代兴起的新体诗，其对句艺术主要是沿着永明诗歌拓展的道路发展起来的。

如果对本章内容作一个小结，可以得出三点初步的认识。

一、永明诗体的确立

永明诗体是在元嘉诗体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元嘉体到永明体，以子夜吴歌和西曲歌为代表的江南民歌在其间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诗品》评论沈约说：“观休文众制，五言最优。详其文体，察其余论，固知宪章鲍明远也。所以不闲于经纶，而长于清怨。”钟嵘所论主要着眼于鲍、沈二人在学习民歌这一共同特点上。如果说在鲍照时代，勇于学习民歌还不能马上得到

大多数人的理解，甚至像颜延之这样恪守传统规矩的文人还要反唇相讥。但是到了永明时代，这种学习则成为了一种比较自觉的行为。上章和本章都着重说明永明诗人不仅学习江南民歌的内容、风格，而且在语言形式等方面也有意摹仿。从这个意义上说，永明诗体的确立实有赖于两个重要条件：第一，元嘉诗体给它提供了足资借鉴的文学传统；第二，江南民歌又给它注入了持久发展的内在生机。在这两个条件中，尤以后者为重要。

二、永明诗体的特征

永明诗体的出现，标志着五言古诗已暂告一个段落，预示着近体诗的来临。这是因为，永明诗体已经初步具备了近体诗的某些基本特征：

第一、句式渐趋于定型，以五言四句、八句为主。

第二、律句大量涌现，平仄相对的观念已经十分明确。十字之中，"颠倒相配"，联与联之间同样强调平仄相对；"粘"的原则尚未确立。至于那些非律句也并非茫无头绪，而是贯穿了平仄颠倒相配的原则，是一种有意义的探索，给后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第三、用韵已相当考究，其主要表现在押平声韵为多，押本韵很严，至于通韵，很多已接近唐人。

第四、在对仗方面，追求自然与情理的完美结合。

上述这些特征，可以说是永明诗人孜孜以求"新变"的具体内容。

三、永明诗人的贡献

永明诗人中，以沈约、谢朓、王融为杰出代表。三位诗人的贡献各不相同。

王融年少，其贡献主要表现在声韵方面。譬如说，他的诗，我们仅论及了16首，而押所谓窄韵的诗就有两首。另外，他的诗大多押平声韵，在三人中所占比例最高。再从文献记载来看，《高僧传》《续高僧传》多次记述他与知音沙门的交往情况，特别是钟嵘，甚至说王融是声律说的主要创始者。《诗品序》说："齐有王元长者，尝谓余云：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之，惟颜宪子乃云律吕音调，而其实大谬；唯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尝欲进《知音论》，未就。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这些材料说明，王融在声韵方面的知识，确实比较精湛。

相比较而言，谢朓在审音方面似乎不及王融细密。且不说文献记载很少，就从诗歌创作来看，谢朓诗押仄声韵颇多，就是一个例证。但谢朓的贡献主要不在用韵方面，而是在平仄调配方面。他似乎比其他人更擅长于此道，所以他的律句最多，在三人中所占比例最高，对唐代诗人影响也最大。

至于沈约，年辈最长，历宋齐梁三朝。历史给了他更多的机会，使他能综合诸家之长，在诗歌句式、韵律、以及俳偶等方面表现得更加成熟，尤其在文学理论方面能有所发明，所以他的影响最为久远。元代陈绎曾撰《诗谱》，首列沈约，以为"律诗之源，"④这不是没有一定道理的。

注　释

① 详见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40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② 《文选》依据胡克家刻本。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玉台新咏》的版本较为复杂。现存诸本，均已失却原貌。详见拙文《玉台新咏版本研究》。刊在《中国古籍研究》第1辑。国家古籍规划整理小组编，上海古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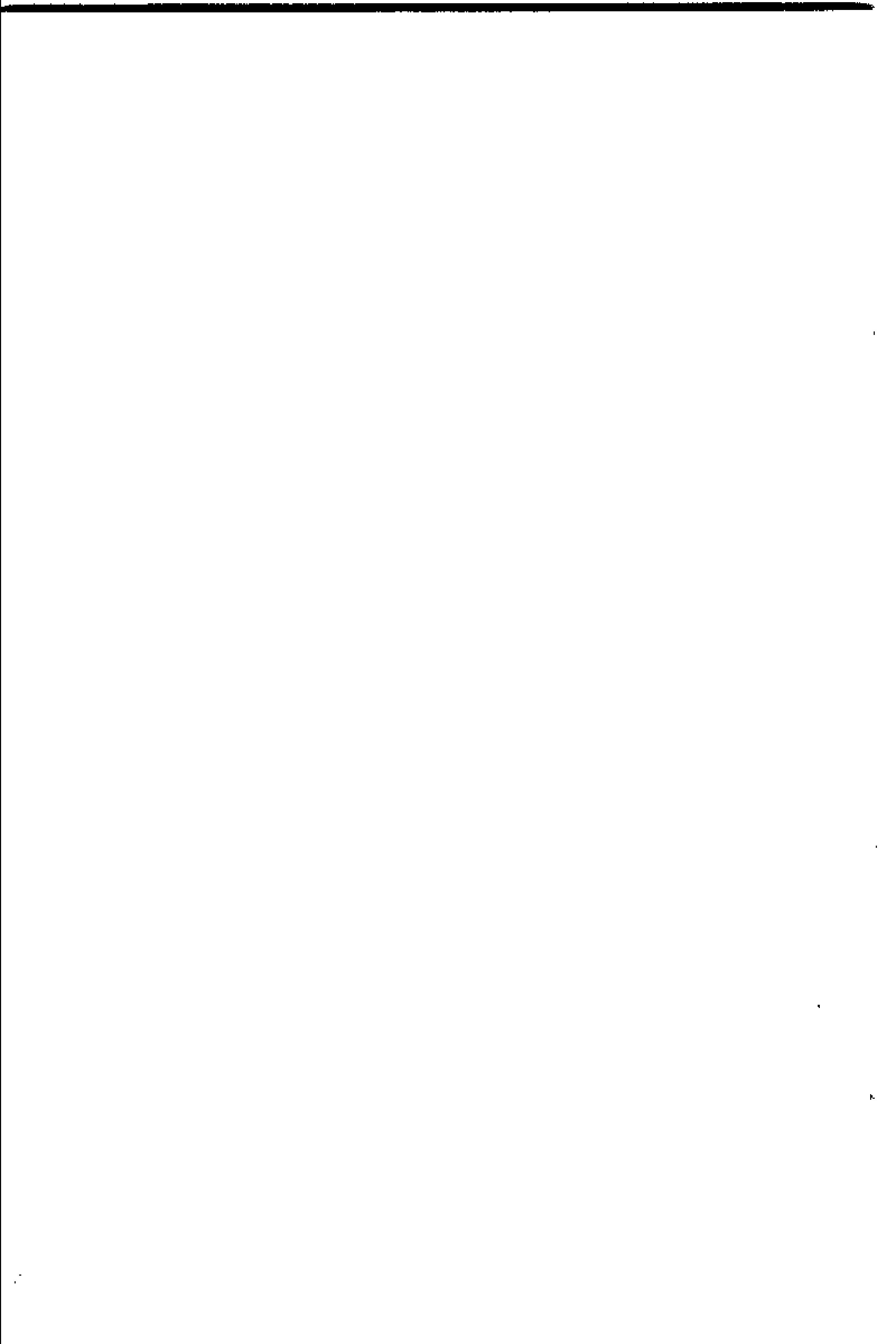
出版社出版。本文依据的是吴兆宜的笺注本，穆克宏校点，中华书局 1985 年出版。

③ 参见陈桥驿《论地名学及其发展》，载史念海主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 1 辑。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④ 见《历代诗话》，中华书局 1981 年版校点本。

下　编

永明文学系年



凡　　例

一、本编以沈约为中心，逐年考订排比从刘宋元嘉十八年到萧梁天监十二年间永明诗人及与之相关的其他作家的重要史料，试图以此勾勒出从元嘉文学到永明文学、乃至梁陈文学的嬗变轨迹。

二、编录内容：(1)对当时作家发生重要影响的政治事件、哲学思潮；(2)作家行迹；(3)作品系年。

三、作家编排次第：(1)生于本年者；(2)卒于本年者；(3)按年龄下排；(4)年龄不详者置后。

四、作家收录标准：(1)见于正史《文学传》者均收；(2)见于《诗品》论及者大部分收录；(3)史书记载其有创作才能而今留存作品极少者酌收；(4)史书未记载其有创作才能而今留下重要作品者酌收。

五、年代考订：或录成说，或抒己见。所记年月并为旧历。

六、诗文篇名：以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及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为主，偶有不妥，略加校正。

宋文帝元嘉十八年(441)辛巳

沈约生。《梁书》本传:"沈约字休文,吴兴武康人也。祖林子,宋征虏将军。父璞,淮南太守。"沈约卒于梁天监十二年,时年七十三岁,上推生于本年。又《宋书·自序》:"史臣十三而孤。"按沈约父沈璞于元嘉三十年(453)以"奉迎之晚"而被宋孝武帝刘骏所杀。沈约时年十三,上推生年,与《梁书》本传合。其父沈璞,本年二十六岁。又按:据史料记载,沈氏祖上并非南方土著,而且沈氏亦非其本姓。沈约《宋书·自序》以为沈氏为少皞金天氏之后;王符《潜夫论·志氏姓》以为沈氏为楚国的后裔;《新唐书·宰相世系》及郑元庆《湖录金石考》所收沈麟士《沈氏述祖德碑》以为沈氏为周文王子聃季之后。以上三说,均不可信。《新唐书》及所谓沈麟士的记载尤其不可信。详见天监二年沈麟士条考辨。关于沈氏家世,可详《吴兴沈氏考略》,此不赘述。

何承天七十二岁,作《白鸠颂》。《宋书》本传:"何承天,东海郯人也。从祖伦,晋右卫将军。"承天卒于元嘉二十四年,年七十八,上推生于晋废帝太和五年(370)。《宋书·符瑞下》:"宋文帝元嘉十八年八月庚午,会稽山阴商世宝获白鸠,眼足并赤,扬州刺史始兴王濬以献。太子率更令何承天上表曰:……。其《白鸠颂》曰:……。"又《宋书·五行志五》:"宋文帝元嘉十八年秋七月,天有黄光,洞照于地。太子率更令何承天谓之荣光,太平之祥,上表称庆。"

宗炳六十七岁。《宋书》本传:"宗炳字少文,南阳涅阳人也。祖承,宜都太守。父繇之,湘乡令。"宗炳元嘉二十年卒,年六十九,上推生于晋孝武帝司马曜宁康三年(375)。

颜延之五十八岁,作《赭白马赋》《王球石志》。《宋书》本传:

"颜延之字延年，琅琊临沂人也。曾祖含，右光禄大夫。祖约，零陵太守。父显，护军司马。"颜延之卒于宋孝武帝孝建三年(456)，年七十三，上推其生年为晋孝武帝太元九年(384)。《赭白马赋》收在《文选》中。其序云："惟宋二十有二载。"李善注："宋文帝十七年。"缪钺《颜延之年谱》(收在《读史存稿》中，以下引此文简称《年谱》)以为李注误，实应十八年，是。又《南齐书·礼志》载："宋元嘉中，颜延之作《王球石志》，素族无碑策，故以记德。"《宋书·王球传》载："十八年卒，时年四十九。"

范晔四十四岁。《宋书》本传："范晔字蔚宗，顺阳人。车骑将军泰少子也。"范晔于元嘉二十二年被杀，年四十八岁。上推其生年为晋安帝司马德宗隆安二年(398)。

刘义庆三十九岁，为南兖州刺史。《宋书》本传载：刘义庆父刘道怜系宋武帝刘裕之弟。道怜弟刘道规无子，以刘义庆过继为嗣。义庆于"永初元年袭封临川王。"元嘉十七年为南兖州刺史，至本年加开府仪同三司。其卒于元嘉二十一年，四十二岁，上推生于晋安帝元兴二年(403)。义庆喜招才学之士，远近必至。阳夏袁淑，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有辞章之美，引为佐吏。

袁淑三十四岁。《宋书》本传："袁淑字阳源，陈郡阳夏人。丹阳尹豹少子也。"又云："不为章句之学，而博涉多通，好属文，辞采遒艳，纵横有才辩。"袁淑在元嘉三十年被刘劭所杀，年四十六岁，上推其生年为晋安帝义熙四年(408)。

谢庄二十一岁。《宋书》本传："谢庄字希逸，陈郡阳夏人，太常弘微子也。"庄卒于宋明帝泰始二年，四十六岁，上推其生年，为宋武帝永初二年(421)。本年，谢庄子谢朏生。谢朏字敬冲，梁天监五年卒，六十六岁，上推生本年。见《梁书》本传。

鲍照二十八岁。《宋书》本传:"鲍照字明远,文辞赡逸,尝为古乐府,文甚遒丽。"其生年史传失载。钱仲联《鲍参军集注》附有年表,以为鲍照生于晋安帝义熙十年(414)。

王微二十七岁。《宋书》本传:"王微字景玄,琅琊临沂人。太保弘弟子也。父孺,光禄大夫。"王微卒于元嘉三十年,年三十九岁,上推生年为晋安帝义熙十一年(415)。

王僧绰十九岁,《宋书》本传:"王僧绰,琅琊临沂人。左光禄大夫昙首子也。"元嘉三十年为刘劭所杀,时年三十一岁,上推生年为宋少帝刘义符景平元年(423)。

王僧达十九岁,娶刘义庆女为妻,任始兴王刘濬后军参军。《宋书》本传:"王僧达,琅琊临沂人,太保弘少子。"卒于宋孝武帝大明二年,时年三十六岁,上推生于宋少帝景平元年(423)。本传又云:"太祖闻僧达早慧,召见于德阳殿,问其书学及家事,应对闲敏,上甚知之,妻以临川王义庆女。少好学,善属文。年未二十以为始兴王濬后军参军。"按:"刘义庆卒于元嘉二十一年,刘濬为后军将军在元嘉十六年,则王僧达娶刘义庆女,入刘濬府当在本年前后。

陆澄十七岁。《南齐书》本传:"陆澄字彦渊,吴郡吴人也。祖邵,临海太守。父瑗,州从事。"澄卒于南齐隆昌元年(494),年七十岁,上推生年为宋文帝元嘉二年(425)。

王僧虔十六岁。《南齐书》本传:"王僧虔,琅琊临沂人也。祖珣,晋司徒。伯父太保弘,宋元嘉世为宰辅。""父昙首,右光禄大夫。"僧虔卒于齐永明三年(485),年六十,上推生于元嘉三年(426)。

朝廷始议宗庙乐舞事,录尚书江夏王刘义恭等十二人参议。未及列奏,值军兴事寝。见《宋书·乐志》及《文献通考》卷一四

五。至元嘉二十年，复议此事，朝廷诏颜延之撰《宋南郊登歌》三首。详说见元嘉二十年颜延之条。

元嘉十九年(442)壬午

羊欣卒，时年七十三岁。《宋书》本传："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泛览经籍，尤长隶书。不疑(羊欣父)初为乌程令，欣时年十二。时王献之为吴兴太守，甚知爱之。献之尝夏月入县，欣著新绢裙昼寝，献之书裙数幅而去。欣本工书，因此弥善。"《隋书·经籍志》著录别集九卷。今仅存书信一篇。又著《古来能书人名》一卷，王僧虔采录呈上，题《条疏古来能书人名启》。王僧虔《论书》评曰："羊欣、邱道护并亲授于子敬。欣书见重一时，行草尤善，正乃不称。"庾肩吾《书品》将其列为中上品，并说："羊欣早随子敬，最得王体。"

何承天七十三岁，领国子博士。《宋书》本传："十九年，立国子学，以本官领国子博士。"建立国子学，当时称为大事。《宋书·文帝纪》："十九年正月乙巳，诏曰：'今方隅乂宁，戎夏慕响，广训胄子，实维时务，便可式尊成规，阐扬景业。'"《建康实录》亦载：十九年四月，"大赦天下，以何尚之领国子祭酒，中散大夫裴松之，太子率更令何承天领国子博士。于时朝廷硕学推裴、荀、何、傅。傅隆长于为政，承天病于踈旷，伯子通脱率易，不以镇重自居，裴西乡清简恬素，最以不竞为法，位不踰于三子，名则差焉。颜延之亦号博闻，而刚愎潜忌，时人恶之，名颜虎。"

范晔四十五岁，此前曾从羊欣学书法。王僧虔《论书》称："范晔、萧思话同师羊欣。范后背叛，皆失故步，名亦稍退。萧思话全法羊欣，风流趣好，殆当不减，而笔力恨弱。"

刘义庆四十岁，仍任南兖州刺史。其时，南兖州、豫州大旱。

见《宋书·符瑞志》及《五行志》。

王僧绰二十岁，尚太祖长女东阳献公主。见《宋书》本传。按《宋书·礼志》："大明二年正月有司奏：'……检元嘉十九年旧事，武康公主出适，二十五月心制终尽，从礼即去。'"考《宋书·后妃·文帝袁皇后传》，袁皇后卒于元嘉十七年。东阳献公主刘英娥服丧二十五月后，于本年出嫁。

刘义季作《伤刘道产》。民间有《襄阳乐歌》。《宋书·刘道产传》："十九年卒。追赠征虏将军，谥曰襄侯。道产惠泽被于西土，及丧还，诸蛮皆备衰绖，号哭追送，至于沔口。荆州刺史衡阳王义季启太祖曰：……。"又《通典》卷一四五载："《襄阳乐》者，刘道产为襄阳太守，有善政，百姓乐业，人户丰赡，蛮夷顺服，缘沔而居，由此有《襄阳乐》歌也。"又《资治通鉴》载："雍州刺史晋安襄侯刘道产卒。道产善为政，民安其业，小大丰赡，由是民间有《襄阳乐》歌。山蛮前后不可制者皆出，缘沔为村落，户口殷盛。及卒，蛮追送沔口。未几，群蛮大动，征西司马朱修之讨之，不利，诏建威将军沈庆之代之，杀虏数万人。"

宗炳六十八岁。颜延之五十九岁。袁淑三十五岁。鲍照二十九岁。王微二十八岁。谢庄二十二岁。王僧达二十岁。陆澄十八岁。王僧虔十七岁。沈约二岁。谢朏二岁。

元嘉二十年(443)癸未

明山宾生。《梁书》本传："明山宾字孝若，平原鬲人也。父僧绍，隐居不仕，宋末征国子博士，不就。"按：明山宾为齐梁间著名学者，与竟陵八友多所共事。入梁后深为梁武帝萧衍、昭明太子萧统所接赏。其卒于梁武帝大通元年，八十五岁，上推生本年。

宗炳卒，六十九岁。《宋书》本传："好山水，爱远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结宇衡山，欲怀尚平之志。有疾还江陵，叹曰：'……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古有《金石弄》，为诸桓所重，桓氏亡，其声遂绝。唯炳传焉。太祖遣乐师杨观就炳受之。炳外弟师觉授亦有素业，以琴书自娱。临川王义庆辟为祭酒，主簿，并不就。乃表荐之，会病卒。元嘉二十年炳卒，时年六十九。"宗炳为当时著名书画家。庾肩吾《书品》将其列入下上品。《隋书·经籍志》著录别集十六卷。《全宋文》收其作品有：《评何承天通裴难荀大功嫁女议》、《答何衡阳书》、《又答何衡阳书》、《寄雷次宗书》、《师子击象图序》、《画山水序》、《明佛论》。按：《明佛论》专论形神关系，颇长。何衡阳指何承天。何有《与宗居士书论释慧琳白黑论》、《答宗居士书》二篇。宗炳宣扬神不灭与报应论，何承天作书论难，又特作《达性论》阐发神灭论思想。

何长瑜卒。《宋书·谢灵运传》："灵运既东还，与族弟惠连、东海何长瑜、颍川荀雍、泰山羊璿之，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时人谓之四友。"《南史·谢灵运传》："庐陵王绍镇寻阳，以长瑜为南中郎行参军，掌书记之任。行至板桥，遇暴风溺死。"按《宋书·文帝纪》：二十年二月"庚申以庐陵王绍江州刺史。"《隋书·经籍志》著录何长瑜集八卷，今存诗仅二首：《嘲府僚诗》《离合诗》。

何承天七十四岁，撰定仪礼。见《宋书·礼志》。又作《上元嘉历表》、《奏改漏刻箭》。见《宋书·律历志》。钱乐之、严粲作《奏详何承天元嘉历》。皮延宗作《难何承天新历》。并见《宋书·律历志》。按：何承天上表奏事，《建康实录》《资治通鉴》系在二十一年。今从《宋书》。

颜延之六十岁，为御史中丞。作《宋南郊登歌三首》。《南齐

书·刘休传》："建元初为御史中丞。顷之，休启曰：'臣窃寻宋世，载祀六十，历斯职者，五十有二，校其年月，不过盈岁。'"据此而知，颜延之为此职时间很短。元嘉十九年始兴王濬后将军府罢，延之为御史中丞。《宋书》本传："御史中丞，在任纵容，无所举奏。"又《通典》卷一四一载："二十年南郊始设登歌，诏颜延之造歌诗，庙舞犹阙。"同书卷一四七载："宋武帝永初始调金石。文帝元嘉十八年有司奏二郊宜奏登歌，后诏颜延之造歌诗。"按：《宋书·乐志》系此在二十二年，《新唐书·音乐志》系在二十四年。考《宋书·乐志》明载颜延之造歌诗时为御史中丞，当是本年作诗，因二十二年已为国子祭酒。

刘义庆四十一岁，仍为南兖州刺史。时南兖州仍大旱。见《宋书·符瑞志》。又，本年，义庆自京城回广陵。见《高僧传·释道冏传》。

范晔四十六岁。袁淑三十六岁。鲍照三十岁。王微二十九岁。谢庄二十三岁。王僧绰二十一岁。王僧达二十一岁。陆澄十九岁。王僧虔十八岁。沈约三岁。谢朏三岁。

元嘉二十一年(444)甲申

江淹生。《梁书》本传："江淹字文通，济阳考城人也。"《南史》本传："父康之，南沙令，雅有才思。"江淹卒于梁天监四年，年六十二，上推生本年。

张融生。《南齐书》本传："张融字思光，吴郡吴人也。祖祎，晋琅琊王国郎中令。父畅，宋会稽太守。"张融卒于齐建武四年，年五十四，上推生本年。

刘义庆卒，四十二岁。《宋书》本传："义庆在广陵有疾，而白虹贯城，黑麕入府，心甚恶之，固陈求还。太祖许解州，以本号还

朝。二十一年薨于京邑，时年四十二。"《隋书·经籍志》著录别集八卷。今存诗二首：《乌夜啼》、《游鼍湖诗》。存文八篇：《箜篌赋》、《鹤赋》、《山鸡赋》、《荐庾实等表》、《启事》、《黄初妻赵罪议》。此外，又有《江左名士传》、《宣验记》十三卷、《幽明录》二十卷、《徐州先贤传》一卷、《世说》八卷、《小说》十卷、《集林》二百卷等，并见《隋书·经籍志》、新旧《唐志》著录。

何承天七十五岁，纠劾谢元。后亦坐白衣领职。见《宋书》本传。

范晔四十七岁，二月任太子詹事。见《资治通鉴·宋纪·元嘉二十一年》。

鲍照三十一岁，作《通世子自解启》、《临川王服竟还田里诗》、《重与世子启》等。考见《鲍参军集注》。

徐耕作《诣县陈辞》，记述了晋陵一带百姓困苦的生活，语气沉痛感人。见《宋书·孝义传》。

颜延之六十一岁。袁淑三十七岁。王微三十岁。谢庄二十四岁。王僧绰二十二岁。王僧达二十二岁。陆澄二十岁。王僧虔十九岁。沈约四岁。谢朓四岁。

元嘉二十二年(445)乙酉

范缜生。考见李曰华《范缜》(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按：胡适据缜从弟范云卒于天监二年(503)，时年五十三，因而得出结论：范云出生前一年元嘉二十七年即为范缜生年(文载天津《大公报》"文史周刊。"1947 年 8 月 8 日)。此仅为假设孤证。李文以为，范缜传中有"在瓛门下积年"一句值得注意，三两年当不得称为积年，至少要在四五年以上。"因此范缜年未弱冠始就学于刘瓛门下的年度，计算应在孝武帝大明六年(462)或七年以

前。再据刘瓛在沛郡的相县讲学，可能是开始于大明四年(460)'举秀才'、'除奉朝请不就'以后。范缜家居舞阳，距相县远在三百公里左右。刘瓛很穷，兄弟三人共处蓬室三间，为风所吹倒也无力修葺。以这样一个穷书生讲起学来，要使在三百公里外的范缜所闻，当非经过两三年以上的时间不可。从大明四年起算，两三年后，推测范缜始往求学的年度，至快亦应该在大明五年或六年以后。根据以上两方计算，当可得出结论：范缜约在大明六年(462)年未弱冠，即十八岁，那么，他的生年就应该约莫在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了。"今从其说。

范晔被杀，时年四十八岁。作《彭城王义康与徐湛之书宣示同党》、《狱中与诸甥侄书》、《临终诗》等。见《宋书》本传。所谓"同党"，据孔休先《谕众檄文》所载，系指徐湛之、范晔、萧思话、臧质、孔熙先、孔休先等。后徐湛之告发其事。见下条。又《宋书·沈演之传》："景仁寻卒，乃以后军长史范晔为左卫将军，与演之对掌禁旅，同参机密。""晔怀逆谋，演之觉其有异，言之太祖，晔寻事发伏诛。"《隋书·经籍志》著录别集十五卷。今存诗二首：《临终诗》、《乐游苑应诏诗》。存文五篇，除上文提及的两篇外，还有：《撡时旨上言》、《双鹤诗序》、《和香方序》。《后汉书》为其代表作。范晔颇以其赞论自负，时人亦以为佳。《文选》收录《后汉书论》五篇，便是一证。钟嵘《诗品》称其五言诗"乃不称其才，亦为鲜举矣。"庾肩吾《书品》将其列人下上品，说明其书法亦可列人名家之流。

徐湛之始与范氏同谋，后作《上范晔等反谋表》告发其事，见《宋书·范晔传》。朝廷遣令还郡，湛之又作《还郡自陈表》。见《宋书·徐湛之传》。

范广渊被杀。按：广渊为范晔弟，坐范晔事被诛。今存诗一

首:《征虏亭饯王少傅》。

孔熙先被杀。作《狱中上书》。见《宋书·范晔传》。

孔休先被杀。作《谕众檄文》。见《宋书·范晔传》。

何承天七十六岁,与颜延之同为皇太子执经。见《宋书》本传。同年正月,改用何承天《元嘉新历》。见《宋书·文帝纪》。

颜延之六十二岁,为国子祭酒。作《皇太子释奠会诗》。《宋书·礼志》两次记载皇太子本年四月讲《孝经》,释奠于国子学。《建康实录》同。《文选》李善注引裴子野《宋略》作二十年,恐未确。诗有"妄先国胄,侧闻邦教,"则已为国子祭酒之证。又《南齐书·陆澄传》载陆澄《与王俭书》称:"元嘉建学之始,玄、弼两立。逮颜延之为祭酒,黜郑置王,意在贵玄,事成败儒。"说明在元嘉后期,玄学复有抬头之势。至刘宋大明泰始之际,玄学尤盛,引导了宋末诗风从元嘉体向永明体的完成。而梁代后期,玄学又起,抑儒弘玄,导致梁陈轻艳诗风的形成。这是后话,在此一提。本年,颜延之作《为皇太子侍宴饯衡阳南平二王应诏诗》。据《宋书·衡阳王义季传》、《南平王铄传》,本年刘义季迁任徐州刺史,刘铄迁任南豫州刺史。

鲍照三十二岁,应刘义季之征辟,之梁郡,旋从之徐州。作《见卖玉器者》、《从过旧宫》。见《鲍参军集注》。

谢庄二十五岁,声名已著,为范晔称许,见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声律之说)年少中唯谢庄识之耳。"范、谢二人在元嘉十七、八年间同在始兴王刘濬府中供职,有所过从。

王僧虔二十岁,除秘书郎、太子舍人,与袁淑、谢庄友善。又转为义阳王文学、太子洗马。见《南齐书》本传。按《宋书·文帝纪》:二十二年二月"第九皇子昶为义阳王。"又《南史·王僧虔传》:"淑每叹之曰:'卿文情鸿丽,学解深拔,而韬光潜实,物莫之

窥，虽猥阳元之射、王汝南之骑，无以加焉。’”

申恬作《上换郡事宜表》。见《宋书》本传。

文帝**刘义隆**告诫子弟以节俭为上。见《资治通鉴》：“九月癸西，上饯衡阳王义季于武帐冈，上将行，敕诸子且勿食，至会所设馔，日旰，不至，有饥色。上乃曰：‘汝曹少长丰佚，不见百姓艰难。今使汝曹识有饥苦，知以节俭御物耳。’”

天安寺**释弘宗**始译《贤愚经》，京师竞习梵音。见释僧祐《贤愚经记》。

沈亮为南阳太守，崇建儒学，开置庠序，训授生徒。见《宋书·自序》。

袁淑三十八岁。王微三十一岁。王僧绰二十三岁。王僧达二十三岁。陆澄二十一岁。沈约五岁。谢朏五岁。江淹二岁。张融二岁。

元嘉二十三年(446)丙戌

何承天七十七岁，作《奏劾博士顾雅等》。见《宋书·礼志》。又作《安边论》。《宋书》本传：“时索虏侵边，太祖访群臣威戎御远之略，承天上表”云云。《资治通鉴》系此事于本年，是。详参宋文帝条。

鲍照三十三岁，作《代苦热行》。见《鲍参军集注》。

宋文帝作《诏群臣》、《北伐诗》。见《宋书·索虏传》：“(二十三年)太祖思弘经略，诏群臣曰：‘吾少览篇，颇爱文义，游玄玩采，未能息卷。自缨绋世务，情兼家国，徒存日昃，终有惭德。而区宇未一，师馑代有，永言斯虞，弥干其虑。加疲疾稍增，志随时往，属思之功，与事而废。残虐游魂，齐民涂炭，乃眷北顾，无忘弘拯。思总群谋，扫清逋逆，感慨之来，遂成短韵。卿等体国情

深，亦当义笃其怀也。诗曰：季父鉴祸先，辛生识机始。……。”这篇文章及诗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其一，文帝元嘉末玄风复振，与文帝本人“游玄玩采”的倡导有必然联系。而且，这里将“玄”与“采”并称，两者间亦有必然联系。宋末文风之变，当始于这时。其二，文帝元嘉末年政坛亦有较大变化。上年我们曾引用文帝自己的话用以说明其早年颇以节俭为尚，因此而有所谓元嘉之治。但这时也许承平日久，渐渐好大喜功。如本年修筑华林园，开挖玄武湖，“役重人怨”（《南史·文帝纪》）。何尚之劝谏，他竟回答说：“小人常自暴背，此不足为劳”（《宋书·何尚之传》）。内兴土木，外动干戈，元嘉之世，由此开始走下坡路。至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失利，元气大伤。推终原始，元嘉之衰，当始于是年前后。

何尚之作《表谏行幸侵夜》。见《宋书》本传：“时上行幸，还多侵夕，尚之又表谏曰：‘……’”。

王敬弘作《又辞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表》。见《宋书》本传。其十六年已辞此封，故此云“又辞。”

盖吴作《上表归顺》、《又上表》。见《宋书·索虏传》。按：盖吴上年九月举兵叛，自称天台王，本年上表归顺。

颜延之六十三岁。袁淑三十九岁。王微三十二岁。谢庄二十六岁。王僧绰二十四岁。王僧达二十四岁。陆澄二十二岁。王僧虔二十一岁。沈约六岁。谢朏六岁。江淹三岁。张融三岁。

元嘉二十四年(447)丁亥

孔稚珪生。《南齐书》本传：“孔稚珪字德璋，会稽山阴人也。祖道隆，位侍中。父灵产。”稚珪卒于南齐永元三年，五十五岁，

上推生于本年。

何承天卒，七十八岁。《宋书》本传："二十四年，承天迁廷尉，未拜，上欲以为吏部，已受密旨，承天宣漏之，坐免官，卒于家，年七十八。"《建康实录》载承天卒于本年八月。《隋书·经籍志》著录别集二十二卷，《礼论》三百卷，《注孝经》一卷，《春秋前传》十卷，《春秋前传杂语》九卷，《合皇览》一百二十三卷，《宋元嘉历》二卷，《历术》一卷，《验日食法》三卷，《漏刻经》一卷，《陆机连珠注》一卷。今存文三十六篇（见《全宋文》卷四十二），诗十六首。

鲍照三十四岁，始兴王刘濬引为国侍郎。作《拜侍郎上疏》、《和王丞》、《河清颂》。见《鲍参军集注》。按：王丞指王僧绰。本年二月戊戌，"河、济俱清"（《宋书·符瑞志》）。而《南史·宋文帝纪》载："夏四月，河、济俱清。"知《河清颂》作于是时。张畅亦有同题之作。

沈约七岁。其父沈璞辞扬州刺史始兴王主簿，转为始兴国大农、秣陵令，仍为刘濬幕僚。按：沈璞于元嘉十七年任始兴王主簿，"在职八年，"本年辞主簿也。见《宋书·自序》。

太尉江夏王义恭作《嘉禾甘露颂》。见《宋书·符瑞志》。又作《奏徙彭城王义康》。见《宋书·彭城王义康传》："二十四年，豫章胡诞世、前吴平令袁恽等谋反，袭杀豫章太守桓隆、南昌令诸葛智之，聚众据郡，复欲奉戴义康。太尉录尚书江夏王义恭等奏曰……。"

沈演之作《嘉禾颂》、《白鸠颂》。并见《宋书·符瑞志》。

颜延之六十四岁。袁淑四十岁。王微三十三岁。谢庄二十七岁。王僧绰二十五岁。王僧达二十五岁。陆澄二十三岁。王僧虔二十二岁。谢朏七岁。江淹四岁。张融四岁。

元嘉二十五年(448)戊子

雷次宗筑室于钟山,谓之招隐馆,使为皇太子诸王讲《丧服》经。本年卒,年六十三岁。见《宋书·隐逸传》。《隋书·经籍志》著录别集十六卷。本年,宋文帝作《下雷次宗诏》。刘义恭作《答诏愍雷次宗》。并见《宋书·隐逸·雷次宗传》。

南平王**刘铄**十八岁,任豫州刺史。《南史》本传载,刘铄少好学有文才,未弱冠,作《拟古诗》三十首,时人以为亚迹于陆机。今存五首。估计这三十首诗非一时所作,但均作于未弱冠前,史有明文,姑系本年。又《宋书·索虏传》载后魏若库辰树兰作《移书豫州》文,"左将军、豫州刺史南平王铄答移曰……"。此文《全宋文》题作《答移魏若库辰树兰》。

沈约八岁,其祖父沈林子被追赠征虏将军,至本年追谥曰怀。见《南史·沈约传》。

宣武场建成,**宋文帝**作《厉兵诏》,并讲武习兵于宣武场,为元嘉二十七年大举北伐作准备。见《宋书·文帝纪》及《礼志》。

何尚之作《密奏庾炳之得失》、《又陈庾炳之愆过》、《又答问庾炳之事》等。《资治通鉴》载:"刘湛既诛,庾炳之遂见宠任,累迁吏部尚书,势倾朝野。炳之无文学,性强急轻浅。既居选部,好诟詈宾客,且多纳货赂;士大夫皆恶之。炳之留令史二人宿于私宅,为有司所纠。上薄其过,欲不问。仆射何尚之因极陈炳之之短。"

陆徽作《荐龚颖表》。见《宋书·龚颖传》。

颜延之六十五岁。袁淑四十一岁。鲍照三十五岁。王微三十四岁。谢庄二十八岁。王僧绰二十六岁。王僧达二十六岁。陆澄二十四岁。王僧虔二十三岁。谢朏八岁。江淹五岁。张融

五岁。孔稚珪二岁。

元嘉二十六年(449)己丑

颜延之六十六岁,作《车驾幸京口侍游蒜山作诗》、《车驾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后湖作诗》。《资治通鉴》载,本年二月己亥,"上如丹徒,谒京陵。三月丁巳大赦。募诸州乐移者数千家以实京口。"

袁淑四十二岁,迁尚书吏部郎。见《宋书》本传。

鲍照三十六岁,随始兴王濬经京口,作《奉始兴王白纻舞曲》、《蒜山被始兴王命作》、《征北世子诞育上表》。考见《鲍参军集注》。

谢庄二十九岁,为随王诞谘议参军,与沈怀文共掌辞令,同僚还有江智渊等。《宋书·沈怀文传》:"随王诞镇襄阳,出为后军主簿,与谘议参军谢庄共掌辞令。"《宋书·江智渊传》:"及为随王诞佐,在襄阳,诞待之甚厚。时谘议参军谢庄,府主簿沈怀文并与智渊友善。"《宋书·竟陵王诞传》:"二十六年出为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竟陵、随二郡诸军事,后将军,雍州刺史。以广陵凋弊,改封随郡王。上欲大举北伐,以襄阳外接关、河,欲广其资力,乃罢江州军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台税租杂物悉给襄阳。"据《宋书·文帝纪》,二十六年七月"广陵王诞为雍州刺史。"又《宋书·谢庄传》:"转随王诞后军谘议,并领记室。分左氏《经传》,随国立篇,制木方丈,图山川土地,各有分理,离之则州别郡殊,合之则宇内为一。"谢庄在从随王诞之前,曾随庐陵王在江州,本年七月还京。《自浔阳至都集道里名为诗》约作于是时。随从刘诞赴雍州,又作《怀园引》。

王僧绰二十七岁,徙尚书吏部郎,参掌大选。究识流品,谙

悉人物，拔才举能，咸得其分。见《宋书》本传。

沈约九岁。其父沈璞为南徐州、南兖州刺史始兴王濬正佐，移镇京口。其伯父沈邵卒，年四十三。并见《宋书·自序》。

江淹六岁，能作诗，常慕司马相如、梁伯鸾的为人，不事章句之学，留情于文章，早为高平檀超所知，优加以礼。见《南史》本传及江淹《自序》。

裴松之重受诏续成何承天《宋书》，未遑述作，“其年终于位。”见裴子野《宋略总论》。按：《宋书·裴松之传》以为“续何承天国史，未乃撰述，二十八年卒，时年八十。”此说恐未确。何承天卒于二十四年，尔后有裴松之受诏续成《宋书》事，不应距何承天之死相去太远。沈约、裴子野都载裴松之“未及撰述”、“未遑述作”而卒，大约其受诏不久即卒，不大可能迟至二十八年也。

随王刘诞作《襄阳乐》。见《乐府诗集》所引《古今乐录》。按：元嘉十九年刘道产卒，襄阳人为歌颂道产而作《襄阳乐》。《古今乐录》以为“非此也。”刘诞之作今存九首。

本年三月，以军兴减百官俸禄，罢国子学。见《宋书·文帝纪》。二月，文帝东巡京口，作《谒京陵诏》、《徙民实京口诏》已明显带有巡视边境、为“经略中原”(《资治通鉴》)作准备之意。见《宋书·文帝纪》《礼志》。文帝欲北伐，群臣争先献策以邀宠信，以王玄谟、袁淑为甚。文帝曾对殷景仁说：“闻王玄谟陈说，使人有封狼居胥意。”

王微三十五岁。王僧达二十七岁。陆澄二十五岁。王僧虔二十四岁。谢朓九岁。张融六岁。孔稚珪三岁。

元嘉二十七年(450)庚寅

秋七月，宋文帝下令北伐，以王玄谟为宁朔将军，前锋入河。

当时有很多人不同意率然动兵，像皇太子刘劭、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左军将军刘康祖等都曾明确表态反对挥师北上。但宋文帝不听劝谏，仓促动武，结果惨败。年底，后魏太武帝拓跋焘打到瓜步，“杀略不可称计”(《宋书·索虏传》)。这场战争给刘宋统治集团及广大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宋书·良吏传叙》载：“自兹至于孝建，兵连不息，以区区之江东，地方不至数千里，户不盈百万，荐之以师旅，因之以凶荒，宋氏之盛，自此衰矣。”三年以后，皇太子刘劭所以敢于叛逆弑杀，与宋文帝末年政治昏乱不无关系。

袁淑四十三岁，以夸诞主战而被命名为始兴王刘濬征北长史、南东海太守。《宋书》本传载，“其秋，大举北伐，淑侍坐从容曰：‘今当鸣銮中岳，席卷赵、魏，检玉岱宗，今其时也。臣逢千载之会，愿上《封禅书》一篇。’太祖笑曰：‘盛德之事，我何足以当之。’出为始兴王征北长史、南东海太守。淑始到府，濬引见，谓曰：‘不意舅遂垂屈佐。’淑答曰：‘朝廷遣下官，本以光公府望。’还为御史中丞。”年底，北伐军败，后魏追至瓜步，宋文帝召集百官共议防御之术，袁淑作《防御索虏议》。因“喜为夸诞，每为时人所嘲。”淑又作《与始兴王濬书》。见《宋书》本传。

鲍照三十七岁，作《送别王宣城》。按：王宣城，即王僧达也。考见《鲍参军集注》。

谢庄三十岁，名声流播北中国。《宋书》本传：“元嘉二十七年，索虏寇彭城，虏遣尚书李孝伯来使，与镇军长史张畅共语，孝伯访问庄及王微，其声名远布如此。”

王僧达二十八岁，春天任宣城太守。其冬作《求解职表》云：“赐莅宣城，仲春移任，方冬便值虏南侵。”是元嘉二十七任宣城太守职之证。

沈约十岁。其父沈璞迁宣威将军、盱眙太守。其伯父沈亮卒，年四十七。见《宋书·自序》。

谢朓十岁，能属文。《梁书》本传载，“庄游土山赋诗，使朓命篇，朓揽笔便就。琅琊王景文谓庄曰：‘贤子足称神童，复为后来特进’。庄笑，因抚朓背曰：“真吾家千金。”

周朗作《报羊希书》。《宋书》本传：“元嘉二十七年春，朝议当遣义恭出镇彭城，为北讨大统。朗闻之解职。及义恭出镇，府主簿羊希从行，与朗书戏之，劝令献奇进策，朗报书曰”云云。此文辞意倜傥，颇可诵读。周朗又有《上书献谠言》，颇长，有一定的政治见解，系在孝武帝即位之元嘉三十年末。

后魏太武帝**拓拔焘**作《与宋太祖书》、《又与宋主书》。见《宋书·索虏传》。

本年始以七条征发，致使伪造谱籍之风日盛。《南史·王僧孺传》载沈约《上言宜校勘谱籍》云：“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条征发。既立此科，苟有回避，人奸互起，伪状巧籍，岁月兹广，以至于齐，患其不实。”

颜延之六十七岁。王微三十六岁。王僧绰二十八岁。陆澄二十六岁。王僧虔二十五岁。江淹七岁。张融七岁。孔稚珪四岁。

元嘉二十八年(451)辛卯

范云生。《梁书》本传：“范云字彦龙，南乡舞阴人。晋平北将军汪六世孙也。”范云卒于梁天监二年，五十三岁，上推生本年。

鲍照三十八岁，随始兴王往江北，侍郎报满辞任，未即南返。作《侍郎报满辞阁疏》、《与王宣城诗》。

王僧达二十九岁，任宣城太守，顷之，徙任义兴太守。见《宋书》本传。

王僧绰二十九岁，迁侍中，任以机密。见《宋书》本传。按《资治通鉴》载：僧绰为侍中"年二十九，沈深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帝颇以后事为念，以其年少，欲大相付托，朝政大小，皆与参焉。帝之始亲政事，委任王华、王昙首、殷景仁、谢弘微、刘湛；次则范晔、沈演之、庾炳之；最后江湛、徐湛之、何瑀之（胡注：恐当作'何尚之'）及僧绰，凡十二人。"

沈约十一岁。其父沈璞时任盱眙太守。正月，魏兵围攻盱眙城，步骑号称数十万。沈璞与臧质共守三旬。二月，魏兵自盱眙退走。王僧达、始兴王濬分别作《与沈璞书》、宋文帝《别诏沈璞》以褒其功。见《宋书·文帝纪》《自序》等。

臧质作《报魏太武书》。见《南史》本传。

江夏王**义恭**奏徙刘义康迁广州，太子劭、武陵王骏、尚书左仆射何尚之奏斩义康。宋文帝虑天下有变，拥立义康，遂斩义康。本年，王玄谟为魏兵追击，流矢中臂，义恭作《与王玄谟书》。

鲁爽作《与弟秀南归奉辞于南平王铄》。见《宋书》本传。

颜延之六十八岁。袁淑四十四岁。王微三十七岁，谢庄三十一岁。陆澄二十七岁。王僧虔二十六岁。谢朏十一岁。江淹八岁。张融八岁。孔稚珪五岁。

元嘉二十九年(452)壬辰

王俭生。《南齐书》本传："王俭字仲宝，琅琊临沂人。祖昙首，宋右光禄。父僧绰，金紫光禄大夫。"王俭卒于南齐永明七年，三十八岁，上推生本年。

颜延之六十九岁，上表乞解职，不许。见《宋书》本传。

袁淑四十五岁，作《与何尚之书》、《真隐传》。按《宋书·何尚之传》："二十九年，致仕，于方山著《退居赋》以明所守，而议者咸谓尚之不能固志。太子左卫率袁淑与尚之书"云云。尚之果然未能守志。文帝作《与江夏王义恭》，刘义恭作《答诏问何尚之致仕事》，并敦谕尚之出仕，后"尚之复摄职。"据《南史·何尚之传》载："尚之既任事，上待之愈隆，于是袁淑乃录古来隐士有迹无名者为《真隐传》以嗤焉。"何尚之《退居赋》不存，而袁淑《真隐传》尚存，主人公曰鬼谷先生。

鲍照三十九岁，自南兖州返建康。作《瓜步山楬文》、《学陶彭泽体》、《和王义兴七夕》。考见《鲍参军集注》。又，曹道衡先生《鲍照几篇诗文的写作时间》谓鲍照在元嘉二十九年至三十年曾为永安令。

谢庄三十二岁，除太子中庶子。南平王刘铄献赤鹦鹉，群臣为赋，谢庄《赤鹦鹉赋应诏》深为袁淑激赏，称"江东无我，卿当独秀；我若无卿，亦一时之杰也。"遂隐去同题赋不传。见《宋书·谢庄传》。谢庄赋存。

王僧达三十岁，作《七夕诗》，时为义兴太守。鲍照有和。考见《鲍参军集注》。

宋文帝又欲北伐。何偃作《北伐议》，刘兴祖《建议伐河北》。沈庆之固谏不从。再次由王玄谟率兵攻碻磝，不克而还。见《宋书·何偃传》、《沈庆之传》及《索虏传》。按：二十七年北伐失利，宋文帝似有悔意。《南史·宋文帝纪》载，二十七年十二月，"魏太武帝率大众至瓜步，声欲渡江，都下震惧，咸荷担而立。""帝登烽火楼极望，不悦，谓江湛曰：'北伐之计，同议者少，今日士庶劳怨，不得无惭。贻大夫之忧，在予过矣'。"又《南史·张永传》："文帝以屡征无功，诸将不可任，诏责永等与思话。又与江夏王义恭

书曰：'早知诸将辈如此，恨不以白刃驱之，今者悔何所及。'"文帝所以在本年又北伐，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北魏太武帝拓拔焘在本年二月被谋杀，文帝欲趁机收回河南。详《资治通鉴》。

王微三十八岁。王僧绰三十岁。陆澄二十八岁。王僧虔二十七岁。沈约十二岁。谢朓十二岁。江淹九岁。张融九岁。孔稚珪六岁。范云二岁。

元嘉三十年(453)癸巳

二月，宋皇太子**刘劭**弑父，自立为帝，改元太初。宋文帝第三子刘骏起兵讨伐。四月至建康新亭，即皇帝位，是为世祖孝武皇帝。五月，骏入建康，杀刘劭。

袁淑被刘劭所杀，时年四十六岁。详《宋书》本传。其文存十五篇，诗有七首。《诗品》评曰："其原出于张华，才力苦弱，故务其清浅，殊得风流媚趣。"

王微作《以书告弟僧谦灵》。四旬后卒。年三十九岁。《遗令》云："以尝所弹琴置床上，何长史来以琴与之。"见《宋书》本传。按：何长史，何偃也。王有《报何偃书》，称何偃"少陶玄风，淹雅修畅，自是正始中人。"其《以书告弟僧谦灵》感情真挚动人，使人想起韩愈名篇《祭十二郎文》。王微散文，不尚骈丽，散体单行，除上面提及的两篇外，其他如《与从弟王僧绰书》、《与江湛书》等，无不素朴可诵，可谓当时文坛别一流派。沈约称之曰"为文古甚，颇抑扬，袁淑见之，谓之诉屈。"所见极是。他自称"少学作文"，"文好古，贵能连类可悲，一往视之，如似多意。当见居非求志，清论所排，便是通辞诉屈邪？尔者真可谓真素寡矣。"《隋书·经籍志》著录别集十卷。佚。其诗，《诗品》谓出张华，才力苦弱。

王僧绰受诏撰汉魏以来废诸王故事，劝宋文帝决断废立太子事。二月，刘劭弑立，任僧绰为吏部尚书。三月，刘劭发现王僧绰以先预见废立，遂杀王僧绰，时年三十一岁。见《宋书》本传。按：宋文帝欲废刘劭，另立太子，然久虑不决，所以令王僧绰撰史以鉴今。撰毕，送与江湛、徐湛之。徐湛之欲立随王刘诞，因诞妃即湛之女。江湛则欲立南平王刘铄，因铄妃即江湛妹。宋文帝则欲立建平王刘宏。当断不断，致使事态发生逆转。《隋书·经籍志》著录《王僧绰集》一卷。

南平王**刘铄**为征虏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本年为孝武帝刘骏所杀。存诗十首。

颜延之七十岁，致仕。五月为光禄大夫。孝武即位，以为金紫光禄大夫，领湘东王师。作《赠谥袁淑诏》、《赐恤袁淑遗孤诏》、《谢子竣封建城侯表》等。考见缪钺编《年谱》。

鲍照四十岁，其秋作《侍宴覆舟山二首》、《谢永安令解禁止启》及《和王护军秋夕诗》。考见《鲍参军集注》及曹道衡先生《鲍照几篇诗文的写作时间》。

谢庄三十三岁，初为刘劭辟为司徒左长史。孝武即位，除侍中，作《密诣世祖启》、《索虏互市议》、《申言节俭诏书事》。按《宋书》本传："元凶弑立，转司徒左长史。世祖入讨，密送檄书与庄，令加改治宣布。庄遣腹心门生具庆奉启事密诣世祖曰：'贼劭自绝于天……。'世祖践阼，除侍中。时索虏求通互市，上诏群臣博议。庄议曰……。时骠骑将军竟陵王诞当为荆州，征丞相，荆州刺史南郡王义宣入辅，义宣固辞不入，而诞便克日下船。庄以'丞相既无入志，骠骑发便有期，如似欲相逼切，于事不便。'世祖乃申诞发日。义宣竟亦不下。上始践阼，欲宣弘风则，下节俭诏书。事在《孝武本纪》。庄虑此事不行，又言曰：'……'"。又《宋

书·索虏传》："世祖即位，索虏求互市，江夏王义恭、竟陵王诞、建平王宏、何尚之、何偃以为宜许；柳元景、王玄谟、颜竣、谢庄、檀和之、褚湛之以为不宜许。时遂通之。"又，《建康实录·世祖孝武帝纪》还载谢庄上疏，纵论莅民宜遵六年之限事。《全宋文》失载。

王僧达三十一岁，初为宣城太守、义兴太守。刘劭弑立，僧达南奔，逢孝武帝于鹊头，被任命为长史，加征虏将军。孝武即位，为尚书右仆射，寻出为使持节，南蛮校尉。八月，为护军将军、征虏将军、吴郡太守。封营道侯。作《求徐州启》。见《宋书》本传。

王僧虔二十八岁，收养亡兄王僧绰遗孤王俭。转武陵太守。还为中书郎，转黄门郎，太子中庶子。见《南齐书》本传及《王俭传》。

沈约十三岁。其父沈璞以"奉迎之晚"为孝武帝所杀，时年三十八岁。沈璞之死，实颜竣所谗陷。后来沈约撰《宋书》，于颜竣颇多微辞。沈璞死后，沈约四处逃匿，备尝艰辛。其后"笃志好学，昼夜不倦。"见《宋书·自序》及《梁书·沈约传》。

王俭二岁，其父王僧绰被杀，为叔父王僧虔抚养成人。见《南齐书》本传。

颜竣作《为世祖檄京邑》。见《宋书·元凶劭传》。又《宋书·颜延之传》："劭召延之，示以檄文，问曰：'此笔谁所造？'延之曰：'竣之笔也。'又问何以知之？延之曰：'竣笔体，臣不容不识。'"按《资治通鉴》载，刘劭曾密令沈庆之杀刘骏，沈庆之持手书见刘骏，刘骏惊惧万分。沈庆之劝刘骏起兵。颜竣则持异议。沈庆之厉声曰："今举大事，而黄头小儿皆得参预，何得不败！宜斩以徇！"刘骏令颜竣拜谢庆之。庆之曰："君但当知笔札事耳！"

张畅作《与张永书》，劝张永与萧思话抛弃前嫌，共赴国难。见《宋书·张茂度传》。

柳元景作《与朝士书》。见《宋书》本传。

周朗作《上书献谠言》，纵论天下时事，颇忤孝武帝，遂自解去职。见《宋书》本传。沈约论曰："周朗辩博之言，多切治要，而意在摛词，文实忤主。文词之为累，一至此乎！"

萧思话作《奉世祖笺》。按《宋书》本传载，刘劭弑立后，以思话为徐、兖二州刺史，思话即率部曲还彭城起义，以应世祖，遣使奉笺。此文颇为通俗素朴，近于王微风格，值得注意。

江夏王**义恭**作《上世祖劝进表》。见《宋书》本传。

刘义隆元嘉之世，号称升平。《宋书·沈昙庆传论》："自义熙十一年司马休之外奔，至于元嘉末，三十年有九载，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盖东西之极盛也。"刘义隆本人又好文章，善书法，奖励提倡，对当时及后世产生很大影响。《宋书·文帝纪》："文帝博涉经史，善隶书。"《南史》本纪："文帝好儒雅。"《宋书·临川王道规传》："文帝每与临川王义庆书，常加意斟酌。"庾肩吾《书品》把刘义隆书法列入中下品。

陆澄二十九岁。谢朏十三岁。江淹十岁。张融十岁。孔稚珪七岁。范云三岁。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454)甲午

正月，改元孝建元年，大赦天下，立皇太子子业。二月，江州刺史臧质拥戴南郡王刘义宣起兵反叛。六月皆败死。见《宋书·孝武帝纪》、《南郡王义宣传》及《臧质传》。

颜延之七十一岁。正月，孝武帝亲祠南郊，延之侍从。其子

颜竣显贵，延之不受其资供。见《宋书》本传。

鲍照四十一岁，除海虞令。见虞炎《鲍照集序》。

谢庄三十四岁。时为左卫将军、吏部尚书。上表解职，不许。作《上搜才表》、《与江夏王义恭笺》。《宋书》本传："孝建元年，迁左卫将军。""于时搜才路狭，乃上表曰……。有诏庄表如此，可付外详议，事不行。其年，拜吏部尚书。庄素多疾，不愿居选部，与大司马江夏王义恭笺自陈曰"云云。文称自己多病，"常恐淹忽。""今之所希，唯在小闲。"又称"家世无年，亡高祖四十，曾祖三十二，亡祖四十七，下官新岁便三十五，加以疾患如此，当复几时见圣世。"按：谢庄乃接颜竣为吏部尚书。《宋书·颜竣传》："孝建元年，转吏部尚书，领骁骑将军。留心选举，自强不息，任遇既隆，奏无不可。其后谢庄代竣领选，意多不行。竣容貌严毅，庄风姿甚美，宾客喧诉，常欢笑答之。时人为之语曰：颜竣嗔而与人官，谢庄笑而不与人官。"其上表求解职时在十月。《宋书·天文志》："孝建元年十月乙丑，荧惑犯进贤星。吏部尚书谢庄表解职，不许。"又作《宋明堂歌九首》，见《通典》卷一四一。按《通典》作"孝武建元元年"云云，误。当据《南齐书·乐志》作孝武帝孝建元年。又《南史》本传："庄有口辩。孝武尝问颜延之曰：'谢希逸《月赋》何如？'答曰：美则美矣，但庄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诏庄，以延之答语语之。庄应声曰：'延之作《秋胡诗》，始知'生为久离别，没为长不归'。帝抚掌竟日。"又载："王玄谟问庄何者为双声，何者为叠韵。答曰：'玄护为双声，碻磝为叠韵。'其捷速若此。"

王僧达三十二岁，因多役公力加盖私宅以及同性恋行为，于本年春天被免官。又因上表陈谢有"不能因依左右，倾意权贵"之句，使孝武帝大怒，但还未下决心处置。见《宋书·王僧达传》。

陆澄三十岁，时为太学博士，作《皇弟休倩殇服议》两篇。见《宋书·礼志》。

王僧虔二十九岁，阻止王僧达坑杀族子王确。《宋书·王僧达传》："僧达族子确年少，美姿容，僧达与之私款。确叔父休为永嘉太守，当将确之郡，僧达欲逼留之，确知其意，避不复往。僧达大怒，潜于所住屋后作大坑，欲诱确来别，因杀而埋之，从弟僧虔知其谋，禁呵乃止。"

臧质作《举兵上表》。见《宋书》本传。刘义宣作《奉表自陈》。见《宋书》本传。

柳元景作《讨臧质等檄》。见《宋书·臧质传》。此文写得很有气势，疑为倩人代作。

江夏王**义恭**作《奏斩臧质事》、《与南郡王义宣书》、《省录尚书表》、《奏请严章服》等。见《宋书·礼志》、《刘义宣传》等。

谢超宗、何法盛校书东宫。见《宋书·自序》。

沈约十四岁。谢朏十四岁。江淹十一岁。张融十一岁。孔稚珪八岁。范云四岁。王俭三岁。

孝建二年(455)乙未

谢庄三十五岁，时为尚书，作奏表以闻降甘露。见《宋书·符瑞志》。

王玄谟作《请用杨头为西秦州假节表》。见《宋书·氐胡传》

颜竣作《让中书令表》《郊庙乐议》。见《宋书·乐志》等。按：参议庙乐的有荀万秋、建平王刘宏、竟陵王刘诞等。

颜延之七十二岁。鲍照四十二岁。王僧达三十三岁。陆澄三十一岁。王僧虔三十岁。沈约十五岁。谢朏十五岁。江淹十二岁。张融十二岁。孔稚珪九岁。范云五岁。王俭四岁。

孝建三年(456)丙申

陶弘景生。《梁书》本传:"弘景字通明,丹阳秣陵人也。萧纶《隐居贞白先生陶君碑》云:"本冀州平阳人也。……后至汉末南渡,始居丹阳。""父贞宝,司徒建安王国侍郎。"《梁书》本传记其大同二年卒时八十五岁。按《南史》本传载弘景生于宋孝建三年,则至大同二年死时为八十一岁,非八十五。萧纲《华阳陶先生墓志铭》及萧纶所作碑并谓弘景死时八十一岁。据此上推其生年与《南史》记载同,当在本年。

八月,**颜延之**卒,七十三岁。年初,作《赠王太常诗》。见《宋书》本传。按:王太常,王僧达也。本年除太常。延之有四子:竣、测、奂、跃。一女,适范羲。宋文帝尝问延之:"卿诸子谁有卿风?"延之回答说:"竣得臣笔,测得臣文,奂得臣义,跃得臣酒。"延之著作主要有:《逆降义》三卷、《论语颜氏注》、《诂幼》二卷、《纂要》一卷、《颜延之集》二十五卷、《元嘉西池宴会诗集》三卷、《阮籍咏怀诗注》、《通佛影迹》、《通佛顶齿爪》、《通佛衣钵》、《通佛二叠不燃》、《妄书禅慧寺宣诸弘信》、《与何彦德论感果生灭》、《与何承天辨达性论》、《广何彦德断家养论》、《与何书》、《离识观》、《论检》、《庭诰》等。其文今存三十八篇,其诗今存二十八首及残句若干。《南史》本传载:"文章冠绝当时。""与谢灵运俱以词采齐名,而迟速悬绝。延之尝问鲍照,己与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绘满眼。'斯时议者以延之、灵运自潘岳、陆机之后,文士莫及。江右称潘陆,江左称颜谢焉。"《诗品》称"其原出于陆机,尚巧似,体裁绮密,情喻渊深,动无虚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弥见拘束;虽乖秀逸,是经纶雅才。"《史通·浮词》称颜延之《秋胡

诗》"语多本传，而事无异说"。由此看来，颜延之的创作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元嘉时代"文多经史"的风尚，所以有颜、谢并称之号。而鲍照则与之不同，他能更多地从民间文学中汲取养分，秀逸艳丽，遂开大明、泰始诗风。从这个意义上说，颜延之的死，标志着一个时代文风的结束。此后，鲍照实为诗坛冠冕。

鲍照四十三岁，迁太学博士，兼中书舍人，出为秣陵令。作《月下登楼连句》、《玩月城西门廨中》、《代放歌行》、《为柳令让谢骠骑表》、《谢秣陵令表》等。考见《鲍参军集注》。

谢庄三十六岁，坐辞疾多，免官。见《宋书》本传。

王僧达三十四岁，除太常，上表解职，免官。复为临淮太守。见《宋书》本传。作《答颜延年诗》、《祭颜光禄文》、《上表解职》等。祭文为《文选》收录，作于本年九月。

江淹十三岁，其父江康之卒。《自序》："十三而孤，邈过庭之训。"《南史》本传："初，淹年十三时，孤贫，常采薪以养母，曾于樵所，得貂蝉一具，将鬻以供养，其母曰：'此故汝之休徵也，汝才学若此，岂长贫贱也，可留待得侍中著之。"齐明帝即位，江淹果为侍中。按：由此可见江淹幼年很贫困，但自强不息，欲以出人头地。后来志得意满，不思进取，遂有江郎才尽之称。幼年的经历对诗人确有极重要之影响。

范云六岁，随从其姑夫袁叔读《毛诗》，昼夜不息。叔明抚其背曰："卿精神秀朗，而勤于学，卿相才也。"见《梁书》、《南史》本传。按：《梁书》作"袁照"。

颜竣复代谢庄为吏部尚书，未拜，丁父忧。作《奏荐孔觊王或为散骑常侍》。见《宋书·孔觊传》。又作《铸四铢钱议》。见《宋书》本传。同议者有徐爰、刘义恭、沈庆之等。

陆澄三十二岁。王僧虔三十一岁。沈约十六岁。**谢**朓十六

岁。张融十三岁。孔稚珪十岁。王俭五岁。

宋孝武帝大明元年(457)丁酉

正月,改元大明元年。

谢庄三十七岁,起为都官尚书。作《奏改定刑狱》。见《宋书》本传。又作《瑞雪咏》及《为八座太宰江夏王表请封禅》。按《宋书·礼志》载本年十一月江夏王刘义恭上《请封禅表》。此表似为谢庄所作,但《初学记》卷十三所收谢庄《为八座太宰江夏王表请封禅》四句不见刘义恭《请封禅表》中。或是脱落,也未可知。

王僧达三十五岁,迁左卫将军、领太子中庶子,以归顺功,封宁陵县五等侯。见《宋书》本传。

王俭六岁,袭封豫宁侯。见任昉《王文宪集序》。

颜竣为东扬州刺史。《资治通鉴》大明元年载:"上自既去之后(胡注:三年之丧既除而既去),奢淫自恣,多所兴造。丹杨尹颜竣以藩朝旧臣,数恳切谏争,无所回避,上浸不悦。竣自谓才足干时,恩旧莫比,当居中永执朝政,而所陈多不纳,疑上欲疏之,乃求外出以占上意。夏六月丁亥,诏以竣为东扬州刺史,竣始大惧。"

裴景仁撰《秦记》十卷。见《南史·沈昙庆传》:"大明元年,为徐州刺史。时殿中员外将军裴景仁助戍彭城。景仁本北人,多悉关中事。昙庆使撰《秦记》十卷,叙苻氏事。其书传于世。"

鲍照四十四岁。陆澄三十三岁。王僧虔三十二岁。沈约十七岁。谢朏十七岁。江淹十四岁。张融十四岁。孔稚珪十一岁。范云七岁。陶弘景二岁。

大明二年(458)戊戌

齐文惠太子萧长懋生。《南齐书》本传:"文惠太子长懋字云乔,小字白泽,世祖长子也。"其卒于齐永明十一年,三十六岁。上推生于本年。

刘绘生。《南齐书》本传:"刘绘字士章,彭城人,太常悛弟也。父勔,宋末权贵。"刘绘卒于齐中兴二年,四十五岁,上推生于本年。

八月,**王僧达**下狱死,时年三十六岁。《宋书》本传:"二年,迁中书令。先是,南彭城蕃县民高阇、沙门释昙标、道方等共相狂惑,自言有鬼神龙凤之瑞,常闻箫鼓音,与秣陵民蓝宏期等谋为乱。又要结殿中将军苗允、员外散骑侍郎严欣之、司空参军阚千纂、太宰府将程农、王恬等,谋克二年八月一日夜起兵,攻宫门,晨掩太宰江夏王义恭,分兵袭杀诸大臣,以阇为天子。事发觉,凡党与死者数十人。僧达屡经狂逆,上以其终无悛心,因高阇事诏之。"《资治通鉴》亦载:"中书令王僧达幼聪警能文,而跌荡不拘,帝初践阼,擢为仆射,居颜(竣)刘(延孙)之右,自负才地,谓当时莫及,一二年间,即望宰相,既而迁护军,怏怏不得志,累启求出。上不悦,由是稍稍下迁,五岁七徙,再被弹削。僧达既耻且怨,所上表奏,辞旨抑扬,又好非议朝政,上已积愤怒。路太后兄子尝诣僧达,趋升其榻,僧达令舁弃之,太后大怒,固邀上令必杀僧达。会高阇反,上因诬僧达与阇通谋,八月丙戌,收付廷尉赐死。"按:路太后兄子诣僧达事,《宋书·路太后传》作路太后弟路琼之,非兄子。又,上年刘瑀曾有《奏弹王僧达》称:"荫藉高华,人品冗末。"其文今存七篇,诗存五首。

何偃卒,时年四十六岁。王微曾誉之为"正始中人。"今存诗

一首，文六篇，其中以《月赋》出名。

鲍照四十五岁，为永嘉令。考见《鲍参军集注》。

谢庄三十八岁，为吏部尚书，迁右卫将军。作《舞马赋应诏》及《舞马歌》。见《宋书》本传。河南王派使方物，在本年八月，详《宋书·孝武帝纪》。按：颜竣、谢庄这几年先后为吏部尚书，掌大权。孝武帝惧权移臣下，欲削弱吏部尚书权限，于是本年六月下诏增置吏部尚书一人，省五兵尚书。与谢庄同为吏部尚书的是顾觊之。

王僧虔三十三岁，出为西阳王刘子尚抚军长史，迁散骑常侍。按《南齐书》本传作"出为豫章王子尚抚军长史。"疑豫章王误，当作西阳王。考《宋书·孝武帝纪》，刘子尚为西阳王在孝建三年。本年十一月加抚军将军。子尚为豫章王是在大明五年四月。

范云八岁，有识具，善属文，便尺牍，下笔辄成，未尝定稿，时人每疑其宿构，为豫州刺史殷琰所赏识。见《梁书》本传。

庾徽之作《奏弹颜竣》。见《宋书·颜竣传》："及王僧达被诛，谓为竣所谗构，临死陈竣前后忿怼，每恨言不见从。僧达所言，颇有相符据。上乃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之曰：……。上未欲便加大戮，且止免官。"按：颜竣下年五月被赐死。

孝武帝作《沙汰沙门诏》。按《宋书·夷蛮传》载："世祖大明二年，有昙标道人与羌人高阇谋反，上因是下诏曰：'佛法讹替，沙门混杂，未足扶济鸿教，而专成逋薮。加奸心频发，凶状屡闻，败乱风俗，人神交怨。可付所在，精加沙汰，后有违犯，严加诛坐'。于是设诸条禁，自非戒行精苦，并使还俗。而诸寺尼出入宫掖，交关妃后，此制竟不能行。"

江夏王**刘义恭**注《新出首楞严经》，释弘充作序。见《全齐

文》卷二十六所载序文。

陆澄三十四岁。沈约十八岁。谢朏十八岁。江淹十五岁。张融十五岁。孔稚珪十二岁。王俭七岁。陶弘景三岁。

大明三年(459)己亥

四月,司空、南兖州刺史竟陵王**刘诞**在广陵城反叛。七月,刘诞被杀,王师悉诛城男丁,以女口为军赏。见《宋书·孝武帝纪》。

鲍照四十六岁,客居江北。作《日落望江赠荀丞》及《芜城赋》。考见《鲍参军集注》。按:曹道衡先生《鲍照几篇诗文的写作时间》认为《芜城赋》作于元嘉末年。

谢庄三十九岁,作《刘琨之诔》。《宋书·刘遵考传》:"澄之弟琨之,为竟陵王诞司空主簿,诞作乱,以为中兵参军,不就,絷系数十日终不受,乃杀之。追赠黄门侍郎。诏吏部尚书谢庄为之诔。"按:《艺文类聚》卷四十八收录此文。又作《江都平解严诗》。广陵又名江都。此诗为平竟陵王诞事而作,时在本年七八月间。

陆澄三十五岁,时为太常丞,作《庙祠有故迁日议》。见《宋书·礼志》。

颜竣下狱死,见《宋书》本传:"及竟陵王诞为逆,因此陷之,召御史中丞庾徽之于前为奏,奏成,诏曰'竣孤负恩养,乃至于此,于狱赐死。'"据《建康实录》,时在夏五月。按:庾徽之奏文作于上年,但当时孝武帝已杀王僧达,对颜竣还未"加大戮,且止免官"而已,至本年又以杀王僧达同样方式对颜竣处以极刑。据《资治通鉴》载:"免竣官,竣愈惧,上启陈谢,且请生命;上益怒,诏答曰:'卿讪讦怨愤,正孤本望,乃复过烦思虑,惧不自全,岂为下事上诚节之至邪?'及竟陵王诞反,上遂诬竣与诞通谋,五月,

收竣付廷尉，先折其足，然后赐死。"其文今存九篇，诗四首。

徐爰领著作郎，续撰《宋书》。刘汝霖《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系此于大明六年，误。《宋书》本传："六年又以爰领著作郎。"《南史》本传径作"孝建六年。"按：孝建共三年，《南史》疏误自不必说，刘汝霖以为"此事当在大明六年无疑"亦非是。《宋书》所说六年，是指孝武帝即位后第六年。其例史书多有。《梁书·谢朏传》载其卒年仅云"后五年"，这是指梁武帝即位后第五年，即天监五年。据《宋书·自序》，何承天发凡起例，始撰《宋书》，徐爰乃接替苏宝生续作。《宋书·苏宝生传》载，苏宝生因高阇谋反叛乱而不启闻，结果被杀，时在大明二年。徐爰本年继承苏宝生未竟事业而续撰《宋书》。

顾琛作《纳款世祖表》。见《宋书》本传：大明三年竟陵王诞反，世祖以琛素结事刘诞，或有异志，遣使就吴郡太守王昙生诛琛父子，会廷稔先至，琛等执而斩之，遣二子送廷稔首，作此表云云，因而获免。

刘成作《诣阙上书告竟陵王诞谋反》，陈文绍作《上书诉父冤》，陈谈之作《上书诉弟泳之枉状》。并见《宋书·竟陵王诞传》。

九月，**孝武帝**在玄武湖北立上林苑，移南郊坛于牛头山。见《南史》本纪。又，是时，舞乐宴歌亦很盛行。《乐府诗集》卷三十引《古今乐录》曰："王僧虔《大明三年宴乐技录》，平调有七曲：一曰长歌行，二曰短歌行，三曰猛虎行，四曰君子行，五曰燕歌行，六曰从军行，七曰鞠歌行。"

王僧虔三十四岁。沈约十九岁。谢朏十九岁。江淹十六岁。张融十六岁。孔稚珪十三岁。范云九岁。王俭八岁。陶弘景四岁。萧长懋二岁。刘绘二岁。

大明四年(460)庚子

萧子良生。《南齐书》本传:"竟陵文宣王子良,字云英,世祖第二子也。"卒于齐隆昌元年,三十五岁,上推生本年。

任昉生。《梁书》本传:"任昉字彦昇,乐安博昌人。汉御史大夫敖之后也。父遥,齐中散大夫。"任昉小名阿堆。见《南史》本传。卒于梁天监七年,四十九岁,上推生本年。

何尚之卒,七十九岁。见《宋书》本传。按:元嘉十五年开设玄学、文学等四馆,何尚之主持玄学馆。其文存十四篇。

谢庄四十岁,作《司空何尚之墓志》。见《艺文类聚》卷四十七。又作《侍东耕诗》。按《宋书·孝武帝纪》:其年正月乙亥,"车驾躬耕藉田。"又元嘉二十一年亦有东耕藉田之礼仪,而谢庄时在江州,不能侍从。

陆澄三十六岁,仍官太常。见《宋书·礼志》。

沈约二十岁,以为晋氏一代,竟无全史,始有撰述之志。见《宋书·自序》。

陶弘景五岁,画灰学书,时人以为美谈。见《南史》本传。

谢超宗以选补新安王国常侍。见《南齐书》本传。按史传未具体叙述确切时间,但明言在殷淑仪卒前任职。殷淑仪卒于七年。

刘瓛举秀才,见《南齐书》本传:"宋大明四年,举秀才,兄琎亦有名,先应州举,至是别驾东海王元僧与瓛父书曰:'此岁贤子充秀,州闾可谓得人。'"

鲍照四十七岁,王僧虔三十五岁。谢朏二十岁。江淹十七岁。张融十七岁。孔稚珪十四岁。范云十岁。王俭九岁。萧长懋三岁。刘绘三岁。

大明五年(461)辛丑

谢庄四十一岁，初为右卫将军，迁侍中，领前军将军。作《和元日花雪应诏诗》。按《宋书·符瑞志》："大明五年正月戊午元日，花雪降殿庭。时右卫将军谢庄下殿，雪集衣。还白，上以为瑞，于是公卿并作花雪诗。史臣按《诗》云：'先集为霰。'《韩诗》曰：'霰，英也。'花叶谓之英。《离骚》云：'秋菊之落英。'左思云：'落英飘飖。'是也，然则霰为花雪矣。草木花多五出，花雪独六出。"据此，则诗题当作《和元日花雪应诏诗》。逯钦立先生《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作"雪花"误。《宋书》本传又云："五年，又为侍中，领前军将军。于时世祖出行，夜还，敕开门。庄居守，以棨信或虚，执不奉旨，须墨诏乃开。上后因酒宴从容曰：'卿欲效郅君章邪?'对曰：'臣闻搜巡有度，郊祀有节，盘于游田，著之前诫。陛下今蒙犯尘露，晨往宵归，容恐不逞之徒，妄生矫诈，臣是以伏须神笔，乃敢开门耳。'改领游击将军，又领本州大中正，晋安王子勋征虏长史、广陵太守，加冠军将军。改为江夏王义恭太宰长史，将军如故。六年……。"由此看来，谢庄虽处处谨慎，但还不是全然曲意奉迎，而江夏王义恭则不然。大明三年四月竟陵王刘诞反叛，孝武帝拟亲自征讨，刘义恭作《谏亲征竟陵王诞表》。本年正有朝贺，"雪落太宰义恭衣，有六出，义恭奏以为瑞，大悦。义恭以上猜暴，惧不自容，每卑辞逊色，曲意祗奉，由是终上之世，得免于祸。"见《资治通鉴》。本年，谢庄又作《皇太子妃哀册文》。据《宋书·孝武帝纪》，皇太子妃死于本年九月。

王僧虔三十六岁，为新安王子鸾北中郎将长史、南东海太守，行南徐州事。见《宋书》本传。按《宋书·孝武帝纪》，大明四年正月庚寅，第八皇子子鸾为襄阳王。同年九月丁亥，改封襄阳

王子鸾为新安王。知王僧虔入刘子鸾府，至少在大明四年九月以后。大明五年，子鸾为北中郎将。冬十月，为南徐州刺史。由此知王僧虔是在十月以后行南徐州事。《南齐书》本传又载："寻迁豫章内史，入为侍中，迁御史中丞。领骁骑将军。王氏以分枝居乌衣者，位宦微减，僧虔为此官，乃曰：'此是乌衣诸郎坐处，我亦可试为耳。'"王僧虔入侍中等职，确切时日不可详考，但据文意，其行南徐州事不久，"寻迁"云云，当是在本年末或下年初。

谢朏二十一岁。此前曾随其父谢庄从驾姑熟，作《洞井赞》，深得孝武帝称赞。《梁书》本传："孝武帝游姑熟，敕庄携朏从驾，诏使为《洞井赞》，于座奏之。帝笑曰：'虽小，奇童也。'"称之为童，必在此年前。

沈约二十一岁，起家奉朝请。见《梁书》本传。具体年月不详，但据《资治通鉴》元嘉二十七年胡三省注："奉朝请者，奉朝会请召而已，"似是释褐起家之官。又据《梁书·朱异传》："旧制，年二十五方得释褐。时异适二十一，特敕擢为扬州议曹从事史。"如果说沈约依"旧制"而在二十五岁起家似过晚，因为《文选》收录其《游钟山诗应西阳王教》，李善注以为是应西阳王刘子尚教。按子尚在孝建三年至大明五年间为西阳王。本年四月改封豫章王。铃木虎雄《沈约年谱》系《游钟山诗应西阳王教》于本年，近是。由此大致推断，沈约起家奉朝请当在本年前后。

张融十八岁，解褐为新安王北中郎参军。见《南齐书》本传。据《宋书·刘子鸾传》，子鸾为北中郎将、南徐州刺史时在本年。

陶弘景六岁，能解书。见萧纶《隐居贞白先生陶君碑》。

丘巨源协助徐爰撰《宋书》。《南齐书》本传："丘巨源，兰陵兰陵人也。""少举丹阳郡孝廉，为宋孝武帝所知，大明五年，敕助

徐爰撰国史。”此亦证明徐爰撰《宋书》至少在大明五年之前。刘汝霖系在六年，显误。

江夏王刘义恭作《条制诸王府镇表》。见《宋书》本传。按：此文作于本年四月海陵王刘休茂在襄阳作乱之后。

鲜卑吐谷浑献舞马，孝武帝诏群臣作《舞马歌》，凡二十七首。见《宋书·鲜卑吐谷浑传》。按：李福庚《南北朝作家编年初稿》(部分载于《重庆师院学报》85年2期)以为谢庄《舞马赋应诏》作于本年，恐未确，因《宋书·谢庄传》明确记载是“河南献舞马”，非鲜卑吐谷浑所献。谢庄之作当系于大明二年为是。

二月，始复百官俸禄。见《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曰：“文帝元嘉二十七年以军兴减内外百官俸三分之一。继而国内有难，日不暇给，今始复百官禄。”

鲍照四十八岁。陆澄三十七岁。江淹十八岁。孔稚珪十五岁。范云十一岁。萧长懋四岁。刘绘四岁。萧子良二岁。任昉二岁。

大明六年(462)壬寅

刘峻生。《梁书》本传：“刘峻字孝标，平原平原人。父珽，宋始兴内史。”孝标卒于梁普通二年，时年六十岁，上推生本年。

四月，**殷淑仪**卒。宋孝武帝作《拟汉武李夫人赋》。见《宋书·刘子鸾传》。按：殷淑仪本为刘义宣女。义宣败后，孝武密娶入宫，假姓殷氏，左右宣泄者多死，故当时莫知所出。义宣为宋文帝亲弟，亦即孝武帝亲叔。刘骏竟娶叔女为宠妃，其纵情败礼如此！十月，又别为立庙名新安寺。殷淑仪子刘子鸾，亦爱冠诸子，孝武割吴郡属之。《通鉴》胡注：“吴郡自晋氏渡江以来属扬州，最为近畿大郡。”孝武帝甚至欲立刘子鸾为皇太子。难怪前

废帝上台伊始即杀刘子鸾，掘殷妃墓，良有以也。

鲍照四十九岁，为临海王前行军参军，掌知内命，寻迁前军刑狱参军事。作《登黄鹤矶》、《登翻车岘》、《歧阳守风》、《从临海王上荆初发新渚》等。见《鲍参军集注》。

谢庄四十二岁，为吏部尚书，领国子博士。作《让吏部尚书表》、《殷贵妃哀策文》。按《南史·后妃传》："谢庄作哀策文奏之，帝卧览读，起坐流涕曰：'不谓当今复有此才。'都下传写纸墨为之贵。"此文收在《文选》中，题名《宋孝武宣贵妃诔》。又《初学记》、《艺文类聚》收有谢庄《殷贵妃谥策文》。

丘灵鞠作《挽歌诗》三首，除新安王北中郎参军，出为剡乌程令。《南齐书》本传："丘灵鞠，吴兴乌程人"，"少好学，善属文"。"宋孝武殷贵妃亡，灵鞠献挽歌诗三首，'云横广阶闇，霜深高殿寒。'帝摘句嗟赏。"此两句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失收。

谢超宗作《殷淑仪诔》，帝大嗟赏。按《南史》本传："选补新安王子鸾国常侍。王母殷淑仪卒，超宗作诔奏之，帝大嗟赏，谓谢庄曰：'超宗殊有凤毛，灵运复出。'"谢超宗为谢灵运之孙。其父谢凤"坐灵运徙岭南，早卒。"

殷琰《宣贵妃诔》。见《太平御览》卷三五八。

江智渊作《宣贵妃挽歌》。见《初学记》。

陶弘景七岁，读《孝经》、《毛诗》、《论语》数万言。见萧纶《隐居贞白先生陶君碑》。

陆澄三十八岁。王僧虔三十七岁。沈约二十二岁。谢朏二十二岁。江淹十九岁。张融十九岁，孔稚珪十六岁。范云十二岁。王俭十一岁，萧长懋五岁。刘绘五岁。萧子良三岁。任昉三岁。

大明七年(463)癸卯

江智渊卒，时年四十六岁。《宋书》本传说是忧惧而卒，《宋略》以为自杀。其前因后果，《资治通鉴》有详载，此不赘引。

鲍照五十岁，时在荆州。作《石帆铭》、《代阳春登荆山行》、《在江陵叹年伤老》、《与伍侍郎别》、《在荆州与张使君李居士联句》。考见《鲍参军集注》。

谢庄四十三岁，仍为吏部尚书，后坐公车令张奇免官。后新安王刘子鸾招引才俊，板庄为长史。见《宋书》本传、《颜师伯传》。九月，作《为北中郎谢兼司徒表》。按：刘子鸾九月兼司徒。十月，作《庆皇太子元服上至尊表》、《皇太子元服上皇太子表》。按：本年十月皇太子冠。又东海王刘祎于本年十月进为司空，谢庄代作《为东海王让司空表》。

江淹二十岁，以五经授始安王刘子真，并为南徐州新安王从事。作《侍始安王石头》、《奏记诣南徐州新安王》等。详考见曹道衡先生《江淹作品写作年代考》，载山西人民出版社编《艺文志》第三辑。以下引此文简称《年代考》，不另注明。

张融二十岁，得陆修静赠白鹭羽麈尾扇，出为封溪令，作《海赋》。按《南齐书》本传："孝武起新安寺，僚佐多儭钱帛，融独儭百钱。帝曰：'融殊贫，当序以佳禄。'出为封溪令。从叔永出后渚送之，曰：'似闻朝旨，汝寻当还！'融曰：'不患不还，政恐还而复去。'广越嶂崄，獠贼执融，将杀食之，融神色不动，方作洛生咏，贼异之而不害也。浮海至交州，于海中作《海赋》。"按：新安寺上年十月立，融出为封剡令当在十月后。《海赋》之作当更后，故系于本年。

任昉四岁，诵诗数十篇，见《南史》本传。

扬州刺史豫章王子尚表立左学，召生徒，置儒林祭酒一人。见《宋书》本传。

祖冲之作《上新历表》。按：《宋书·律历志》以为作于六年，不确。此表后列"历法"有："上元甲子至宋大明七年癸卯"云云，是作于本年之证。又《南齐书·文学传》本传："事奏，孝武令朝士善历者难之，不能屈。会帝崩，不施行。"按：孝武帝下年五月卒，则此表必于是时之前。驳难之文，有戴法兴《议祖冲之新历》，因法兴为孝武宠幸，天下畏其权，皆附会之。唯巢尚之支持祖冲之。冲之又作《辩戴法兴难新历》。《宋书·律历志》载："上爱奇慕古，欲用冲之新法。时大明八年也。故须明年改元，因此改历。未及施用，而宫车晏驾也。"据此，其驳难往返之文作于本年末下年初。

陆澄三十九岁。王僧虔三十八岁。沈约二十三岁。谢朏二十三岁。孔稚珪十七岁。范云十三岁。王俭十二岁。陶弘景八岁。萧长懋六岁。刘绘六岁。萧子良四岁。刘峻二岁。

大明八年(464)甲辰

五月，孝武帝**刘骏**卒，时年三十岁。皇太子刘子业即位，是为前废帝。

萧衍生。《梁书》本纪："高祖以宋孝武大明八年甲辰岁生于秣陵县同夏里三桥宅。"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中都里人。

谢朓生。《南齐书》本传："谢朓字玄晖，陈郡阳夏人也。祖述，吴兴太守。父纬，散骑常侍。"谢朓在齐永元元年被杀，时年三十六岁，上推生本年。

丘迟生。《梁书》本传："丘迟字希范，吴兴乌程人也。父灵鞠，有才名，仕齐官至太中大夫。"丘迟卒于梁天监七年，时年四

十五岁，上推生本年。

谢庄四十四岁。正月，作《为北中郎新安王拜司徒章》。按：刘子鸾上年九月兼司徒，本年正月领司徒。五月，作《孝武帝哀策文》。前废帝即位，因怨谢庄为殷贵妃作诔，欲诛之。后听孙奉伯言，系庄于尚方。见《宋书》、《南史》本传。本年又作《豫章长公主墓志铭》。按：豫章长公主名刘欣男，先嫁徐乔，后嫁何瑀，本年卒。

谢超宗为新安王抚军行参军。见《南齐书》本传。按：新安王刘子鸾本年正月为抚军将军。

周颙随萧惠开入蜀，为厉锋将军，带肥乡、成都二县令，转惠开辅国府参军，仍为府主簿。见《南齐书》本传。据《宋书·前废帝纪》，萧惠开于本年八月任益州刺史。

丘巨源为江夏王刘义恭掌书记。见《南齐书》本传。

刘义恭作《劾蔡兴宗等表》。柳元景作《奏劾蔡兴宗》。见《宋书·蔡兴宗传》。按：《全宋文》无"等"字，而此表实奏劾多人，应补此字。

释宝亮初至京师，袁粲见而异之，作《与明法师书》称之。见《高僧传·释宝亮传》。

鲍照五十一岁。陆澄四十岁。王僧虔三十九岁。沈约二十四岁。谢朏二十四岁。江淹二十一岁。张融二十一岁。孔稚珪十八岁。范云十四岁。王俭十三岁。陶弘景九岁。萧长懋七岁。刘绘七岁。萧子良五岁。任昉五岁。刘峻三岁。

宋明帝泰始元年(465)乙巳

正月，改元永光元年。八月，尚书令柳元景谋立江夏王刘义恭，事泄，皆死。改元景和元年。十一月，湘东王刘彧谋杀前废

帝。十二月，刘彧即皇帝位，改元泰始元年。是为太宗明皇帝。

王僧孺生。《梁书》本传："王僧孺字僧孺，东海郯人。魏卫将军肃八世孙。曾祖雅，晋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祖准，宋司徒左长史。"又《南史》本传："父延年，员外常侍，未拜卒。"僧孺卒于梁普通三年，五十八岁，上推生本年。

柳恽生。《梁书》本传："柳恽字文畅，河东解人也。"其卒于梁天监十六年，五十三岁，上推生本年。

颜师伯被前废帝所杀，四十七岁。存诗一首。见《宋书》本传。《资治通鉴》载："初，世祖多猜忌，王公大臣，重足屏息，莫敢妄相过从。世祖殂，太宰义恭等皆相和曰：'今日始免横死矣。'甫过山陵，义恭与柳元景、颜师伯等声乐酣饮，不舍昼夜。帝内不能平。既杀戴法兴，诸大臣无不震慑，各不自安；于是元景、师伯密谋废帝，立义恭，日夜聚谋，而持疑不能决。元景以其谋告沈庆之，庆之与义恭素不厚，又师伯常专断朝事，不与庆之参怀，谓令史曰：'沈公爪牙耳，安得预政事？'庆之恨之，乃发其事。"

刘义恭被杀，存诗七首及若干残句。存文三十四篇。《全宋文》卷四十何勖《与江夏王义恭笺》下注引谢绰《宋拾遗录》云："义恭性爱古物，尝遍就朝士求之。"其诗文亦有特点。《隋书·经籍志》著录别集十一卷。

鲍照五十三岁，作《代挽歌行》、《代蒿里行》、《代门有车马客行》等作品，详见《鲍参军集注》考证。

谢庄四十五岁。明帝刘彧即位后被释放，任散骑常侍，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领寻阳王师，顷之，转中书令、常侍。寻加金紫光禄大夫，给亲信二十人。见《宋书》本传。作《泰始元年大赦诏》、《让中书令表》、《宋世祖庙歌二首》。按：二首庙歌指世祖孝武皇帝歌和宣太后歌。宣太后，即宋文帝沈婕妤容姬，明帝母，

卒于元嘉三十年。孝武即位，追赠湘东国太妃。明帝即位，谥曰宣太后。

陆澄四十一岁，为尚书殿中郎，后免官。见《南齐书》本传。

江淹二十二岁。秋，从始安王去南兖州，作《始安王拜征虏将军南兖州刺史章》及《从征虏始安王道中》等。详《年代考》。

陶弘景十岁，读葛洪《神仙传》，始有养生之志。详《梁书》本传。

丘灵鞠坐东贼党锢数年。见《南齐书》本传。按：后来褚渊为吴兴太守，对人说："此郡才士，唯有丘灵鞠及沈勃耳。"乃延誉引荐，明帝使著《大驾南讨纪论》。

丘巨源参制明帝诏诰。见《南齐书》本传。

贾渊辟丹阳郡主簿、奉朝请、太学博士。见《南齐书》本传。

袁粲为司徒左长史、冠军将军、南东海太守。尝著《妙德先生传》以自况，并续嵇康《高士传》。按《宋书》本传："袁粲字景倩，陈郡阳夏人，太尉淑兄子也。父濯，扬州秀才，早卒。祖母哀其幼孤，名之曰愍孙。""愍孙幼慕荀奉倩之为人，白世祖，求改名为粲，不许。至是言于太宗，乃改为粲，字景倩焉。"

刘昶逃奔北魏，作《断句诗》。见《南史》本传。

周颙作《三宗论》，智林作《与周颙书》以表赞同。按《高僧传·智林传》："至宋明之初，敕在所资给发遣下京，止灵基寺，讲说相续，禀服成郡，申明二谛义，有三宗不同。时汝南周颙又作《三宗论》，既与林意相符，深所欣慰。乃致书与颙"云云。《南齐书·周颙传》载三宗论：一、不空假名，二、空假名，三、假名空。汤用彤先生《中国佛史零篇·周颙三宗论》有详考。载《燕京学报》第二十二期。后收入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年出版的汤先生论文集《理学·佛学·玄学》一书中。

王僧虔四十岁。沈约二十五岁。谢朏二十五岁。张融二十二岁。孔稚珪十九岁。范云十五岁。王俭十四岁。萧长懋八岁。刘绘八岁。萧子良六岁。任昉六岁。刘峻四岁。萧衍二岁。谢朓二岁。丘迟二岁。

泰始二年(466)丙午

正月，晋安王**刘子勋**在寻阳自立为帝，改元义嘉。八月，沈攸之等军入寻阳，斩子勋。

徐勉生。《梁书》本传："徐勉字脩仁，东海郯人也。祖长宗，宋高祖霸府行参军。父融，南昌相。"勉卒于梁大同元年，时年七十，上推生本年。

鲍照在荆州被杀，时年五十三岁。本年作有《代东门行》诗。考见《鲍参军集注》。《南史》本传："明远文辞赡逸，尝为古乐府，文甚遒丽。"钟嵘《诗品》称："其源出于二张。善制形状写物之词，得景阳之淑诡，含茂先之靡嫚，骨节强于谢混，驱迈疾于颜延。总四家而擅美，跨两代而孤出。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然贵尚巧似，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南齐书·文学传》论及元嘉诗风影响于后世者有三派：一是谢灵运之典丽诗派；二是颜延年之功利诗派；三是鲍照之险俗诗派。就影响而言，鲍照可谓直接开启永明诗风。鲍照谢世时，永明重要作家大多来到人世，他们生长在"鲍照之遗烈"中，跳出传统诗学的窠臼，把目光更多地转向江南民歌创作上，汲取养分。

谢庄卒，时年四十六岁。本年作《为朝臣与雍州刺史袁颛书》。按：刘子勋在寻阳自立，任命袁颛为安北将军。《宋书·谢庄传》载："太宗使朝士与颛书。"此书收在《艺文类聚》卷二十五中，题谢庄撰。谢庄卒后，追赠右光禄大夫。所著文章四百余首

行于世。见《宋书》本传。《隋书·经籍志》著录别集十九卷。今存文三十六篇，诗十七首。《诗品》称："希逸诗气候清雅，不逮于范、袁。然兴属闲长，良无鄙促也。"谢庄有五子，名为：飏、朏、颢、岳、瀹。世谓谢庄名儿为风、月、景、山、水。见《南齐书·谢瀹传》。

王僧虔四十一岁，作《诫子书》。见《南齐书》本传。按：此文具体描述了当时士人以玄学为"言家口实"之风，极为重要："往年有意于史，取《三国志》聚置床头，百日许，复徙业就玄，自当小差于史，犹未近仿佛。曼倩有云：'谈何容易。'见诸玄，志为之逸，肠为之抽，专一书，转诵数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尚未敢轻言。汝开《老子》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马、郑何所异，《指例》何所明，而便盛于麈尾，自呼谈士，此最险事。设令袁令命汝言《易》，谢中书挑汝言《庄》，张吴兴叩汝言《老》，端可复言未尝看邪？谈故如射，前人得破，后人应解，不解即输赌矣。且论注百氏，荆州《八袠》，又《才性四本》，《声无哀乐》，皆言家口实，如客至之有设也。汝皆未经拂耳瞥目，岂有庖厨不修，而欲延大宾者哉？就如张衡思侔造化，郭象言类悬河，不自劳苦，何由至此？汝曾未窥其题目，未辨其指归；六十四卦，未知何名；《庄子》众篇，何者内外；《八袠》所载，凡有几家；《四本》之称，以何为长。而终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刘汝霖《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以为"此书之作当于（袁）粲为中书令之后，（谢）庄卒之前，"故系于本年。

谢朏二十六岁，时为太子舍人，以父忧去职。见《梁书》本传。

江淹二十二岁，随建平王刘景素在南兖州，受猜忌，系狱，作《诣建平王上书》。详《年代考》。

王俭十五岁，时宋明帝欲毁俭父母坟，王俭苦谏。见任昉《王文宪集序》。按：宋明帝居藩王时，素与王俭母武康公主不和，故即位后有掘坟之举。

谢超宗为建安王刘休仁司徒参军事、尚书殿中郎。见《南齐书》本传。按：刘休仁上年十二月迁为司徒、尚书令，按阅历已在本年初。

邓琬为晋安王刘子勋作《传檄京师》文。见《宋书》本传及《刘子勋传》。按《全宋文》将此文收录在刘子勋名下，并案云："荀道林为子勋记室参军，此檄当是道林所作。"

刘休若为宋明帝作《移檄东土讨孔颉等》文。见《宋书·孔颉传》。

刘休祐作《与殷琰书》，刘勔作《与殷琰书》、《又与殷琰书》。见《宋书·殷琰传》。

陆澄四十二岁。沈约二十六岁。张融二十三岁。孔稚珪二十岁。范云十六岁。陶弘景十一岁。萧长懋九岁。刘绘九岁。萧子良七岁。任昉七岁。刘峻五岁。萧衍三岁。谢朓三岁。丘迟三岁。王僧孺二岁。柳恽二岁。

泰始三年(467)丁未

王融生。《南齐书》本传："王融字元长，琅琊临沂人。祖僧达，中书令，曾高并台辅。父道琰，庐陵内史。母临川太守谢惠宣女，惇敏妇人也，教融书学。"融于齐永明十一年被杀，时年二十七岁，上推生本年。

刘勰生。《梁书》本传："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骑校尉。"关于刘勰生年，持说不一，今本牟世金《刘勰年谱汇考》(以下简称《汇考》)。

沈约二十七岁。任郢州刺史蔡兴宗安西外兵参军，兼记室。蔡兴宗盛称沈约为“人伦师表”。见《梁书》本传。按：蔡兴宗出仕郢州刺史在本年三月。其时，范岫二十八岁，亦为蔡兴宗安西将军主簿，亦在郢州。沈、范二人相知很深。

江淹二十四岁，为巴陵王左常侍，赴襄阳，作《望荆山》、《哀千里赋》、《秋至怀归》以及《到主簿日诣右军建平王》等。详见《年代考》。

张融二十四岁，与顾觊之友善。顾本年卒，张自负坟土。见《南齐书》本传。按《宋书·顾觊之传》，觊之卒于本年，时七十六岁。

范云十七岁，其父范抗为郢州刺史蔡兴宗参军，范云随父在府，与沈约，庾杲之等过从甚密。

任昉八岁，能属文，作《月仪》，深为褚渊赏识。由是闻声藉甚。见《南齐书》本传。

谢超宗议秀才考格。见《南齐书》本传。此议《全齐文》题作《策秀才议》。

李珪之为蔡兴宗安西主簿。见《南齐书》本传。

顾欢作《夷夏论》。刘汝霖《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任继愈《汉—唐佛教简明年表》并以《夷夏论》作于本年。

陆澄四十三岁。王僧虔四十二岁。谢朏二十七岁。孔稚珪二十一岁。王俭十六岁。陶弘景十二岁。萧长懋十岁。刘绘十岁。萧子良八岁。刘峻六岁。萧衍四岁。谢朓四岁。丘迟四岁。王僧孺三岁。柳恽三岁。徐勉二岁。

泰始四年(468)戊申

王僧虔四十三岁，妻卒。《梁书·王志传》载，王志九岁丁母

忧。按：王志为王僧虔子，天监十二年卒，时年五十四。本年九岁。王志字次道，善草隶，当时以为楷法。齐游击将军徐希秀亦号能书，常谓志为"书圣"。

谢朏二十八岁，服阕，复为太子舍人。见《梁书》本传。

江淹二十五岁，作《就谢主簿宿》、《应谢主簿骚体》、《报袁淑明书》。谢主簿，即谢超宗。详《年代考》。

刘勔作《条对贾元友北攻悬瓠书》。见《宋书》本传。

周颙随萧惠开离蜀还京。见《南齐书》本传。按《宋书·萧惠开传》："泰始四年，还至京师。"

孙琼作《重奏江夏王女服》。见《南齐书·江谧传》。

陆澄四十四岁。沈约二十八岁。张融二十五岁。孔稚珪二十二岁。范云十八岁。王俭十七岁。陶弘景十三岁。萧长懋十一岁。刘绘十一岁。萧子良九岁。任昉九岁。刘峻七岁。萧衍五岁。谢朓五岁。丘迟五岁。王僧孺四岁。柳恽四岁。徐勉三岁。王融二岁。刘勰二岁。

泰始五年(469)己酉

吴均生。《梁书》本传："吴均字叔庠，吴兴故鄣人也。家世寒贱。"其卒于梁普通元年，五十二岁，据此上推生本年。

裴子野生。《梁书》本传："裴子野字几原，河东闻喜人。晋太子左率康八世孙。兄黎，弟楷、绰，并有盛名。所谓'四裴'也。曾祖松之，宋太中大夫。祖骃，南中郎外兵参军。父昭明，通直散骑常侍。子野生而偏孤，为祖母所养。"其卒于梁中大通二年，时年六十二岁，上推生本年。《刘勰年谱汇考》系于泰始三年，实误。又，本年裴子野父裴昭明作《议皇太子纳征礼》。虞龢亦有同议。见《宋书·礼志》。

沈约二十九岁，随蔡兴宗从郢州至会稽。按沈约《与徐勉书》云："望得小禄，傍此东归。岁逾十稔，方忝襄阳县。"沈约为襄阳令，时在479年，上溯十年为本年。时仍在蔡兴宗府中供职。本年六月，蔡兴宗为镇东将军、会稽太守，离开郢州刺史职位。又，沈约在本年开始修撰《晋书》。《宋书·自序》称："泰始初，征西将军蔡兴宗为启明帝，有敕赐许，自此迄今，年逾二十。"按：文中所云"今"是指齐永明六年，上溯二十年为本年。

江淹二十六岁，作《贻袁常侍》、《建平王谢赐石砚等启》、《从冠军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等。袁常侍，即袁炳。详《年代考》。

王俭十八岁，解褐秘书郎，太子舍人。选尚阳羡公主，拜驸马都尉。见《南史》本传。秘书郎为甲族起家之官。见《梁书·张缵传》。王俭为驸马都尉，是袁粲所荐举，袁粲本年为丹阳尹。

刘峻八岁，青州陷魏，峻为人掠至中山。家贫，好学不倦。见《梁书》本传。

王僧孺五岁，读《孝经》有得。见《梁书》本传。

刘祥为巴陵王刘休若征西行参军，历骠骑中军二府。见《南齐书》本传。按：刘休若为征西将军，时在本年闰十一月。

刘瓛为丹阳尹袁粲荐为秘书郎，不见录用。见《南齐书》本传。

陆澄四十五岁。王僧虔四十四岁。谢朏二十九岁。张融二十六岁。孔稚珪二十三岁。范云十九岁。陶弘景十四岁。萧长懋十二岁。刘绘十二岁。萧子良十岁。任昉十岁。萧衍六岁。谢朓六岁。丘迟六岁。柳恽五岁。徐勉四岁。王融三岁。刘勰二岁。

泰始六年(470)庚戌

九月，立总明观，置东观祭酒，访举各一人。举士二十人，分为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学。言阴阳者遂无其人。见《南史·宋明帝纪》。按《南齐书·百官志》云："泰始六年，以国学废，初置总明观。玄、儒、文、史四科置学士各十人，正令史一人、书令史二人、干一人、门吏一人、典观吏二人。"

陆倕生。《梁书》本传："陆倕字佐公，吴郡吴人也。晋太尉玩六世孙。祖子真，宋东阳太守，父慧晓，齐太常卿。"陆倕卒于梁普通七年，时年五十七岁，据此上推生于本年。

陆澄四十六岁，作《皇太子冕服议》，寻转著作正员郎，除安成太守，转刘韫抚军长史，加绥远将军，襄阳太守，并不拜。仍转刘秉后军长史，东海太守。见《南齐书》本传。按：刘韫于本年六月任抚军将军、雍州刺史。刘秉七月为南徐州刺史。见《宋书·明帝纪》及《刘秉传》。

王僧孺六岁，能属文。见《梁书》本传。

谢超宗迁司徒主簿，丹阳丞。复为司徒记室，正员郎，兼尚书左丞中郎。以直言忤仆射刘秉，左迁通直常侍。见《南齐书》本传。按：建安王刘休仁本年二月为太尉，领司徒。又，刘秉，《南齐书·谢超宗传》作"康"。曹道衡师以为系形近而误，据改。

虞龢作《上明帝论书表》。年月见文末记载。此表评价历代书法名家，极有参考价值。

袁粲执《周易》，明帝讲经于华林园。见《宋书》本传。按：王僧虔《诫子书》盛称袁粲通《周易》，良有以也。

王景文作《与王道隆书》。见《宋书》本传。

王僧虔四十五岁。沈约三十岁。谢朏二十岁。江淹二十

七岁。张融二十七岁，范云二十岁。王俭十九岁。陶弘景十五岁。萧长懋十三岁。刘绘十三岁。萧子良十一岁。任昉十一岁。刘峻九岁。萧衍七岁。谢朓七岁。丘迟七岁。柳恽六岁。徐勉五岁。王融四岁。刘勰四岁。吴均二岁。裴子野二岁。

泰始七年(471)辛亥

殷芸生。《梁书》本传："殷芸字灌蔬，陈郡长平人也。"卒于梁大通三年，五十九岁。上推生于本年。

徐摛生。《梁书》本传："徐摛字士秀，东海郯人也。祖凭道，宋海陵太守。父超之，天监初仕至员外散骑常侍。"按：《梁书》本传称其大宝二年卒时七十八岁，恐误。萧绎在中大通六年(534)作《法宝联璧序》，文末称徐摛六十四岁，上推生本年，下推至大宝二年，为八十一岁。

周捨生。《梁书》本传："周捨字昇逸，汝南安成人。晋左光禄大夫顗之八世孙也。父颙，齐中书侍郎，有名于时。"按：史传未明确记载周捨卒年，仅云："迁右骁骑将军、知太子詹事。以其年卒，时年五十六。"这里所说的"其年"是哪年呢？铃木虎雄《沈约年谱》，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周捨小传》，洪顺隆《六朝诗论·谢朓作品系年》并据上文定其卒于普通五年，实误。据《梁书·司马筠传》、《裴子野传》，普通七年，周捨仍在世，为太子詹事。依《梁书》本传，周捨卒年与其任太子詹事同年，则其当卒于普通七年。上推生于本年，而不是象洪顺隆所说生于泰始五年。

王素卒，时年五十四岁。《玉台新咏》收其《学阮步兵体》一首。

王僧虔四十六岁，五月，以白衣兼侍中，监吴郡太守，迁使持

节、都督湘州诸军事、建武将军，行湘州事，仍为辅国将军、湘州刺史。见《南齐书》本传。

江淹二十八岁，随刘景素之荆州。作《渡西塞望江上诸山》、《从建平王游纪南城》、《建平王散五刑教》、《建平王聘隐逸教》、《建平王让右卫将军荆州刺史表》、《建平王拜右卫将军荆州刺史章》、《建平王庆安成王拜封表》等。详《年代考》。

张融二十八岁，为安成王抚军仓曹参军。见《南齐书》本传。按《宋书·明帝纪》：泰始七年七月"以第三皇子准为抚军将军。"八月"立第三皇子准为安成王"。《宋书·顺帝纪》："七年封安成王，食邑三千户。仍拜抚军将军，置佐吏。"

任昉十二岁，为从叔任晷激赏，称其小名曰："阿堆，吾家千里驹也。"昉孝友纯至，每侍亲疾，衣不解带，言与泪并，汤药饮食必先经口。见《南史》本传。

丘迟八岁，能属文。其父丘灵鞠曰："气骨似我。"谢超宗、何点见而异之。见《梁书》本传。

徐勉六岁，率尔为文，见称耆宿。见《梁书》本传。

周颙为安成王抚军行参军。与张融为同僚。见《南齐书》本传。

贾渊为安成王抚军行参军。见《南齐书》本传。

王景文作《自陈求解扬州》。见《宋书》本传："时太子及诸皇并小，上稍为身后之计，诸将帅吴喜、寿寂之之徒，虑其不能奉幼主，并杀之，而景文外戚贵盛，张永累经军旅，又疑其将来难信，乃自为谣言曰：'一士不可亲，弓长射杀人。'一士，王字；弓长，张字也。景文弥惧，乃自陈解扬州曰"云云。文中有"自窃州任，倏已七月。"景文上年六月任扬州刺史，至本年初满七月。按：明帝耽心自己死后，皇后临朝，则王景文自然成宰相，门族强盛，藉元

舅之重，恐为后患，于是下年初即赐王景文死。时年六十。

陆修静上《三洞道经目录》。考见刘汝霖《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

陆澄四十七岁。沈约三十一岁。谢朏三十一岁。孔稚珪二十五岁。范云二十一岁。王俭二十岁。陶弘景十六岁。萧长懋十四岁。刘绘十四岁。萧子良十二岁。刘峻十岁。萧衍八岁。谢朓八岁。丘迟八岁。王僧孺七岁。柳恽七岁。王融五岁。刘勰五岁。吴均三岁。裴子野三岁。陆倕二岁。

宋明帝泰豫元年(472)壬子

正月，改元泰豫元年。四月，明帝刘彧死。太子刘昱即位，是为后废帝。

陆厥生。《南齐书》本传："陆厥字韩卿，吴郡吴人。扬州别驾闲子也。"厥卒于齐永元元年，时年二十八岁，上推生本年。

沈约三十二岁，为征西将军蔡兴宗记室参军，带厥西令。见《梁书》本传。按：蔡兴宗于本年四月任荆州刺史，未之任，八月即卒。沈约亦未赴任。详《宋书·沈攸之传》。

江淹二十九岁，为刘景素镇军参军事，领南东海郡丞。作讽诗十五首。两人关系开始疏远。本年作《建平王庆明帝疾和礼上表》、《建平王谢玉环刀等启》、《建平王庆改号启》、《建平王太妃周氏行状》、《建平王庆少帝登祚表》、《建平王让镇南徐州刺史启》、《建平王之南徐州刺史辞阙表》、《江上之山赋》、《金灯草赋》等。详《年代考》。

范云二十二岁，蔡兴宗死后，仍留沈攸之荆州刺史府内。作《送沈记室夜别》。沈记室，沈约也。

周颙入侍帷幄，颇见重用。见《高僧传·释僧瑾传》。

谢超宗与**萧道成**共属文。见《南齐书》本传。

王智深作《和建平王观法篇》，被刘景素辟为西曹书佐。见《南齐书》本传。

李珪之为镇西将军沈攸之中郎咨议。见《南齐书》本传。

宋**孝武帝**、**明帝**之大明、泰始中，文风大变，是元嘉文风向永明文风转变的重要过渡阶段。宋孝武帝、宋明帝并好辞赋。《建康实录》载，大明六年八月建置清台令官，用以考其清浊。又云："武帝自永初迄于元嘉，多为经史之学，自大明之代，好作词赋。"《宋书·临川王道规传》附《鲍照传》称："孝武好为文章，自谓物莫能及。"其诗今存二十七首，居刘宋帝王之首。《诗品》评："孝武诗，雕文织采，过为积密。"《宋书·明帝纪》："好读书，爱文义。在藩时撰《江左以来文章志》，又续卫瓘所注《论语》二卷，及即大位，才学之士，多蒙引进，参侍文籍，应对左右。"裴子野《雕虫论序》亦称："宋明帝博好文章，才思朗捷，常读书奏，号称七行俱下，每有祯祥，及幸谳集，辄陈诗展义，且以命朝臣，其戎士武夫则托请不暇，困于课限，或买以应诏焉。于是天下向风，人自藻饰，雕虫之艺，盛于时矣。"故裴子野说："宋初迄于元嘉，多为经史。大明之代，实好斯文，高才逸韵，颇谢前哲，波流相尚，滋有笃焉。自是闾阎年少，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斐尔为功。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讨其宗途，亦有宋之遗风也。"《诗品序》也称："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钞。"钟嵘谈的是使事用典，但元嘉与大明、泰始又有所不同。元嘉诗风尚经史，而大明、泰始则以玄学为主。

陆澄四十八岁。王僧虔四十七岁。谢朏三十二岁。张融二十九岁。孔稚珪二十六岁。王俭二十一岁。陶弘景十七岁。萧长懋十五岁。刘绘十五岁。萧子良十三岁。任昉十三岁。刘峻十一岁。萧衍九岁。谢朓九岁。丘迟九岁。王僧孺八岁。柳恽八岁。徐勉七岁。王融六岁。刘勰六岁。吴均四岁。裴子野四岁。陆倕三岁。徐摛二岁。殷芸二岁。周舍二岁。

宋后废帝元徽元年(473)癸丑

正月,改元元徽元年。

江淹三十岁,仍在刘景素幕下,作《灯赋》、《遂古篇》、《扇上彩画赋》、《伤友人赋》、《袁友人传》、《伤爱子赋》、《悼室人十首》、《伤内弟刘常侍》、《陆东海谯山集》、《灯夜和殷长史》、《赠炼丹法和殷长史》等。详《年代考》。

张融三十岁,议家人家长罪所不及事。见《南齐书》本传。按:泰始四年,宋明帝取荆郢湘雍四州射手,叛者斩亡身及家长者,家口没奚官。元徽初,郢州射手有叛者,张融议其家人家长罪所不及。

王俭二十二岁,表上《七志》三十卷。见《宋书·后废帝纪》及《南齐书》本传(作四十卷)。任昉《王文宪集序》称:"元徽初,迁秘书丞,于是采公曾(荀勖)之《中经》,刊弘度(李充)之《四部》,依刘歆《七略》,更撰《七志》。盖尝赋诗云:'稷契匡虞夏,伊吕翼商周。'自是始有应务之迹,生民属心矣。时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脱落尘俗,见公弱龄,便望风推服,叹曰:'衣冠礼乐在是矣。'时粲位亚台司,公年始弱冠,年势不侔,公与之抗礼,因赠粲诗,要以岁暮之期,申以止足之诫。粲答诗曰:'老夫亦何寄,之子照清襟。'"按:王俭《赠袁粲诗》失传。袁粲这两句诗为《先秦汉魏

晋南北朝诗》所失收。阮孝绪《七录序》载："宋秘书殷淳撰《大四部目》，俭又依别录之体，撰为《七志》。"其编排体例为："改六艺为经典，次诸子，次诗赋为文翰，次兵书为军书，次数术为阴阳，次方伎为术艺。以向、歆虽云《七略》，实有六条，故别立图谱一志，以全七限。其外又条《七略》及二汉《艺文志》（按：指班固、袁山松所撰书）、《中经簿》所阙之书，并方外之经，佛经道经，各为一录。"因献此书目，朝廷又命王俭等编《元徽元年秘阁四部书目录》，收书二千二十帙，一万五千七十四卷。见《七录序》及《隋书·经籍志》。

周颙出为剡令，有恩惠，百姓思之。见《南齐书》本传。

丘巨源为桂阳王刘休范所征，未能，留京都。见《南齐书》本传。

顾长康、**何翌之**表上所撰《谏林》十二卷，上自虞舜，下及晋武。见《宋书·后废帝纪》。

陆澄四十九岁。王僧虔四十八岁。沈约三十三岁。谢朏三十三岁。孔稚珪二十七岁。范云二十三岁。陶弘景十八岁。萧长懋十六岁。刘绘十六岁。萧子良十四岁。任昉十四岁。刘峻十二岁。萧衍十岁，谢朓十岁。丘迟十岁。王僧孺九岁。柳恽九岁。徐勉八岁。王融七岁。刘勰七岁。吴均五岁。裴子野五岁。陆倕四岁。徐摛三岁。殷芸三岁。周舍三岁。陆厥二岁。

元徽二年（474）甲寅

五月，桂阳王**刘休范**在浔阳反叛，逼入建康朱雀门。右军将军王道隆、领军将军刘勔等战死。越骑校尉张敬儿诈降，杀刘休范。

吴迈远坐桂阳王之乱被杀，作《临终诗》。按：吴作诗每得称

意语，辄掷地大呼："曹子建何足数哉！"今存诗共十一首。

王僧虔四十九岁，七月进封平南将军，以其攻讨桂阳王有功故也。作《报檀珪书》。见《宋书·后废帝纪》、《南史·檀珪传》。

沈约三十四岁，为郢州刺史晋熙王燮法曹参军，转外兵参军，兼记室。按：《梁书》本传作晋安王法曹参军。日本学者铃木虎雄以为"晋安之安，疑熙之误。"

谢朏三十四岁，为卫将军袁粲长史。按：袁粲于元年被任为卫将军，以丁母忧不受。二年桂阳王举兵反，袁粲扶曳入殿，府置佐史。

江淹三十一岁，被贬建安、吴兴令。作《敕为朝贤答刘休范书》、《刘仆射东山集》、《刘仆射东山集学骚》、《无锡县历山集》、《无锡舅相送衔涕别》、《被黜为吴兴令辞笺诣建平王》、《与交友论隐书》、《赤亭渚》、《去故乡赋》、《渡泉峤出诸山之顶》、《迁阳亭》、《游黄蘗山》等。详见《年代考》。

张融三十一岁，作《与从叔张永书》、《与王僧虔书》。见《南齐书》本传。按：张永时为征北将军、南兖州刺史，王僧虔掌吏部。张融撰信，用以求禄。时议以张融非治民才，竟不果。

孔稚珪二十八岁，解褐安成王车骑法曹行参军。见《南齐书》本传。按《宋书·顺帝纪》："元徽二年，进号车骑将军，都督扬南豫二州诸军事。"

刘勰八岁，其父刘尚卒。见《汇考》。

周颙为邵陵王刘友南中郎三府参军。见《南齐书》本传。按《宋书·邵陵殇王传》，刘友本年为南中郎将、江州刺史，封邵陵王。

丘巨源在中书省撰符檄，征讨桂阳王刘休范。其符檄似已不存。事平，巨源望有封赏，既而不获，于是作《与尚书令袁粲

书》以诉怨言。见《南齐书》本传。

刘休范举兵反叛后作《与袁粲褚渊刘秉书》。见《宋书》本传。

萧道成作《与褚渊袁粲书》。见《南齐书·褚渊传》。按:萧道成在平定桂阳王反叛后,迁中领军,领南兖州,增户邑,重权在掌,为平息众疑,固让不受,遂作此书。褚渊有《答萧领军书》。

王珪之开始纂集古设官历代分职,后成《齐职仪》五十卷。见《南齐书·王珪之传》。

陆澄五十岁。范云二十四岁。王俭二十三岁。陶弘景十九岁。萧长懋十七岁。刘绘十七岁。萧子良十五岁。任昉十五岁。刘峻十三岁。萧衍十一岁。谢朓十一岁。丘迟十一岁。王僧孺十岁。柳恽十岁。徐勉九岁。王融八岁。吴均六岁。裴子野六岁。陆倕五岁。徐摛四岁。殷芸四岁。周捨四岁。陆厥三岁。

元徽三年(475)乙卯

张率生。《梁书》本传:"张率字士简,吴郡吴人。祖永,宋右光禄大夫。父瓌,齐世显贵,归老乡邑。天监初授右光禄,加给事中。"张率卒于梁大通元年,五十三岁,上推生于本年。

徐爰卒,时年八十二岁。沈约对他颇多微词,列之于《宋书·恩幸传》,以其"巧于将迎"、"长于附会,又饰以典文"故也。今存诗二首,文二十四篇。

沈约三十五岁,客居郢州,作《栖禅精舍铭并序》。见《广弘明集》。

江淹三十二岁,仍在吴兴。作《草木颂》、《采石上菖蒲》、《待罪江南思北归赋》、《泣赋》、《赤虹赋》、《四时赋》、《山中楚辞》等。

详《年代考》。

张融三十二岁，奔叔父张永丧。以故免官，寻复位，摄祠、仓部二曹。按《宋书·张永传》："三年卒，时年六十六。"

任昉十六岁，为丹阳尹刘秉辟为主簿。见《梁书》本传。

陆澄五十一岁。王僧虔五十岁。谢朏三十五岁。孔稚珪二十九岁。范云二十五岁。王俭二十四岁。陶弘景二十岁。萧长懋十八岁。刘绘十八岁。萧子良十六岁。刘峻十四岁。萧衍十二岁。谢朓十二岁。丘迟十二岁。王僧孺十一岁。柳恽十一岁。徐勉十岁。王融九岁。刘勰九岁。吴均七岁。裴子野七岁。陆倕六岁。徐摛五岁。殷芸五岁。周捨五岁。陆厥四岁。

元徽四年(476)丙辰

七月，建平王**刘景素**举兵反叛，旋即被杀。

王僧虔五十一岁。十月，以吏部尚书迁至散骑常侍、尚书右仆射。见《南齐书》本传及《宋书·后废帝纪》。

江淹三十三岁，仍为建安、吴兴令。刘景素败后回到京城。作《杂三言》、《石劫赋》、《翡翠赋》、《青苔赋》、《恨赋》、《别赋》、《倡妇自悲赋》等。详《年代考》。

张融三十三岁，为南阳王刘翙友。见《南齐书》本传。按《宋书·南阳王传》："元徽四年，年六岁，封南阳王，食邑二千户。"

王俭二十五岁，时为司徒右长史，作《公府长史朝服议》等。见《宋书·礼志》。

萧长懋十九岁，随其父萧赜居郢州。萧赜时为晋熙王镇西长史、江夏内史，行郢州事。见《南齐书·武帝纪》。

王智深被建平王刘景素辟为西曹书佐，未到职而景素败，后解褐徐州祭酒。见《南齐书》本传。

虞玩之在本年五月上《陈时事表》，指摘时弊，颇中肯綮。详《宋书》本传及《后废帝纪》。

陆澄五十二岁。沈约三十六岁。谢朏三十六岁。孔稚珪三十岁。范云二十六岁。陶弘景二十一岁。刘绘十九岁。萧子良十七岁。任昉十七岁。刘峻十五岁。萧衍十三岁。谢朓十三岁。丘迟十三岁。王僧孺十二岁。柳恽十二岁。徐勉十一岁。王融十岁。刘勰十岁。吴均八岁。裴子野八岁。陆倕七岁。徐摛六岁。殷芸六岁。周捨六岁。陆厥五岁。张率二岁。

元徽五年，宋顺帝昇明元年(477)丁巳

七月，**萧道成**使人杀宋帝刘昱，立安成王刘准，是为宋顺帝，改元昇明元年。十二月，荆州刺史沈攸之起兵反萧道成。司徒袁粲等据石头城反萧道成，未几败死。

到沆生。《梁氏》本传："到沆字茂瀣，彭城武原人也。曾祖彦之，宋将军。父㧑，齐五兵尚书。"沆卒于梁天监五年，三十岁，上推生本年。

到洽生。《梁书》本传："到洽字茂㳂，彭城武原人也。宋骠骑将军彦之曾孙。祖仲度，骠骑江夏王从事中郎。父坦，齐中书郎。"洽卒于梁大通元年，时年五十一岁，上推生于本年。

陆静修卒。时年七十二岁。见刘汝霖《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

王僧虔五十二岁，七月任尚书仆射。十二月为中书令、尚书左仆射。见《南齐书》本传及《宋书·顺帝记》。

沈约三十七岁，仍居郢州，得以与萧赜、萧长懋父子相过从。

谢朏三十七岁，与褚炫、刘俣、江斅等入殿侍文义，号曰"四友"。见《南齐书·褚炫传》。

江淹三十四岁，时居京城，为萧道成骠骑参军事，尚书驾部郎。作《还故园》、《到功曹参军笺诣骠骑竟陵王》、《萧领军拜侍中刺史章》、《萧领军让司空并敦劝表》、《萧骠骑让油幢表》、《萧骠骑录尚书事到省表》、《拜正员郎表》、《萧骠骑让封第二表》、《萧骠骑让封第三表》、《萧骠骑让豫司二州表》、《知己赋》、《尚书符》、《萧骠骑发徐州三五教》等。详《年代考》。

张融三十四岁，以父敌王玄谟之子王瞻同为南阳王掾属，请求去官，不许。见《南齐书》本传。按：融父张畅先为丞相长史，义宣事难，张畅为王玄谟所录，将杀之。本年，刘翙进号前将军，王瞻为前军长史，融亦同僚，故有此请。

孔稚珪三十一岁，为萧道成记室参军，与江淹对掌辞笔，以文翰见赏。迁正员郎、中书郎、尚书令丞。见《南齐书》本传。

范云二十七岁。其父范抗仍在郢州任职，府主为武陵王刘赞。范云为西曹书佐，法曹行参军。见《梁书》本传。

陶弘景二十二岁，为萧道成诸王侍读。按：《梁书》本传称"未弱冠，齐高帝作相，引为诸王侍读。"萧道成作相是在本年七月，陶弘景二十二岁，已逾弱冠之后。因此，"未弱冠"三字疑误。

萧长懋二十岁，授辅国将军，迁晋熙王抚军主簿。见《南齐书》本传。按《宋书·顺帝纪》，刘燮本年七月为抚军将军、扬州刺史。

萧子良十八岁，随其父兄萧赜、萧长懋同守盆城，被任为宁朔将军，又为邵陵王刘友左军行参军。见《南齐书》本传。

裴子野九岁，祖母亡，泣血哀恸。见《梁书》本传。

谢超宗年末为义兴太守。见《南齐书》本传。

卞彬作童谣记述时事，《南齐书》本传云："宋元徽末，四贵辅政。彬谓太祖曰：'外间有童谣云：可怜可念尸著服，孝子不在

日代哭，列管暂鸣死灭族。公颇闻不？'时王蕴居父忧，与袁粲同死，故云尸著服也。服者衣也，褚字边衣也。孝除子，以日代者，谓褚渊也。列管，萧也。彬退，太祖笑曰：'彬自作此。'"据《南齐书·高帝纪》，"四贵"指萧道成、袁粲、褚渊、刘秉。又据《南史·袁粲传》，袁粲举兵反萧道成，褚渊发其谋，粲兵败遇害，而褚渊独辅政。"于时百姓语曰：'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

丘巨源作《为尚书符荆州》、《驰檄数沈攸之罪恶》。见《南齐书》本传："沈攸之事，太祖使巨源为尚书符荆州。巨源以此又望赏异，自此意常不满。"按：前文见《南齐书·柳世隆传》，后文见《宋书·沈攸之传》。

沈攸之作《西乌夜飞》五曲、《遗萧道成书》。见《乐府诗集》卷四十九及《南齐书·张敬儿传》。按：此诗书颇可诵读。

周颙为萧道成作《报沈攸之书》。见《南齐书》本传及《张敬儿传》。

其时，声乐特盛，太平雅郑，共有千余人。后堂杂技，不在其数。见《太平御览》卷五六九所引《宋书》。《南齐书·崔祖思传》也称：宋后废帝时，"户口不能百万，而太乐雅郑，元徽时校试，千有余人。后堂杂技，不在其数。"《通典》卷一四一引裴子野《宋略》论及宋末歌舞之盛："王侯将相，歌伎镇室；鸿商富贾，舞女成群，竞相夸大，互有争夺，如恐不及，莫为禁令。"裴氏称之"伤风败俗，莫不在此。"因此之故，王僧虔特于下年上表要求统一整理。

陆澄五十三岁。王俭二十六岁。刘绘二十岁。任昉十八岁。刘峻十六岁。萧衍十四岁。谢朓十四岁。丘迟十四岁。王僧孺十三岁。柳恽十三岁。徐勉十二岁。王融十一岁。刘勰十

一岁。吴均九岁。陆倕八岁。徐摛七岁。殷芸七岁。周捨七岁。陆厥六岁。张率三岁。

昇明二年(478)戊午

正月，**沈攸之**败归自缢。二月，加萧道成太尉、都督南徐等十六州军事。九月，进萧道成假黄钺、大都督中外军事、太傅、领扬州牧。

萧子恪生。《梁书》本传："萧子恪字景冲，兰陵人，齐豫章文献王嶷第二子也。"子恪卒于梁大通三年，五十二岁，上推生本年。

王僧虔五十三岁，任尚书令，以飞白书题尚书省壁来警诫自己曰："圆行方止，物之定质，修之不已则溢，高之不已则慄，驰之不已则蹶，引之不已则迭，是故去之宜疾。"见《南齐书》本传。按《南齐书·王延之传》载：萧道成辅政，"朝野之情，人怀彼此。延之与尚书令王僧虔中立无所去就。时人语曰：二王居平，不送不迎。"又作《乐表》，详细描述了当时"家竞新哇，人尚淫俗"的社会风尚。见《宋书·乐志》。

谢朏三十八岁，为萧道成骠骑长史、太尉长史、带南东海太守。见《梁书》本传。又《宋书·符瑞志》亦载本年谢朏任职于南东海。按：本年十月，萧道成立皇后谢氏，即谢庄之孙女，亦即谢朏侄女。谢朏于宋齐之交日益显贵，多赖这种皇亲国戚的关系。

江淹三十五岁，作《萧骠骑祭石头战亡文》、《萧骠骑筑新亭垒埋枯骨表》、《萧骠骑上顿表》、《萧骠骑庆平贼表》、《慰劳雍州诏》、《萧骠骑解严输黄钺表》、《卧疾怨别刘长史》、《惜春晚应刘秘书》、《宋故安成王右常侍刘乔墓志铭》、《萧骠骑谢甲仗入殿表》、《萧太尉上便宜表》、《萧骠骑让太尉增封第二表》、《萧骠骑

让太尉增封第三表》、《让太傅扬州牧表》、《萧重让扬州牧表》、《后让太傅扬州牧表》、《萧拜太尉扬州牧表》、《萧太傅谢追赠父祖表》、《萧太尉子侄为领军江州兖州豫州淮南黄门谢启》、《萧上铜锺芝草众瑞表》、《萧让剑履殊礼表》、《萧被侍中敦劝表》、《萧被尚书敦劝重让表》等。详见《年代考》。

张融三十五岁，为萧道成召为太傅掾。见《南齐书》本传。

范云二十八岁。上年末被沈攸之俘获，被迫送书入郢，有人要求杀之，赖柳世隆求免。除员外散骑郎。见《南史》本传。

王俭二十七岁，迁长兼侍中，又为太尉右长史、左长史，颇得萧道成器重。建议加萧道成太傅、假黄钺，并让中书舍人虞整作诏。见《南齐书》本传及《资治通鉴》。

萧长懋二十一岁，随父还都。见《南齐书》本传。

刘绘二十一岁，解褐著作郎，为萧道成太尉行参军。八月，又为豫章王萧嶷左军主簿，随镇江陵。见《南齐书》本传。

萧子良十九岁，为邵陵王刘友主簿、安南记室参军、安南长史。见《南齐书》本传。

谢超宗罢义兴太守，为萧道成辟为骠骑主簿。见《南齐书》本传。

刘祥为萧道成东阁祭酒、骠骑主簿。见《南齐书》本传。

丘灵鞠为正员郎，领本郡中正，为萧道成掌诏策。见《南齐书》本传。

贾渊为萧道成骠骑将军、武陵王国郎中令。未行，仍为义兴郡丞。见《南齐书》本传。

何昌寓作《与萧骠骑启理建平王景素》。见《南齐书》本传。

陆澄五十四岁。沈约三十八岁。孔稚珪三十二岁。陶弘景二十三岁。任昉十九岁。刘峻十七岁。萧衍十五岁。谢朓十五

岁。丘迟十五岁。王僧孺十四岁。柳恽十四岁。徐勉十二岁。王融十二岁。刘勰十二岁。吴均十岁。裴子野十岁。陆倕九岁。徐摛八岁。殷芸八岁。周舍八岁。陆厥七岁。张率四岁。到沆二岁。到洽二岁。

昇明三年·齐高帝建元元年(479)己未

三月,以萧道成为相国,总百揆,封齐公,加九锡。四月,进爵为齐王,继而即皇帝位,是为齐太祖高皇帝。以宋帝为汝阴王,旋杀之,追谥宋顺帝。宋亡。六月,立皇太子萧赜。

刘杳生。《梁书》本传:"刘杳字士深,平原平原人也。祖乘民,宋冀州刺史。父闻慰,齐东阳太守,有清绩。"又载:刘杳"大同二年卒官,时年五十。"依此上推,其生于齐永明五年(487)。但此说恐未确。《梁书》、《南史》本传并称其"十三丁父忧。"考《南齐书·刘怀慰传》(怀慰本名闻慰。齐武帝即位,以与舅氏名同,敕改之),刘怀慰卒于齐永明九年,年四十五。其时刘杳十三岁,上推生本年。

阮孝绪生。《梁书》本传:"阮孝绪字士宗,陈留尉氏人也。父彦之,宋太尉从事中郎。"孝绪卒于大同二年,五十八岁,上推生本年。所著《七录》名闻于世。

陆澄五十五岁,以故被任遐、褚渊弹劾。作《上表自理》。萧道成下诏:"澄表据多谬,不足深劾,可白衣领职。"见《南齐书》本传。

王僧虔五十四岁,转侍中、抚军将军、丹阳尹。见《南齐书》本传。

沈约三十九岁,为征虏将军萧长懋记室,带襄阳令。见《梁书》本传及沈约《与徐勉书》,作《为柳世隆让封公表》。按《南齐

书·柳世隆传》：柳世隆本年四月“进爵为公。”

谢朏三十九岁。正月为侍中，领秘书监。以家贫乞郡，辞旨抑扬，诏免官禁锢五年。见《梁书》本传。

江淹三十六岁。三月补记室参军。六月为骠骑豫章王记室，带东武令。寻迁中书侍郎。参掌诏册，并典国史。见《梁书》本传。作《萧让前部羽葆鼓吹表》、《谢开府辟召表》、《萧让太傅相国齐公十郡九锡表》、《第二表》、《萧太傅辞舆驾亲幸表》、《被百僚敦劝受表》、《萧拜相国齐公十郡九锡章》、《萧太傅东耕咒文》、《萧相国让进爵为王第二表》、《萧相国拜齐王表》、《齐王谢冕旒诸法物表》、《断募士诏》、《赐赦交州诏》、《封江冠军等诏》、《遣大使巡诏》等。详《年代考》。

张融三十六岁，为长沙王萧晃镇军。是年前后编《玉海》。别集而有专名，始自此书。见《南齐书》本传。

孔稚珪三十三岁，为散骑侍郎，与何点、谢瀹为莫逆之交。见《梁书·何点传》。又为褚伯玉立碑。见《南齐书·褚伯玉传》。

范云二十九岁，随闻喜公萧子良在会稽，宠冠府朝。见《梁书》本传。

王俭十八岁，迁尚书右仆射，领吏部，封南昌县公。作《策齐公九锡文》、《策命齐王》、《再命玺书》、《与豫章王嶷笺》、《郊殷议》、《朝堂讳训议》等。参见《南齐书》本传、《礼志》、《豫章王传》及任昉《王文宪集序》等。又《通鉴》载，五月，萧道成赏佐命之功，“褚渊、王俭等进爵，增户各有差。处士何点谓人曰：‘我作《齐书》已竟，赞云：渊既世族，俭亦国华；不赖舅氏，遑恤国家！’点，尚之孙也。渊母宋始安公主，继母吴郡公主；又尚巴西公主。俭母武康公主；又尚阳羡公主，故点云然。”

萧长懋二十二岁，六月，被封为南郡王。江左未有嫡皇孙封

王，其例始自此也。见《南齐书》本传。

刘绘二十二岁。正月，为豫章王嶷镇西外兵曹参军。六月，为骠骑主簿。见《南齐书》本传。

萧子良二十岁，为使持节、都督会稽、东阳、临海、永嘉、新安五郡、辅国将军、会稽太守，又封闻喜县公。作《请停台使检课表》等。见《南齐书》本传。按：萧道成即位后，命萧映、萧晃分镇兖、豫，命萧嶷镇扬州。胡三省注《通鉴》云："江左之势，莫重于上流，莫富于东土，故又分布子孙以居之。"

谢超宗作《明堂夕牲辞》、《庙乐歌诗》等。见《南齐书》本传及《乐志》。本传称："有司奏撰立郊庙歌，敕司徒褚渊，侍中谢朏、散骑侍郎孔稚珪、太学博士王咺之、总明学士刘融、何法冏（《南史》作"图"）、何昙秀十人并作，超宗辞独见用。"其时，超宗为黄门郎，为人仗才使酒，多所陵忽，以失仪出为南郡王中军司马。超宗怨望，谓人曰："我今日政应为司驴。"为省司所奏，以怨望免官，禁锢十年。见《南齐书》本传。

王逡之时为著作郎，兼尚书左丞，参定仪礼。作《锡辂议》、《难王俭〈古今丧服集记〉》，更撰《世行》五卷。见《南齐书》本传。

崔祖思作《陈政事启》八章，时为给事黄门侍郎。见《南齐书》本传。

刘善明作《上表陈事》、《贤圣杂语》，时为淮南、宣城太守，提出"宜时择才辩，北使匈奴。"见《南齐书》本传。

裴叔业《上书献谠言》。见《南齐书》本传。

刘思效《上齐高帝表陈谠言》。见《南齐书·顾欢传》。

李安民作《断募部曲表》。见《资治通鉴》。

刘祥为武陵王冠军征虏功曹，徐正员外。见《南齐书》本传。按《南齐书·高帝纪》，萧晔本年为武陵王、冠军将军、征虏将军。

周颙初为齐台殿中郎，后为长沙王萧晃参军、后军参军、山阴令。作《言滂民闻喜公子良》，极言滂民的困苦　见《南齐书》本传。

丘灵鞠转中书郎、中正如故，敕知东宫手笔，寻又掌知国史。见《南齐书》本传。

丘巨源为尚书主客郎，领军司马、越骑校尉。除武昌太守，拜竟，不乐江外行，复为余杭令。见《南齐书》本传。

伏曼容为辅国长史、南海太守，至玉门而作《贪泉铭》，佚。见《南史》本传。

卞彬咏诗忤怒萧道成，摈废数年不得进。又拟赵壹《穷鸟》为《枯鱼赋》以喻意。见《南史》本传。

褚渊作《为宋顺帝禅位齐王诏》。见《南齐书·高帝纪》。

袁彖作《赠庾易诗》。见《南史·庾易传》。

萧道成倡导儒学，崇尚文学，世风随之而变。元嘉十六年立儒学馆，萧道成曾就学于雷次宗。上台伊始，他向当时名儒刘瓛问为政之道，以为"儒者之言可宝万世。"他又启用王俭为辅佐，重要原因在于王俭长于经礼。所有这些，对世风颇有影响，"是以儒学大振"(赵翼《廿二史劄记》)。这便与大明、泰始中之玄风特盛颇有不同。萧道成本人又爱好文艺，曾与书法大家王僧虔试比高低(见《南齐书·王僧虔传》)。又诏东观学士撰《史林》三十篇，亚迹于《皇览》(《南史》本纪)。其诗亦"词藻意深，无所玄少"(钟嵘《诗品》)。

陶弘景二十四岁。任昉二十岁。刘峻十八岁。萧衍十六岁。谢朓十六岁。丘迟十六岁。王僧孺十五岁。柳恽十五岁。徐勉十四岁。王融十三岁。刘勰十三岁。吴均十一岁。裴子野十一岁。陆倕十岁。徐摛九岁。殷芸九岁。周捨九岁。陆厥八

岁。张率五岁。到溉三岁，到洽三岁。萧子恪二岁。

建元二年(480)庚申

王籍生。《梁书》本传："王籍字文海，琅琊临沂人。祖远，宋光禄勋，父僧佑，齐骁骑将军。"王籍卒年，史传未载。萧绎中大通六年(534)作《法宝联璧序》称王籍时年五十五岁，上推生于本年。

陆澄五十六岁，转给事中、秘书监，迁吏部。见《南齐书》本传。

王僧虔五十五岁，进号左卫将军，固让不拜。改授左光禄大夫。作《请禁上汤杀囚疏》。见《南齐书》本传。按：上汤杀囚是指用毒药鸩杀囚犯。

沈约四十岁，作《为南郡王让中军表》、《为南郡王舍身疏》、《和王卫军解讲》等。南郡王，即萧长懋，本年为中军将军。又《舍身疏》中有"储妃阐膺祥之符"一语，储妃裴氏，南郡王萧长懋之母，本年七月卒。铃木虎雄《沈约年谱》以为此文本年作。王卫军，即王僧虔，本年进号左卫将军。考见郝立权《沈休文诗注》。

江淹三十七岁，作《大赦诏》、《何詹事为吏部尚书诏》、《北伐诏》、《曲赦丹阳等四郡诏》、《王仆射为左仆射诏》、《王抚军为安东吴兴诏》、《王侍中为南蛮校尉诏》、《萧冠军进号征虏诏》、《王光禄为征南湘州诏》、《步桐台》、《王仆射为太子詹事诏》、《王仆射加兵诏》等。见《年代考》。

范云三十岁，为闻喜公萧子良丹阳尹主簿，极得亲任。见《梁书》本传。

王俭二十九岁，为尚书左仆射、侍中、太子詹事。作《让左仆

射表》。又,《太子迎车驾临丧议》、《宫臣为太子妃服议》、《太子妃铭旌议》、《太子妃甍建旐议》、《太子妃灵还在道不设祭议》、《国臣为太子妃服议》等,为本年七月皇太子萧赜妃裴氏卒后所作。见《南齐书·礼志》、《文惠太子传》等。又作《谏省南豫州启》。见《南齐书·州郡志》。又与褚渊、王僧虔连名上《谏起宣阳门表》。见《南齐书》本传。又,江东多不闲隶书,不识秦汉文字,王俭识之。见《南齐书·五行志》:"建元二年夏,庐陵石阳县长溪水冲激山麓崩,长六七丈,下得柱千余口,皆十围,长者一丈,短者八九尺,头题有古文字,不可识。江淹以问王俭,俭云:'江东不闲隶书,此秦汉时柱也。'"按:其时,襄阳有盗发楚王冢,有十余枚竹简,王僧虔以为是科斗书《考工记》,为《周官》所缺之文。见《南齐书·文惠太子传》。看来,王僧虔、王俭叔侄确为博学之士。所以任昉《王文宪集序》载:"自朝章国纪,典彝备物,奏议符策,文辞表记,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等皆取定于王俭。

萧长懋二十三岁,为侍中、中军将军,置府镇石头。七月,母卒,解侍中,移镇西州。见《南齐书》本传。

刘绘二十三岁,为豫章王萧嶷司空记室录事,随之还京。见《南齐书》本传。

萧子良二十一岁,仍为征虏将军、丹阳尹。见《南齐书》本传。

刘善明作《与崔祖思书》。见《南齐书》本传。祖思本年为青冀二州刺史,刘善明遗书叙旧,情理兼善,写得极为出色,不可多得。又作《上表陈事》以谏起宣阳门。见《南史》本传。

周颙时为萧长懋中军录事参军。见《南齐书》本传。

萧嶷在南蛮园开馆立学,置生四十人(《南史》作三十人),又有儒林参军一人,文学祭酒一人,劝学从事二人,行释菜礼。见

《南齐书》本传。

丘灵鞠为镇南长史、寻阳相。见《南齐书》本传。

檀超与**江淹**掌史职，作《上表立国史条例》。袁彖有《驳檀超国史条例议》、王俭有《国史条例议》等。见《南齐书·檀超传》及《袁彖传》。

王逡之上表立学，见《南齐书》本传。

虞玩之作《黄籍革弊表》。文中有"今建元元年书籍，宜更立明科"云云，《通鉴》系于本年。又作《上表告退》。文中有"臣生于晋，长于宋，老于齐，世历三代，朝市再易。臣以元嘉二十八年为王府行佐，于兹三十年矣。……年过六十，为不夭矣"，从元嘉二十八年至本年整三十年。又史传载其永明八年致仕，古人七十而致仕。时年虞玩之正七十岁。则《上表告退》作于本年无疑。虞氏又有《陈时事表》，与前两篇一样，均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并见《南齐书》本传。

谢朏四十岁。张融三十七岁。孔稚珪三十四岁。陶弘景二十五岁。任昉二十一岁。刘峻十九岁。萧衍十七岁。谢朓十七岁。丘迟十七岁。王僧孺十六岁。柳恽十六岁。徐勉十五岁。王融十四岁。刘勰十四岁。吴均十二岁。裴子野十二岁。陆倕十一岁。徐摛十岁。殷芸十岁。周舍十岁。陆厥九岁。张率六岁。到沆四岁。到洽四岁。萧子恪三岁。刘杳二岁。

建元三年(481)辛酉

刘孝绰生。《梁书》本传："刘孝绰字孝绰，彭城人，本名冉。祖勔，宋司空忠昭公。父绘，齐大司马霸府从事中郎。"孝绰卒于梁大同五年，五十九岁，上推生于本年。

王筠生。《梁书》本传："王筠字元礼，一字德柔，琅琊临沂

人。祖僧虔，齐司空简穆公。父楫，太中大夫。"筠卒于梁太清三年，六十九岁，上推生于本年。

沈约四十一岁，作《为柳兖州世隆上旧宫表》。见《艺文类聚》卷六十二。按：柳世隆本年正月为南兖州刺史。

江淹三十八岁，作《柳仆射为南兖州诏》。柳仆射，即柳世隆。

王俭三十岁，为散骑常侍。作《请解领选表》、《太子妃丧遇闰议》、《答褚渊难丧遇闰议书》（褚渊有《难王俭丧遇闰议》）、《答王逡书》、《穆太妃小祥南郡王应不相待议》等。见《南齐书》本传、《礼志》、《萧子良传》等。

萧子良二十二岁，作《修治塘遏表》。始制东宫官僚以下官敬子良。见《南齐书》本传。

到沆五岁，能讽诵古诗。见《梁书》本传。

刘瓛为会稽郡丞，为武陵王、会稽太守萧晔讲五经。学徒从之转众。见《南齐书》本传。

刘祥为武陵王冠军征虏功曹，除正员外。见《南齐书》本传。

谢超宗为释道慧作碑铭。见《高僧传·释道慧传》。

褚渊上臧荣绪所撰《晋书》。见刘汝霖《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

陆澄五十七岁。王僧虔五十六岁。谢朏四十一岁。张融三十八岁。孔稚珪三十五岁。范云三十一岁。陶弘景二十六岁。萧长懋二十四岁。刘绘二十四岁。任昉二十二岁。刘峻二十岁。萧衍十八岁。谢朓十八岁。丘迟十八岁。王僧孺十七岁。柳恽十七岁。徐勉十六岁。王融十五岁。刘勰十五岁。吴均十三岁。裴子野十三岁。陆倕十二岁。徐摛十一岁。殷芸十一岁。周舍十一岁。陆厥十岁。张率七岁。到洽五岁。萧子恪四

岁。刘杳三岁。王籍二岁。

建元四年(482)壬戌

正月，立国学。三月，齐高帝萧道成死。皇太子萧赜嗣之，是为世祖武皇帝。六月，立皇太子萧长懋，封萧子良为竟陵王。

刘苞生。《梁书》本传："刘苞字孝尝，彭城人也。祖勔，宋司空。父愃，齐太子中庶子。"苞卒于梁天监十年，三十岁，上推生于本年。

陆澄五十八岁，复为秘书监，领国子博士。见《南齐书》本传。

王僧虔五十七岁。九月，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固辞，又为侍中、特进、左光禄大夫。见《南齐书》本传。

沈约四十二岁，为步兵校尉，管书记，直永寿省，校四部图书，复为太子家令，始撰《齐史》。见《梁书》本传及《宋书·自序》。作《竟陵王造释迦像记》、《为文惠太子解讲疏》等。年月见文中记载。

江淹三十九岁，作《立学诏》、《王镇军为中书令右光禄诏》、《张令为太常领国子祭酒诏》、《应刘豫章别》、《齐太祖高皇帝诔》等。详《年代考》。

孔稚珪三十六岁，作《褚先生百玉碑》。年末丁父忧去职。见《南齐书》本传。按：孔灵产卒年史无明载，但史传记载是在王敬则为会稽太守期间。王敬则本年出为会稽太守。褚渊卒于八月，孔稚珪为作碑文，则其父丧至少在本年八月以后。

范云三十二岁，为文惠太子刑狱参军事，领主簿，迁尚书殿中郎。见《梁书》本传。

王俭三十一岁，为侍中、尚书令、镇军将军。齐武帝即位，给

班剑二十人。作《嗣位郊祀议》、《谅闇议》、《昭皇后迁祔仪议》、《迁祔设虞议》、《单拜录尚书优策议》、《司空未拜而薨掾属为吏敬议》、《高帝哀策文》、《太宰褚彦回碑文》等。见《南齐书》本传、《礼志》及《文选》。又广集才学之士，总校虚实，类物隶之，谓之隶事，自此始也。见《南史·王湛传》、《孔逷传》、《何宪传》等。时人呼孔逷、何宪为王俭三公。

陶弘景二十七岁，为宜都王侍读，总知管记。见萧纶《隐居贞白先生陶君碑》。

萧长懋二十五岁，初为征北将军，南徐州刺史。武帝即位，被立为太子。见《南齐书》本传。

刘绘二十五岁，为太子洗马、大司马谘议。因文惠太子萧长懋与豫章文献王萧嶷素不和，刘绘处于夹缝中，故苦求外任，复加南康相。见《南齐书》本传。

萧子良二十三岁，被封竟陵郡王，任镇北将军，南徐州刺史。见《南齐书》本传。

萧衍十九岁。其父萧顺之颇受齐武帝忌惮，未能高居台辅。故萧衍在永明时代政治上抑郁不得志。见《南史·梁本纪》。

谢朓十九岁，解褐豫章王萧嶷太尉行参军。见《南齐书》本传。按：萧嶷本年三月份为太尉。

谢超宗掌国史，除竟陵王征北谘议参军，领记室。见《南齐书》本传。

周颙为萧长懋征北府掾，随入东宫。见《南齐书》本传。

丘灵鞠转通直常侍，领东观祭酒。自称："久居官不愿数迁，使我终身为祭酒，不恨也。"见《南齐书》本传。

傅映泛览记闻，有文才而不以篇什自命，与刘绘、萧琛等友善。刘绘为南康相，傅映为府丞，文教多令具草。见《梁书》本

传。

范岫亦为东宫学士，为沈约、范云所钦服。见《梁书》本传。传称："岫文虽不逮约，而名行为时辈所与，博涉多通，尤悉魏晋以来吉凶故事，约常称曰：'范公好事该博，胡广无以加。'南乡范云谓人曰：'诸君进止威仪，当问范长史。'以岫多识前代旧事也。"

谢朓四十二岁。张融三十九岁。任昉二十三岁。刘峻二十一岁。丘迟十九岁。王僧孺十八岁。柳恽十八岁。徐勉十七岁。王融十六岁。刘纆十六岁。吴均十四岁。裴子野十四岁。陆倕十三岁。徐摛十二岁。殷芸十二岁。周捨十二岁。陆厥十一岁。张率八岁。到沆六岁。到洽六岁。萧子恪五岁。刘杳四岁。王籍三岁。刘孝绰二岁。王筠二岁。

齐武帝永明元年(483)癸亥

正月，改元永明元年。

谢超宗被杀。见《南齐书》本传。按：本年张敬儿被杀后，谢超宗说："往年杀韩信，今年杀彭越。"武帝怀疑超宗轻慢，遂使御史中丞袁彖作《奏劾谢超宗》。王逡之又作《奏劾谢超宗、袁彖》。超宗被流放越州，路上被赐死。子谢几卿。《梁书·文学传》有传。

陆澄五十九岁，转度支尚书，寻领国子博士。作《与王俭书》谓国学不应置《孝经》。见《南齐书》本传。按：其时国学置郑、王《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麋氏《谷梁》，郑玄《孝经》。王俭自以博闻多识，读书过澄，素来不把陆澄放在眼里。《南齐书·王俭传》载，建元初，"上曲宴群臣数人，各使效伎艺，褚渊弹琵琶，王僧虔弹琴，沈文季歌《子夜》，张敬儿舞，王敬则拍张。俭

曰：'臣无所解，唯知诵书。'因跪上前诵相如《封禅书》。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后上使陆澄诵《孝经》，自'仲尼居'而起。俭曰：'澄所谓博而寡要，臣请诵之。'"又《南齐书·陆澄传》载："澄当世称为硕学，读《易》三年不解文义，欲撰《宋书》竟不成，王俭戏之曰：'陆公，书厨也。'"

沈约四十三岁，作《为齐竟陵王发讲疏》。见《广弘明集》。年月日见载于文中。又作《为褚炫让吏部尚书表》。见《艺文类聚》卷四十八。褚炫本年为吏部尚书。又作《为长城公主谢表》。见《艺文类聚》卷五十一。长城公主为齐武帝女。

谢朏四十三岁，起家拜通直散骑常侍。参与编修《永明元年秘阁四部目录》。见《梁书》本传及阮孝绪《七录序》。按：谢朏在建元元年得罪齐高帝萧道成，武帝当年曾奏表要求处死，后仅免官禁锢五年。

江淹四十岁，迁骁骑将军，仍掌国史。后出为建武将军、庐陵内史。见《梁书》本传。按：本传称其"视事三年，还为骁骑将军，兼尚书左丞。"检《南史》本传："永明三年兼尚书左丞。"知本年外任。作《褚侍中为征北长史诏》、《感春冰遥和谢中书》等。褚侍中，褚炫，时诏为竟陵王征北长史。谢中书，谢瀹。详《年代考》。

张融四十岁，为竟陵王征北谘议参军。见《南齐书》本传。

范云三十三岁，随竟陵王镇南兖州，每陈朝政得失。见《南史》本传。

王俭三十二岁，进号卫将军，参掌选事。作《立春在郊无烦迁日启》、《日蚀废社议》等。见《南齐书》本传及《礼志》。

萧子良二十四岁，为侍中，都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征北将军、南兖州刺史。见《南齐书》本传。

萧衍二十岁，为王俭东阁祭酒。见《梁书》本传。

谢朓二十岁，作《为王敬则谢会稽太守启》。见《艺文类聚》卷六。按：文称"陛下继历胜统，日月重光，"知为武帝即位初所作。《南齐书·王敬则传》："太祖遗诏敬则以本官领丹阳尹，寻迁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会稽东阳新安临海永嘉五郡军事、镇东将军、会稽太守。永明二年给鼓吹一部。"

柳恽十九岁，为竟陵王征北府法曹行参军。见《梁书》本传。

徐勉十八岁，被召为国子生。见《梁书》本传。

王融十七岁，作《赠族叔卫军俭诗》。见《文馆词林》卷一五二。

柳世隆作《奏省流寓民户帖》。见《南齐书·州郡志》。

周颙作《驳伏曼容车旂尚色议》。见《南齐书·舆服志》。按：伏曼容有《车旂议》。

张充作《与王俭书》，辞旨激扬，为到㧑所纠，免官禁锢。见《南齐书·张绪传》、《梁书·张充传》。

刘祥迁长沙王晃镇军谘议参军，撰《宋书》指斥禅代，王俭密以启闻。武帝暂夫追究。见《南齐书》本传。按：刘祥好文学，性刚疏。建元初，褚渊位高权重，入朝以腰扇障目，刘祥讥讽道："作如此举止，羞面见人，扇障何益？"褚渊怒斥道："寒士不逊！"刘祥不甘示弱："不能杀袁刘，安得免寒士。"袁指袁粲，刘指刘秉。此二人与褚渊、萧道成在宋末被称为"四贵。"后褚渊协助萧道成杀此二人，故刘祥讥讽之。

刘瓛被萧子良召为征北司徒记室，不就，作《与张融王思远书》。见《南齐书》本传。

何昌寓为竟陵王文学。见《南齐书》本传。

王思远补竟陵王征北记室参军。见《南齐书》本传。

贾渊为尚书外兵郎。见《南齐书》本传。

顾欢被征为太学博士，不就，与孔稚珪等又论《四本》，作《三名论》。尚书刘澄、临川王常侍朱广之，并与之往返论难。见《南史》本传。

蔡约为竟陵王征北谘议。见《南齐书》本传。按：蔡约为蔡兴宗之子。

齐武帝作《估客乐》，使释宝月为配曲。宝月也有《估客乐》四曲。见《乐府诗集》卷四十八。按《通典》卷一四五载："《估客乐》者，齐武帝之所制也。布衣时尝游樊邓，登祚已后，追忆往事而作歌。""使太乐令刘瑶教习百日，无成。或启释宝月善音律，帝使宝月奏之，便就。敕歌者常重为感忆之声。梁改其名为《商旅行》。

王僧虔五十八岁。孔稚珪三十七岁。陶弘景二十八岁。萧长懋二十六岁。刘绘二十六岁。任昉二十四岁。刘峻二十二岁。丘迟二十岁。王僧孺十九岁。刘勰十七岁。吴均十五岁。裴子野十五岁。陆倕十四岁。徐摛十三岁。殷芸十三岁。周舍十三岁。陆厥十二岁。张率九岁。到沆七岁。到洽七岁。萧子恪六岁。刘杳五岁。王籍四岁。刘孝绰三岁。王筠三岁。刘苞二岁。

永明二年(484)甲子

伏挺生。《梁书》本传："伏挺字士标。父暅，为豫章内史。"齐末，萧衍率兵逼近建康，伏挺迎谒，时年十八，上推生于本年。

丘巨源被杀。见《南齐书》本传："高宗为吴兴，巨源作《秋胡诗》，有讥刺语，以事见杀。"按《南齐书·明帝纪》：永明二年"出为征虏将军，吴兴太守。"丘巨源诗今存《咏七宝扇诗》、《听邻妓诗》

等。

陆澄六十岁，作《南郊明堂异日议》。见《南齐书·礼志》。按：同时参议者还有江淹、王俭、王祐、刘蔓、蔡仲熊、顾宪之等。

沈约四十四岁，兼著作郎，撰起居注。又迁中书郎，司徒右长史，黄门侍郎。见《宋书·自序》及《梁书》本传。作《到著作省表》、《和竟陵王游仙诗》等。

张融四十一岁，为竟陵王司徒从事中郎、司徒左西掾。作《与豫章王笺请宥朱兼之》。见《南齐书》本传。按：《南齐书·朱兼之传》载："朱兼之吴郡钱塘人，所生母亡，假葬田侧，为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永明中手刃杀幼方，诣狱自系……别驾孔稚珪，兼记室刘琎、西徒左西掾张融笺与刺史豫章王"云云。孔稚珪本年为别驾。《朱兼之传》又载："豫章王言之世祖，时吴郡太守王慈、太常张绪、尚书陆澄，并表论其事"。检《南齐书·张绪传》，其为太常在永明元年、二年两年间。而张融为司徒左西掾必在二年以后，因萧子良本年正月位兼司徒。陆澄为度支尚书亦在永明元年、二年间。则知此文必作于本年。又，张融本年酒后出言不逊，为御史中丞到㧑所奏弹，免官。不久即复官。

孔稚珪三十八岁。服阕，为司徒从事中郎，州治中，别驾，从事史。见《南齐书》本传。

范云三十四岁，为竟陵王记室参军事。寻授通直散骑侍郎，领本州大中正。见《梁书》本传。

王俭三十三岁，领国子祭酒、丹阳尹，作《高德宣烈之乐歌辞》、《穆德凯容之乐歌辞》等。见《南齐书》本传及《礼志》。又，伏曼容本年上表，制定礼乐，武帝命王俭总其事，立治礼乐学士及职局，置旧学四人、新学六人、正书令史各一人、干一人、秘书省差能书弟子二人，因集前代，撰治五礼，吉、凶、宾、军、嘉也。"

此五礼至梁天监十一年始修成，前后历二十余年，详《南齐书·乐志》、《礼志》及《梁书·徐勉传》载徐勉《上修五礼表》。

萧子良二十五岁，为护军将军，兼司徒，领兵置佐，镇西州。作《陈时政密启》、《与沙门法献书》。见《南齐书》本传及《高僧传·僧远传》。

任昉二十五岁，为王俭主簿。见《梁书》本传。

萧衍二十一岁，为司徒竟陵王西阁祭酒。见《南齐书·礼志》。

徐勉十九岁，受知于王俭，每称勉有宰辅之量。见《梁书》本传及王僧孺《詹事徐府君集序》。

王融十八岁，为竟陵王法曹行参军，迁文惠太子舍人。作《求自试启》、《为王俭让国子祭酒表》等。见《南齐书》本传。

萧琛为丹阳尹王俭主簿。见《梁书》本传。按：本传称其梁中大通三年卒时五十二岁，依此推其生年，当在齐高帝萧道成建元二年。但这显然不可能。萧琛为竟陵八友之一，据考证，八友的结交时间大致在永明二年至五年前后，永明八年开始分散（详见上编第一章《从隔阂走向融合》）。永明二年，依《梁书》记载而推，萧琛不过五岁，永明八年才十一岁。竟陵八友中的其他人呢，即以永明八年为例：沈约五十、范云四十、任昉三十一、萧衍二十七、谢朓二十七、王融二十四、陆倕二十一。很难想象，年仅十一岁的萧琛居然能和这些著名文人交游。是为一。又《弘明集》收有萧琛所撰《难范缜〈神灭论〉》，当作于永明年间。其时，萧琛不过十岁上下，似亦不可能。是为二。又《梁书》本传载，永明九年，萧琛衔命北使桑乾。这年萧琛才十二岁，居然能担起使臣重任，也令人难以置信。总之，《梁书》所谓萧琛享年五十二岁的记载靠不住。胡适先生 1947 年 8 月 8 日在天津《大公报》“文

史周刊"上发表文章，以为五十二是七十二之误。李日华《范缜》一书(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以为五十二当是九十二之误，因为"七误作五是不容易的。"就是说萧琛死时既非五十二，亦非七十二，而是九十二。但这些只是推测，难以信据。曹道衡、沈玉成先生《中古文学丛考》有专文考证，认为永明初年，萧琛大约二十多岁，推断较合理。

刘祥为鄱阳王锵征虏府幕僚。见《南齐书》本传。按：萧锵本年进号征虏将军。

周颙为始兴王鉴前军谘议。见《南齐书》本传。按：萧鉴本年进号前将军。又，周颙本年为释玄畅制碑文。见《高僧传·释玄畅传》。

王思远为竟陵王录事参军。见《南齐书》本传。

丘灵鞠为骁骑将军，不乐武位，改正员常侍。见《南齐书》本传。

贾渊为竟陵王参军，撰《见客谱》。见《南齐书》本传。

王亮、**宗夬**亦随萧子良游，各见《梁书》本传。

蔡约为竟陵王记室、中书郎、司徒右长史、黄门郎。见《南齐书》本传。

陆慧晓先为始兴王前将军安西谘议，领冠军录事参军，后转为竟陵王司徒从事中郎。见《南齐书》本传。

范岫亦为竟陵王记室参军。见《梁书》本传。

纪德真作《造释迦石象记》。见《古刻丛钞》。年月见文中记载。

王僧虔五十九岁。谢朏四十四岁。江淹四十一岁。陶弘景二十九岁。萧长懋二十七岁。刘绘二十七岁。刘峻二十三岁。谢朓二十一岁。丘迟二十一岁。王僧孺二十岁。柳恽二十岁。

刘勰十八岁。吴均十六岁。裴子野十六岁。陆倕十五岁。徐摛十四岁。殷芸十四岁。周捨十四岁。陆厥十三岁。张率十岁。到沆八岁。到洽八岁。萧子恪七岁。刘杳六岁。王籍五岁。刘孝绰四岁。王筠四岁。刘苞三岁。

永明三年(485)乙丑

正月,复立国学。五月,省总明观。十月,皇太子讲《孝经》,释奠。

王僧虔卒,时年六十岁。见《南齐书》本传。有《论书》、《书赋》、《戒子书》等文。其书法"雄发于齐代",被庾肩吾《书品》评列为中上品。其书法以草书驰名。庾元威《论书》:"所学草书,宜以张融、王僧虔为则,体用得法,意气有余。"

沈约四十五岁,仍从游西邸。作《为南郡王侍皇太子释奠宴诗》二首。南郡王,皇孙萧昭业。同赋释奠诗者今存有王俭、萧子良、任昉、何胤、陆琏等人之作。

谢朓四十五岁,为司徒萧子良左长史。右长史为陆慧晓。见《南齐书·陆慧晓传》:"迁右长史。时陈郡谢朓为左长史,府公竟陵王谓王融曰:'我府二上佐,求之前世,谁可为比?'融曰:'两贤同时,便是未有前例。'"

江淹四十二岁,从庐陵内史任上还京,任骁骑将军,兼尚书左丞。见《南史》本传。

王俭三十四岁,仍领国子祭酒,以叔父王僧虔亡,上表请求解职,不许。又领太子少傅,解丹阳尹。王俭宅开学士馆,以四部书充之。作《释奠释菜议》等。见《南齐书》本传。

刘绘二十八岁,时仍在豫章王萧嶷幕下,颇受器重。按《南史·张稷传》:"永明中为豫章王嶷主簿,与彭城刘绘俱见礼接,未

尝被呼名，每呼为刘四、张五。以贫求为剡令，略不视事，多为小山游。会山贼唐寓之作乱，稷率厉部人保全县境。"唐寓之等因不满黄籍检定、被发配远戍，遂于本年举兵反，众至三万人，三吴却籍者无不响应。刘绘时从豫章王游，豫章王有《唐寓之贼起启》。

王融十九岁，作《为竟陵王与隐士刘虬书》。见《南齐书·刘虬传》。按：刘虬有答书。庾杲之亦有《为竟陵王致书刘隐士》、任昉有《为庾杲之与刘居士虬书》及《答刘居士诗》，大约都作于同时。本年，刘虬作《无量义经序》。年月见文中记载。

周颙为太子仆，为《孝经》作义疏。见《南史·文惠太子传》："永明三年于崇正殿讲《孝经》，少傅王俭令太子仆周颙撰为义疏。"

谢几卿服阕，补国子生。见《梁书》本传："服阕，召补国子生。齐文惠太子自临策试，谓祭酒王俭曰：'几卿本长于玄理，今可以经义访之。'俭承旨发问，几卿随事辩对，辞无滞者，文惠大称赏焉。俭谓人曰：'谢超宗为不死矣。'"

钟嵘通《周易》，为王俭接赏。见《梁书》本传："嵘，齐永明中为国子生，明《周易》，卫军王俭领祭酒，颇赏接之。"按《南齐书·礼志》："三年正月辛卯，诏立学，创立堂宇，召公卿子弟，下及员外郎之胤，凡置生二百人。"本年文惠太子讲《孝经》，国学多讲《周易》，《隋书·经籍志》载有《齐永明国学周易讲疏》三十卷，《齐永明三年东宫讲孝经义疏》一卷，便是证明。姚振宗考证曰：本年正月下诏，其秋悉集。王俭、张绪并预其中。张绪长于《易》，建元四年初，立国学，即领国子祭酒。本年王俭代之，俭长于礼学。七年王俭卒，复以张绪代祭酒。国子生当以《易》、《礼》为主要学习科目。钟嵘、谢几卿等并通《周易》，故为王俭所重。

陆澄六十一岁。张融四十二岁。孔稚珪三十九岁。范云三十五岁。陶弘景三十岁。萧长懋二十八岁。萧子良二十六岁。任昉二十六岁。刘峻二十四岁。萧衍二十二岁。谢朓二十二岁。丘迟二十二岁。王僧孺二十一岁。柳恽二十一岁。徐勉二十岁。刘勰十九岁。吴均十七岁。裴子野十七岁。陆倕十六岁。徐摛十五岁。殷芸十五岁。周舍十五岁。陆厥十四岁。张率十一岁。到沆九岁。到洽九岁。萧子恪八岁。刘杳七岁。王籍六岁。刘孝绰五岁。王筠五岁。刘苞四岁。伏挺二岁。

永明四年(486)丙寅

刘孝仪生。《梁书》本传:"刘潜字孝仪,秘书监孝绰弟也。幼孤,与兄弟相励勤学,并工属文。孝绰常曰:三笔六诗。三即孝仪,六孝威也。""大宝元年病卒,时年六十七。"依此而推,孝仪生于永明二年。但萧绎《法宝联璧序》记载刘孝仪年龄,534年时是四十九岁,上推生于本年。又载:"刘孝仪字孝仪。"

沈约四十六岁,为车骑将军、竟陵王长史。见《梁书》本传。作《绣像赞并序》,载《广弘明集》。年月日见文中记载。

江淹四十三岁,时为骁骑将军,作《藉田歌》。今存《迎送神升歌》、《飨神歌》。见《南齐书·乐志》。又与琅琊王智深等以文章相会,同从衡阳王萧道度游。按《南史·萧道度传》:"性好学,善属文,与琅琊王智深以文章相会,济阳江淹亦游焉。武帝谓王俭曰:'衡阳王须文学,当使华实相称,不得止取贵游子弟而已。'乃以太子舍人萧敷为文学。"可见,江淹在武帝心目中为贵游子弟,非华实相称。

王俭三十五岁,以本官领吏部。王俭长于礼学,谙究朝仪。于是衣冠翕然,并尚经学,儒学由此大兴。见《南齐书》本传。

萧子良二十七岁，进号车骑将军，作《陈时政密启》两篇。见《南齐书》本传。

刘峻二十五岁，自魏逃回京师，闻竟陵王萧子良博招学士，因人求职，未进。见《文选·重答刘秣陵沼书》李善注引刘峻《自序》。

谢朓二十三岁，度随王萧子隆东中郎府。见《南齐书》本传。按：萧子隆在唐寓之反叛被平定后被封为东中郎将、会稽太守。

王融二十岁，拜秘书丞。见《南齐书》本传。作《拜秘书丞谢表》。见《初学记》卷十二。

刘勰二十岁，母没。见《汇考》。

陆倕十七岁，举本州秀才，造竟陵王府。见《梁书》本传。

张率十二岁，常日限为诗一篇。见《梁书》本传。

王籍七岁，能属文。见《梁书》本传。

陆澄六十二岁。谢朏四十六岁。张融四十三岁。孔稚珪四十岁。范云三十六岁。陶弘景三十一岁。萧长懋二十九岁。刘绘二十九岁。任昉二十七岁。萧衍二十三岁。丘迟二十三岁。王僧孺二十二岁。柳恽二十二岁。徐勉二十一岁。吴均十八岁。裴子野十八岁。徐摛十六岁。殷芸十六岁。周捨十六岁。陆厥十五岁。到沆十岁。到洽十岁。萧子恪九岁。刘杳八岁。刘孝绰六岁。王筠六岁。刘苞五岁。伏挺三岁。

永明五年(487)丁卯

庾肩吾生。《梁书》本传："肩吾字子慎。"未言卒年。萧绎《法宝联璧序》载，534年庾肩吾四十八岁，上推生于本年。

萧子显生。《梁书》本传："子显字景阳，子恪第八弟也。"太清二年侯景之乱，寻卒官。时年四十九岁。据此，铃木虎雄《沈

约年谱》定子显生于永明七年，实误。《法宝联璧序》载，534 年萧子显四十八岁，上推生于本年，下至太清二年，应是五十一岁。但这里也有问题。《梁书·萧子云传》载："年十二，齐建武四年也。"依此而推，萧子云生于永明四年。问题是，萧子云是萧子恪第九弟，就是说，萧子云是萧子显的弟弟，但是若依《萧子云传》说，子云反比子显还大一岁。其中必有误。限于材料，无从细考。今暂依萧绎记载，确定萧子显生年。至于萧子云生年，不从《梁书》本传，只好从略。

沈约四十七岁。春，被敕撰《宋书》。见《宋书·自序》。按《南齐书·王智深传》："世祖使太子家令沈约撰《宋书》，拟立《袁粲传》，以审世祖。世祖曰：'袁粲自是宋家忠臣。'约又多载孝武、明帝诸鄙渎事，上遣左右谓约曰：'孝武事迹不容顿尔。我昔经事宋明帝，卿可思讳恶之义。'于是多所省除。"刘知几《史通》指斥说："《宋书》多妄。"未尝没有根据。作《谢齐竟陵王示永明乐歌启》、《永明乐》、《和竟陵王抄书》、《奉和竟陵王药名》等诗以及《为晋安王谢南兖州章》（晋安王萧子懋本年正月为南兖州刺史）、《又为安陆王谢荆州章》（安陆王萧子敬正月为荆州刺史）。又，《形神论》、《神不灭论》、《难范缜神灭论》等文约亦作于本年前后。见《广弘明集》。这些文章主要是针对范缜《神灭论》而发的。参见范缜条。

谢朏四十七岁，出为冠军将军、义兴太守。见《梁书》本传。按《南史·谢瀹传》载："齐武帝问王俭：当今谁能为五言？俭曰：朏得父膏腴，江淹有意。"可见其五言诗在当时颇有影响，与江淹并称。可惜今不存一诗。

范云三十七岁。萧子良为之启为郡，齐武帝以为其"常相卖弄"。子良奏以范云谏书，辞皆切直。作《奉和齐竟陵王郡县名

诗》。见《梁书》本传及《资治通鉴》。

王俭三十六岁，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固让。作《皇孙南郡王冠议》、《南郡王冠醮酒辞》等。见《南齐书》本传及《礼志》。

萧长懋三十岁，其冬临国学。见《南齐书》本传。

刘绘三十岁，显贵于当时。见《梁书·刘苞传》。

萧子良二十八岁，正位司徒，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王俭有《竟陵王山居赞》盛称曰："升堂践室，金晖玉朗。亹亹大韶，遥遥闲赏。道以德弘，声由业广。义重实归，情深虚往。濠梁在兹，安事遐想。"本年，萧子良作《谏射雉启》两篇。

任昉二十八岁，为竟陵王记室参军。王融自谓无对当时，见任昉之文，怳然自失。见《南史·任昉传》。

谢朓二十四岁，为太子舍人。作《永明乐》十首。详考见陈庆元《谢朓诗歌系年》(以下简称《系年》。文载中华书局编《文史》第 21 辑)。

王僧孺二十三岁，亦从子良游鸡笼山邸，作《谢齐竟陵王使撰众书启》。见《梁书》本传。按《南史》本传载："司徒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僧孺与太学生虞羲、邱国宾、萧文琰、邱令楷、江洪、刘孝孙并以善辞藻游焉。而僧孺与高平徐夤俱为学林。"

王融二十一岁，为丹阳丞、中书郎，作《上疏请给虏书》。见《南齐书》本传。又，《奉和竟陵王郡县名诗》、《移席琴室应司徒教》、《抄众书应司徒教》、《永明乐》、《齐明王歌辞》等约作于本年前后。

刘孝绰七岁，能属文，号曰神童。舅父王融常说："天下文章，若无我，当归阿士。"阿士，孝绰小字。父党沈约、任昉、范云

等闻其名,并命驾造访。见《梁书》本传。

王筠七岁,亦以警寤著称。见《梁书》本传。

范缜亦从游萧子良鸡笼山邸,却盛称无佛。当时,沈约、王融、萧琛等人在萧子良的率领下,围攻辩难。范缜退而著《神灭论》,舆论大哗。见《梁书》本传。关于《神灭论》的成书及发表年代,可参见邱明洲《范缜〈神灭论〉发表的年代》(载《四川大学学报》1980年1期)。

刘祥为豫章王谘议参军,又转为临川王从事中郎。见《南齐书》本传。按:豫章王萧嶷本年进位大司马。临川王萧映本年为开府仪同三司,七年卒。刘祥之从游二王,当在这两年间。

谢璟亦入竟陵王府。见《梁书》本传。

陆澄六十二岁。江淹四十四岁。张融四十四岁。孔稚珪四十一岁。陶弘景三十二岁。刘峻二十六岁。萧衍二十四岁。丘迟二十四岁。柳恽二十三岁。徐勉二十二岁。刘勰二十一岁。吴均十九岁。裴子野十九岁。陆倕十八岁。徐摛十七岁。殷芸十七岁。周捨十七岁。陆厥十六岁。张率十三岁。到沆十一岁。到洽十一岁。萧子恪十岁。刘杳九岁。王籍八岁。刘苞六岁。伏挺四岁。刘孝仪二岁。

永明六年(488)戊辰

臧荣绪卒,时年七十四岁。见《南史》本传。

沈约四十八岁。二月,作《上宋书表》。按:《宋书》仅用一年即完成,是因为在前人已有成果基础上增补而成。其详细经过见《宋书·自序》。六月,作《湘州枳园寺刹下石记》。见《广弘明集》。年月见文中记载。九月,作《从齐武帝琅琊城讲武应诏》(本郝立权《沈休文诗注》说)。又作《荐沈骥士表》。见《南齐书·

沈骥士传》。按：此表《全齐文》收在沈渊名下。张溥以为是沈约所作。是。沈骥士有《与沈约书辞表荐》，沈约特作《答沈骥士书》，期冀“幽期可託，克全素履，与尊贤弋钓泉皋，以慰闲暮。”见《南史·沈骥士传》及《艺文类聚》卷三十七所载。

范云三十八岁，作《古意赠王中书》。《文选》李注：“集曰《览古赠王中书融》。”又，王融有《杂体报范通直云》约作于本年前后。范云时为通直散骑侍郎。

王俭三十七岁，重申前命，被封为开府仪同三司。见《南齐书》本传。

任昉二十九岁，作《为褚谘议蓁让兄袭封表》、《又表》。前表见《文选》，后表见《艺文类聚》。按《南齐书·褚渊传》载，渊长子为褚贲，永明六年上表称疾，让封与弟褚蓁，褚蓁袭封南康郡公。《又表》是为褚贲所作。此后，以父丧去官。齐武帝曾对任昉伯任遐称赞任昉“哀瘠过礼”的孝心。见《南齐书》本传。

王僧孺二十四岁，为丹阳尹王晏辟为郡功曹，撰《东宫新记》。见《梁书》本传。按：王晏本年为丹阳尹。

王融二十二岁，作《古意》二首、《从武帝琅琊城讲武应诏诗》。

裴子野二十岁，欲绍成祖业，为《宋书》。见沈约《宋书》出，始删繁撮要，历代而成《宋略》二十卷。见《宋略总论》。按：裴子野不满意沈约《宋书》似有三点：一是“浮浅”，二是繁冗，三是臧否有私。从现存《宋略》传论来看，裴子野重视才能，而沈约则更重门第。

刘祥作《连珠》十五首。见《南齐书》本传。按：史载王奂为仆射，刘祥与王奂子王融同载至中堂，见路人驱驴，刘祥说：“驴，汝好为之，如汝人才，皆已令仆。”又著《连珠》十五首以寄怀。考

《南齐书·武帝纪》及《王奂传》，王奂任尚书仆射是在永明四年后至六年十月前。故这组诗当作于本年十月前。

陆澄六十四岁。谢朏四十八岁。江淹四十五岁。张融四十五岁。孔稚珪四十二岁。陶弘景三十三岁。萧长懋三十一岁。刘绘三十一岁。萧子良二十九岁。刘峻二十七岁。萧衍二十五岁。谢朓二十五岁。丘迟二十五岁。柳恽二十四岁。徐勉二十三岁。刘勰二十二岁。吴均二十岁。陆倕十九岁。徐摛十八岁。殷芸十八岁。周舍十八岁。陆厥十七岁。张率十四岁。到沆十二岁。到洽十二岁。萧子恪十一岁。刘杳十岁。王籍九岁。刘孝绰八岁。王筠八岁。刘苞七岁。伏挺五岁。刘孝仪三岁。庾肩吾二岁。萧子显二岁。

永明七年(489)己巳

王俭五月卒，三十八岁。本年作《求解选表》，见许，改领中书监，参掌选事。寻卒，追赠太尉。见《南齐书》本传。按《南齐书·王晏传》："俭卒，礼官谥议，上欲依王导谥为文献。晏启上曰：'导乃得此谥，但宋以来，不加素族。'"又《南齐书》本传载："少撰《古今丧服集记》并文集，并行于世。今上(梁武帝)受禅，下诏为俭立碑，降爵为侯。"《隋书·经籍志》载其文集有六十卷。又有《百家集谱》十卷，《吊答仪》十卷，《吉书仪》十卷等。

刘瓛卒，时年五十六岁。见《南齐书》本传。《隋书·经籍志》著录别集三十卷，另有数种有关经学的著作。可参见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按：刘瓛及其弟刘琎在齐梁士人心目中地位极高。刘峻《辩命论》云："瓛则关西孔子，通涉六经，循循善诱，服膺儒行；琎则志烈秋霜，心贞昆玉，亭亭高竦，不杂风尘。皆毓德于衡门，并驰声于天地。"任昉《求为刘瓛立馆启》称："刘瓛渫身

浴德，修行明经。"《颜氏家训·兄弟篇》载刘瓛、刘琎兄弟二人相敬以礼事，颇为传神。刘瓛以儒学垂名，卒无嗣。齐武帝诏刘显为后。刘显，本名颋，字嗣芳，刘瓛族子。幼年聪敏，深得王思远、张融、沈约等人赏识。入梁后，与裴子野、殷芸等人过从甚密，在梁代中期文学复古思潮形成过程中曾起到一定作用。生平见《南史》本传。

刘祥卒，时年三十九岁。见《南齐书》本传。按：上年作《连珠》，有人启闻。御史中丞任遐作《奏劾刘祥》，武帝下《敕徙刘祥》，发配广州，终日病酒，少时病卒。刘祥被处死的直接原因不仅仅是因作《连珠》，关键是撰《宋书》直书禅代事，为齐帝所不容，故置于死地。《隋书·经籍志》著录别集十卷。钟嵘《诗品》认为，刘祥同谢超宗、丘灵鞠、檀超、钟宪、颜则、顾则心等七人"并祖袭颜延，欣欣不倦，得士大夫之雅致乎？余从祖正员常云：大明、泰始中，鲍休美文，殊已动俗，惟此诸人，传颜、陆体。"

沈约四十九岁，作《瑞石像铭》。见《广弘明集》。年月见文中记载。又作《齐临川王行状》。见《艺文类聚》卷四十五。按：临川王萧映本年正月卒。又作《齐太尉文宪王公墓志铭》及《高松赋》。见《艺文类聚》卷四十六。《高松赋》作年参见下文萧子恪条。

谢朓四十九岁，以义兴太守职还都，迁为都官尚书、中书令。见《梁书》本传。

孔稚珪四十三岁，为骁骑将军，复领左丞，迁黄门郎。见《南齐书》本传。

范云三十九岁，作《为柳司空让尚书令初表》、《第二表》。见《艺文类聚》卷四十八。按：柳世隆本年五月为尚书令。见《南齐书·武帝记》。

刘绘三十二岁，征为安陆王萧子敬护军司马，转中书郎，掌诏诰。见《南齐书》本传。按：萧子敬本年为侍中、护军将军。刘绘随之征还京师。本年，豫章王萧嶷亦启求还第。

萧子良三十岁，代王俭领国子祭酒，因武帝又属意于长于《易》学的张绪，遂不拜，以绪领国子祭酒。见《南齐书·张绪传》。又，本年由任昉代笔，作《求为刘瓛立馆启》。见《艺文类聚》卷三十八。按《南齐书·刘瓛传》："瓛姿状纤小，儒学冠于当时。京师士子贵游莫不下席受业。性谦率通美，不以高名自居。游诣故人，唯一门生持胡床随后，主人未通，便坐问答。住在檀桥，瓦屋数间，上皆穿漏。学徒敬慕，不敢指斥，呼为青溪焉。竟陵王子良亲往修谒。七年，表世祖为瓛立馆，以扬烈桥故主第给之，生徒皆贺。瓛曰：'室美为人灾，此华宇岂吾宅邪？幸可诏作讲堂，犹恐见害也。'未及徙居，遇疾。子良遣从瓛学者彭城刘绘、从阳范缜将厨于瓛宅营斋。"特别值得特书的是萧子良在本年二月和十月两次大集善声沙门及京师硕学于鸡笼山邸，造经呗新声。四声之发现，与此有较为直接的关系。二月的集会，陈寅恪《四声三问》及《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征引甚详。十月的集会，陈先生未曾论及。释僧祐《略成实论记》有详细记载。此次集会持续到下年初。王融、张融、周颙、张肃、王肃等都躬逢盛会，活跃一时。《高僧传》、《续高僧传》多有记述。又可参见本书附录《四声八病二题》及《周颙卒年新探》。

王僧孺二十五岁，为大司马豫章王萧嶷行参军，又兼太学博士。见《梁书》本传。按：王僧孺上年为丹阳尹功曹。本年王晏转为江州刺史，固辞不愿出外，留为吏部尚书。疑王晏被任命为江州刺史时，王僧孺转入萧嶷幕下。

王融二十三岁，作《栖玄寺听讲毕游西邸园七韵应司徒诗》。

见《广弘明集》。又，《诃诘四大门诗》、《在家男女恶门诗》、《大惭愧门诗》、《努力门诗》、《春游回文诗》等大约亦作于这个时期。据《高僧传·释法献传》载，王融本年与沙门多所过从，"崇其诫训"。

刘勰二十三岁，三年丧礼毕。见《汇考》。

萧子恪十二岁。五月王俭卒前，和从兄司徒萧子良《高松赋》。据《梁书》本传载："卫军王俭见而奇之。"俭卒于本年五月，知此赋必作于五月前。沈约、谢朓、王俭等《和竟陵王子良高松赋》并存。子良赋佚。

萧子隆娶王俭女为妃。齐武帝以子隆能属文，谓王俭曰："我家东阿也。"王俭说："东阿重出，实为皇家蕃屏。"本年三月，迁中护军，转侍中、左卫将军。时年十六岁。见《南齐书》本传及《武帝纪》。

王植《奏上撰定律章表》。见《南齐书·孔稚珪传》。

徐孝嗣继任王俭未竟之业，主持修撰江左以来仪典。见《南齐书》本传。

陆澄六十五岁。江淹四十六岁。张融四十六岁。陶弘景三十四岁。萧长懋三十二岁。任昉三十岁。刘峻二十八岁。萧衍二十六岁。谢朓二十六岁。丘迟二十六岁。柳恽二十五岁。徐勉二十四岁。吴均二十一岁。裴子野二十一岁。陆倕二十岁。徐摛十九岁。殷芸十九岁。周捨十九岁。陆厥十八岁。张率十五岁。到沆十三岁。到洽十二岁。刘杳十一岁。王籍十岁。刘孝绰九岁。王筠九岁。刘苞八岁。伏挺六岁。刘孝仪四岁。庾肩吾三岁。萧子显三岁。

永明八年(409)庚午

沈约五十岁。春,仍为太子右卫率。秋,兼尚书左丞、御史中丞。作《奉和竟陵王经刘𤩽墓诗》。详见本年萧子良条。又作《正阳堂宴劳凯旋》。郝立权以为"所宴劳者似当为萧顺之。"本年八月,萧子响不堪典签驾御,举兵反抗。武帝遣萧顺之率兵征讨。下年五月,正阳堂大灾被毁。所以此诗必作于正阳堂被毁之前。又作《和刘中书仙诗》二首。刘绘其时为中书郎。王融有《游仙诗》五首,陆慧晓一首,大约亦作于此时。又与江秀才革、王丞融、王兰陵僧孺、谢洗马昊、刘中书绘及谢朓作《阻雪联句遥赠和》。又作《芳树》、《临高台》、《有所思》等。刘绘有《同沈右率诸公赋鼓吹曲》,即《巫山高》、《有所思》。虞羲亦有《巫山高》。谢朓《同沈右率诸公赋鼓吹曲名二首》,即《芳树》、《临高台》。这些作品约作于本年,奉和沈约之作。又作《与范述曾论竟陵王赋书》。见《艺文类聚》卷五十八、《初学记》卷二十一。按《梁书·范述曾传》称沈约时为左卫率,恐"左"是"右"字之误,因沈约在本年至十年为右卫率,未见左卫率之记载。又作《奏弹王源》,表现出强烈的门第观念。王源嫁女与商人满氏,沈约以为"玷辱流辈,莫斯为甚。"以为"此风弗剪,其源遂开。"沈约靠黄籍考察出满璋之身份,发现其身世皆"虚证",故入梁后特作《上言宜校勘谱籍》,用以厘析士庶。此奏文收进《文选》。李善注:"吴均《齐春秋》曰:永明八年,沈约为中丞。"知奏文作于本年或稍后。又作《奏弹孔稚珪违制启假事》。见《初学记》卷二十。文中称孔稚珪为"廷尉"。按:孔稚珪本年为廷尉,下年末已为御史中丞。见《南齐书·孔稚珪传》。

范云四十岁,作《巫山高》、《赠沈左卫》、《数名诗》等。见《先

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刘绘三十二岁，辅佐何胤撰治礼义。见《南齐书》本传。按：据徐勉《上修五礼表》，何胤永明七年接替张绪领国子祭酒，至建武四年退还东山，经涉九载。其间，有学士二十人辅佐修撰。刘绘即其中之一。八月，作《为豫章王嶷乞收葬萧子响表》。见《南齐书·萧子响传》。按：萧子响为武帝第四子。萧嶷无后，武帝过继之为嗣。后萧嶷有子，仍表留为嫡。本年八月，萧子响与典签发生矛盾，盛怒之下杀典签。武帝以为子响谋反，遂派萧顺之讨伐。子响伏诛。《南齐书·刘绘传》载："鱼复侯子响诛后，豫章王嶷欲求葬之，召绘言其事，使为表。绘求纸笔，须臾便成。"刘绘为永明重要作家，是年前后，颇为活跃。《南齐书》本传："永明末，京邑人士盛为文章谈议，皆凑竟陵王西邸。绘为后进领袖，机悟多能。时张融、周颙并有言工，融音旨缓韵，颙辞致绮捷，绘之言吐，又顿挫有风气。时人为之语曰：'刘绘贴宅，别开一门。'言在二家之中也。"其《和池上梨花诗》等约作于本年。

萧子良三十一岁，被赐三望车。春，作《登山望雷居士精舍同沈左卫过刘先生墓下作》。序曰："益深宿草之叹。"知刘瓛卒已逾年。同和者除上文提及的沈约外，还有谢朓、虞炎、萧子隆、柳恽等。

任昉三十一岁，服阕。作《为齐竟陵王世子临会稽郡教》。见《艺文类聚》卷五十。按《南齐书·萧昭胄传》："永明八年，自竟陵王世子为宁朔将军、会稽太守。"又，《王文宪集序》当亦作于本年前后。文中称齐高帝"圣武定业，肇于王命"云云，是作于齐代之证。

萧衍二十七岁，为随王萧子隆镇西谘议参军。见《梁书》本纪。按：萧子隆本年八月为镇西将军、荆州刺史。虞羲有四言

《敬赠萧谘议诗》十章。

谢朓二十七岁，为随王萧子隆镇西功曹，转文学。见《南齐书》本传。作《同咏坐上所见一物·席》。柳恽咏《席》，王融咏《幔》，虞炎咏《帘》。又应《沈右率座赋三物为咏》而咏《幔》，王融咏《琵琶》，沈约咏《篪》。又与沈约同作《咏竹火笼》、《咏邯郸故才人嫁为厮养卒妇》及《杂咏》三首（《咏镜台》、《咏灯》、《咏烛》）。又，《同咏坐上玩器·乌皮隐几》及沈约《咏竹槟榔盘》、《咏檐前竹诗》、《咏桃诗》、《咏青苔诗》等大约亦作于是时。详考见陈庆元《谢朓诗歌系年》。

王融二十四岁，时为司徒法曹。作《金天颂》。见《南史·王摛传》。又，《药名诗》、《星名诗》、《奉和月下诗》、《咏池上梨花诗》、《咏梧桐诗》、《咏女萝诗》、《咏火》等亦约作于是年。

刘勰二十四岁，离京口至建康，依僧祐入定林寺。详《汇考》。

张率十六岁，作诗二千许首。虞讷见而诋之。率乃焚毁，更为诗示焉，托名沈约，讷便句句嗟称，无字不善。见《梁书》、《南史》本传。

伏挺七岁，通《孝经》、《论语》，为五言诗学谢灵运体，深为任昉激赏。见《梁书》本传。

周颙作《抄成实论序》。见《出三藏记集》。按：释僧祐《略成实论记》明载本年正月周颙作序，说明周颙本年初仍在世。《南齐书》本传："颙卒官时，会王俭讲《孝经》未毕。"据此，陈寅恪先生认为，周颙卒年当在"永明七年五月王俭薨逝之前，永明三年王俭领国子祭酒及太子少傅之后。"铃木虎雄据沈约《与约法师书》中"去冬今岁，人鬼见分"推定周颙卒于永明六年冬。均误。由《略成实论记》及《抄成实论序》推知，周颙卒年至少在本年冬

季以后。沈约《与约法师书》是指慧约。据《高僧传·慧约传》载，慧约与周颙关系极洽，与京城其他贤人亦多所交往。永明末离京城居丧。隆昌元年时又在京城。沈约任东阳太守时，慧约同行。以后，两人就没有再离开过。因此，《与约法师书》很可能作于慧约在家乡守丧期间，至迟不会晚于永明十一年。这也就是周颙卒年的下限。详见附录《周颙卒年新探》。

晋安王**萧子懋**作《春秋例苑》三十卷奏之。见《南史》本传。按《隋书·经籍志》著录萧子懋别集四卷。

陆澄六十六岁。谢朏五十岁。江淹四十七岁。张融四十七岁。孔稚珪四十四岁。陶弘景三十五岁。萧长懋三十三岁。刘峻二十九岁。丘迟二十七岁。王僧孺二十六岁。柳恽二十六岁。徐勉二十五岁。吴均二十二岁。裴子野二十二岁。陆倕二十一岁。徐摛二十岁。殷芸二十岁。周舍二十岁。陆厥十九岁。到沆十四岁。到洽十四岁。萧子恪十三岁。刘杳十二岁。王籍十一岁。刘孝绰十岁。王筠十岁。刘苞九岁。刘孝仪五岁。庾肩吾四岁。萧子显四岁。

永明九年(491)辛未

庾杲之卒，时年五十一岁。有《临终上表》。《南齐书》本传："杲之历在上府，以文学见遇，上造崇虚馆，使为碑文。卒时年五十一，上甚惜之，谥曰贞子。"按：庾杲之为竟陵王西邸重要文士，又与江淹颇接近。《南史》本传："时诸王年少，不得妄称接人。敕杲之及济阳江淹五日一诣诸王，使申游好。"

沈约五十一岁，仍为御史中丞。作《伤庾杲之》、《伤王湛》。按：王湛亦卒于本年。又作《齐司空柳世隆行状》。见《艺文类聚》卷四十七。据《建康实录》，柳世隆卒于本年。又作《三日侍

林苑曲水宴应制诗[illegible]、[illegible]竹北殿、王融、谢朓同题[illegible]
殿[illegible]。又作《奏弹
太子舍人王僧祐》。按：王僧祐为王籍父，时为太子舍人。见《梁书·王秀之传》附传。又作《奏弹秘书郎萧遥昌》。按：萧遥昌与其兄萧遥欣均于永明中起家秘书郎。萧遥昌于永明十一年迁太孙舍人。则此奏表必作于永明八年中至本年底沈约任御史中丞期间。又，《奏弹奉朝请王希聃违假》、《奏弹御史孔橐题省壁悖慢事》、《修竹弹甘蕉文》等约亦作于八、九年间。又作《别范安成》。按《梁书·范岫传》："出为建威将军、安成内史。入为给事黄门侍郎，迁御史中丞。"其为御史中丞是在永元元年，则其为安成内史必在此前；所奉之主由此可以推定是齐安成王萧暠。据《南齐书·安成王暠传》，萧暠卒于本年夏。则此诗又必作于本年夏之前。此外，《为柳世隆谢赐乐游胡桃启》亦作于柳世隆卒前无疑。

张融四十八岁，迁司徒右长史。见《南齐书》本传："八年，朝臣贺众瑞公事，融扶入拜起，复为有司所奏，见原，迁司徒右长史。"按《南齐书·天文志》、《祥瑞志》等载，所谓"祥瑞"多发生在上年末叶，由此推测张融为人所奏弹、见原、升职，约在上年末本年初。

孔稚珪四十五岁，作《上新定律注表》，因此而被擢为御史中丞。见《南齐书》本传。按：王植在七年奏上《撰定律章表》，公卿八座参议。至本年，孔稚珪上表。时为太子中庶子、廷尉。年末为御史中丞。见《答竟陵王启》三篇。其三曰："十一月二十九日州民御史中丞孔稚珪启。"知是年底所作。萧子良有《与孔中丞稚珪书》、《答孔中丞书》。前书有"君非不睹经律所辩，何为偏志一方，埋没道路"云云，似为讨论《晋律》问题，知必作于本年孔稚

计上表前后。《孔稚珪传》载，王植上表后，群臣参议，"有轻重处，竟陵王子良下意，多使从轻。其中朝议不能断者，制旨平决。"知修订《晋律》，子良始终参预其中。

陶弘景三十六岁，时为奉朝请。作《与亲友书》、《与从兄书》，欲归隐山林。按《与从兄书》云："仕宦期四十左右作尚书郎，即抽簪高迈。今三十六，方作奉朝请，头颅可知，不如早去。"萧纶《隐居贞白先生陶君碑》亦载："先生本不希荣，常欲辞退，乃与亲友书曰：'畴昔之意，不愿处人间。年登四十，毕志山薮。今三十六矣。时不我借，知几其神乎？无为自苦。"

刘绘三十四岁，作《饯谢文学离夜诗》。按：王季之、王常侍(失名)并有《离夜诗》，均言春景，如王季之诗"离歌上春日"等是其证，约作于同时。

萧子良三十二岁，开仓济贫。见《南齐书》本传。

任昉三十二岁，时为尚书殿中郎。见刘之遴而异之，荐为宁朔主簿。见《梁书·刘之遴传》。作《别萧谘议衍诗》。详萧衍条。

萧衍二十八岁，仍为随王萧子隆镇西谘议参军，本年春赴荆州。作《答任殿中宗记室王中书别诗》。任昉、宗夬、王融《萧谘议西上夜集》别诗并存。宗夬为西邸重要学士。《梁书》本传载："齐司徒竟陵王集学士于西邸，并见图画，夬亦预焉。"王融亦敬异萧衍，以为"宰制天下，必在此人！"

谢朓二十八岁，随萧子隆赴荆州，时为镇西功曹，转文学。萧子隆在荆州，好辞赋，数集僚友，朓以文才，尤被赏爱，流连晤对，不舍日夕。见《南齐书》本传。本年作《同咏乐器·琴》、《侍宴华光殿曲水奉敕为皇太子作》、《三日侍华光殿曲水宴代人应诏》、《三日侍宴曲水代人应诏》、《随王鼓吹曲》、《和江丞北戍琅琊城》、《离夜》、《将发石头上烽火楼》、《夏始和刘孱陵》、《奉和随

王殿下》以及《和沈右率诸君饯谢文学》诗。按:"诸君"诗存者有:右率沈约、别驾虞炎、通直郎范云、中书郎王融、记室萧琛、中书郎刘绘。详《系年》。

柳恽二十七岁,丁父忧,作《述先颂》,申其罔极之心,文甚哀丽。见《梁书》本传。

王融二十五岁,作《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按《南齐书》本传:"九年,上幸芳林园禊宴朝臣,使融为《曲水诗序》。"《文选》收录此序云:"有诏曰:今日嘉会,咸可赋诗。凡四十有五人,其辞云尔。"又有《饯谢文学离夜》、《萧谘议西上夜集》、《永明九年策秀才文》等。

陆厥二十岁,为州举秀才,王晏少傅主簿。见《南齐书》本传。

刘杳十三岁,丁父忧。见《梁书》本传。按《南齐书·刘怀慰传》:"永明九年卒官。"

王颢上其父王珪之所撰《齐职仪》五十卷,诏付秘阁。见《梁书》本传。

庾於陵随萧子隆赴荆州,为主簿。按《梁书》本传:"庾於陵字子介,散骑常侍黔娄之弟也。七岁能言玄理。既长,清警博学有才思。齐随王子隆为荆州,召为主簿,使与谢朓、宗夬抄撰群书。"

萧琛作《饯谢文学》、《别萧谘议前夜以醉乖例今昼由醒敬教诗》。按《梁书》本传:"高祖(萧衍)在西邸早与琛狎,每朝宴,接以旧恩,呼为宗老。"本年八月,萧琛以司徒参军身份聘于魏。见《南史·武帝纪》。

陆澄六十七岁。谢朏五十一岁。江淹四十八岁。范云四十一岁。萧长懋三十四岁。刘峻三十岁。王僧孺二十七岁。徐勉

二十六岁。刘勰[illegible]。吴均二十[illegible]岁。裴子野二十[illegible]岁。陆倕二十[illegible]岁。徐勉二十[illegible]岁。殷芸二十[illegible]岁。周舍[illegible]十[illegible]岁。张率十七岁。到沆十五岁。到洽十五岁。萧子恪十四岁。王籍十二岁。刘孝绰十一岁。王筠十一岁。刘苞十岁。伏挺八岁。刘孝仪六岁。庾肩吾五岁。萧子显五岁。

永明十年(492)壬申

四月，豫章王萧嶷卒。作《疾笃启》、《诫诸子》、《遗令诸子书》等。见《南齐书》本传。

陆澄六十八岁，时为光禄大夫，与孔稚珪、虞悰、沈约、张融等表荐杜京产。见《南齐书·杜京产传》。按：此文题《荐杜京产表》，《全齐文》收在孔稚珪名下。

沈约五十二岁，作《答乐蔼书》。见《南齐书·豫章文献王嶷传》。按《南史·豫章王嶷传》载："群吏中南阳乐蔼、彭城刘绘、吴郡张稷，最被亲礼。蔼与竟陵王子良笺，欲率荆江湘三州僚吏建碑，讬中书侍郎刘绘营办。蔼又与右率沈约书，请为文。约答曰"云云。乐蔼书，《全梁文》题《与右率沈约书请撰豫章文献王碑文》。沈约竟予拒绝。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二云："约谦避作碑，当亦知齐武帝之子文惠太子与豫章王有嫌故耳。"此嫌隙，《南齐书》有意隐而不书，因为史书作者萧子显是萧嶷之子。王鸣盛说："自作史而为父立传，千古只此一人，故传中极尽推崇。"《南史》则力揭萧嶷之短，如后房千余人，又如与齐武帝父子的矛盾等。今传沈约《齐丞相豫章文宪王碑》(见《艺文类聚》卷四十五)是齐建武年间应萧嶷第二子萧子恪之请讬而作。其时，萧赜、萧长懋父子已死，无所谓违碍之情。铃木虎雄将沈约此碑文系于本年，大误。又作《冬节后至丞相第诣世子车中作》。

据《文选》李善注，世子是指萧嶷长子萧子廉。此诗感叹人死势去，贵贱不同，于世态炎凉，多所讥讽。

范云四十二岁，仍为司徒参军。本年十二月与萧琛出使北魏。见《南齐书·魏虏传》及《建康实录·魏虏传》。

陶弘景三十七岁，作《解职表》，脱朝服挂神武门，辞官隐居于句容之句曲山，自号华阳隐居。临发，公卿祖之于征虏亭，供帐甚盛，车马填咽，咸云宋齐以来未有斯事，朝野荣之。见《梁书》本传。

刘绘三十五岁，以善言词，使接北使。张融亦名扬江北，朝廷敕以接使。各见《南史》本传。

萧子良三十三岁。正月，领尚书令。五月，为扬州刺史。见《南齐书·武帝纪》。作《请加豫章王嶷启》。见《南齐书·豫章文献王传》。又请释僧祐三吴讲律。见《续高僧传·释明彻传》。

任昉三十三岁，作《为王金紫谢齐武帝示皇太子律序启》。见《艺文类聚》卷九十四。按：王晏本年被授予金紫光禄大夫。文惠太子下年正月卒，知此文当作于本年。

谢朓二十九岁，作《江上曲》、《同羁夜集》、《望三湖》、《答张齐兴》、《和伏武昌登孙权故城》、《冬绪羁怀示萧谘议虞田曹刘江二常侍》以及《和王长史卧疾》。见《系年》。按：王秀之有《卧病叙意》。考《南齐书》本传："长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动，密以启闻。世祖敕曰：'侍读虞云自宜恒应侍接，朓可还都。'朓道中为诗寄西府曰：常恐鹰隼击，秋菊委严霜。寄言罻罗者，寥廓已高翔。"知谢朓在荆州之被谤，乃王秀之所为。

王僧孺二十八岁，为文惠太子所赏，召入东宫。见《梁书》本传。

王融二十六岁；作《豫章文献王墓志铭》。见《南史·豫章王

凝传》。按：此铭为武帝所敕撰。

刘勰二十六岁，本年为上定林寺释超辩制碑文。见《高僧传·释超辩传》。

谢举十四岁，赠沈约五言诗，为沈约激赏。《南史》本传称："弱冠丁父忧。"按：其父谢瀹卒于永泰元年(498)，时谢举二十岁，上溯知谢举本年十四岁。

谢朏五十二岁。江淹四十九岁。张融四十九岁。孔稚珪四十六岁。萧长懋三十五岁，刘峻三十一岁。萧衍二十九岁。丘迟二十九岁。柳恽二十八岁。徐勉二十七岁。吴均二十四岁。裴子野二十四岁。陆倕二十三岁。徐摛二十二岁。殷芸二十二岁。周捨二十二岁。陆厥二十一岁。张率十八岁。到沆十六岁。到洽十六岁。萧子恪十五岁。刘杳十四岁。王籍十三岁。刘孝绰十二岁。王筠十二岁。刘苞十一岁。伏挺九岁。刘孝仪七岁。庾肩吾六岁。萧子显六岁。

永明十一年(493)癸酉

正月，文惠太子**萧长懋**卒，时年三十六岁。七月，齐武帝萧赜卒。太孙萧昭业嗣立(后贬号郁林王)。

王融被杀，时年二十七岁。年初兼主客，复为宁朔将军竟陵王萧子良军主。七月，以谋立竟陵王萧子良，不果，下狱。作《上疏乞自劾》、《下狱答辞》，赐死。见《南齐书》本传。按《南史·萧衍纪》："及齐武帝不豫，竟陵王子良以帝(指萧衍)及兄懿、王融、刘绘、王思远、顾暠之、范云等为帐内军主。融欲因帝晏驾立子良。帝曰：'夫立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融才非负图，视其败也。'范云曰：'忧国家者，唯有王中书。'帝曰：'忧国欲为周召？欲为竖刁邪？'懿曰：'直哉史鱼，何其木强也'。"本年，王融作《皇

太子哀策文》、《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别王丞僧孺》。《隋书·经籍志》著录别集十卷。今存诗文多篇。《诗品》评其五言诗"词美英净,至于五言之作,几乎尺有所短。"又善长书画。庾元威《论书》曰:"齐末王融图古今杂体,有六十四书,少年崇效,家藏纸贵。""宗炳又造画瑞应图,千古卓绝,王元长颇加增定。"

沈约五十三岁。任东阳太守,下年春启程。作《齐武帝谥议》、《伤王融》、《伤胡谐之》、《为文惠太子礼佛愿疏》等。见《梁书》本传。按:沈约《与徐勉书》有"永明末,出守东阳,意在止足"数句,据此,铃木虎雄以为沈约本年春出守东阳。但从现存诗文及有关史料来看,沈约本年并未赴任。第一,沈约赴任路上所写《早发定山》等诗描写的是暮春景致,说明沈约是春天赴任。而本年七月,沈约并未在东阳,而在京城作《齐武帝谥议》。第二,沈约下年仍在京城,为齐明帝萧鸾作书。第三,齐明帝建武三年,沈约还京入为尚书,临发作《去东阳与吏民别诗》,其中有"霜载凋秋草,风三动春旗"之句,说明是建武元年赴任。第四,《续高僧传·释慧约传》载:"少傅沈约,隆昌中赴任,携与同行。"是沈约下年赴东阳太守职的直接证据。终永明之世,沈约虽有重名于时,但在齐武帝心目中仍不过文士而已,未予重用。《南史·刘系宗传》:"武帝常云:'学士辈不堪经国,唯大读书耳。经国,一刘系宗足矣。沈约、王融数百人,于事何用!'其重吏事如此。"在永明年间,沈约还作有《谢齐竟陵王教撰高士传启》、《谢竟陵王示华严璎珞启》、《谢齐竟陵王赉母赫氏国云气黄绫裙襦启》、《为东宫谢赐孟尝君剑启》、《为皇太子谢赐御所射雉启》、《谢司徒赐北苏启》等文(并见《艺文类聚》)及为数颇多的咏物诗、酬答诗等。

江淹五十岁,岁末任御史中丞。奏劾刘悛、阴智伯。见《资

治通鉴》永明十一年。按:刘悛,刘绘兄也。刘绘曾请求代兄受戮,详见下年刘绘条。江淹为御史中丞,似接替孔稚珪。本年七月,孔稚珪尚为御史中丞也。详下条。入齐以后,特别是永明年间,江淹的创作日益见少,遂有"江郎才尽"之讥。其原因,曹道衡先生《江淹及其作品》、《论江淹诗歌的几个问题》等文作了深入的探讨,可以参看。永明年间,江淹作品可考者有《郊外望秋答殷博士》、《自序传》、《祀先农迎神升歌》、《铜剑赞》等。详《年代考》。

孔稚珪四十七岁,年中仍为御史中丞。作《奏劾王奂》。见《南齐书·王奂传》。又作《奏劾王融》。见《南齐书·王融传》。按:王奂子亦名王融,本年与王奂同时被杀。孔稚珪所奏劾之王融非王奂子,而是竟陵八友之一的王融。本年,孔稚珪又作《为王敬则让司空表》。见《艺文类聚》卷四十。按:王敬则本年迁司空。

范云四十三岁。上年十二月使魏,还居东郊,与萧懿、萧衍兄弟过从甚密。详《南史》本传。七月,齐武帝病危,萧子良委派范云与萧懿、王融、刘绘、王思远、顾暠之等为帐内军主。其秋,迁零陵内史,作《之零陵郡次新亭诗》,诗云:"江干远树浮,天末孤烟起。江天自如合,烟树还相似。"江天寥廓,当在秋际。又作《渡黄河诗》。按《南史》本传:"使还,再迁零陵内史。"其时,谢朓被敕还都,适云外谪,故作《新亭渚别范零陵云》诗。

萧子良三十四岁。正月,文惠太子死,齐武帝检行东宫,见太子服御羽仪多过制度,以子良不加启闻,颇为嫌责。七月,武帝病危,遗诏使子良辅政。郁林王即位,进位太傅,增班剑三十人。见《南齐书》本传。

任昉三十四岁,作《为王思远让侍中表》。见《艺文类聚》卷

四十。按：王晏被杀，王思远为侍中，掌优策及起居注。见《南齐书·王思远传》。

萧衍三十岁，在本年争夺帝位的极严酷斗争中站在萧鸾一边，使王融谋立萧子良未能得逞。萧衍所以如此，一方面看出萧子良、王融辈"才非负图"，不足以成事；另一方面也对齐武帝父子颇多不满。其父萧顺之带兵平萧子响，武帝又后悔。因此，萧顺之实以忧卒。萧衍投靠明帝似与此有关。按《南史·梁本纪》："初，皇考之薨，不得志。事见《齐鱼复侯传》。至是，郁林失德，齐明帝作辅，将为废立计，帝欲助齐明，倾齐武之嗣，以雪心耻。齐明亦知之，每与帝谋。"看来，在这次宫廷政变中，萧衍的向背起了比较关键的作用。

谢朓三十岁，为新安王中军记室，兼尚书殿中郎，作《拜中军记室辞随王笺》。见《南齐书》本传。按《南齐书·海陵王纪》："十一年，进号冠军将军。文惠太子薨，还都。郁林王即位，为中军将军，领兵置佐。封新安王。"本年，谢朓还作有《和何仪曹郊游》、《落日同仪曹熙》、《和宗记室省中》、《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等。详《系年》。

王僧孺二十九岁，补晋安郡丞，除侯官令。见《梁书》本传。按：文惠太子本欲命王僧孺为宫僚，后卒，不果。时王晏子王德元出为晋安郡，以王僧孺补郡丞。

徐勉二十八岁，王融求与相识，不见。俄而王融及祸，时人叹其机鉴。见《梁书》本传。

刘勰二十七岁，仍佐僧祐于定林寺。见《汇考》。

萧子显七岁，封宁都县侯。见《梁书》本传。

庾於陵为随王萧子隆送故主簿。见《梁书》本传。按：本年晋安王萧子懋为雍州刺史，萧子隆解督代还。

王寂作《第五兄揖到太傅竟陵王属奉诗》五章。见《文馆词林》卷一五二。按：王寂为王僧虔之子。又，王揖有《在齐答弟寂》诗五章，均四言。

陆澄六十九岁。谢朏五十三岁。张融五十岁。陶弘景三十八岁。刘绘三十六岁。刘峻三十二岁。丘迟三十岁。吴均二十五岁。裴子野二十五岁。陆倕二十四岁。徐摛二十三岁。殷芸二十三岁。周捨二十三岁。陆厥二十二岁。张率十九岁。到沆十七岁。到洽十七岁。萧子恪十六岁。刘杳十五岁。王籍十四岁。刘孝绰十三岁。王筠十三岁。刘苞十二岁。伏挺十岁。刘孝仪八岁。庾肩吾七岁。

齐郁林王隆昌元年，齐恭王延兴元年，齐明帝建武元年(494)甲戌

正月，改元隆昌元年。七月，西昌侯萧鸾杀齐帝萧昭业，迎立新安王萧昭文(谥恭王)，改元延兴元年。十月，萧鸾为太傅，加殊礼，进爵为王，废帝为海陵王，即帝位，改元建武元年，是为高宗明皇帝。

陆澄卒，时年七十岁。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著录其专著五种。生平见《南齐书》本传。

萧子良卒，时年三十五岁。本年初加殊礼，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进督南徐州。四月卒。所著内外文笔数十卷，虽无文采，多是劝戒。见《南齐书》本传。又有《止足传》十卷，《净住子》二十卷、《义记》二十卷、文集四十卷。见《隋书·经籍志》等著录。

九月，**萧子隆**被杀，时年二十一岁。见《南齐书·海陵王纪》。

文存《山居序》，诗存《过刘瓛墓下作诗》。按：萧子隆被杀实萧衍出的主意。此时的谢朓亦为萧鸾奔走前后。萧、谢二人彻底背叛了旧主。

沈约五十四岁，正月至七月，除吏部郎，出为宁朔将军、东阳太守。作《早发定山诗》以及《循役朱方道路》、《登玄畅楼》、《新安江水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游好》、《赠留真人祖父教》、《赠沈录事江水曹二大使》、《赠刘南郡季连》等诗。详见《诗注》。十月，进号辅国将军，征为五兵尚书，迁国子祭酒。作《让五兵尚书表》、《贺齐明帝登祚启》、《齐故安陆昭王碑》（萧缅本年被追赠为安陆王）、《应王中丞思远咏月》、《直学省愁卧》等。见《梁书》本传及《诗注》等。

谢朏五十四岁，为江淹所奏劾，固求外任，为征虏将军、吴兴太守。时局多变，朏作《遗弟瀹书》，劝其："勿豫人事。"又与周兴嗣纵谈文史。见《梁书》本传及《周兴嗣传》。司马光论曰："二谢兄弟，比肩近贵，安享荣禄，危不预知，为臣如此，可谓忠乎？"

江淹五十一岁，仍为御史中丞。弹劾数人，号称"严明。"十月，为车骑临海王长史。见《梁书》本传："少帝初，以本官兼御史中丞。时明帝作相。""于是弹中书令谢朏、司徒左长史王缋、护军长史庾弘远，并以久疾不预山陵公事；又奏前益州刺史刘悛、梁州刺史阴智伯，并赃货巨万，辄收付廷尉治罪。临海太守沈昭略、永嘉太守庾昙隆及诸郡二千石并大县官长，多被劾治，内外肃然。明帝谓淹曰：'宋世以来，不复有严明中丞，君今日可谓近世独步。'明帝即位，为车骑临海王长史。"按《南齐书·巴陵王昭秀传》："郁林即位，封临海郡王，二千户。隆昌元年，为使持节，都督荆雍益宁梁南北秦七州军事、西中郎将、荆州刺史。延兴元年，征为车骑将军，卫京师。

孔稚珪四十八岁，[illegible]本传。

陶弘景二十九岁，作《梦记》。《梁书》本传载，宜都王萧铿被杀，弘景因著书记梦。按：本传称此文作于"建武中"，而萧铿本年九月被杀，明帝十月即位，此文当作于萧铿被杀不久，故系于本年。

刘绘三十七岁。其兄为江淹所弹劾，将见杀，刘绘求代兄死。明帝辅政解之，引为镇军长史、转黄门郎。复为辅国将军，领录事，典笔翰。十月，迁太子中庶子，出为宁朔将军、抚军长史。安陆王萧宝晊为湘州刺史，又转为长沙内史，行湘州事。见《南齐书》本传。

任昉三十五岁，作《为齐明帝让宣城郡公第一表》，明帝恶其辞斥，甚愠。因此终建武中，任昉位不过列校。见《梁书》本传。又作《为萧侍中拜袭封表》。见《艺文类聚》卷五十。按：萧侍中指萧子良子萧昭胄。郁林王初为右卫将军，迁侍中，领右军将军。又作《齐竟陵王行状》。见《文选》。按：文称郁林王为"圣主"，知作于本年萧子良死后、萧鸾上台前。又《文选》载任昉《上萧太傅固辞夺礼启》，李善注引刘璠《梁典》曰："昉为尚书殿中郎，父忧去职，居丧不知盐味，冬月单衫，庐于墓侧，齐明作相，乃起为建武将军骠骑记室，再三固辞。帝见其辞切，亦不能夺。"按：依此注文，似本年任昉仍居丧。但是自永明八年至本年，任昉年年都有文章传世，似不像居丧。又，《梁书》本传载其为齐明帝作表，为明帝所恶，其时在本年七月。而任昉此文题"上萧太傅"云云，萧鸾为太傅在宣城郡公之后。既然萧鸾颇恶任昉之文，何以又起之为建武将军骠骑记室呢？我以为，任昉丁父忧，当在永明六年或稍后，因六年至八年，任昉没有文章传世。当

然，这只是推测性意见。《文选》所收这篇启，亦当再深入研究。

刘峻三十三岁，为萧遥欣豫州府刑狱。见《梁书》本传。按：萧遥欣本年为豫州刺史。萧衍三十一岁，拜中书侍郎，迁黄门侍郎，协助萧鸾篡立。又为宁朔将军，镇寿春。见《梁书》本纪。按：萧鸾借典签之手，滥杀高帝、武帝之子，萧衍多所预谋。

谢朓三十一岁，为骠骑谘议，领记室，掌霸府文笔，又掌中书诏诰。除秘书丞，未拜，仍转中书郎。所奉之主为萧鸾。见《南齐书》本传。作《为录公拜扬州恩教》、《为宣城公拜章》、《为明帝拜录尚书表》、《为齐明帝让封宣城公表》、《为百官劝进齐明帝表》等文，以及《始出尚书省》、《同谢谘议咏铜雀台》（谢璟）、《酬王晋安》（王德元）、《和王丞闻琴》（王思远）、《观朝雨》等诗。详《系年》。

刘勰二十七岁，为僧柔制碑文。见《高僧传·僧柔传》。

陆厥二十三岁，为王晏少傅主簿，迁后军行参军。见《南齐书》本传。按：王晏初为后将军，本年十一月领太子少傅。本年，陆厥作《与沈约书》商讨声律问题。书中称沈约为尚书，沈约本年十月为五兵尚书。沈约有《答陆厥书》。

张率二十岁。时萧遥光为扬州刺史，召张率为主簿，不就。起家著作佐郎。见《梁书》本传。

到洽十八岁，为南徐州迎西曹行事，与谢朓情好欢甚。见《梁书》本传。

刘孝绰十四岁，为沈约、任昉、范云所激赏。见《梁书》本传。

贾渊为长水校尉。王泰宝买袭《琅琊谱》，贾渊坐罪被收。见《南齐书》本传。

庾於陵与**宗夬**为萧子隆料理丧事。其他幕僚，莫有至者。

见《梁书》本传。

谢璟为齐明帝骠骑谘议参军，领记室。见《梁书》本传。

江夏王**萧锋**作《修柏赋》，不久为明帝所杀。见《南史》本传。

王屮作《头陁寺碑文》。见《文选》。

韩兰英作《为颜氏赋诗》。见《金楼子》。按《南齐书·武裴后传》："吴郡韩兰英，妇人有文辞。武帝以为博士，教六宫书学，以其年老多识，呼为韩公。"

张融五十一岁。范云四十四岁。丘迟三十一岁。王僧孺三十岁，柳恽三十岁。徐勉二十九岁。吴均二十六岁。裴子野二十六岁。陆倕二十五岁。徐摛二十四岁。殷芸二十四岁。周舍二十四岁。到沆十八岁。萧子恪十七岁。刘杳十六岁。王籍十五岁。王筠十四岁。刘苞十三岁。伏挺十一岁。刘孝仪九岁。庾肩吾八岁。萧子显八岁。

建武二年(495)乙亥

王逡之卒。见《南齐书·文学传》。

江淹五十二岁，其亲家萧诞为萧衍所杀。见《南史·齐宗室·衡阳公谌传》："谌兄诞，字彦伟。永明中为建康令。""延兴元年历徐司二州刺史。明帝立，封安复侯。征为左卫将军。上欲杀谌，以诞在边镇拒魏，故未及行。魏军退六旬，谌诛，遣梁武帝为司州别驾，使诛诞。诞子稜妻，江淹女，字才君，闻诞死，曰：'萧氏皆尽，妾何用生。'恸哭而绝。"

刘绘三十八岁，仍为安陆王萧宝晊冠军长史、长沙内史、行湘州事，西溯赴湘，作《入琵琶峡望积布矶呈玄晖》诗。谢朓有《和刘中书》。刘绘弟刘瑱有《上湘度琵琶矶诗》、虞羲有《送友人上湘诗》等，大约亦作于此时。本年又作《难何佟之南北郊牲色

议》。见《南齐书·礼志》。

谢朓三十二岁，作《齐雩祭明堂辞》八首。见《南齐书·乐志》。又作《和王主簿季哲怨情》、《赠王主簿》、《同王主簿有所思》(王季哲为王敬则之子)、《和徐都曹出新亭渚》(徐都曹即徐勉)。暮春，出为宣城太守。《酬德赋》序称："建武二年，予将南牧。"作《晚登三山还望京邑》、《京路夜发》、《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始之宣城郡》、《游敬亭山》、《宣城郡内登望》、《冬日晚郡事隙》等多首。详《系年》。

裴子野二十七岁，作《刘虬碑》。见《艺文类聚》卷三十七。按：刘虬卒于本年冬。见《南齐书·高逸·刘虬传》。

王筠十五，少好钞书。见《自序》："余少好钞书，老而弥笃，虽遇见瞥观，皆即疏记。后重省览，欢兴弥深。习与性成，不觉笔倦。自年十三四，齐建武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载矣。幼年读《五经》，皆七八十遍。爱《左氏春秋》，吟讽常为口实。广略去取，凡三过五钞。余经及《周官》、《仪礼》、《国语》、《尔雅》、《山海经》、《本草》，并再钞，子史诸集皆一遍。未尝请人假手，并躬自钞录，大小百余卷，不足传之好事，盖以备遗忘而已。"

庾於陵为萧遥光抚军行参军，兼记室。见《梁书》本传。按：萧遥光本年即号抚军将军。见《南齐书·萧遥光传》。

沈约五十五岁。谢朏五十五岁。张融五十二岁。孔稚珪四十九岁。范云四十五岁。陶弘景四十岁。任昉三十六岁。刘峻三十四岁。萧衍三十二岁。丘迟三十二岁。王僧孺三十一岁。柳恽三十一岁。徐勉三十岁。刘勰二十九岁。吴均二十七岁。陆倕二十六岁。徐摛二十五岁。殷芸二十五岁。周捨二十五岁。陆厥二十四岁。张率二十一岁。到沆十九岁。到洽十九岁。萧子恪十八岁。刘杳十七岁。王籍十六岁。刘孝绰十五

岁。刘苞十四岁。伏挺十二岁。刘孝仪十岁。庾肩吾九岁。萧子显九岁。

建武三年(496)丙子

周弘正生。《陈书》本传:"周弘正字思行,汝南安成人也。晋光禄大夫颢之九世孙也。祖颙,齐中书侍郎,领著作。父宝始,梁司徒祭酒。"弘正卒于陈太建六年,时年七十九岁,上推生于本年。

沈约五十六岁,年初在东阳太守职,有《大鸟集东阳奏表》。见《南齐书·五行志》。后入为尚书,离东阳前作《去东阳与吏民别诗》。沈约在东阳三年,本年还都。谢朓《在郡卧病呈沈尚书》有"为邦岁已朞"之句。朓于上年出守宣城,一年后正是本年。从诗意看,沈约本年确已还京为尚书。此前,曾有《八咏诗》、《游金华山》等诗。又作《酬谢宣城朓卧疾》。

范云四十六岁,为始兴内史。见《梁书》本传。按:上年范云仍在京城,与刘绘、刘孝绰父子过从甚多。永元元年六月自始兴内史迁广州刺史。由此知其出任始兴,在本年后。作《除始兴郡表》。见《艺文类聚》卷五十。又作《酌修仁水赋诗》。见《韶州图经》(《全梁文》引)。

刘绘三十九岁,守母丧。按《南齐书》本传,刘绘永泰元年服阕,出为晋安王萧宝义征北长史。上推知本年守母丧。

任昉三十七岁,作《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见《文选》。按《南齐书·萧子良传》:"建武中,故吏范云上表为子良立碑,事不行。"其时,任昉郁郁不得志,但文章为时人推崇。"当世王公表奏,莫不请焉。"任、范同为萧子良西邸旧僚,任撰此文,亦在情理之中。

谢朓三十三岁，仍在宣城，作《在郡卧病呈沈尚书》。方回评曰："约之为吏部出东阳，亦恐与朓同时，而约先入也。"朓为此诗，"意欲约引己入朝也。"又作《高斋视事》、《祀敬亭山春雨》、《纪功曹中园》、《送江兵曹檀主簿朱孝廉还上国》、《与江水曹干边戏》、《送江水曹还远馆》、《和刘西曹望海台》、《移病还园示亲属》、《和萧中庶直石头》等诗。见《系年》。

张率二十二岁，举秀才，为太子舍人。与同郡陆倕、陆厥等相友狎，为沈约所赏识。见《梁书》、《南史》本传。

王筠十六岁，作《芍药赋》。见《梁书》本传。

钟嵘为南康王侍郎，作《上齐明帝书谏亲细务》。见《南史》本传。按：《资治通鉴》系于本年。《南史》本传载："建武初，为南康王侍郎。时齐明帝躬亲细务，纲目亦密，于是郡县及六署九府常行职事，莫不争自启闻，取决诏敕。文武勋旧皆不归选部，于是凭势互相通进，人君之务，粗为繁密。嵘乃上书言'……'。书奏，上不怿，谓太中大夫顾暠曰：'钟嵘何人，欲断朕机务，卿识之不？'答曰：'嵘虽位末名卑，而所言或有可采。且繁碎职事，各有司存，今人主总而亲之，是人主愈劳而人臣愈逸，所谓代庖人宰而为大匠斫也，上不顾而言他。"

谢朏五十六岁。江淹五十三岁。张融五十三岁。孔稚珪五十岁。陶弘景四十一岁。刘峻三十五岁。萧衍三十三岁。丘迟三十三岁。王僧孺三十二岁。柳恽三十二岁。徐勉三十一岁。刘勰三十岁。吴均二十八岁。裴子野二十八岁。陆倕二十七岁。徐摛二十六岁。殷芸二十六岁。周舍二十六岁。陆厥二十五岁。到沆二十岁。到洽二十岁。萧子恪十九岁。刘杳十八岁。王籍十七岁。刘孝绰十六岁。刘苞十五岁。伏挺十二岁。刘孝仪十一岁。庾肩吾十岁。萧子显十岁。

建武四年(497)丁丑

张融卒,时年五十四岁。见《南齐书》本传。其遗令曰:“吾生平所善,自当凌云一笑。三千买棺,无制新衾。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儒释道,三教并重,可见士风之一斑。《隋书·经籍志》著录别集有:《玉海集》十卷、《大泽集》十卷、《金波集》六十卷。又有《少子》五卷。孔稚珪《答竟陵王启》称:“融乃著通源之论,其名《少子》。”今存文十三篇,诗五首。《南齐书》本传载:“融立义无师法,而神解过人。白黑谈论,鲜能抗拒。永明中,遇疾,为《门律自序》曰:‘吾文章之体,多为世人所惊。汝可师耳以心,不可使耳为心也,夫文岂有常体,但以有体为常,政当使常有其体。丈夫当删《诗》、《书》,制礼乐,何至因循寄人篱下。且中代之文,道体阙变,尺寸相资,弥缝旧物。吾之文章,体亦何异,何尝颠温凉而错寒暑,综哀乐而横歌哭哉?政以属辞多出,比事不羁,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然其传音振逸,鸣节竦韵,或当未极,亦已极其所矣。汝若复别得体者,吾不拘也。吾义亦如文,造次乘我,颠沛非物。吾无师无友,不文不句,颇有孤神独逸耳。义之为用,将使性入清波,尘洗犹沐。无得钓声同利,举价如高,俾是道场,险成军路。吾昔嗜僧言,多肆法辩,此尽游乎言笑,而汝等无幸’。”临卒作《诫子书》云:“吾文体英绝,变而屡奇,既不能远至汉魏,故无取嗟晋宋。”孔稚珪《祭外兄张长史文》云:“惟君之德,高明秀挺,浩汗深度,昂藏风领。学不师古,因心则睿。”又善草书隶书,自号其能。萧道成曾叹曰:“此人不可无一,不可有二”(见《建康实录》)。又说:“卿书殊有骨力,但恨臣无二王法。”张融答曰:“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见《南史》本传。庾肩吾《书品》将其列入下中品。

沈约五十七岁，作《授王缋蔡约王师制》。见《文苑英华》卷四五〇。文中载：冠军将军司徒左长史始平县五等男王缋为随郡王师，加散骑常侍。都官尚书蔡约为零陵王师，加给事中。按《南齐书·王缋传》及《蔡约传》载，王缋为冠军将军，蔡约为都官尚书均在建武二年以后。随郡王为萧宝融，建武元年封，三年为冠军将军，领石头戍军事。又，零陵王，《南齐书·蔡约传》作邵陵王。据《南齐书·明帝纪》载：建武二年九月，"改封南平王宝攸为邵陵王。"蔡约为邵陵王师至少在二年九月之后。《蔡约传》又说：其后为"江夏王车骑长史。"《南齐书·江夏王宝立传》载，萧宝立"永元元年又进车骑将军。"则蔡约为邵陵王师又必在永元元年前。沈约建武二年始回京师，据此而推，此制作于本年的可能性较大。

谢朏五十七岁，征为侍中、中书令，不应，仍居吴兴郡，只遣诸子还都。明帝诏加优礼，旌其素概，赐床帐褥席，奉以卿禄。见《南史》本传。按：其时，国子祭酒何胤亦抗表还会稽。他们大约都已意识到了时局隐伏着危机。

江淹五十四岁，出为宣城太守。见《梁书》本传。按：本年夏，谢朓被召还京师，曾任中书郎。江淹代之为宣城太守也。

孔稚珪五十一岁，作《祭外兄张长史文》。见《艺文类聚》卷三十八。按《南齐书》本传："稚珪风韵清疏，好文咏，饮酒七八斗。与外兄张融情趣相得，又与琅琊王思远、庐江何点、点弟胤并款交。"又作《上和虏表》，主张南北通和。文称："建元之初，胡尘犯塞；永明之始，复结通和，十余年间，边候且息。陛下张天造历，驾日登皇，声雷寓宇，势压河岳，而封豕残魂，未屠剑首，长蛇于喘，偷窥外甸，烽亭不静，五载于斯。"

任昉三十八岁，作《为萧扬州荐士表》。见《文选》。按：此表

为萧遥光荐举王暕和王僧孺而作。文曰："前侯官令东海王僧孺，年三十五。""秘书丞琅琊王暕，年二十一，七叶重光。"按《梁书·王僧孺传》记载而推，王僧孺三十五岁为齐东昏侯永元元年。但此表不可能作于永元元年，因萧遥光在永元元年八月举兵反，旋即被杀。也不可能作于永元元年萧遥光举兵反叛之头半年，因为《梁书·王僧孺传》及《王暕传》并载，建武时，"明帝诏求异士，"此荐是为应明帝诏求异士而作，必作于建武五年七月明帝死之前。从王暕行年来看，此表作于本年的可能性最大。王暕卒于梁普通四年冬，时年四十七岁。这在《梁书》本传中有明确记载。其二十一岁时为本年。但这时，王僧孺三十三岁，非三十五岁。或任昉误记，或《梁书·王僧孺传》误载，不可详也。本年，任昉又作《赠王僧孺诗》。见《梁书·王僧孺传》。

萧衍三十四岁，受节度，赴雍州解魏兵围。十月至襄阳。见《梁书》本纪。当时，襄阳流传有童谣："襄阳白铜蹄，反缚扬州儿。"后来，萧衍即帝位，特作《襄阳蹋铜蹄》三首，沈约有奉和。见《乐府诗集》卷四十八。

谢朓三十四岁，出为晋安王镇北谘议，南东海太守，行南徐州事。见《南齐书》本传。按：谢朓《酬德赋》云："四年，予忝役朱方。""其夏还京师，且事谳言，未遑篇章之思。"晋安王为萧宝义。二年为镇北将军，南徐州刺史。

王僧孺三十三岁，为萧遥光所荐，任尚书仪曹郎，迁治书侍御史，出为钱塘令。见《梁书》本传。

刘苞十六岁，移葬父母及两兄，为刘绘所叹服。见《梁书》本传。

萧子云封新浦县侯，自制拜章，颇有文采。见《梁书》本传。

释慧琳作《新安寺释玄远法师诔》。见《广弘明集》卷二十三。

范云四十七岁。陶弘景四十二岁。刘绘四十岁。丘迟三十四岁。柳恽三十三岁。徐勉三十二岁。刘勰三十一岁。吴均二十九岁。裴子野二十九岁。陆倕二十八岁。徐摛二十七岁。殷芸二十七岁。周捨二十七岁。陆厥二十六岁。张率二十三岁。到沆二十一岁。到洽二十一岁。萧子恪二十岁。刘杳十九岁。王籍十八岁。刘孝绰十七岁。王筠十七岁。伏挺十四岁。刘孝仪十二岁。庾肩吾十一岁。萧子显十一岁。周弘正二岁。

建武五年·永泰元年(498)戊寅

四月,改元永泰元年。大司马王敬则举兵反于会稽,五月被杀。七月,明帝病卒。皇太子萧宝卷继位,后被废称东昏侯。

颜协生。《梁书》本传:"颜协字子和,琅琊临沂人也。七代祖含,晋侍中、国子祭酒、西平靖侯。父见远,博学有志行。"颜协卒于梁大同五年,时年四十二岁,上推生于本年。

沈约五十八岁,为尚书。见《南齐书·河东王铉传》。五月,作《封左兴盛等制》。按:文中有"逆竖王敬则纵兵内侮,陵斥畿甸,辅国将军参军将军左兴盛、直阁将军刘山阳,受律前驱……"等句,知是王敬则被杀不久所作。七月,尚书令徐孝嗣使撰《齐明帝遗诏》。又作《齐明帝谥议》、《齐明帝哀策文》等。迁左卫将军,寻加通直散骑常侍。见《梁书》本传。又作《封申希祖诏》。文曰:"爰及中兴,忠款弥著。"知是东昏侯即位后所作。八月,又作《劝农访民所疾苦诏》。张溥谓此文乃约为齐帝作。《南齐书·东昏侯纪》载本年八月下诏"访搜贫屈"。本年又为国子祭酒,作《行园》诗。其秋,谢朓有《和沈祭酒行园》。东昏即位前后,由于徐孝嗣的举荐,沈约活跃一时。但政局动荡,他又深感忧虑,谋求退隐。《与徐勉书》云:"建武肇运,人世胶加,一去不返,行之

未易。及昏猜之始，王政多门，因此谋退。”

谢朏五十八岁，仍任吴兴太守。

江淹五十五岁，仍任宣城太守。

刘绘四十一岁，为宁朔将军、晋安王征北长史、南东海太守、行南徐州事。见《南齐书》本传。按：晋安王萧宝义本年八月进号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任昉三十九岁。东昏即位，迁中书侍郎。见《梁书》本传。作《齐明帝谥议》。见《艺文类聚》卷十四。

萧衍三十五岁，行雍州府事。三月，大败于邓城。七月，仍受持节、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司州之随郡诸军事、辅国将军、雍州刺史。见《梁书》本纪。按：雍州为军事重镇，直接控制京城，故历来皆皇子为之牧。东昏即位，政出多门，萧衍密为舟装之备，准备夺权。

谢朓三十五岁。年初启岳丈王敬则反。五月为尚书吏部郎。见《南齐书》本传。按《南史》本传又载：“初，朓告王敬则反，敬则女为朓妻，常怀刀欲报朓，朓不敢相见。及当拜吏部，谦挹尤甚。尚书郎范缜嘲之曰：‘卿人无惭小选，但恨不可行于寡妻。’朓有愧色。”王敬则之反叛，实在建武初年即有所准备。《南齐书·王敬则传》载：“帝既多杀害，敬则自以高武旧臣，心忧恐。……三年，遣萧坦之将斋仗五百人，行武进陵。敬则诸子在都，忧怖无计。上知之，遣敬则世子仲雄入东安慰之。仲雄善弹琴，当时新绝。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库，上敕五日一给仲雄。仲雄于御前鼓琴，作《懊侬曲歌》：‘常叹负情侬，郎今果行许。’帝愈猜愧。”齐明帝死前，杀尽高、武子孙，以及高、武重要谋臣，敬则只是其中之一而已。详《资治通鉴》齐明帝永泰元年所载。本年，谢朓作为吏部郎，推举到洽，洽拒之。又作《敬皇后哀策文》。

《南齐书》本传以为此文“齐世莫有及者。”按：敬皇后名刘惠端，彭城人，永明七年卒。延兴元年赠宣城王妃。明帝即位追赠为敬皇后。见《南齐书·皇后传》。又作《齐明帝谥册文》。秋，作《和沈祭酒行园》。冬，作《酬德赋》致沈约。

刘勰三十二岁，因感梦而“搦笔和墨，乃始论文”，作《文心雕龙》，约始于本年。又，本年前，作《灭惑论》。详《汇考》。

陆倕二十九岁，张率二十四岁，为沈约所赏识。《梁书·张率传》载：“与同郡陆倕幼相友狎，尝同载诣左卫将军沈约，适值任昉在焉。约乃谓昉曰：‘此二子后进才秀，皆南金也。卿可与定交。’由此与昉友善。”

到洽二十二岁，为谢朓所荐。洽睹世局方乱，深相拒绝。除晋安王国左常侍，不就。遂筑室岩阿，幽居积岁。任昉有知人之鉴，与到溉、到沼、到溉并善，称到洽“此子日下无双。”遂申拜亲之礼。见《梁书》本传。

萧子恪二十一岁。四月，为太子中庶子。七月，为秘书监，领右军将军、侍中。《南齐书》本传载：“大司马王敬则于会稽举兵反，以奉子恪为名。明帝悉召子恪兄弟亲从七十余人入西省，至夜当害之。会子恪弃郡奔归，是日亦至，明帝乃止。以子恪为太子中庶子。东昏即位，迁秘书监，领右军将军，俄为侍中。”

萧琛为左丞，作《嗣君庙见议》。见《南齐书·礼志》。

曹思文作《国讳不宜废学表》。见《南齐书·礼志》。

孔稚珪五十二岁。范云四十八岁。陶弘景四十三岁。丘迟三十五岁。王僧孺三十四岁。柳恽三十四岁。徐勉三十三岁。吴均三十岁。裴子野三十岁。徐摛二十八岁。殷芸二十八岁。周捨二十八岁。陆厥二十七岁。到沆二十二岁。刘杳二十岁。王籍十九岁。刘孝绰十八岁。王筠十八岁。刘苞十七岁。伏挺

十五岁。刘孝仪十三岁。庾肩吾十二岁。萧子显十二岁。周弘正三岁。

齐东昏侯永元元年(499)己卯

正月，改元永元元年。八月，始安王萧遥光举兵反，寻败死。十一月，太尉陈显达于寻阳举兵反，十二月败死。

张缵生。《梁书》本传："(张)缵字伯绪，缅第三弟也。出后从伯弘籍。弘籍，高祖舅也，梁初赠廷尉卿。"缵卒于太清三年，年五十一，上推生于本年。

谢朓卒，时年三十六岁。见《南齐书》本传。按：江祏等欲拥立萧遥光，遥光又派刘沨密致意于谢朓，欲引以为心腹。谢朓将江祏等谋告左兴盛。萧遥光大怒，与徐孝嗣、江祏等连名上《诛谢朓启》。朓临终，谓门客曰："寄语沈公(约)，君方为三代史，亦不得见没。"《隋书·经籍志》著录别集十二卷，逸集一卷。《文选》收其诗文二十四篇。钟嵘《诗品》评其五言诗"出于谢混，微伤细密，颇在不伦。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足使叔源失步，明远变色。善自发诗端，而末篇多踬，此意锐而才弱也。"沈约常言："二百年来无此诗也。"《颜氏家训·文章篇》云："刘孝绰当时既有重名，无所与让，唯服谢朓。常以谢诗置几案间，动静辄风味。"谢朓又善草隶，《书品》将其列入中下品。

陆厥卒，时年二十八岁。见《南齐书》本传。又本传称其"五言诗体甚新奇。"《诗品》云："观厥文纬，具识丈夫之情状。自制未优，非言之失也。"《隋书·经籍志》著录别集八卷。今存文一篇，诗十一首。

徐孝嗣被东昏侯所杀，所修五礼，多所散失。后收敛所余，由蔡仲然、何佟之共掌其事。见徐勉《上修五礼表》。孝嗣存诗

二首。

沈约五十九岁。四月，作《立太子诏》。九月，作《赦诏》，十月，作《封徐世标诏》。并见《文苑英华》。按：东昏侯本年四月立皇太子萧诵，九月以频诛大臣，大赦天下。十月杀徐孝嗣后，封徐世标为临汝县子。见《南齐书·东昏侯纪》。又，下列诏书亦作于本年：《沈文季加侍中诏》、《崔慧景加侍中诏》。二人为侍中，均在本年。各见《南齐书》本传。《授王亮左仆射诏》、《临川王子晋南康侯子恪迁授诏》、《刘暄封侯诏》、《常僧景等封侯诏》、《封三舍人诏》等。按：萧子恪本年迁为侍中。刘暄为敬皇后弟，即东昏侯舅，萧遥光平后，迁领军将军，封平都县侯，其年又见杀。常景僧为庐陵王萧宝源中兵参军事，薛元嗣为江夏王萧宝玄车骑参军事，均封侯。《封三舍人诏》是指沈徽孚、王咺之、裴长穆三人被封为伯。又作《伤谢朓》。

孔稚珪五十三岁，为都官尚书，迁太子詹事，加散骑常待。见《南齐书》本传。作《让詹事表》。见《艺文类聚》卷四十九。

范云四十九岁，六月，由始兴内史迁为广州刺史。见《南齐书·东昏侯纪》。作《答何秀才诗》，按：何秀才指何逊。何时举为秀才，史无明文。李伯齐先生认为何逊永明四年举秀才（见《何逊集校注》）。曹道衡先生以为何逊举才秀在建武四年至永元元年间（见《何逊生卒年问题试考》、《何逊三题》，并载《中古文学史论文集》）。依曹先生意见，早在永明中，范、何二人即有交往，范云有《贻何秀才诗》，何逊有《酬范记室云》约作于彼时（范云诗题当系后人追改）。本年前后举秀才，其对策深得范云称赞，因结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咏，云辄嗟赏。谓所亲曰：顷观文人，质则过儒，丽则伤俗，其能含清浊，中今古，见之何生矣。”见《梁书·何逊传》。本年范云为广州刺史后，何逊有《落日前墟望赠范广

州》、《范广州联句》等。

陶弘景四十四岁，更筑三层楼，弘景居其上，弟子居其中，宾客至则居其下，与物遂绝。见《梁书》本传。

任昉四十岁，作《齐司空曲江公行状》。见《艺文类聚》卷四十七。按：萧遥欣于建武元年封闻喜县公，后改为曲江公。本年卒，赠侍中、司空，谥康公。见《南齐书·萧遥欣传》。

张率二十五岁，迁尚书殿中郎，出为西中郎南康王功曹史，以疾不就。见《梁书》本传。按：齐和帝萧宝融本年封南康王，为持节、都督荆雍益宁梁南北秦七州军事、西中郎将、荆州刺史。见《南齐书·和帝纪》。

颜协二岁，其父颜见远为萧宝融录事参军，随赴荆州。见《梁书·颜协传》。

何思澄起家为南康王侍郎。按《梁书》本传云："何思澄字元静，东海郯人。父敬叔，齐征东录事参军、余杭令。思澄少勤学，工文辞，起家为南康王侍郎。"此南康王指萧宝融，非梁初南康王萧绩，因萧绩天监八年始封南康王，而何思澄在天监元年已成为安成王萧秀左常侍，六年又随赴江州。详后考。

庾弘远作《为陈显达与朝贵书》。见《南齐书·陈显达传》。按：文中有"沈左卫各负良家，共伤时冷"之句，似指沈约。

谢朓五十九岁。江淹五十六岁。刘绘四十二岁。刘峻三十八岁。萧衍三十六岁。丘迟三十六岁。王僧孺三十五岁。柳恽三十五岁。徐勉三十四岁。刘勰三十三岁。吴均三十一岁。裴子野三十一岁。陆倕三十岁。徐摛二十九岁。殷芸二十九岁。周捨二十九岁。到沆二十三岁。到洽二十三岁。萧子恪二十二岁。刘杳二十一岁。王籍二十岁。刘孝绰十九岁。王筠十九岁。刘苞十八岁。伏挺十六岁。刘孝仪十四岁。庾肩吾十三

岁。萧子显十三岁。周弘正四岁。

永元二年(500)庚辰

三月,平西将军崔慧景起兵围建康,寻败死。十一月,雍州刺史萧衍起兵襄阳。十二月,西中郎长史萧颖胄起兵江陵,奉南康王萧宝融为主。

谢徵生。《梁书》本传:"谢徵字玄度,陈郡阳夏人。高祖景仁,宋尚书左仆射。祖稚,宋司徒主簿。父璟,少与从叔朓俱知名。"谢徵卒于梁大同二年,时年三十七岁,上推生于本年。

王思远卒,时年四十九岁。见《南齐书》本传。今存诗一首。

祖冲之卒,时年七十二岁。见《南齐书·文学传》。有著述多种。详《隋书·经籍志》。

陆慧晓卒,时年六十二岁。见《南齐书》本传。

沈约六十岁,以母老表求解职,改授冠军将军、司徒左长史、征虏将军、南清河太守。见《梁书》本传。作《大赦诏》。见《文苑英华》卷四三一。崔慧景举兵反被杀,因有是诏。又作《授李居士等诏》。见《文苑英华》卷四一六。文中所称李居士,永元二、三年为太子左卫率;胡松,本年为太子右卫率。文中称胡松为新除太子右卫率,故知作于本年。又作《王亮王莹加授诏》、《王亮等封侯诏》等,均作于崔慧景被平后。又作《和刘雍州绘博山香炉峰》。参见刘绘条。

谢朏六十岁,诏征为散骑常侍、中书监,不就。见《梁书》本传。按:何胤亦被诏为太常,亦不就。

江淹五十七岁,罢宣城太守,还京,为黄门侍郎,领步兵校尉。见《梁书》本传。按:江淹在建武四年出为宣城太守,"在郡四年。"《南史》本传又称:"淹少以文章显,晚节才思微退。云为

宣城太守时，罢归，始泊禅灵寺渚，夜梦一人，自称张景阳，谓曰：'前以一匹锦相寄，今可见还。'淹探怀中得数尺与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尽。'顾见丘迟谓曰：'余此数尺无所用，以遗君。'自尔淹文章踬矣。又尝宿于冶亭，梦一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吾有笔在卿处多年，可以见还。'淹乃探怀中得五色笔一以授之。尔后为诗绝无美句，时人谓之才尽。"钟嵘《诗品》、《建康实录》等亦有类似记载，似江淹才尽于齐末。但据曹道衡先生考证，江淹大多数重要作品完成于宋末，入齐已逐渐才尽矣。

陶弘景四十五岁，作《肘后百一方序》。见《艺文类聚》卷七十五。文称："余宅身幽岭，迄将十载。"陶弘景永明十年隐居，迄本年为九载。又，文前有"太岁庚辰"，是作于本年之证。

刘绘四十三岁，为冠军长史。十二月，被任为雍州刺史以替代已经举兵反叛的萧衍。"众以朝廷昏乱，为之寒心，绘终不受。"见《南齐书》本传。又作《咏博山香炉诗》。

任昉四十一岁，因建武朝很不得志，是时乃纡意于幸臣梅虫儿，为中书郎，谢尚书令王亮。王亮讥讽说："卿宜谢梅，那忽谢我。"见《南史》本传。

萧衍三十七岁，冬，其兄萧懿被杀。于是密召长史王茂、中兵吕僧珍、别驾柳庆远、功曹史吉士瞻等谋划。十一月起兵于雍州。

丘迟三十七岁，作《侍宴乐游苑送张徐州应诏诗》。见《文选》。李善注引刘璠《梁典》以为张徐州即张稷，本年七月为北徐州刺史。十一月为南兖州刺史。诗作于此四个月期间。《梁书·丘迟传》载："服阕，除西中郎参军。"西中郎将为萧宝融，永元元年封。按：沈约《侍宴乐游苑饯徐州刺史应诏》当与丘迟同赋。范云时为国子祭酒，亦有《赠张徐州稷》诗。

萧颖胄作《移檄京邑》。见《南齐书》本传。按:此文写得极有气势。

谢举为江淹所激赏。《南史》本传载:"弱冠丁父忧,几致毁灭。服阕,为太常博士,与兄览俱豫元会。江淹一见并相钦挹,曰:'所谓驭二龙于长涂者也。"按:谢举为谢庄之孙。其父谢瀹卒于永泰元年(498),至本年,谢举服阕。

孔稚珪五十四岁。范云五十岁。刘峻三十九岁。柳恽三十六岁。王僧孺三十六岁。徐勉三十五岁。刘勰三十四岁。吴均三十二岁。裴子野三十二岁。陆倕三十一岁。徐摛三十岁。殷芸三十岁。周舍三十。张率二十六岁。到沆二十四岁。到洽二十四岁。萧子恪二十三岁。刘杳二十二岁。王籍二十一岁。刘孝绰二十岁。王筠二十岁。刘苞十九岁。伏挺十七岁。刘孝仪十五岁。庾肩吾十四岁。萧子显十四岁。周弘正五岁。颜协三岁。张缵二岁。

永元三年·齐和帝中兴元年(501)辛巳

正月,南康王萧宝融称相国。三月,即位于江陵,是为齐和帝,改元中兴元年。九月,萧衍军逼建康。十二月,雍州刺史王珍国杀东昏侯,迎萧衍。以宣德太后令,萧衍为中书监、大司监、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封建安郡公。

萧统生。《梁书》本传:"昭明太子统字德施,高祖长子也。母曰丁贵嫔。""太子以齐中兴元年九月生于襄阳。"

孔稚珪卒,时年五十五岁。见《南齐书》本传。《隋书·经籍志》著录别集十卷。今存文十三篇,诗五首。《诗品》称:"德璋生于封豁,而文为雕饰,青出于蓝矣。"按:封豁指张融,曾为封豁令。稚珪从之学诗,故得其衣钵。钟嵘评张融诗:"纡缓诞放,纵

有乖文体，然亦捷疾丰饶，差不局促。”

贾渊卒，时年六十二岁。《南齐书》本传载：“中兴元年卒，年六十二。撰《氏族要状》及《人名书》并行于世。”“先是谱学未有名家，渊祖弼之广集百氏谱记，专心治业。晋太元中，朝廷给弼之令史书吏，撰定缮写，藏秘阁。渊父及渊三世传学，凡十八州士族谱，合百帙七百余卷，该究精悉，当世莫比。永明中，卫军王俭抄次《百家谱》，与渊参怀撰定。”

沈约六十一岁，正月作《南郊赦诏》。见《初学记》卷二十。按：所写内容多涉及战事，疑是本年作。《南齐书·东昏侯纪》：正月辛亥，“车驾祠南郊，诏大赦天下。”十月，萧衍攻建康，后引沈约为骠骑司马，掌文书。见《梁书》本传。

谢朏六十一岁。本年，东昏侯、萧衍并请入京，均不至。何胤亦然。各见《梁书》本传。

江淹五十八岁，以秘书监兼卫尉，又副领军王莹。固辞不获免，遂叹曰：“此非吾任，路人所知，正取吾空名耳。”迁吏部尚书。萧衍逼建康，江淹出奔，为冠军将军，兼司徒左长史。见《梁书》本传。

范云五十一岁，先为国子博士。东昏侯被杀后，侍中张稷派范云衔命出城。萧衍任命他为黄门侍郎，俄迁大司马谘议参军，领录事。见《梁书》本传。

陶弘景四十六岁，使弟子向萧衍献图谶。见《梁书》本传。按：陶弘景在齐初和梁初特别热衷政治。其永明末归隐，实以官位卑微故也，未尝忘却现实也。

刘绘四十四岁。正月，为建安王萧宝寅车骑长史，行府国事。萧衍围建康，张稷与刘绘等谋划废立。东昏被杀，城内派刘绘、范云送首诣萧衍，转大司马萧衍从事中郎。见《南齐书》本传。

任昉四十二岁，为司徒右长史。后为萧衍骠骑记室参军，作《到大司马记室笺》。见《梁书》本传。按：在永明年间，萧衍曾对任昉说："我登三府，当以卿为记室。"任昉因萧衍善骑，亦戏答曰："我若登三事，当以卿为骑兵。"又作《与江革书》。见《南史·江革传》。按：本年三月，萧衍弟萧伟为雍州刺史，以江革为记室参军。任昉此书作于江革任记室参军后不久。

丘迟三十八岁，为萧衍骠骑主簿，甚被礼遇，时劝进梁王及殊礼，皆迟文。见《梁书》本传。

柳恽三十七岁，为萧衍冠军将军、征东府司马，又任给事黄门侍郎，领步兵校尉。见《梁书》本传。

徐勉三十六岁，为萧衍管记室，与江革同掌书记。见《梁书》本传。

刘勰三十五岁，继续撰《文心雕龙》，兼佐僧祐。见《汇考》。

裴子野三十三岁，作《齐安乐寺律师智称法师碑》。见《广弘明集》卷三十二。

王籍二十二岁，尝于沈约座赋得《咏烛》，甚为约赏，加冠军行参军，累迁外兵、记室。见《梁书》本传。

伏挺十八岁，州举秀才，对策为当时第一，被萧衍引为征东行参军。见《梁书》本传。

颜协四岁，其父颜见远为治书侍御史、中丞。见《梁书》本传。

江革作《为萧仆射与袁昂书》。见《梁书·袁昂传》。按《梁书·江革传》："中兴元年，高祖入石头，时吴兴太守袁昂据郡拒义师。乃使革制书与昂，于坐立成。"

萧琛为萧衍骠骑谘议，领录事，迁给事黄门侍郎。见《梁书》本传。

袁峻随鄱阳王萧恢赴破冈，知管记事。《梁书》本传云："袁峻字孝高，陈郡阳夏人，魏郎中令涣之八世孙也。峻早孤，笃志好学，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休息。讷言语，工文辞。"

庾於陵除东阳遂安令，为吏民所称。见《梁书》本传。

钟嵘除司徒行参军。见《梁书》本传。

谢璟为萧衍谘议。见《梁书》本传。

崔偃《上书理父冤》、《又上书》。见《南齐书·崔慧景传》附传。

乐霭作《奏定朝直》。见《南齐书·萧颖胄传》。

刘峻四十岁。萧衍三十八岁。王僧孺三十七岁。吴均三十三岁。陆倕三十二岁。徐摛三十一岁。殷芸三十一岁。周舍三十一岁。张率二十七岁。到沆二十五岁。到洽二十五岁。萧子恪二十四岁。刘杳二十三岁。刘孝绰二十一岁。王筠二十一岁。刘苞二十岁。刘孝仪十六岁。庾肩吾十五岁。萧子显十五岁。周弘正六岁。张缵三岁。谢微二岁。

中兴二年·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壬午

正月，齐大司马萧衍都督中外诸军事，加殊礼，旋为相国，封梁公，加九锡。二月，进爵梁王，大杀齐明帝子弟，迎和帝于江陵。四月，萧衍称帝，改元天监元年，是为梁高祖武皇帝。十一月，立萧统为皇太子。

刘绘卒，时年四十五岁。绘撰《能书人名》，自云善飞白，言论之际，颇好矜知。弟刘瑱，字士温，亦好文章，并善绘画。荥阳毛惠远善画马，瑱善画妇人，世并为第一。刘绘子刘孝绰，亦长于诗文，善长书法，名著梁朝。见《南齐书·刘绘传》。

沈约六十二岁，萧衍称王前，与范云等数劝进。三月，为散骑常侍、吏部尚书，兼右仆射。四月，为尚书仆射，封建昌县侯，邑千户。又拜约母为建昌国太夫人。奉策之日，范云等二十余人咸来致拜，朝野以为荣。又参与修订礼乐。见《梁书》本传、《柳恽传》、《徐勉传》等。又进策杀死齐和帝。见《建康实录》。齐宗室对沈约多致忿恨。《南史·萧颖达传》载，颖达出为豫章内史，意甚愤愤，大骂沈约："我今日形容，正是汝老鼠所为，何忽复劝我酒。"萧衍劝道："汝是我家阿五，沈公宿望，何意轻脱。若以法绳汝，汝复何理。"颖达无言，萧衍也有愧。后来，沈约作梦齐和帝剑断其舌，知沈约也一直为此事不安。死前又用道家上章首过之法为自己开脱罪责。本年，作《齐太尉徐公墓志》。见《艺文类聚》卷四十六。按《南史·徐孝嗣传》，徐孝嗣在永元元年被杀，中兴元年和帝赠徐孝嗣太尉，中兴二年改葬，谥文忠。又作《让仆射表》、《谢封建昌侯表》、《谢母封建昌国太夫人表》、《立太子诏》、《为太子谢初表》。并见《艺文类聚》。又作《梁武帝郗后谥议》。见《梁书·郗皇后传》。按：郗后死于永元元年，本年追封为皇后。又作《封授临川等五王诏》。见《文苑英华》卷四四四。五王，即临川王萧宏、安成王萧秀、建安王萧伟、鄱阳王萧恢、始兴王萧憺。又作《齐太尉王俭碑》。见《南齐书·王俭传》记载。萧衍即位后下诏为俭立碑。又作《丞相长沙宣武王墓志铭》。见《艺文类聚》卷四十五。按：萧懿在东昏侯时被杀，本年追赠长沙王。又作《资给何点诏》、《搜访隐逸诏》、《酬荆雍义士献物者诏》、《立左降诏》、《梁武帝践祚后与诸州郡敕》、《降死罪诏》、《为武帝与谢朏敕》、《又与何胤敕》。并见《艺文类聚》、《初学记》等书。又作《答诏访古乐》。见《隋书·音乐志》。梁初郊庙乐辞多为沈约所作。至大同二年，萧子云上书不满沈约之辞，始有改

换。见《梁书·萧子云传》。沈约所作郊庙乐辞有：梁雅歌十一首、梁南郊登歌二首、梁北郊登歌二首、梁明堂登歌五首、梁宗庙登歌七首、梁小庙乐歌二首、梁三庙雅乐歌十九首、梁鼓吹曲十二首(《隋书·音乐志》作萧衍撰)。所撰歌曲有：相和五引、西曲、襄阳蹋蹄三首、在舞曲上梁大壮大观舞歌二首、梁鞞舞歌七首、在杂舞上四时白纻歌五首等。本年又参定新律，定为二十篇。详见《梁书·柳恽传》以及《隋书·刑法志》。又参议继续修撰五礼。见《梁书·徐勉传》。

谢朏六十二岁，被征为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不就，见《梁书》本传。

江淹五十九岁，为相国右长史、散骑常侍、左卫将军，封临沮县开国伯，食邑四百户。江曾对子弟说："吾本素宦，不求富贵，今之忝窃，遂至于此。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备矣。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吾功名既立，正欲归身草莱耳。"本年又以疾迁金紫光禄大夫，改封醴陵侯。见《梁书》本传。

范云五十二岁，二月，迁侍中。四月，领吏部。十一月，以本官领太子中庶子。又以佐命功，封霄城县侯。见《梁书》本传。萧衍曾对萧宏、萧恢说："我与范尚书少亲善，申四海之敬。今为天下主，此礼既革，汝宜代我呼范为兄。"二王下席敬拜，与范云"同车还尚书下省。时人荣之。"见《南史》本传。又荐举许懋参详五礼，许懋作《封禅议》。见《梁书·许懋传》。

陶弘景四十七岁，频以书启致萧衍，恩礼愈笃。其《与梁武帝启》详论王羲之等书法家字迹真伪等问题，颇有参考价值。

任昉四十三岁，为黄门侍郎、吏部郎中，又以本官掌著作。作《封梁公诏》、《进梁公爵为王诏》、《策梁公九锡文》、《为齐宣德皇后令》、《齐宣德皇后答梁王令》、《宣德皇后敦劝梁王令》、《又

重敦劝梁王令》、《为梁公请刊改律令表》、《为府僚劝进梁公笺》、《又笺》(《文选》题作《百辟劝进今上笺》)、《禅位梁公策》、《禅位梁王玺书》、《禅位诏》、《梁武帝初封诸功臣诏》、《武帝追封永阳王诏》(萧敷,萧衍次兄,齐建武四年卒。本年,萧衍追封为永阳郡王)、《追封丞相长沙王诏》、《丞相长沙宣武王碑》(萧懿,萧衍长兄,本年被追封为长沙郡王)。《追封衡阳王桂阳王诏》、《抚军桂阳王墓志铭》(萧畅,萧衍弟,本年被追封为衡阳郡王。萧融,萧衍弟,本年被追封为桂阳王)。又作《求荐士诏》、《为梁武帝集坟籍令》、《为梁武帝断华侈令》。按《梁书·任昉传》:"梁台建,禅让文诰,多昉所具。"又作《为范尚书让吏部封侯第一表》、《奉答敕七夕诗启》、《答刘孝绰诗》等。

刘峻四十一岁,召入西省,与贺踪典校秘书。坐私载禁物,被奏免官。见《梁书》本传。

萧衍三十九岁,登基为帝,代齐建梁。作《赐谢览王暕诗》。见《南史·谢览传》。按:谢览为谢庄孙,王暕为王俭子。本年,萧衍又下诏为刘瓛立碑,谥曰贞简先生。见《南齐书·刘瓛传》。

丘迟三十九岁,拜散骑侍郎。见《梁书》本传。作《为范尚书拜表》、《为范卫军让梁台侍中表》、《为范云谢示毛龟启》。

王僧孺三十八岁,除临川王后军记室参军,待诏文德省。见《梁书》本传。按:萧宏本年被封临川王、后军将军、扬州刺史。

柳恽三十八岁,除长兼侍中,与沈约等共定新律。少工篇什,始为诗曰:"亭皋木叶下,陇首白云飞。"王融见而嗟赏,因书斋壁。入梁,常与宴赋诗,奉和萧衍《登景阳楼》"太液沧波起,长杨高树秋。翠华承汉远,雕辇逐风游,"为当时传诵。见《梁书》本传。

徐勉三十七岁,拜中书侍郎,进领中书通事舍入,直内省。

迁临川王后军谘议、尚书左丞。自掌枢宪，多所纠举，时论以为称职。见《梁书》、《南史》本传。本年作《临海太守伏曼容墓志铭》。按：伏曼容卒于本年。

刘勰三十六岁，撰成《文心雕龙》，并取定于沈约。见《汇考》。按：《文心雕龙》成书年代，历来争论不一。清人刘毓崧《书〈文心雕龙〉后》举三证以为作为齐末，杨明照以为此说"翔实确切"（见《梁书刘勰传笺注》，载《中华文史论丛》1979 年第一辑）。此说确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近些年异议又起：施助、广信《关于〈文心雕龙〉著述和成书年代的探讨》（载《文学评论丛刊》第三辑），叶晨晖《〈文心雕龙·时序〉"海岳降神"句试释》、《〈时序篇〉末段齐帝庙号蠡测》（见《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五和第七辑），夏志厚《〈文心雕龙〉成书年代与刘勰思想渊源新考》，（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十一辑）等均以为《文心雕龙》成书于梁代。

裴子野三十四岁，丁父忧。按：其父为裴昭明，本年卒。见《南史·裴昭明传》。

陆倕三十三岁，为右军安成王萧秀外兵参军，转主簿。作《感知己赋》赠任昉，任昉有《报陆倕感知己赋》。见《梁书》本传。

殷芸三十二岁，为西中郎主簿，后军临川王记室。见《梁书》本传。

周捨三十二岁，为范云所荐，拜尚书祠部郎。礼仪损益，多自捨出。见《梁书》本传。

张率二十八岁，初为相国主簿，天监初为鄱阳王友。见《梁书》本传。

到沆二十六岁，迁征虏主簿，后为太子洗马。见《梁书》本传。按《梁书·庾於陵传》载，东宫官属，均为清选，"洗马掌文翰，

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时於陵与周捨并擢充职。高祖曰：'官以人而清，岂限以甲族。'时论以为美。"

到洽二十六岁，为太子舍人。萧衍曾问丘迟："到洽何如沆、溉?"迟对曰："正清过于沆，文章不减溉；加以清言，殆将难及。"即召为太子舍人。见《梁书》本传。

萧子恪二十五岁，迁辅国谘议参军。四月，降爵为子，除散骑常侍、领步兵校尉，以疾不拜，徙为光禄大夫，俄为司徒左长史。见《梁书》本传。按：萧衍注意汲取齐亡教训，虽诛杀齐明帝子弟，而对其他齐宗室则多所笼络，起用萧子恪兄弟，即其一例。

王籍二十三岁，为安成王萧秀主簿。见《梁书》本传。

刘孝绰二十二岁，起家著作佐郎，作《归沐呈任中丞昉诗》，任昉作《答刘孝绰诗》。见《梁书》本传。按：任昉诗又见《梁书·谢举传》。又作《送瑞鼎诣相国梁公启》。见《艺文类聚》卷九十九。

刘苞二十一岁，以临川王妃弟故，自征虏主簿迁王中军功曹。见《梁书》本传。

伏挺十九岁，迁中军参军事。见《梁书》本传。

颜协五岁，丁父忧。见《梁书》本传。

萧琛由御史中丞迁庶子。见《梁书》本传。

萧统二岁，十一月被立为太子。

刘之遴、孔休源同为太学博士，为沈约、范云赏识。见《梁书·刘之遴传》。

刘显举秀才，解褐中军临川王行参军，俄署法曹。显好学，博涉多通，任昉尝得一篇缺简书，文字零落，历示诸人，莫能识者，显云是《古文尚书》所删逸篇，昉检《周书》，果如其说，昉因大相赏异。见《梁书》本传。

袁峻为鄱阳王侍郎，从镇京口。见《梁书》本传。按：萧恢本年封鄱阳王，领石头戍军事。

刘昭起家奉朝请。见《梁书》本传。按：刘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人。七岁通老庄义，既长，勤学善属文，外兄江淹早相称赏。天监初起家奉朝请。

钟嵘作《上言军官》。见《梁书》本传。

周兴嗣作《休平赋》，其文甚美，梁武帝嘉之。见《梁书》本传。

何思澄为安成王秀左常侍。见《梁书》本传。

臧严为安成王秀侍郎，转常侍。见《梁书》本传。按：臧严，字彦威，东莞莒人。曾祖焘，宋左光禄。祖凝，齐尚书左丞。父稜，后军参军。严幼有孝性，居父忧以毁闻。孤贫勤学，行止书卷不离于手。

萧衍旧友，特别是西邸宾僚多得提挈，当时有"草泽底下，悉化成贵人"的说法。见《梁书·陈伯之传》。

梁初文学颇为盛行。《梁书·文学传叙》称："高祖聪明文思，光宅区宇，旁求儒雅，诏采异人，文章之盛，焕乎俱集。每所御幸，辄命群臣赋诗，其文善者，赐以金帛，诣阙庭而献赋颂者，或引见焉。其在位者，则沈约、江淹、任昉，并以文采，绝妙当时。至若彭城到沆、吴兴丘迟、东海王僧孺、吴郡张率等，或入直文德，通宴寿光，皆后来之选也。"

吴均三十四岁。徐摛三十二岁。刘杳二十四岁。王筠二十二岁。刘孝仪十七岁。庾肩吾十六岁。萧子显十六岁。周弘正七岁。张缵四岁。谢徵三岁。

天监二年(503)癸未

萧纲生。《梁书·简文帝纪》:萧纲字世缵,小字六通,梁武帝萧衍第三子,昭明太子母弟。天监二年十月丁未生于显阳殿。

范云卒,时年五十三岁。正月,为尚书右仆射,犹领吏部。五月卒。见《梁书·武帝纪》。《梁书》本传载其有集三十卷。《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十一卷。钟嵘《诗品》评曰:"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范云之人品亦为当时称道。《南史·徐勉传》:"勉虽骨鲠不及范云,亦不阿意苟合,后知政事者莫及。梁世之言相者称范、徐云。"

沈骥士卒,时年八十五岁。临终作《遗令》。见《南齐书》本传。按:《全梁文》收录有沈骥士《沈氏述祖德碑》,题作本年,但疑窦颇多。如称沈氏祖上沈戎,屡用"戎祖",不辞,岂有子孙直呼祖名之理。又称尹射隐华山,而华山属秦,楚人隐此,不可信。又称沈犹行受业于曾子之门。据上文,犹行为沈子嘉六世孙。沈子嘉在鲁定公时,其时孔子已召收门徒,说明沈子嘉与孔子生活时代相去不远,其六世孙怎么可能是曾子门人呢?再说,沈犹行,非姓沈氏。沈犹,似为复姓,与沈氏无关。又称沈郢在秦并天下后封丞相。据上文,郢父为沈同,沈同又见于《孟子》,两人同时代。沈郢若为沈同子,相距在九十年以上,实在叫人难以置信。又称沈戎"捨故宅为佛寺",但汉光武帝时,佛尚未入中国。总之,碑文所记,大抵后人附会。沈骥士为饱学之士,不应出现这些疵谬。故此碑文恐后人伪造,托名沈骥士,如同今存周处碑,托名陆机一样不可信。

沈约六十三岁,正月,迁尚书左仆射,寻兼领军,加侍中。十一月,以母忧去职。本年,其子沈众出生。沈众卒于陈永定二

年，时年五十七岁，上推生于本年。沈约在本年作《尚书右仆射范云墓志铭》、《佛记序》、《应诏进佛记序启》。按：萧衍有《敕沈约撰佛记序》和《敕答沈约》。又作《授蔡法度廷尉制》。见《文苑英华》卷三九七。按：天监元年，蔡法度受命定令为九品（至七年，徐勉为吏部，改为十八班），本年四月，蔡法度上《梁律》二十卷、《令》三十卷、《科》四十卷。帝以法度为廷尉卿。见《梁书·武帝纪》、《隋书·百官志》及《刑法志》等。又作《侍宴谢朏宅饯东归》。引证详谢朏条。又作《连珠》、《注制旨连珠表》。引证详丘迟条。又作《法王寺碑》。见《建康实录·梁武帝纪》。范云卒后，众谓沈约宜当枢管，萧衍以沈约轻易而不与，乃以徐勉及右卫将军周舍参知国政。据此而知，沈约位虽在范云之右，而亲任不及范云远矣。

谢朏六十三岁，六月，轻舟诣阙，自陈己志。诏为侍中、司徒、尚书令。朏辞以脚疾，不许，又请自还东迎母。临发，舆驾临幸，赋诗饯行。王公送迎，相望于道。见《梁书》本传。按《南史·阮孝绪传》载："初，谢朏及伏暅应征，天子以为隐者苟立虚名，以要显誉。"而天子萧衍所以屈身就士，又何尝不是"以要显誉"？

任昉四十四岁，出为义兴太守。作《出郡传舍哭范仆射诗》三章。诗云："结欢三十载，生死一交情。""与子别几辰，终途不盈旬。"说明任昉出任义兴太守是在本年五月范云卒前"不盈旬"，路上听到噩耗而作此诗。又作《与沈约书》，痛悼范云。

丘迟四十岁，待诏文德殿，迁中书侍郎，领吴兴邑中正。萧衍作《连珠》，诏群臣继作者数十人，迟文最美。见《梁书》本传。又，《题琴朴奉柳吴兴诗》亦作于本年或稍后。柳吴兴，即柳恽，本年出任吴兴太守。

王僧孺三十九岁，出为南海太守。作《至南海郡教》。《梁

书》本传作“视事朞月”。《南史》作“视事二岁”。

柳恽三十九岁，出为吴兴太守。作《赠吴均诗》五首。见《梁书》本传。

徐勉三十八岁，除给事黄门侍郎、尚书吏部郎，参掌大选。见《梁书》本传。

刘勰三十七岁，起家奉朝请，仍居定林寺内，佐僧祐译经。见《汇考》。

吴均三十五岁，为吴兴太守柳恽主簿。吴均文体清拔有古气，自成吴均体。见《梁书》本传。本年作《连珠》。又，《送柳吴兴竹亭集诗》、《同柳吴兴乌亭集送柳令人诗》、《同柳吴兴何山集送刘余杭诗》等作于本年或稍后。

裴子野三十五岁，为吴平侯萧景冠军录事。见《梁书》本传。

张率二十九岁，为司徒谢朏主簿，直文德待诏省，使抄乙部书，又使撰妇人事，二十余条，勒成百卷，使工书人琅琊王深、吴郡范怀约、褚洵等缮写，以给后宫。后请假东归，论者谓为傲世，率惧，乃作《待诏赋》奏之，为梁武帝萧衍赏识，说：“省赋殊嘉。相如工而不敏，枚皋速而不工。卿可谓兼二子于金马矣。”又侍宴赋诗，萧衍赐张率诗曰：“东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虽惭古昔，得人今为盛。”彼此往还赋诗数首。又迁秘书丞。萧衍说：“卿东南物望，朕宿昔所闻。卿言宰相是何人，不从天下，不由地出。卿名家奇才，若复以礼律为意，便是其人。秘书丞天下清官，东南胄望未有为之者，今以相处，足为卿誉。”见《梁书》、《南史》本传。

到沆二十七岁，时文德殿置学士省，召高才硕学者待诏其中，使校定典籍，诏到沆通籍焉。见《梁书》本传。

到洽二十七岁，迁司徒谢朏主簿，直待诏省，使抄甲部书。

见《梁书》本传。按《梁书·殷钧传》:"天监初,拜驸马都尉,起家秘书郎,太子舍人、司徒主簿、秘书丞。钧在职,启校定秘阁四部书,更为目录。又受诏料检西省法书古迹,别为品目。"此事,《到洽传》明确记载是在天监二年开始做起。

萧统三岁,受《孝经》、《论语》。见《梁书》本传。

庾於陵为建康狱平,迁尚书功论郎,待诏文德殿。见《梁书》本传。

周兴嗣拜安成王国侍郎,直华林省。见《梁书》本传。

任孝恭入西省撰史。见《梁书》本传。

谢几卿为鄱阳王萧恢记室。见《梁书》本传。按:萧恢本年出为使持节、都督南徐州诸军、征虏将军、南徐州刺史。

谢昂作《谢后军临川王参军启》。见《南史》本传。

曹景宗作《华光殿侍宴赋竞病韵诗》。见《南史》本传。

何佟之卒,伏暅继之主持修撰五礼。见徐勉《上修五礼表》。

江淹六十岁。陶弘景四十八岁。刘峻四十二岁。萧衍四十岁。陆倕三十四岁。徐摛三十三岁。殷芸三十三岁。周捨三十三岁。萧子恪二十六岁。刘杳二十五岁。王籍二十四岁。刘孝绰二十三岁。王筠二十三岁。刘苞二十二岁。伏挺二十岁。刘孝仪十八岁。庾肩吾十七岁。萧子显十七岁。周弘正八岁。颜协六岁。张缵五岁。谢微四岁。

天监三年(504)甲申

四月,梁武帝**萧衍**舍道事佛,不啻把佛教颁为国教。

沈约六十四岁,为镇军将军、丹阳尹,参与修定五礼。见《梁书》本传。伏暅继何佟之修礼,后迁官,由缪昭掌知。后以礼仪深广,记载残缺,宜须博论,共尽其致,于是诏沈约、张充、徐勉三

人共主其事，又诏周捨、庾於陵参加，见徐勉《上修五礼表》。又，《还园宅奉酬华阳先生诗》约作于本年。《均圣论》亦作于本年前后。详见陶弘景条。本年又为释法献造碑文。见《高僧传·法献传》。

谢朏六十四岁，诏乘小舆升殿，恩遇异常。见《梁书》本传。

陶弘景四十九岁，作《难镇军沈约〈均圣论〉》。沈约有《答陶隐居〈难均圣论〉》。按：沈约本年正月为镇军将军，知此文作本年前后。刘宋时慧琳作有《均善论》，沈约之作，当与此有关。又，陈宣懋本年作《陶隐居井栏记》。见《景定建康志》引。但据方若《增补校碑随笔》所考，《石井栏记》，清乾隆五十年孙星衍曾访得石碑，云天监十五年作。

任昉四十五岁，罢义兴太守职，还为御史中丞。作《天监三年策秀才文》。谭献以为"开阖动容，亡力岂逊元长，且有主文谲谏之意"（评点《文选》）。又作《奏弹曹景宗》。按《梁书·曹景宗传》载：上年十月，魏寇司州，包围刺史蔡道恭。景宗望门不出，[illegible]游猎而已。至本年八月，城内粮尽而陷。"及司州城陷，为[illegible]中丞任昉所奏。高祖以功臣寝而不治。"知此文作于本年八月后。文章写得极有气势，为任昉代表作之一。谭献以为"笔挟风霜"、"骏迈曲折，气举其辞"。又作《奏弹刘整》。按：文中有"当伯天监二年六月从广州还至，整复夺取"云云，知作于本年任御史中丞后。刘整，非指南齐刘祥兄，而是刘寅之弟。此文极为古朴，近似白话。任昉还京任御史中丞后殷芸、到溉、刘苞、刘孺、刘显、刘孝仪、陆倕、到洽、张率等车轨日至，号曰"龙门之游"。又叫"兰台聚。"见《梁书·陆倕传》、《南史·到溉传》。

丘迟四十一岁，出永嘉太守。作《永嘉郡教》。在郡不称职，为有司所纠。见《梁书》本传。

刘勰三十八岁，为临川王萧恢记室。详见《汇考》。

裴子野三十六岁，为右军安成王参军，俄迁廷尉正。当时三官通署狱牒，子野尝不在，同僚辄署其名，奏有不允，子野从坐免职。或劝言诸有司，可得无咎。子野笑答曰："虽惭柳季之道，岂因讼以受服。"自此免黜久之。见《梁书》本传。按：安成王萧秀本年进号右将军。

陆倕三十五岁，作《赠任昉诗》。见《南史·到溉传》。

到沆二十八岁。当时，诏尚书郎在职清能或人才高妙者为侍郎，以到沆为殿中曹侍郎。沆从父兄溉、洽并有才名，时皆相代为殿中，当世荣之。见《梁书》本传。

钟嵘为临川王萧宏行参军。见《梁书》本传。按：萧宏本年进号中军将军。由此看来，刘勰、钟嵘同在萧宏幕下，有相识的可能。

刘孺起家中军将军萧宏法曹行参军，时镇军将军沈约闻其名，引为主簿，常与游宴赋诗，大为约所嗟赏。见《梁书》本传。按：刘孺，字孝稚，彭城安上里人也。祖勔，宋司空忠昭公。父悛，齐太常敬子。悛，乃刘绘兄也。

江淹六十一岁。刘峻四十三岁。萧衍四十一岁。王僧孺四十岁。柳恽四十岁。徐勉三十九岁。吴均三十六岁。徐摛三十四岁。殷芸三十四岁。周捨三十四岁。张率三十岁。到洽二十八岁。萧子恪二十七岁。刘杳二十六岁。王籍二十五岁。刘孝绰二十四岁。王筠二十四岁。刘苞二十三岁。伏挺二十一岁。刘孝仪十九岁。庾肩吾十八岁。萧子显十八岁。周弘正九岁。颜协七岁。张缵六岁。谢徵五岁。萧统四岁。萧纲二岁。

天监四年(505)乙酉

正月,置五经博士。诏曰:"今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经,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颜,勿限年次。"明山宾、沈峻、严植之、贺玚各主一馆。馆有数百生。其射策通明者,即除为吏。二月,初置胄子律博士。六月,立孔子庙。十月,大举伐魏。萧宏都督北伐诸军事,柳惔为副。

江淹卒,时年六十二岁。谥曰宪伯。子芀嗣。凡所著述百余篇,自撰为前、后集,并《齐书》十志,并行于世。见《梁书》本传。《诗品》评曰:"文通诗体总杂,善于摹拟。筋力于王微,成就于谢朓。"《隋书·经籍志》著录别集九卷(梁二十卷)、《后集》十卷。

沈约六十五岁,正月,作《南郊恩诏》。见《文苑英华》卷四二四。又作《上疏论选举》。见《通典》卷十六。文中谈到当时士人,"略以万计,常患官少才多,无地以处",而且又都"并聚京邑。"又作《应诏乐游苑饯吕僧珍》。见《文选》。李善注以为吕僧珍本年冬十月参与北伐。此诗为出征前作。

谢朏六十五岁,丁母忧,去职。见《梁书·武帝纪》。按《南史》本传云:"朏素惮烦,及居台铉,兼掌内台,职事多不览,以此颇失众望。其年母忧,寻有诏摄职如故。"

陶弘景五十岁,移居积金东涧。见《梁书》本传。

任昉四十六岁,作《奏弹范缜》。见《梁书》本传。按:范缜对梁武帝礼遇谢朏表示异议,说:"司徒谢朏本有虚名,陛下擢之如此。前尚书令王亮颇有治实,陛下弃之如彼。"梁武帝为之变色,而范缜仍固执无已。于是任昉作此奏表。又,《奏弹萧颖达》似亦作于本年前后。

丘迟四十二岁，为临川王萧宏记室，随军北伐。见《梁书》本传。《答徐侍中为人赠妇诗》作于本年或稍后。

柳恽四十一岁，仍为吴兴太守。见《梁书·沈觊传》。

徐勉四十岁，迁侍中，时北伐伊始，候驿填委，勉参掌军书，劬劳夙夜，动经数旬，乃一还宅。见《梁书》本传。

刘勰三十九岁，迁车骑将军夏侯详之仓曹参军。详见《汇考》。

张率三十一岁，三月，禊饮华光殿。其日，河南国献舞马，诏张率作赋，题《河南国献舞马赋应诏》。同赋者有到沆、到洽、周兴嗣等人。梁武帝以张率、周兴嗣赋为工。其年，父忧去职。见《梁书》本传。

到沆二十九岁，迁太子中舍人，又迁丹阳尹丞，以疾不能处职事，迁北中郎谘议参军。见《梁书》本传。

刘杳二十七岁，为太学博士，豫章王行参军。杳少好学，博综群书，沈约、任昉等当时硕学显宦每有遗忘，皆访问焉。见《梁书》本传。按：萧综，萧衍第二子，上年封为豫章郡王。

王筠二十五岁，作《侍宴饯临川王北伐应诏诗》（四言）。

周弘正十岁，通《老子》、《周易》，为伯父周捨赏识。见《陈书》本传。

萧统五岁，遍读五经。见《梁书》本传。按：萧统生长在儒学复兴的时代。其父萧衍非常注意用儒家思想教育、影响萧统。萧统幼读五经，本年立五经博士，萧衍又别诏五经博士之一的贺瑒为皇太子萧统定礼乐，明山宾等亦服侍萧统身边。这些都对萧统的思想产生重要影响。

萧几作《杨公则诔》，沈约以为此作不减希逸之作。见《梁书》本传。按：萧几，曲江公萧遥欣之子。杨公则为萧遥欣故吏，

本年卒。见《梁书·杨公则传》。

袁峻为都曹参军，随鄱阳王萧恢赴郢州。见《梁书》本传。

何思澄为太学博士。见《梁书》本传。

编成《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及术数书目录》。见阮孝绪《七录序》。按：《四部目录》为任昉、刘孝标等人编。《术数书目录》为祖暅等人编。详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殷钧又撰《秘阁四部书》，少于文德殿书，故不见载于《七录》。

释僧祐作《贤愚经记》。其时正"总集经藏，访告遐迩。"见《释藏》。

释宝唱总撰时录，以拟时要。见《续高僧传》本传。

刘峻四十四岁。萧衍四十二岁。王僧孺四十一岁。吴均三十七岁。裴子野三十七岁。陆倕三十六岁。徐摛三十五岁。殷芸三十五岁。周捨三十五岁。到洽二十九岁。萧子恪二十八岁。王籍二十六岁。刘孝绰二十五岁。刘苞二十四岁。伏挺二十二岁。刘孝仪二十岁。庾肩吾十九岁。萧子显十九岁。颜协八岁。张缵七岁。谢徵六岁。萧纲三岁。

天监五年(506)丙戌

谢朏卒，时年六十六岁。见《梁书·武帝纪》。按：铃木虎雄《沈约年谱》据《梁书·谢朏传》"其年(三年)遭母忧，后五年……冬薨于府"推断朏卒于天监八年，实误。"后五年"非指天监三年后又过五年，而是指天监五年。谢朏五言诗见称于当时，王俭以为"得父膏腴"，与江淹并称。见《南齐书·谢瀹传》。惜其诗今不一存。又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著录其文集十五卷、《齐笔仪》二十一卷，均佚。

到沆卒，时年三十岁。所著诗赋百余篇。见《梁书》本传。

沈约六十六岁，正月，为右光禄大夫、领太子詹事、扬州大中正、关尚书八条事。作《司徒谢朏墓志铭》。见《艺文类聚》卷四十七。又作《齐禅林寺尼静秀行状》。见《广弘明集》卷二十三。

丘迟四十三岁，春，作《与陈伯之书》。见《梁书·陈伯之传》。又作《为柳仆射让光禄表》。见《艺文类聚》卷四十九。按：柳惔，柳世隆之子。上年为军副，佐临川王萧宏北伐。《梁书》本传云："军还，复为仆射。以久疾，转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给亲信二十人。未拜，出为使持节、安南将军、湘州刺史。"又，《敬酬柳仆射征怨诗》作于本年或稍后。

萧衍四十三岁，五月，置集雅馆，以招远学。又，搜访术能，本年在寿光殿、华林园、正观寺、占云馆、扶南馆等处，传译《大育王经》、《解脱道论》等佛经，至十七年始译完，凡十一部四十八卷。参与译经工作的有宝唱、惠超、僧智、法云等，相对疏出，华质有序，不坠译宗。据载，"初翻经日于寿光殿，武帝躬临法座，笔受其文，然后乃付译人尽其经本。见《续高僧传·梁杨都正观寺沙门僧伽婆罗传》。

到洽三十岁，迁尚书殿中郎。洽兄弟群从，递居此职，时人荣之。见《梁书》本传。

刘孝仪二十一岁，举秀才。见《梁书》本传。按：沈约《上疏论选举》云："秀才自别是一种任官，非若汉代取人之例也。"作《为临川王奉诏班师表》。见《艺文类聚》卷五十九。按：本年十一月，以王师出兵淹时，有诏班师。见《梁书·武帝纪》及《临川王宏传》。

庾肩吾二十岁，为晋安王萧纲常侍。见《梁书》本传。

萧统六岁，始出居东宫。见《梁书》本传。

萧纲四岁，被封为晋安郡王。见《梁书·简文帝纪》。

陶弘景五十一岁。任昉四十七岁。刘峻四十五岁。王僧孺四十二岁。柳恽四十二岁。徐勉四十一岁。刘勰四十岁。吴均三十八岁。裴子野三十八岁。陆倕三十七岁。徐摛三十六岁。殷芸三十六岁。周捨三十六岁。张率三十二岁。萧子恪二十九岁。刘杳二十八岁。王籍二十七岁。刘孝绰二十六岁。王筠二十六岁。刘苞二十五岁。伏挺二十三岁。周弘正十一岁。颜协九岁。张缵八岁。谢徵七岁。

天监六年(507)丁亥

徐陵生。《陈书》本传:"徐陵字孝穆,东海郯人也。祖超之,齐郁林太守。梁员外散骑常侍。父摛,梁戎昭将军、太子左卫率,赠侍中、太子詹事,谥贞子。母臧氏,尝梦五色云化而为凤,集左肩上,已而诞陵焉。"徐陵卒于陈至德元年,时年七十七岁,上推生于本年。

沈约六十七岁,四月,为尚书左仆射。闰十月,迁尚书令,行太子少傅。见《梁书》本传。作《使四方士民陈刑政诏》。见《初学记》卷二十。又作《正会乘舆议》。见《隋书·礼仪志》。又作《王茂加侍中诏》。见《文苑英华》卷三八〇。又作《拜尚书令到都上表》。见《艺文类聚》卷四十八。又作《光宅寺刹下石记》。见《广弘明集》卷十六。又作《上言宜校勘谱籍》。见《南史·王僧孺传》,称"尚书令沈约以为"云云,是作于本年前后之证。当时重门阀,为计仕宦之便,多伪造谱籍:"凡粗有衣食者,莫不互相因依,竟行奸货,落除卑注,更书新籍,通官荣爵,随意高下。以新换故,不过用一万许钱。昨日卑微,今日仕伍。凡此奸巧,并出愚下。不辨年号,不识官阶。或注义熙在宁康之前,或以隆安在元兴之后,此时无此府,此年无此国。元兴唯有三年,而猥称

四年。又诏书甲子,不与长历相应。如此诡谬,万绪千端。"因此他建议校勘谱籍。后王僧孺受命改定《百家谱》。又作《报王筠书》。见王筠条。又作《与刘杳书》。见刘杳条。又,《郊居赋》约作于本年或稍后。见铃木虎雄孝证。此赋在当时人心目中地位很高。《梁书·刘杳传》云:"因著《林庭赋》。王僧孺见之叹曰:'《郊居》以后,无复此作。'"按:此文比较讲求声韵的调配,王筠诵之抑扬,沈约引以为"知音"。但《文选》却未加收录。从这里可以看出某些端倪,即萧统对于过分考究声律藻饰的作品不甚以为然。说明萧统与永明作家虽有不少相近之处,但仍有不少分歧。本年,萧衍置光宅寺,内有萧衍、沈约、范云、周兴嗣以下数十人铜像。见《建康实录·梁武帝纪》。按:沈约《光宅寺刹下石记》亦明载光宅寺之置在本年闰十月。《梁书·周兴嗣传》云:"是时,高祖以三桥旧宅为光宅寺,敕兴嗣与陆倕各制寺碑,及成,俱奏,高祖用兴嗣所制者。"

任昉四十八岁,春,出为宁朔将军、新安太守。见《梁书》本传。作《济浙江诗》、《赠桐庐出溪口见候余既未至郭仍进村维舟久之郭生方至诗》、《落日泛舟东溪诗》、《泛长溪诗》、《严陵濑诗》等。按:新安郡治在今浙江淳安县西北。

刘峻四十六岁,注释《世说新语》。考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232页。

柳恽四十三岁,为散骑常侍,迁左民尚书。见《梁书》本传。

徐勉四十二岁,除给事中、五兵尚书。十月,为吏部尚书。既居选官,精力过人,虽文案填积,坐客充满,应对如流,手不停笔。又该综百氏,皆为避讳。又闲尺牍,兼善辞令。见《梁书》本传。

刘勰四十一岁,六月前继任车骑仓曹参军。七月后则出为

太末令。见《汇考》。

吴均三十九岁，为建安王扬州刺史萧伟引为记室，掌文翰。见《梁书》本传。按《梁书·萧伟传》，萧伟本年迁使持节、都督扬、南徐二州诸军事、右军将军、扬州刺史，未拜，进号中权将军。时在五月。参见《梁书·武帝纪》。

裴子野三十九岁，其《宋略》已流行于世，为萧琛、傅昭、周捨等推重。沈约见而叹曰："吾弗逮也。"至是，吏部尚书荐之于梁武帝，为著作郎，掌国史及起居注。见《梁书》本传。按：徐勉本年十月为吏部尚书，下年迁他职。《宋略》之作，章学诚《丙辰劄记》以为在齐永明末。《梁书·裴子野传》载是在沈约《宋书》行世后增删而成。而《南史·裴子野传》则称："及齐永明末，沈约所撰《宋书》称：'松之已后无闻焉。'子野更撰为《宋略》二十卷，其叙事评论多善，而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从义师故也。'约惧，徒跣谢之，请两释焉。"

周捨三十七岁，时为中书侍郎，与吏部尚书徐勉、五经博士伏暅总知五礼事。本年五月完成《嘉礼仪注》，凡十二秩，一百一十六卷，《宾礼仪注》，凡十七秩，一百三十三卷。见《梁书》本传及徐勉《上修五礼表》。

陆倕三十八岁，迁骠骑将军临川王萧宏东曹掾。作《新漏刻铭》。见《梁书》本传。按：文载《文选》中。李善注引刘璠《梁典》曰："天监六年以旧漏乖舛，乃敕员外郎祖暅治之。漏刻成，太子中舍人陆倕为文。"

刘杳二十九岁，为沈约郊居新宅赠赞二首，并以所撰文章呈沈约。沈约命工书人题其赞于壁，并作《报刘杳书》。见《梁书·刘杳传》。

刘孝绰二十七岁，出为平南安成王萧秀记室，随府之江州。

见《梁书》本传。按：萧秀本年四月出为使持节、都督江州诸军事、平南将军、江州刺史。本年刘孝绰作《谢安成王赉祭孤石庙胙肉启》。后补太子洗马、掌东宫管记，旋出为上虞令。作《上虞乡亭观涛津诣学潘安仁河阳县诗》："秋江冻雨绝，反景照移塘。""离家复临水，眷然思故乡。"知作于秋冬之际。

王筠二十七岁，除尚书殿中郎。王氏过江以来，未有居郎署者。或劝逡巡不就。筠曰："陆平原东南之秀，王文度独步江东，吾得比踪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职。尚书令沈约，当世号为辞宗，每见筠文，咨嗟吟咏，以为不逮，并将王筠所作草木十咏书于壁。又对梁武帝说："晚来名家，唯见王筠独步。"见《梁书·王筠传》。

刘孝仪二十二岁，作《为安成王让江州表》。见《艺文类聚》卷五十。按：安成王萧秀本年四月为江州刺史。

萧子显二十一岁，作《鸿序赋》，为尚书令沈约激赏，以为"得明道之高致，盖《幽通》之流也。"见《梁书》本传。

顾协举秀才，尚书令沈约览其策而叹曰："江左以来，未有此作。"见《梁书》本传。

刘显为尚书令沈约所赏识，引为少傅五官掾。"见《梁书》本传。

袁峻作《拟扬雄官箴》奏之，除员外散骑侍郎，直文德学士省，抄《史记》、《汉书》各为二十卷。见《梁书》本传。

何逊为建安王水曹行参军，兼记室。见《梁书》本传。按：本传作"迁中卫建安王水曹行参军。"建安王萧伟本年进号中权将军。《梁书·武帝纪》本年五月己巳"置中卫、中权将军，改骁骑为云骑、游击为游骑。"同月，任萧伟为中权将军。七月，以王茂为中卫将军。据此，本传所谓"中卫"当作"中权"。

何思澄为平南安成王萧秀行参军，兼记室，随府江州，作《游庐山诗》，深为沈约激赏，使人书于郊居新宅阁斋。见《梁书》本传。又云："初，思澄与宗人逊及子朗俱擅文名，时人语曰：'东海三何，子朗最多。'思澄闻之曰：'此言误也。如其不然，故当归逊。'意谓宜在己也。子朗字世明，早有才思，工清言。周舍每与共谈，服其精理。"

殷钧编《梁天监六年四部书目录》。见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

陶弘景五十岁。萧衍四十四岁。丘迟四十四岁。王僧孺四十三岁。徐摛三十七岁。殷芸三十七岁。张率三十三岁。到洽三十一岁。萧子恪三十岁。王籍二十八岁。刘苞二十六岁。伏挺二十四岁。颜协十岁。张缵九岁。谢徵八岁。萧统七岁。萧纲五岁。

天监七年(508)戊子

正月，下立学诏。

萧绎生。《梁书·元帝纪》："世祖孝元皇帝讳绎，小字七符，高祖第七子也。天监七年八月丁巳生。"

杜之伟生。《陈书》本传："杜之伟字子大，吴郡钱塘人也。家世儒学，以三礼专门。父规，梁奉朝请，与光禄大夫济阳江革、都官尚书会稽孔休源友善。"之伟卒于陈永定三年，时年五十二岁，上推生于本年。

庾持生。《陈书》本传："庾持字允德，颖川鄢陵人也。祖佩玉，宋长沙内史。父沙弥，梁长城令。"庾持卒于陈太建元年，时年六十二岁，上推生于本年。

任昉卒，时年四十九岁。《梁书》本传称其出任新安太守，

"视事期岁，卒于官舍。时年四十九。"《隋书·经籍志》著录别集三十四卷。又有《杂传》一百四十七卷、《地记》二百五十二卷。任昉疏于诗而长于笔。《诗品》称："彦昇少年为诗不工，故世称沈诗任笔。昉深恨之。晚节爱好既笃，文亦遒变，善铨事理，拓体渊雅，得国士之风，故擢居中品。但昉既博物，动辄用事，所以诗不得奇。少年士子，效其如此，弊矣。"《南史》本传："昉以文才见知，时人云任笔沈诗。昉闻，甚以为病。晚节转好著诗，欲以倾沈。用事过多，属词不得流便，自尔都下士子慕之者，转为穿凿，于是有才尽之谈矣。"萧绎《金楼子·立言》称："任彦昇甲部阙如，才长笔翰，善辑流略，遂有龙门之名。"

丘迟卒，时年四十五岁。见《梁书》本传。《隋书·经籍志》著录别集十卷。今存诗文多篇。《诗品》称："丘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故当浅于江淹，而秀于任昉。"

沈约六十八岁，仍为太子少傅。见《南史·蔡撙传》。任昉死后，与贺踪一起勘定任昉藏书，凡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见《梁书·任昉传》。正月，作《上建阙表》。见《艺文类聚》卷六十二。又作《太常卿任昉墓志铭》。见《艺文类聚》卷四十九。又作《新定官品》二十卷。见《隋书·经籍志》著录。说详徐勉条。

陶弘景五十三岁，暂游南岳，遗世独往，是用忘归。见萧纶《隐居贞白先生陶君碑》。

刘峻四十七岁，为安成王萧秀户曹参军，开始抄录事类，编撰《类苑》。按：此书约成于天监十五年。《南史》本传云："及峻《类苑》成，凡一百二十卷，帝即命诸学士撰《华林遍略》以高之。"据《梁书·何思澄传》，天监十五年，敕徐勉人华林撰《遍略》，勉荐举何思澄、顾协、刘杳、王子云、钟屿等五人应选。其时，刘之遴《与刘孝标书》称此书"括综百家，驰骋千载，弥纶天地，缠络万

品，撮道略之英华，搜群言之隐赜，铅摘既华，杀青已就，义以类聚，事以群分，述征之妙，扬班俦也。"刘峻作《答刘之遴借〈类苑〉书》概述经过。并见《艺文类聚》卷五十八。本年冬，见任昉诸子流离不能自振，生平旧交莫有收卹，遂著《广绝交论》。先是描绘士人如何趋奉任昉，尔后写道："及瞑目东粤，归骸洛浦，繐帐犹悬，门罕渍酒之彦；坟未宿草，野绝动轮之宾。……呜呼！世路险巇，一至于此。"据此而知，本文作于任昉卒后的一年之内。到溉见其论，抵几于地，终身恨之。见《南史·任昉传》。

王僧孺四十四岁，作《太常敬子任府君传》。见《艺文类聚》卷四十九。

徐勉四十三岁，仍为吏部尚书，领太子右卫率。正月，受诏，定百官九品为十八班，以班多者为贵。《南史》本传称："自是贪冒苟进者以财货取通，守道沦退者以贫寒见没矣。"

刘勰四十二岁，继续在太末令任上。十一月至下年四月内，参与《众经要抄》之编撰。详见《汇考》。

吴均四十岁，作《扬州建安王让加司徒表》。见《艺文类聚》卷四十七。按：建安王萧伟本年为侍中、中抚军，知司徒事。

陆倕三十九岁，为太子中舍人，与到洽对掌东宫管记。作《石阙铭记》，被梁武帝称为"辞义典雅"的佳作。

殷芸三十八岁，迁通直散骑侍郎，兼中书通事舍人。作《与到溉书》悼念任昉。见《梁书》本传及《任昉传》。

张率三十四岁，除中权将军建安王记室参军。寻有敕直寿光省，治丙、丁部书抄。见《梁书》本传。按：《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刘杳撰《寿光书苑》二百卷。姚振宗《考证》据《张率传》推测是书分甲乙丙丁四部。刘汝霖以为此书必出众手而使杳专其名也。详见《隋书经籍志考证》及《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

刘孝绰二十八岁，为安西将军安成王萧秀记室，累迁安西骁骑谘议参军。见《梁书》本传。按：萧秀本年进号安西将军、荆州刺史。其秋，孝绰作《登阳云楼》诗。

王筠二十八岁，迁太子洗马、中舍人，并掌东宫管记。昭明太子爱文学士，常与筠及刘孝绰、陆倕、到洽、殷芸等游宴玄圃，太子独执筠袖、抚孝绰肩而言曰："所谓'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见重如此。见《梁书》本传。

范缜为国子博士，作《以国子博士让裴子野表》，评价《宋略》甚高。见《梁书·裴子野传》。

袁峻作《新阙铭》，与陆倕同制。见《梁书》本传。

庾仲容为安成王萧秀主簿，与刘峻、刘孝绰等先后同僚。见《梁书》本传。

萧衍四十五岁。柳恽四十四岁。裴子野四十岁。徐摛三十八岁。周捨三十八岁。到洽三十二岁。萧子恪三十一岁。刘杳三十岁。王籍二十九岁。刘苞二十七岁。伏挺二十五岁。刘孝仪二十三岁。庾肩吾二十二岁。萧子显二十二岁。周弘正十三岁。颜协十一岁。张缵十岁。谢徵九岁。萧统八岁。萧纲六岁。徐陵二岁。

天监八年(509)己丑

江德藻生。《陈书》本传："江德藻字德藻，济阳考城人也。祖柔之，齐尚书仓部郎中。父革，梁度支尚书、光禄大夫。"德藻卒于陈天嘉六年，时年五十七岁，上推生本年。

沈约六十九岁，作《舍身愿疏》。见《广弘明集》卷二十八。

刘峻四十八岁，继续修撰《类苑》，未及成，复以疾去，因游东阳紫岩山，筑室居焉。作《东阳金华山栖志》，其文甚美。见《梁

书》本传。《山栖志》今存。

萧衍四十六岁。上年命僧旻、智藏、僧朗等编修《众经要抄》八十八卷、《众经理义》(又曰《义林》)八十卷、注《大般涅槃经》七十二卷。见《续高僧传·释宝唱传》。本年,命释宝亮撰《涅槃义疏》十余万言,并为序言。见《高僧传·释宝亮传》。

柳恽四十五岁,除持节、都督广交桂越四州诸军事、仁武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见《梁书》本传。

徐勉四十四岁,领太子中庶子,侍东宫。昭明太子尚幼,敕知宫事。本年,与沈约、张充、王莹、张稷、柳憕、王暕等朝中硕学名流奉昭明太子讲《孝经》。见《梁书》本传。作《释奠会升阶议》。见《隋书·礼仪志》。

刘勰四十三岁。四月,撰《众经要抄》毕,继续为太末令。详《汇考》。

徐摛三十九岁,遍览经史,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时晋安王萧纲出戍石头,梁武帝让周捨推荐一人侍读。周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质陋小,若不胜衣,而堪此选。"以摛为侍读。见《梁书》本传。

周捨三十九岁,时为中书通事舍人,尚书吏部郎。作《释奠会升阶议》等。见《资治通鉴》及《隋书·礼仪志》。

张率三十五岁,为晋安王萧纲云麾中记室。见《梁书》本传。按:萧纲本年为云麾将军、领石头戍军事,量置佐吏。

刘孝绰二十九岁,作《三日侍安成王曲水宴诗》、《春日从驾新亭应制诗》。

张缵十一岁,尚萧衍第四女富阳公主,拜驸马都尉,封利亭侯,召补国子生。见《梁书》本传。按:张缵的从伯张弘籍为萧衍之舅。

萧统九岁，九月，讲《孝经》于寿安殿，尽通大义。讲毕，亲临释奠于国学。见《梁书》本传。按：《隋书·经籍志》著录有《皇太子讲孝经义》三卷。

陶弘景五十四岁。王僧孺四十五岁。吴均四十一岁。裴子野四十一岁。陆倕四十岁。殷芸三十九岁。到洽三十三岁。萧子恪三十二岁。刘杳三十一岁。王籍三十岁。王筠二十九岁。刘苞二十八岁。伏挺二十六岁。刘孝仪二十四岁。庾肩吾二十三岁。萧子显二十三岁。周弘正十四岁。颜协十二岁。谢微十岁。萧纲七岁。徐陵三岁。萧绎二岁。杜之伟二岁。庾持二岁。

天监九年(510)庚寅

颜晃生。《陈书》本传："颜晃字元明，琅琊临沂人也。"卒于陈天嘉三年，时年五十三岁，上推生于本年。

沈约七十岁，正月，由尚书令、太子少傅转为左光禄大夫。见《梁书》本传。作《致仕表》。见《艺文类聚》卷十八。按《南齐书·武帝纪》载御史中丞沈渊在齐永明中上表云："百官年登七十者，皆令致仕。"又作《与徐勉书》。见《梁书》本传："初，约久处端揆，有志台司，论者咸谓为宜，而帝终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见许。与徐勉素善，遂以书陈情于勉曰"云云。其中写道："今岁开元，礼年云至，悬车之请，事由恩夺。"按：古人年七十辞官归家，废车不用，故曰悬车。班固《白虎通·致仕》："臣年七十悬车致仕者，臣以执事趋走为职，七十阳道极，耳目不聪明，跂踦之属，是以退老去避贤路者，所以长廉远耻也。"又《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三云："台司，三公也。时约官至尚书令，已居宰辅，然未拜三公，故云。"

吴均四十三岁，补建安王萧伟侍郎，兼府城局。见《梁书》本传。按：建安王萧伟时为江州刺史。

张率三十六岁，为晋安王萧纲宣毅谘议参军，并兼记室。见《梁书》本传。按：萧纲本年迁使持节、都督南北兖青徐冀五州诸军事、宣毅将军，南兖州刺史。

到洽三十四岁，迁国子博士，奉敕撰《太学碑》。见《梁书》本传。按：七年下诏立学，本年三月、十二月，梁武帝两次驾幸国子学，亲临讲肆，策试胄子，并下诏曰："王子从学，著在礼经，贵游咸在，实惟前诰，所以式广义方，克隆教道。今成均大启，元良齿让，自斯以降，并宜肄业。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在从师者，可令入学。"其立《太学碑》乃崇学之用。

刘孝仪二十五岁，起家镇右始兴王萧憺法曹行参军，随府镇益州，兼记室。见《梁书》本传。按：萧憺本年春迁都督益宁南梁南北秦沙六州诸军事、镇西将军、益州刺史。因此，《刘孝仪传》所云"起家镇右"当作"镇西"。萧憺为镇右将军是在天监十四年，其时却为荆州刺史。

周弘正十五岁，补国子生，为国子博士到洽所赏识，作《周弘正补太学博士议》。见《陈书》本传。

萧琛出为宁远将军、平西长吏、江夏太守。见《梁书》本传。

何逊仍在建安王萧伟幕下，随府迁江州，犹掌书记，与吴均同僚。见《梁书》本传。

周兴嗣除新安郡丞。见《梁书》本传。

释宝唱始撰《名僧录》，至天监十三年编成，凡三十一卷。其后，释慧皎以此传颇多浮沉，又著《高僧传》十四卷，今存。裴子野亦有《高僧传》十卷，文极省约，已佚。见《续高僧传·释宝唱传》、《释慧皎传》。《军礼仪注》完成，凡十八秩，一百八十九卷，

上尚书。见徐勉《上修五礼表》。按：天监六年已上《嘉礼仪注》、《宾礼仪注》。

陶弘景五十五岁。刘峻四十九岁。萧衍四十七岁。王僧孺四十六岁。柳恽四十六岁。徐勉四十五岁。刘勰四十四岁。裴子野四十二岁。陆倕四十一岁。徐摛四十岁。殷芸四十岁。周捨四十岁。萧子恪三十三岁。刘杳三十二岁。王籍三十一岁。刘孝绰三十岁。王筠三十岁。刘苞二十九岁。伏挺二十七岁。庾肩吾二十四岁。萧子显二十四岁。颜协十三岁。张缵十二岁。谢微十一岁。萧统十岁。萧纲八岁。徐陵四岁。萧绎三岁。杜之伟三岁。庾持三岁。江德藻二岁。

天监十年(511)辛卯

陆云公生。《梁书》本传："陆云公字子龙，吴郡人也。祖闲，州别驾。父完，宁远长史。"陆云公卒于太清元年，时年三十七岁，上推生于本年。

刘苞卒，时年三十岁。《梁书》本传云："自高祖即位，引进文学之士，苞及从兄孝绰，从弟孺，同郡到溉，溉弟洽，从弟沆，吴郡陆倕，张率并以文藻见知，多预宴坐，虽仕进有前后，其赏赐不殊。天监十年卒，时年三十。"

陶弘景五十六岁，梁武帝"遣左右司徒惠明征还先生茅山，别给廨宇。"见萧纶《隐居贞白先生陶君碑》。

王僧孺四十七岁，出为南康王萧绩长史，行府、州、国事、兰陵太守。后为典签汤道愍谤讼，逮诣南司，作《奉辞南康王府笺》。见《梁书》本传。按：萧绩于天监八年被封为南康郡王，本年迁使持节、都督徐州诸军事、南徐州刺史，进号仁威将军。

刘勰四十五岁，除仁威南康王萧绩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

详《汇考》。

陆倕四十二岁，时为太常。按《陈书·虞荔传》载，虞荔九岁诣太常陆倕。虞荔卒于陈天嘉二年，时年五十九岁。其九岁在本年。

殷芸四十一岁，除通直散骑侍郎，兼尚书左丞。见《梁书》本传。

沈约七十一岁。刘峻五十岁。萧衍四十八岁。柳恽四十七岁。徐勉四十六岁。吴均四十三岁。裴子野四十三岁。徐摛四十一岁。周舍四十一岁。张率三十七岁。到洽三十五岁。萧子恪三十四岁。刘杳三十三岁。王籍三十二岁。刘孝绰三十一岁。王筠三十一岁。伏挺二十八岁。刘孝仪二十六岁。庾肩吾二十五岁。萧子显二十五岁。周弘正十六岁。颜协十四岁。张缵十三岁。谢徵十二岁。萧统十一岁。萧纲九岁。徐陵五岁。萧绎四岁。杜之伟四岁。庾持四岁。江德藻二岁。颜晃二岁。

天监十一年(512)壬辰

沈约七十二岁。正月，加特进。见《梁书·武帝纪》。迁中军将军、丹阳尹。见《南史》本传。按《续高僧传·慧约传》载："天监元年沈为尚书仆射，启敕请入省住。十一年临丹阳尹，无何而叹，有忧生之嗟。报门：'檀越福极已尽，贫道未得灾度。'词旨怆然，俄而沈殒。"由此而看，沈约为中军将军、丹阳尹是在本年下半年，很可能是年末，下年闰三月沈约卒。时间相距很近，故云"俄而。"钟嵘《诗品》卷下宋尚书令傅亮条下曰："今沈特进撰诗，载其数首。"此选诗，或即沈约十卷《集钞》。又，本年作《赵瑟曲》、《秦筝曲》、《阳春曲》、《朝云曲》，通谓之《江南弄》。萧衍亦有《江南弄》七曲：《江南弄》、《龙笛曲》、《采莲曲》、《凤笛曲》、《采

菱曲》、《游女曲》、《朝云曲》，并见《乐府诗集》卷五十。

刘孝仪二十七岁，作《为临川王解司空表》。见《艺文类聚》卷四十七。按：临川王萧宏八年为司空、扬州刺史。本年十一月，"降太尉扬州刺史临川王宏为骠骑将军、开府同三司之仪"（《梁书·武帝纪》）。

钟嵘随衡阳王萧元简出守会稽，为宁朔记室，专掌文翰，作《瑞室颂》。见《梁书》本传。按：萧元简何时出守会稽，史无明文。考《陈书·虞荔传》，上年虞九岁，与太常陆倕有所过从，"倕甚异之。又尝诣征士何胤，时太守衡阳王亦造焉，胤言之于王。王……还都，即辟为主簿，荔又辞以年小不就，及长……。"此是九年至十二年间事，因《梁书·衡阳王元简传》载，萧元简"十三年入为给事黄门侍郎，出为持节、都督广交越三州诸军事、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钟嵘作《瑞室颂》，《梁书·何胤传》亦有记载："胤初还，将筑室，忽见二人著玄冠，容貌甚伟，问胤曰：'君欲居此邪？'乃指一处云：'此中殊吉。'忽不复见。胤依其言而止焉。寻而山发洪水，树石皆倒拔，唯胤所居室岿然独存。元简乃命记室参军钟嵘作《瑞室颂》，刻石以旌之。"今暂系于十一年。

萧子云、谢举为定林上寺僧法通撰碑文。见《高僧传·法通传》。

五礼全部修毕，合一百二十秩，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十九条。见徐勉《上修五礼表》。按：《嘉礼仪注》天监六年完成，司马褧注，十二秩，一百一十六卷。《宾礼仪注》亦六年完成，贺玚注，十七秩，一百三十三卷。《军礼仪注》天监九年完成，十八秩，一百八十九卷。《吉礼仪注》，明山宾注，二十六秩，二百二十四卷。《凶礼仪注》，严植之注，四十七秩，五百一十四卷，并本年完成。参见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

陶弘景五十七岁。刘峻五十一岁　萧衍四十九岁。王僧孺四十八岁。柳恽四十八岁。徐勉四十七岁。刘勰四十六岁。吴均四十四岁。裴子野四十四岁。陆倕四十三岁。徐摛四十二岁。殷芸四十二岁。周捨四十二岁。张率三十八岁。到洽三十六岁。萧子恪三十五岁。刘杳三十四岁。王籍三十三岁。刘孝绰三十二岁。王筠三十二岁。伏挺二十九岁。刘孝仪二十七岁。庾肩吾二十六岁。萧子显二十六岁。周弘正十七岁。颜协十五岁。张缵十四岁。谢微十三岁。萧统十二岁。萧纲十岁。徐陵六岁。萧绎五岁。杜之伟五岁。庾持五岁。江德藻四岁。颜晃三岁。陆云公二岁。

天监十二年(513)癸巳

庾信生。《北史》本传:"庾信字子山,南阳新野人。祖易,父肩吾。"庾信卒于隋开皇元年,史传未载享年。据滕王逌《庾子山集序》:"自梁朝筮仕周世,驱驰至今,岁在屠维,龙居渊献,春秋六十有七。"知己亥岁,即北周宣帝大象元年,庾信六十七岁,上推生于本年。

沈约卒,时年七十三岁,作《临终遗表》。见《梁书》本传。按:沈约用事十余年,未尝有所荐达,政之得失,唯唯而已,但在文化事业上却功绩卓著。据《梁书》本传载,著《晋书》一百十一卷。刘知几对此书评价不高,以为"好诬先代","喜造奇说"(《史通·采撰篇》、《杂说篇》)。又著《宋书》一百卷、《齐纪》二十卷、《高祖纪》十四卷。此即沈约所自负撰写的"四代之史。"惜仅存《宋书》一种。又著《迩言》十卷。按: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以为"言"字误,当作"雅"。沈约子沈旋有《集注尔雅》。又著《谥例》十卷。按: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以为此书是在旧有

《谥法》、《广谥》基础上总集而成，上采周秦，下至晋宋，君臣谥号以旧有周代《谥法》为本。又著《宋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四声谱》一卷。除此之外，据《隋书·经籍志》等书记载，沈约还撰有《新定官品》二十卷、《俗说》三卷、《杂说》二卷、《袖中记》二卷、《珠丛》一卷、《集钞》十卷及《阮嗣宗咏怀诗注》和《竹书纪年注》等。至于文学创作，特别是五言诗，尤为世人尊崇，被誉为一代词宗。钟嵘《诗品》称："观休文众制，五言最优。详其文体，察其余论，固知宪章鲍明远也。所以不闲于经纶，而长于清怨。永明相王爱文，王元长等皆宗附之。约于时谢朓未遒，江淹才尽，范云名级故微，故约称独步。虽文不至，其工丽亦一时之选也。见重闾里，诵咏成音。嵘谓约所著既多，今剪除淫杂，收其精要，允为中品之第矣。故当词密于范，意浅于江矣。"《旧唐书·文苑传序》："近世惟沈隐侯斟酌二南，剖陈三变，据云渊之抑郁，振潘陆之风徽，俾律吕和谐，宫商辑洽，不独子建总建安之霸，客儿擅江左之雄。"值得注意的是，钟嵘著《诗品》，是以沈约作为入评的最后一位作家，萧统编《文选》，所录作品也基本上都出于天监十二年以前去世作家之手，即止于沈约的卒年。看来，在当时人心目中，沈约之死。标志着文学史上一个历史段落的结束。这个历史段落，就是永明文学。有趣的是，作为梁代中后期最有成就的作家，庾信在这一年诞生了。这又预示着文学史上一个新的历史段落的开端。这个新的历史段落，就是梁陈文学。当然，从永明文学的结束到徐陵、庾信登上文坛，中间还有近二十年的过渡阶段。这个过渡阶段，我称之为梁代中期文学复古阶段，是对永明文学偏颇的反拨。详见萧统条。

陶弘景五十八岁。后二十三年，即梁大同二年(536)，无疾而终，时年八十一岁。著《学苑》百卷，又著《孝经集注》、《论语集

注》、《帝代年历》、《本草集注》、《效验方》、《古今州郡记》、《图象集要》、《王匮记》、《七曜新旧术疏》、《占候》、《合丹法式》等书。又善长书法，有论书文章数篇。庾肩吾《书品》将其列入中下品。

刘峻五十二岁。后八年，即梁普通二年(521)卒，时年六十岁。其平生有两大著述：一是《类苑》一百二十卷，二是《世说新语注》。后者引书一百六十余种，至今士林传诵。今存文十二篇，诗四首。

王僧孺四十九岁。后九年，即梁普通三年(522)卒，时年五十八岁。著有《百家谱集钞》十五卷、《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东南谱集钞》十卷、《两台弹事》、《东宫新记》及文集三十卷。

柳恽四十九岁。后四年，即梁天监十六年(517)卒，时年五十三岁。著《棋品》一卷。

徐勉四十八岁。后二十二年，即梁大同元年(535)卒，时年七十岁。著有《流别起居注》六百卷、《左丞弹事》五卷、《选品》五卷、《太福祝文》二卷、《会林》五十卷、《妇人集》十卷、《章表集》十卷、前后二集四十五卷。

刘勰四十七岁。后九年，即梁普通三年(522)卒，时年五十六岁。详《汇考》。按：此说尚多争议　李庆甲《刘勰卒年考》(载《文学评论丛刊》第一辑)定在梁中大通四年(532)卒。杨明照《梁书刘勰传笺注》(见《文心雕龙校注拾遗》附录)定在梁大同四、五年(538、539)卒。曹道衡、沈玉成《刘勰卒年的再探讨》(载《古籍整理与研究》第五期)定在梁大同二、三年(536、537)卒。

吴均四十五岁。后七年，即梁普通元年(520)卒，时年五十二岁。著有《齐春秋》三十卷、《通史》四百八十卷、注范晔《后汉书》九十卷、《庙记》十卷、《十三州记》十六卷、《钱塘先贤传》五卷、《续文释》五卷、《续齐谐记》一卷。

裴子野四十五岁。后十七年，即梁中大通二年（530）卒，时年六十二岁。著有《集注服丧》二卷、《续裴氏家传》二卷、《众僧传》二十卷、《百官九品》二卷、《附益谥法》一卷、《方国使图》一卷、《宋略》二十卷、文集二十卷。

陆倕四十四岁。后十三年，即梁普通七年（526）卒，时年五十七岁。著有文集二十卷。

徐摛四十二岁。后三十八年，即梁大宝二年（551）卒，时年八十一岁。

殷芸四十三岁。后十六年，即梁大通三年（529）卒，时年五十九岁。

周捨四十三岁。后十三年，即梁普通七年（526）卒，时年五十六岁。著有《礼疑义》五十卷。

张率三十九岁，随晋安王萧纲还都，为中书侍郎。见《梁书》本传。按：萧纲本年入为宣惠将军、丹阳尹。后十四年，即梁大通元年（527）卒，时年五十三岁。著有《文衡》十五卷、文集三十卷。

到洽三十七岁，出为临川内史。见《梁书》本传。后十四年，即梁大通元年（527）卒，时年五十一岁。

萧子恪三十六岁。后十六年，即梁大通三年（529）卒，时年五十二岁。

刘杳三十五岁。以博学著称，佐周捨修撰国史。后二十三年，即梁大同二年（536）卒，时年五十八岁。著有《要雅》五卷、《楚辞草木疏》一卷、《高士传》二卷、《东宫新旧记》三十卷、《古今四部书目》五卷。

王籍三十四岁。后三十四年，即梁太清元年（547），随萧绎赴荆州，任安西府谘议参军、带作唐令，少时卒，时年六十八岁。

著有文集十卷。又善书法,《书品》将其列入下中品。

刘孝绰三十三岁。后二十六年,即梁大同五年(539)卒,时年五十九岁。著有《诗苑》及文集数十万言。

王筠三十三岁。后三十六年,即梁太清三年(549)卒,时年六十九岁。所撰文章以一官为一集,自洗马、中书、中庶子、吏部、左佐、临海、太府各十卷,又《尚书》三十卷。

伏挺三十岁。后三十六年,即梁太清三年(549)卒,时年六十六岁。著有《迩说》十卷及文集二十卷。

刘孝仪二十八岁,作《为晋安王让丹阳尹表》。见《艺文类聚》卷五十。按:晋安王萧纲本年为丹阳尹。见《梁书·简文帝纪》。后三十七年,即梁大宝元年(550)卒,时年六十五岁。

庾肩吾二十七岁,迁宣惠将军晋安王萧纲行参军。后三十七年,即梁大宝元年(550)后卒,时年六十四岁。

萧子显二十七岁。后二十四年,即梁大同三年(537)卒,时年五十一岁。著有《后汉书》一百卷、《南齐书》六十卷、《普通北伐记》五卷、《贵俭传》三十卷及文集二十卷。

周弘正十八岁,为丹阳尹晋安王萧纲主簿。后六十一年,即陈太建六年(574)卒,时年七十九岁。著有《周易讲疏》十六卷、《论语疏》十一卷、《庄子疏》八卷、《老子疏》五卷、《孝经疏》二卷及文集二十卷。

颜协十六岁。后二十六年,即梁大同五年(539)卒。时年四十二岁。著有《晋仙传》五篇、《日月灾异图》二卷。有二子显名于世:颜之仪、颜之推。

张缵十五岁。后三十六年,即梁太清三年(549)卒,时年五十一岁。著有《鸿宝》一百卷及文集二十卷。

谢徵十四岁。后二十三年,即梁大同二年(536)卒,时年三

十七岁。有文集二十卷。

萧统十三岁。后十八年，即梁中大通三年(531)卒，时年三十一岁。著有《正序》十卷、《文章英华》二十卷、《文选》三十卷及文集二十卷。按：从本年沈约死到中大通三年萧统死，其间十有八年，实际是昭明太子文学集团独擅文坛的历史时期。这个历史时期，作者颇众，创作亦丰，号称“晋宋以来所未之有也”(《梁书·昭明太子传》)。不过，从现存作品来看，他们的创作成就不仅远不能与元嘉三大家即谢灵运、颜延之、鲍照相媲美；而且也没有达到永明三大家即沈约、谢朓、王融所取得的成就；就是与梁代后期一些重要作家如庾信、徐陵等人的艺术成就相比，他们在许多方面也显得颇为逊色。平心而论，这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在前后两个文学高潮之间呈现出平缓发展的态势，成就平平，没有出现一个足以彪炳文坛的大家。当然，这个文学集团毕竟给后人留下一部影响极为久远的《文选》，毕竟首次发现了陶渊明的真正价值，毕竟创作了为数不能算少的文学作品，毕竟推动了梁代中期文学复古思潮的形成。仅此而言，这个文学集团就很值得我们作更深入的探讨。拙文《昭明太子与梁代中期文学复古思潮》(载《文选学论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曾作了初步的探讨，此不赘述。

周兴嗣迁给事中，与刘杳佐周舍修撰国史。见《梁书》本传。后八年，即梁普通二年(521)卒。著有《皇帝实录》、《皇德记》、《起居注》、《职仪》等百余卷及文集十卷。

王规作《新殿赋》，其辞甚工。见《梁书》本传。按：王规字威明，齐太尉王俭之孙。

萧纲十一岁。后三十八年，即梁大宝二年(551)遇害，时年四十九岁。著有《昭明太子传》五卷、《诸王传》三十卷、《礼大义》

二十卷、《老子义》二十卷、《庄子义》二十卷、《长春义记》一百卷、《法宝连璧》三百卷。

萧绎六岁，作《奉敕为诗》。见《金楼子·自序》。后四十一年，即梁承圣三年（554）被杀，时年四十七岁。著有《孝德传》三十卷、《忠臣传》三十卷、《丹阳尹传》十卷、《注汉书》一百一十五卷、《周易讲疏》十卷、《内典博要》一百卷、《连山》三十卷、《词林》三卷、《玉韬》十卷、《补阙子》十卷，《老子讲疏》四卷及《金德志》、《怀旧志》、《荆南志》、《江州记》、《贡职图》、《古今同姓名录》、《筮经》、《式赞》、《金楼子》和文集五十卷。

陆云公三岁。后三十四年，即梁中大同二年（547）卒，时年三十七岁。

其他作家，本年徐陵七岁，杜之伟六岁，庾持六岁，江德藻五岁，颜晃四岁，因均已入陈，此不详述。

附　　录

从武力强宗到文化士族

——吴兴沈氏的衰微与沈约的振起

公元317年，晋元帝司马睿在南渡“侨姓”士族及东南“吴姓”士族的支持下，建立了偏安江左的东晋王朝。在以后的二百多年间，江南统治大权实际操纵在南北士族豪门手中。当然，这些士族豪门的政治地位及其影响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有所不同的。即以东南豪族为例，朱张顾陆四门主要活跃在孙吴及西晋初年。两晋之际，义兴周氏、吴兴沈氏继起，故当时有“今江东之豪，莫强周、沈”（《晋书·周札传》）的说法。但义兴周氏进入南朝后，门庭已见冷落，朝中罕见光耀，而吴兴沈氏却累世显赫，文武昭著。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在门阀倾轧十分激烈的东晋南朝，沈氏家族何以能迅速崛起于两晋之际，并驰誉于南朝之间呢？沈氏家族曾是东南著名的武力强宗，到后来如同其他“吴姓”豪族一样，先后转向文化士族。这种转变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完成的呢？它对于沈氏家族曾产生过哪些重要影响呢？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我们对东南豪族集团的形成及其兴衰际遇的历史过程加深认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来把握东晋南朝政治、文化的发展脉络。

一、吴兴沈氏源流

沈氏故里在今浙江德清县。西汉时属会稽郡，名乌程县。东汉顺帝永建元年(126)分会稽为吴郡，乌程即属吴郡。灵帝熹平五年(176)合乌程、余杭为永安县。吴孙皓宝鼎二年(267)分吴郡为吴兴。晋太康二年(281)改永安县为武康县(据《宋书·自序》)。所以历史上称沈氏为吴兴武康人。

但推终原始，据说沈氏祖上并非南方土著，而是如同朱张顾陆四姓中朱张陆一样，由江北迁居而来。不仅如此，沈氏也并非其本姓。据沈约《宋书·自序》说，沈氏属少昊金天氏后裔。题名沈驎士撰《沈氏述祖德碑》(沈驎士《沈氏述祖德碑》颇多疑问。详见下编永明文学系年天监二年沈驎士条，此不赘述)称沈氏为周文王十子聃季后裔。聃季封于汝南平舆之沈亭，为沈子国。"沈氏得姓，实始诸此。"[①]沈氏迁居江南是在秦汉之际。沈约《宋书·自序》说："秦末有沈逞[②]，征丞相，不就。"沈逞曾孙沈保任太子太傅，沈保子沈遵自本国迁居九江寿春，官至齐王太傅敷德侯。秦汉时期，沈氏历代有官，如沈遵子沈达为骠骑将军，曾孙沈乾为尚书令。沈乾子沈弘为南阳太守，孙沈勖任河内郡守。沈勖子沈奋，御史中丞。所有这些，沈约与沈驎士的记载大体相同。但这些人物并不见史传记载，可见名声并不显赫。沈氏祖上最值得后人夸耀的大约要算沈戎。沈戎，字威卿，东汉初"说降剧贼尹良"(《宋书·自序》)，被光武帝封为海昏县侯，坚辞不受，因避地徙居会稽乌程县。从此子孙蕃衍，辉映先后。《述祖德碑》记载：沈戎永平元年(58)卒，葬于乡里金鳌山。"时有金鹅

飞集，三鸣而去。童谣曰：金鹅鸣，沈氏兴，代代出公卿。"不知这是沈氏后人杜撰，还是当时确有此谣，但沈氏家族的兴盛确实发轫于沈戎，却无疑问。自沈戎至南朝末，沈氏家族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东汉，沈氏家族以德行名世。据《宋书·自序》沈戎儿子中名字可考的有沈酆、沈浒和沈景。沈浒，字仲高，功名不显；沈景却以"端鲠清直"而成为沈氏家族第一个进入正史的人物。《后汉书·河间孝王开传》载："顺帝以侍御史吴郡沈景有强能称，故擢为河间相。景到国谒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赞拜，景峙不为礼，问王所在。虎贲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服，常人何别！今相谒王，岂谒无礼者邪？'王惭而更服，景然后拜。出住宫门外，请王傅责之曰：'前发京师，陛下见受诏，以王不恭，使相检督。诸君空受爵禄，而无训导之义。'因奏治罪，诏书让政而诘责傅。景因捕诸奸人，上案其罪，杀戮恶者数十人，出冤狱百余人。政遂为改节，悔过自修。"这里不过百余字，但沈景之精明强干已跃然纸上。这个阶段，沈氏家族最可值得注意的是两大支脉由此分开：一是沈浒后人，著名的有沈林子、沈田子、沈约、沈众等；一是沈景后人，著名的有沈演之、沈庆之、沈攸之等。

第二阶段是在晋宋之间，沈氏家族以武功扬名。两晋时期，沈氏家族已成为江东著名豪族之一。东晋建国之初，许多"侨姓"士族为了在江东站稳脚跟，首先要考虑的便是如何结交像沈氏这样的豪族。王敦叛乱时结交沈充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王敦是东晋开国重臣王导的从兄，称得上是南渡头等士族。他见"吴姓"士族周札一门五侯，"吴氏贵盛，莫与为比"（《晋书·周札传》），深为忌惮，借机杀掉周札一门。这说明"侨姓"士族与

"吴姓"士族之间的矛盾很尖锐。但王敦对沈氏却"遂相朋构"(《晋书·沈充传》),目的是扩充实力,以抗拒司马氏及其他士族势力。永昌元年(322)王敦以诛刘隗为名,起兵于武昌,与此同进,沈充也从吴兴起兵响应。这场叛乱在两年后被平定,沈充也被部曲将领所杀,从这里可以看出,吴兴沈氏拥有自己的地方武装,确有一定势力。晋宋间,吴兴沈氏更以勇猛晓兵而著称于东南。先看沈景这一支脉。沈庆之"忠谨晓兵,以勇闻。"刘宋初年,他多次率兵平定边地叛乱,进为司空。沈攸之亦征战东西,被封为贞阳县公。其他如沈演之、沈文秀等也无不以勇猛著称。再看沈许这一支脉。沈田子、沈林子兄弟追随刘裕讨伐南燕,大败刘毅,攻入长安,所以刘裕在庆功会上对沈田子说:"咸阳之平,卿之功也"(《宋书·自序》)。就连沈约的父亲沈璞也是一员骁将。元嘉二十七年王玄谟北伐,大败而归。魏兵追至江畔。沈璞时任盱眙太守,固城死守。魏兵攻打三旬不下,伤亡颇重,只得退去。这场保卫战对江南的稳固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皇帝及王公重臣等都致书祝贺,赏赐丰赡。这是沈氏家族发展的第一个顶峰,所以《述祖德碑》说:"沈氏之兴,莫过是也。"

第三阶段是在齐梁间,吴兴沈氏从武力强宗转向文化士族。这时期出现了两个重要人物,一是沈景后人沈驎士,专尚经子,著述极多。另一位是沈许后人沈约,终生致力于文史。沈驎士,字云祯。史载其"博通经史,有高尚之心,"终生不仕,以博学高隐而著称于齐梁之间。他卒于天监二年,但因其学术交游活动主要是在南齐年间,所以萧子显把他列入《南齐书·高逸传》。从古今诸著录来看,沈驎士的著述以经子为主,择其要者,大略如下:《周易要略》、《尚书要略》、《丧服要略》、《春秋要略》、《孝经要略》、《论语要略》、《礼记要略》、《周易两系》、《丧服经传义疏》、

《论语训注》以及《老子要略》、《庄子要略》等(参见陈述《补南齐书艺文志》、徐崇《补南北史艺文志》)。由此不难看出，沈驎士的学术活动多集中在儒家经典方面。这一点，对后来的沈氏家族颇有影响。如《梁书·儒学·沈峻传》载，沈峻"好学，与舅太史叔明师事宗人沈驎士，在门下积年，"学业颇有长进，名重一时。陆倕致书徐勉荐为五经博士。沈峻门下又有沈宏、沈熊等人，研习经典，时人"莫不叹服"。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沈峻的儿子沈文阿，"少习父业，研精章句"(《陈书》本传)，专治三礼三传，曾博采先儒异同，自为义疏，撰有《礼记义记》、《春秋义记》、《春秋发题辞及义记》、《春秋左氏经传义略》、《孝经义记》、《论语义记》、《经典大义》等书。所有这些，都是与沈驎士的学术旨趣一脉相承的。可以说，沈氏家族从武力强宗向文化士族转变过程中，沈驎士可能起到一定作用。但是，由于沈驎士仅以著述、隐逸知名，因此，他对于沈氏家族兴衰际遇的影响毕竟十分有限。与之相比较，沈约的作用就颇有不同了。其政治地位高，学术成就大，所以对沈氏家族的影响最大。

第四阶段是在陈代，沈氏家族以文史著称。沈约的儿子沈旋有《集注尔雅》，孙沈众被梁武帝誉为"文体翩翩，可谓无忝尔祖。"另外有沈炯，是梁陈之际著名文士。王僧辩称赞他的文章"当时莫有逮者"。其所著《归魂赋》影响颇大③。这个时期以文史出名的还有沈洙、沈不害等，多侧重在五经章句、子史杂著方面。而在政治上，沈氏家族较有影响的人物很少，至多仅能推出一个沈君理，而且主要还是由于他的女儿沈婺华被皇太子陈叔宝纳为妃子。陈叔宝即皇帝位，即为皇后，故"宗族多有显官"。联姻皇室，对于一些家族的地位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如齐梁皇室萧氏在宋代列为士族，其根源也在于联姻皇室。沈氏家

族在陈代联姻皇室不仅有沈君理一门，陈文帝皇后沈妙容亦为吴兴沈氏人。凭借着这种“国婚”关系，沈氏家族又似略呈复兴之势。但是究其实际，不论是武功还是文治，沈氏家族在陈代实已找不出一个真正能在历史上产生一定影响的人物了。这对于吴兴沈氏家族来说，与其说是复兴，倒不如说是家道真正衰微了。

二、吴兴沈氏特点

从沈戎定居吴兴武康到陈代亡国，前后经历了五百多年岁月。在这数百年间，吴兴沈氏始终以其顽强的生命力活跃在东南。这个事实本身就很耐人寻味。

沈氏家族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当首推其能征善战的传统。对于渡江南下的“侨姓”士族来说，像朱张顾陆那样很早就进入文化士族圈子的“吴姓”豪族还比较容易笼络，真正难对付的是周沈等武力强宗。就以义兴周氏为例，早在孙吴、西晋初年就以豪强著称于江左。如周鲂大败魏大司马扬州牧曹休，使之损兵万计。又如周处以“忠勇果劲”（《晋书·周处传》）为世人赞叹。东晋周札一门贵盛，使“侨姓”士族心存警戒，但是王敦借吴兴沈氏之力灭掉周札一门后，这个家族就一蹶不起了。这个时期，“吴姓”豪族中真正有实力与江北兵家将种相抗衡的，只有吴兴沈氏一门。“颇以雄豪闻于乡里”的沈充，“以武毅之姿，属殷忧之日，驱驰戎旅”的沈庆之，“屡有功”的沈攸之，“率步兵数万”深入西北的沈田子，“屡战摧寇”的沈林子，等等，无不声威播于遐迩。难怪沈约自叹“家世为将”了。这一点，刘宋统治集团也不能有

所忽视，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委之以重任。沈氏家族累世为将的传统所以能够形成，其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就其中比较明显的一点而言，这个传统的形成，恐怕与沈氏家族信奉天师道不无关系。天师道起自东方，传于吴会，在东南影响极为久远。《宋书·自序》说："钱塘人杜子恭通灵有道术，东土豪家及京邑贵望并事之为弟子，执在三之敬。"《晋书·孙恩传》也说：杜子恭、孙泰之道术，"三吴士庶多从之"。沈约高祖沈警、曾祖沈穆夫皆奉天师道，先后敬事杜子恭及门徒孙泰和泰侄孙恩。沈约虽信奉佛教，但在临死时仍用"道家"上章首过之法为自己开脱"罪孽"。沈僧昭"少事天师道士。"可见，沈氏家族奉持天师道确有传统。陈寅恪先生曾在著名的《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指出，汉末以来的几次大乱，如黄巾起义、孙恩起义等，无不是以道教信徒为骨干。何无忌参军殷阐曾说："三吴旧贼，百战余勇。始兴溪子，拳捷善斗。未易轻也"(《建康实录》)，劝谏何无忌不要轻视孙恩、卢循的力量。何无忌没有接受这个意见，结果大败，战死沙场。从这里看出，三吴人士及居于今湖广交界地带的溪族土著均以"百战余勇"及"拳捷善斗"著称于世，这是否与其崇尚天师道有关，我们可以作些肯定性的推测。当然，也仅限于推测而已。因为北来高门如王谢等家族也多信奉天师道，却不宜称他们为武力强宗。因此，吴兴沈氏崇尚武功，只能说与此或有关系，却不一定是决定因素。此外，沈氏家族所以能累世为将，恐怕还有一个经济上的原因。沈警"家世富殖，财产累千金"，堪称"东南豪士"(《宋书·自序》)。这至少说明，在东晋时代，沈氏家族所以能迅速崛起，雄厚的财力是其基础。不过，东南望族中，顾、陆、朱、张同样经济富足，但与沈氏家族相比，他们似乎缺乏一种军事实力。因此，他们虽说有钱，却不能说有势。

吴兴沈氏则不然。沈充响应王敦反叛，竟能从吴兴“率众万余人至”，可见他们有比较强大的地方武装势力。沈充被杀后，其子沈劲“以刑家不得仕进，”王胡之曾上书朝廷请求启用，说：“且臣今西，文武义故，吴兴人最多，若令劲参臣府事者，见人慨悦，义附亦众”（《晋书·沈劲传》）。这说明吴兴沈氏在东南确实影响很大。梁末侯景之乱时，沈氏家族已无人在朝中掌握军事大权，而沈众仍能从家乡“率宗族及义附五千余人入援京邑”。这些部曲家丁“军容甚整”，竟使“骁勇有膂力”的侯景也“深惮之”（《梁书·沈众传》）。其兵强气盛，于此不难窥见一斑。从这些材料来推断，沈氏家族所以能累世为将，他们拥有自己的地方武装，当是其中比较重要的因素。故此，东晋北府兵建立之初，其主力除过江下层人物外，再有就是东南像沈氏这样的武力强宗了。吴兴沈氏所以能在晋宋的政坛扮演重要角色，恐怕是与他们介入北府兵有直接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刘宋统治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委之以重任的历史原因。

吴兴沈氏家族还有一个比较醒目的特点，那就是强烈的功名意识。在东南望族中，吴兴沈氏属于后起，颇带有暴发户的色彩，为了保持和进一步发展家族的地位，必须作不懈的奋斗。他们不能像“侨姓”士族和王谢子弟那样安享先人的遗泽。翻开沈氏家族世系，真正遁世隐居，远引高蹈者聊聊无几，绝大多数可以借用《沈氏述祖德碑》的话说，“或致君泽民，或立言垂范，或折冲御诲，或孝友于家庭。”这里当然有不少溢美的成分，但沈氏家族不甘沉寂，不断在功名上追求进取，洵为事实。沈充率部曲起兵时曾豪迈地说：“男儿不竖豹尾，终不还也！”沈田子率众北伐，敌众我寡，支撑他信念的只有“封侯之日，其在此乎？”沈璞在魏兵压境之际对官兵慷慨陈辞：“此是吾报国之秋，诸君封侯之

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家族特点在吴兴沈氏后来的发展变化过程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在他们以武功相尚的同时，社会风尚已经在悄悄地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魏晋以来的尚武精神日消，而右文风气日盛。赶不上时代潮流，就会受到嘲弄。名重一时的沈庆之"手不知书，眼不识字"，虽以武功扬名，最后却在逼迫之下做出了一首不错的五言诗。沈攸之习武征战，到晚年始彻悟道："早知穷达有命，恨不十年读书。"到了南齐，沈文季甚至"讳称门将"。当褚渊不无讥讽地以"当今将略"相称时，他竟为此而大怒。细细揣摩，似乎不难体会，这恰恰反映了沈氏家族对于江北士族的文化挑战无法抗衡的自卑和向往。看来，他们已经日益强烈地感受到了新的危机。时势已迫使着吴兴沈氏走到了转折的关口。

宋末齐初，沈约踏上仕途。在强烈的功名观念的支配下，他能审时度势，从而推动了吴兴沈氏从武力强宗向文化士族的历史性转变。

三、沈约的振起

在沈约步入仕途之前，沈氏这一支脉曾遭受过两次较大的家祸。一次是在东晋初年，沈穆夫参与孙恩起义，沈警及沈穆夫兄弟五人先后罹难。只有沈穆夫的儿子沈田子、沈林子兄弟五人得以逃脱。第二次是在刘宋元嘉末，宋孝武帝征讨刘劭，沈璞以"奉迎之晚"被杀。这时沈约只有十三岁，为躲避缉拿，四处逃窜，历尽艰辛。沈约懂事伊始就生长在这样一个特殊环境里：一方面，家世崇尚武功、追求功名，属东南豪族后裔；另一方面，家

道坎坷多难，经常受到各个方面的夹击。这种特殊境遇对沈约一生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自视门第，又信奉儒学，他的入世精神特别强烈；但遭逢时难，家道颓危，他的处世态度又十分慎微。

沈约起家于宋代，但官位并不显要。早年值得留恋的是在蔡兴宗府下任幕僚的一段生涯，先是出任安西外兵参军、兼记室；后又为征西记室参军，带厥西令，颇得蔡兴宗的赏识，目以"入伦师表"。泰豫元年(472)蔡兴宗死，沈约留居郢州，后在郢州刺史晋熙王刘燮府下任幕僚，得以结识了同僚中后为齐武帝的萧赜、萧长懋父子，为日后的政治生涯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宋齐禅代之际，他在萧长懋幕府中任记室，开始了新的政治生涯。孙颉《辞署记室笺》说："记室之局，实惟华要。自非文行秀敏，莫或居之。"看来，萧长懋任用沈约是看中了他的通才敏思这一特长的。不过，青年时代的沈约并不想仅当个文士，而是想积极从政，渴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令他遗憾的是，萧齐皇室却始终把他看作一个文士。齐武帝曾对萧长懋说："汝可好以阶级在意……及文章诗笔，乃是佳事，然事务弥为根本，可常忆之。"可见齐武帝是个较重实际的君主，自然不会对沈约这样的文士多所措意。《南史·刘系宗传》载："武帝常云，学士辈不堪经国，唯大读书耳。经国，一刘系宗足矣。沈约、王融数百人，于事何用！"尽管沈约曾受到了文惠太子萧长懋、竟陵王萧子良的特别赏识，政治上有所发展、学术上也日益成熟，但是他的思想深层里隐藏着凄苦，因为现实境遇与理想目标相差太远了。他后来回顾这段生涯说："望得小禄，傍此东归，岁逾十稔，方忝襄阳县"(《与徐勉书》)。他为此深感失望。永明六年，沈约荐举同宗沈骥士出仕，结果被婉言谢绝。沈约给沈骥士写信，表露自己"冀幽期可

托，克全素履，与尊贤戈钓泉皋，以慰闲暮"的归隐志尚。当然，他并没有"傍此东归。"像他这样功名意识十分强烈的官僚世家子弟，是绝不会轻易放弃任何仕进机会的。文惠太子、竟陵王死后，靠山坍塌，他出守东阳，为此曾消极沉寂了一段时间。建武末，由于当时显贵徐孝嗣的荐举，沈约代齐明帝起草遗诏，又一次活跃在朝廷。特别是在齐末永泰、永元年间，沈约多次起草诏书，在政治上曾得意一时。

然而，沈约并没有利令智昏。多年的从政经验告诉他齐祚将终，与其随之倾覆，不如全身远害。于是他不得不暂时隐退。不久，他看准了西邸旧友萧衍，转投其门下，一举而成为萧梁开国重臣之一。这次选择给沈约及他的家族真正带来了昌运。萧衍先是为他封爵加官，后又为沈约等十余重臣铸铜像置于光宅寺内(《建康实录》)，一时间风云直上，权尊势重。但是细加考察，沈约在天监初也有诸多难言的苦衷。《资治通鉴》载，天监二年范云卒，朝臣咸以为沈约会接替范云职位，"宜当枢管。"出人意料的是，萧衍却以沈约"轻易"而不与。胡三省推绎文意说："沈约位虽在范云之右，而亲任不及云远矣。"这对于仕进欲望特别强烈的沈约来说，的确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天监六七年前后，沈约在京城郊区盖起一幢别墅，为此还特意写下名重一时的《郊居赋》，称自己"本忘情于徇物，"摆出一副超然世外的样子。大约与此同时，又作《与刘杳书》，称自己"生平爱嗜，不在人中。"但是，所有这些表白显然都是违心之论。天监九年，沈约为左光禄大夫，自以为"久在端揆，有志台司，"而萧衍根本不予考虑。于是沈约给徐勉写了一封长信，倾吐了满腹牢骚。所谓台司，即指三公，属人臣中的最高荣誉，向来只能由"侨姓"士族来担任。据《南齐书》的《沈文秀传》和《张绪传》，齐梁时代，"吴姓"士族连当

仆射的资格都被取消。梁武帝任孔休源为扬州刺史而曾轰动一时，因为孔休源是南士，不宜任此要职。由此看来，沈约以"吴姓"大户而任尚书令、尚书左仆射，已是梁武帝"心念旧恩"而给予的破例升迁。而沈约却不以此为满足。其"自负高才，昧于荣利，乘时借势"（《梁书》本传），总想在政治上重振家门，但是在时势的迫使下，这个愿望始终不曾变成现实。这显然不仅仅是沈约个人及其家族的悲剧，也是南方士族的悲剧。

历史上有许多事情叫人难以捉摸。沈约在政治上虽然没有太大的作为，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在文史领域却开基立业，创获良多，不仅被时人称为"一代文宗"，而且也成为沈氏家族从武力强宗向文化士族转变过程中的关键人物。

早在二十岁左右，他就立志修撰《晋书》。当时他的幕主蔡兴宗替他向宋明帝奏请，获得批准，开始正式修撰，逾二十年，成一百二十卷。建元四年(482)，《晋书》尚未竣事，又奉命"撰国史"，成《齐纪》二十卷。永明二年(484)又编撰齐《起居注》。永明五年又奉命撰《宋书》，共一百卷。梁天监初，又作《高祖纪》十四卷。可见沈约曾为晋宋齐梁四朝修史，这是沈氏家族从未有过的业绩。沈约颇以此自负，曾对王筠说："吾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梁书·王筠传》）。可惜"四代之史"仅存《宋书》一种，其他三史已经散佚。《宋书》的修撰是在何承天、徐爰等人旧著基础上增删润色而成。由于时代连接，许多史事必然有所回护。但像刘知几所说"《宋书》多妄"，则似乎要求过苛。《宋书》毕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材料，特别是《列传》六十卷，辑录了大量的原始奏稿书札，宋人单篇著述多赖此书保存下来。另外，《隐逸传》为陶渊明立传，并辑录了两篇作品。陶渊明在宋齐之间，声名不显，作于齐末的《文心雕龙》评述历代作家，竟只字不

提陶渊明，便是很好的说明(《文心雕龙·隐秀篇》曾提及陶渊明，但很多学者认为这一篇中的大段文字不可靠)。沈约却把他列入官修正史，这是沈约的一大功绩。还值得文学研究工作者重视的是《五行志》和《乐志》，前者辑录了许多古代民俗方面的史料，为后人研究南朝风俗民情提供了极大便利；后者则记录了自汉至刘宋庙堂乐舞和民间歌舞资料，为后世保留了许多瑰丽的诗篇[④]。

与其史学相比较，沈约在文学方面的成就更大，影响也更久远。

沈约的文学活动可大致分为两个时期。南齐永明前后为前期，主要从事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活动。在诗歌理论方面，沈约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声律主张。晋宋以来，许多作家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诗文创作必须寻求创新；这种创新不仅仅在于内容，更明显地体现在形式方面。刘宋时期著名古文作家、画家王微曾说："文词不怨思抑扬，则流淡无味"(《与从弟僧绰书》)。以"音旨缓韵"著称于永明年间的张融也曾自负地写道："吾文章之体，多为世人所惊"(《门律自序》)，并且"变而屡奇"(《戒子书》)。不仅诗文如此，这个时期的书法绘画也颇讲究"多态"与"骋势"。王僧虔《书赋》推崇的是"形绵靡而多态"，"迹乘规而骋势"，即在规矩之内寻求变化。这是一种时代的要求。南齐永明年间，"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玄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百数"(《南齐书·良政传序》)，是南朝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许多皇室子弟招集文士，讨论文艺，兼习释典，渐渐体味出梵汉语音的异同。像释僧祐《梵汉译经音义同异记》、慧皎《高僧传·经师论》等就是这种研讨的重要文献。特别是永明七年，竟陵王萧子良在

二月和十月两次大集"善声沙门",转读佛经(参见第一章《从隔阂走向融合——论竟陵八友及其在六朝文化史上的地位》),当时著名文人沈约、王融、刘绘、周颙、张融等都参与其事,这对于声律的研讨无疑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周颙《四声切韵》、沈约《四声谱》、王斌《四声论》等大约都完成在这个时期。其中尤以沈约的《四声谱》影响最巨。纪昀甚至认为,陆法言编《切韵》"实窃据沈约而作者也"(《沈氏四声考》),黄季刚先生也认为"韵书成于沈约"(详《文字声韵训诂笔记》),这里所说的韵书均指沈约的《四声谱》。此书在唐初已亡佚,但在明清之际竟出现了伪书。章学诚《丙辰札记》载:"朱竹垞序张士俊校刻《广韵》序云:近有岭外妄男子,伪撰沈约之书眩世,信而不疑者有焉。"此书影响之久远,由此不难推想。随着四声的发现,沈约等人马上又将声律理论运用到诗文创作中去。《梁书·王筠传》载,王筠读沈约《郊居赋》,其中有"雌霓连蜷"之句,王筠读"霓"为五激反,沈约为此抚掌欣忭,说他曾恐别人读"霓"为五鸡反。沈赋原文为"驾雌霓之连蜷,泛天江之悠永"。倘"霓"字读为五鸡切,即为平声,则两句中平声太多、仄声太少,使句式死板;如果读为五激切,即为仄声,则使两句平仄相间,形成了"|-|---,|----|"这样抑扬顿挫的句式。又王筠所称赏的"磓(坠)石堆星"与"冰悬坮而带坻"二句,其平仄关系是:"||--"与"--|-|-"的样式,即以"二仄"对"二平",又以"平仄"对"仄平"。这与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提出的"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的观点符合;所以沈约极为称赏王筠的"知音"。至于沈约的诗歌创作,尤其注意声律的调配。关于这点,第二章《若无新变 不能代雄——永明诗体辨释》一文曾作了比较详尽的考释。总而言之,声

律说的提出是晋宋以来的作家自觉地追求创新的必然结果，而沈约则是当之无愧的集大成者。

沈约文学活动的另一个时期是在齐梁之际。这一时期，他的主要贡献是在文学组织方面，奖掖后进，执文坛牛耳。在竟陵八友中，沈约年辈最长，但从来不自矜伐，而总是对别人称扬推许。任昉善长文章，才思敏捷，沈约"深所推挹"。陆倕同辈晚生，曾引荐张率拜访沈约，沈约对任昉说："此二子后进才秀，皆南金也。"评王融"元长秉奇调，弱冠慕前踪"；评谢朓"调与金石谐，思逐风云上。"从这里可以看出，沈约的为人比较敦厚诚恳，较少文人相轻的恶习。对同辈人尚且如此，至于后进新秀，沈约更是不遗余力地奖掖提拔：刘勰《文心雕龙》写好后，不见时贤推重，是沈约首先为之延誉，从此这部文学理论巨著才得以为世人所重视；何逊初登诗坛，即得沈约欣赏，说"吾每读卿诗，一日三复，犹不能已；"吴均清拔有古气，"沈约尝见均文，颇相称赏"；王籍博涉有才气，"甚为约赏"；刘孺颇负文名，沈约"引为主簿"；顾协举秀才，沈约览其策而叹曰："江左以来，未有此作；"萧子显作《鸿序赋》，沈约以为"得明道之高致，盖《幽通》之流也"；王筠文采风流，沈约每见其文，辄"咨嗟吟咏，以为不逮"。郊居别墅落成后，沈约将"晚来名家"中的王筠《草木十咏》、刘显《上朝诗》、何思澄《游庐山诗》以及刘杳的赞等并书之于壁，朝夕讽咏。类似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不少。齐梁文学的发展与繁荣，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作为一代文宗，沈约在进能劝贤、奖掖后进方面的功绩，也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东晋初年，王导向晋元帝提出联合吴姓士族的建议，目的是缓解南北士族的矛盾，使寄寓江左的"侨姓"士人能够安顿下来。

经过一百余年的起伏更替，南北士族逐渐消除了彼此间的隔膜，共同治理着江南。不过到了晋宋之交，出现了两个重要变化：第一，在"侨姓"士族中，以王、谢为代表的高门甲族在政治、军事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小，而多以文义相标榜；第二，在"吴姓"士族中，以吴兴沈氏在政治上的衰微及沈约在文化上的振起为显著标志，东南最有影响的豪族都已纷纷弃武从文，先后从武力强宗转向文化士族。这两种变化明显体现出了统治阶级内部权力的交替更迭。从此，江左军政大权便已完全操纵在后起的中下士族手中了。

注 释

① 林宝《元和姓纂》卷七"沈"氏条："周文王第十子聃食采于沈，因氏焉。今汝南平舆沈亭，即沈子国子也。"《述祖德碑》似本此而来。

② 沈逞，《元和姓纂》作沈郢。

③ 陈寅恪认为庾信《哀江南赋》的创作就受到了《归魂赋》的影响。见《金明馆丛稿初编》所收《读〈哀江南赋〉》。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④ 详见苏晋仁、萧炼子《宋书乐志校注》，齐鲁书社 1982 年版。

吴兴沈氏考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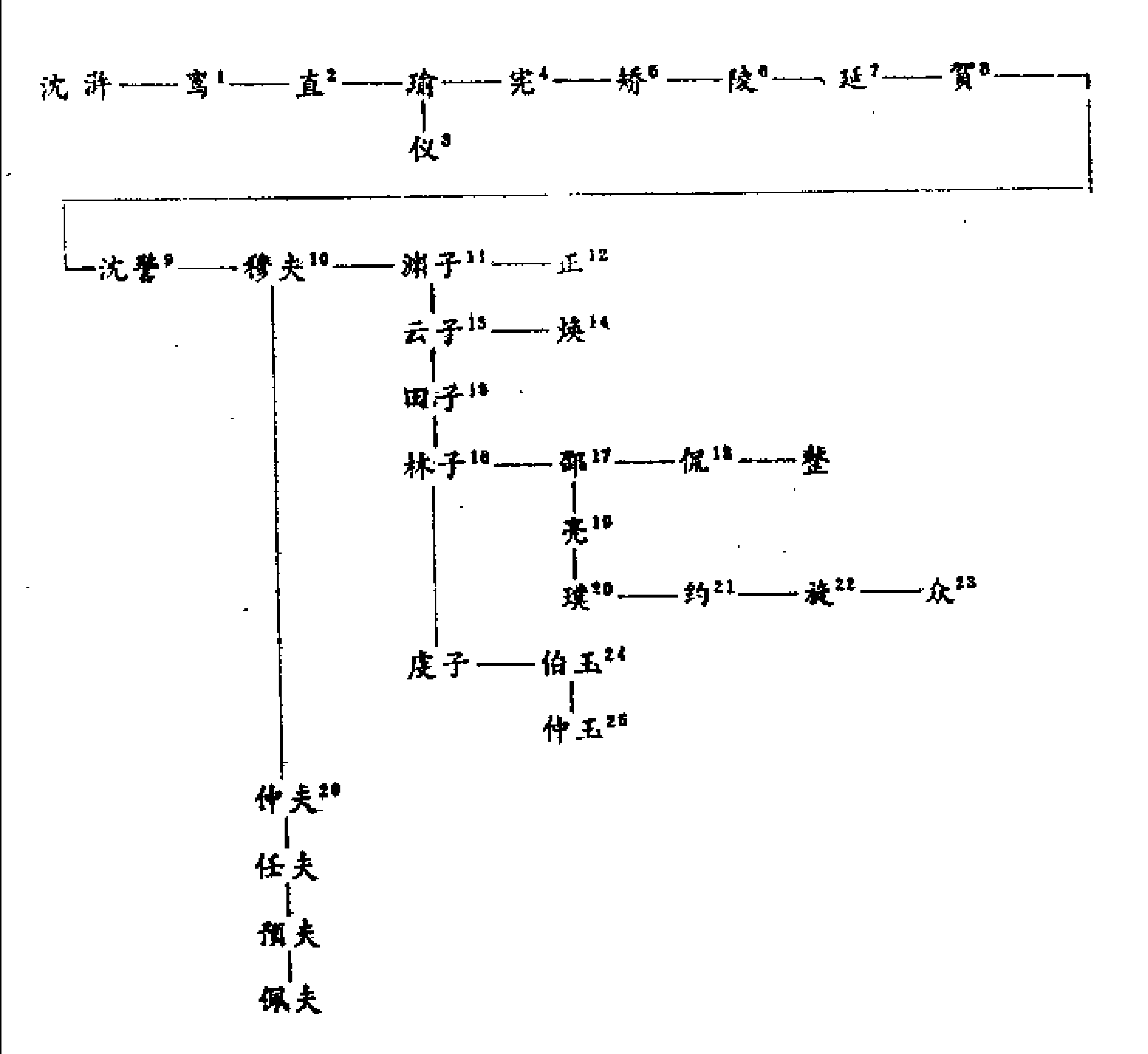
吴兴沈氏在东晋南朝已成为东南豪族，人才辈出，至沈约而声名更盛。本文拟对沈氏家族的世系略作考释，以明其发达的历史渊源。

从沈约《宋书·自序》来看，其祖先自沈戎以下，似乎"谱牒"有存，所以记载得比较详细："戎字威卿，仕州为从事，说降剧贼严良，汉光武嘉其功，封为海昏县侯，辞不受。因避徙居会稽乌程县之余不乡，遂世家焉。"

沈戎有三子，长子沈酆，字圣通，零陵太守。二子沈浒，字仲高，安平相。少子沈景，河间相。三子中，沈酆后代世系不详。而沈浒、沈景后人在晋宋以后，名声大振，成为东南著名的豪族之一。这一豪族在东晋南朝的兴衰际遇及其原因，我在《从武力强宗到文化士族——吴兴沈氏的衰微与沈约的振起》一文中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这里，仅就沈浒、沈景两大支脉的世系情况略作考述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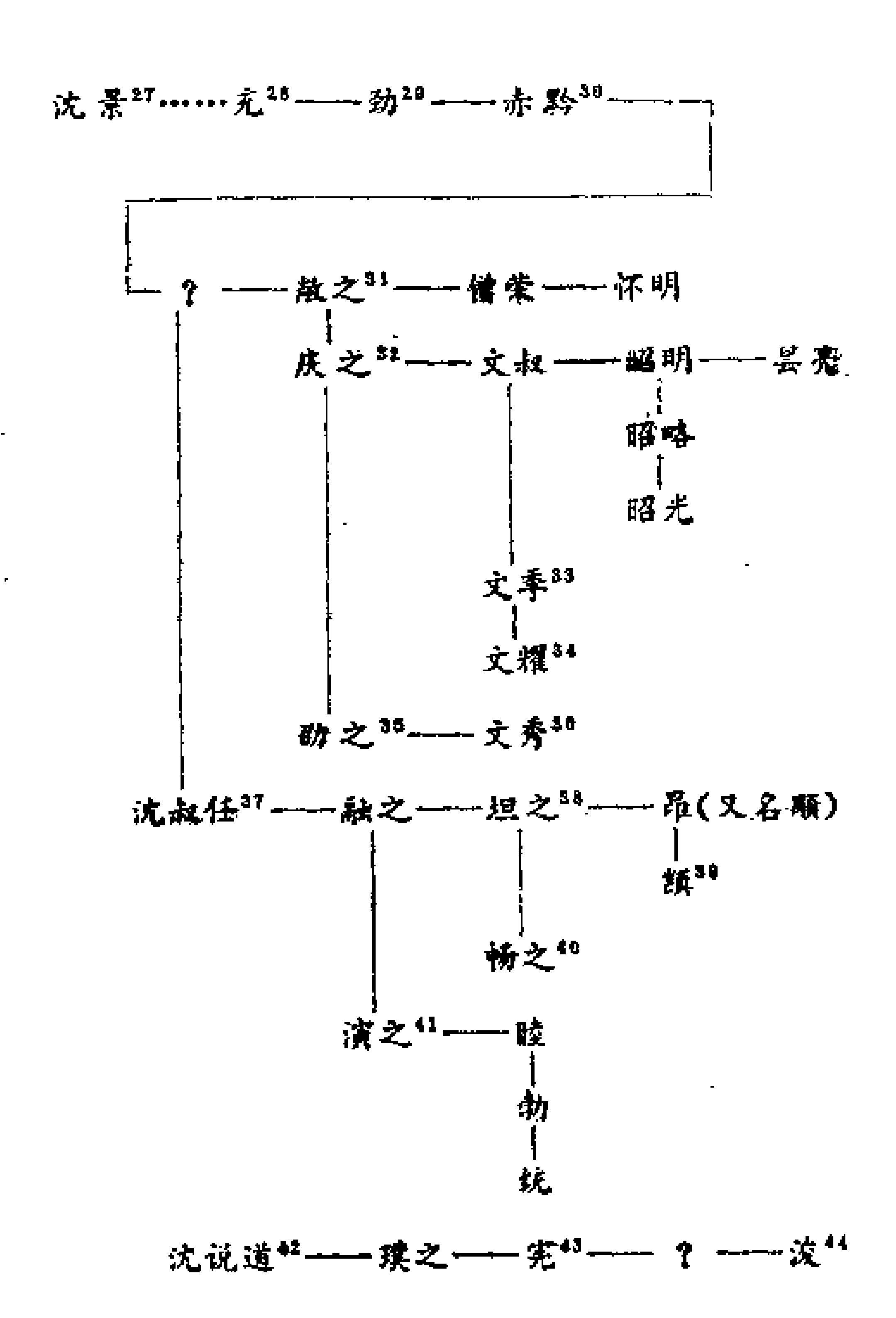
先看沈浒世系：（见下页）

先看沈許世系：



沈 許
鸾[1]
直[2]
瑜
仪[3]
宪[4]
矫[5]
陵[6]
延[7]
賀[8]
沈礬[9]
穆夫[10]
渊子[11]
正[12]
云子[13]
焕[14]
田子[15]
林子[16]
邵[17]
侃[18]
整
尭[19]
璞[20]
约[21]
旋[22]
众[23]
虔子
伯玉[24]
仲玉[25]
仲夫[26]
任夫
預夫
佩夫

再看沈景世系：



沈景[27]……允[28]——劲[29]——赤黔[30]
？——敞之[31]——儵棠——怀明
庆之[32]——文叔——昭明——昙亮
昭略
昭光
文季[33]
文耀[34]
劭之[35]——文秀[36]
沈叔任[37]——融之——坦之[38]——昂（又名顒）
顗[39]
畅之[40]
演之[41]——睦
勃
统
沈说道[42]——璞之——宪[43]——？——浚[44]

1.自序云："沈子鸾字建光，少有高名，州举茂才，公府辟州别驾从事史。时卢陵太守陆稠，鸾之舅也，以义烈政绩，显名汉朝，复以女妻鸾。年二十三，早卒。"

2.自序云："子直字伯平，州举茂才，亦有清名，年二十八卒。"按：沈直为汉末名士盛孝章女婿。

3.自序云："子仪字仲则，少有至行，兄瑜十岁仪九岁而父亡，居丧过礼，毁瘠过于成人。外祖会稽盛孝章，汉末名士也，深加忧伤，每抚慰之，曰：'汝并黄中冲爽，终成奇器，何为逾制，自取殄灭邪。'三年礼毕，殆至灭性，故兄弟并以孝著。瑜早卒。仪笃学有雅才，以儒素自业。时海内大乱，兵革并起，经术道弛，士少全行，而仪淳深隐默，守道不移，风操贞整，不妄交纳，唯与族子仲山、叔山及吴郡陆公纪友善。州郡礼请，二府交辟，公车征，并不屈，以寿终。"

4.自序云："子宪字元礼，左中郎、新都都尉、定阳侯，才志显于吴朝。"《南史·沈约传》作"沈曼，字元禅。"

5.自序云："子矫字仲桓，以节气立名，仕为立武校尉、偏将军，封列侯，建威将军，新都太守。孙皓时，有将帅之称。吴平后，为郁林、长沙太守，并不就。太康末卒。"

6.自序云："子陵字景高，太傅东海王越辟为从事。元帝之为镇军将军，命参军事。徐馥作乱，杀吴兴太守袁琇，陵讨平之。"

7.自序云："子延字思长，桓温安西参军、颍川太守。"又云"晋武帝平吴后，太康二年，改永安为武康县，史臣七世祖延始居县东乡之博陆里余乌村。"

8.自序云："子贺字子宁，桓冲南中郎参军，围袁真于寿阳，遇疾卒。"

9. 自序云："子警字世明，惇笃有行业，学通《左氏春秋》家世富殖，财产累千金，仕郡主簿，后将军谢安命为参军，甚相敬重。警内足于财，为东南豪士，无仕进意，谢病归。"又云："初，钱唐人杜子恭通灵有道术，东土豪家及京邑贵望并事之为弟子，执在三之敬。警累世事道，亦敬事子恭。子恭死，门徒孙泰、泰弟子恩传其业，警复事之。"孙恩起义被平定后，沈警被杀。

10. 自序云："子穆夫字彦和，少好学，亦通《左氏春秋》。""隆安三年，恩于会稽作乱，自称征东将军，三吴皆响应。穆夫时在会稽，恩以为前部参军、振武将军、余姚令。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恩为刘牢之所破，辅国将军高素于山阴回踵埭执穆夫及伪吴郡太守陆瓌之、吴兴太守丘尪，并见害"。与之同时被杀的除其父沈警外，还有四个弟弟，即沈仲夫、沈任夫、沈预夫、沈佩夫。"唯穆夫子渊子、云子、田子、林子、虔子获全。"

11. 自序云："渊子字敬深，少有志节，随高祖克京城，封繁畤县五等侯。又为道规辅国、征西参军，领宁蜀太守。与刘基共斩蔡猛于大薄，还为太尉参军，从征司马休之，与徐逵之同没，时年三十五。"又《南史》避唐高祖讳，改称沈深之。

12. 自序云："子正字元直，淹详有器度，美风姿，善容止，好老、庄之学。弱冠，州辟从事。宗人光禄大夫演之称之曰：'此宗中千里驹也。'出为始宁、乌伤、娄令。母忧去职。服阕，为随王诞后军安南行参军。诞镇会稽，复参安东军事"。"诞入为骠骑大将军，正为中兵参军，迁长水校尉。孝建元年，移青州镇历城，临海地空，除宁朔将军，齐北海二郡太守，委以全齐之任。未拜，二年卒。时年四十三。"据此，则沈正生于东晋安帝义熙九年(413)。

13. 自序云："渊子弟云子，元嘉中，为晋安太守。"

14. 自序云："云子子焕字士蔚，"元嘉末为驸马都尉、奉朝请。"后废帝元徽中以为宁远将军、交州刺史，未至镇，病卒，时年四十五。"

15. 自序云："田子字敬光，云子弟也。"生于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383)，卒于义熙十四年(418)，享年三十六。曾随刘裕克京城，参镇军军事，封营道县五等侯。义熙五年(409)随刘裕北伐鲜卑，领偏师，与孟龙符为前锋。八年从讨刘毅。十一年从讨司马休之。十二年领别军，随刘裕北伐，攻克长安。十四年被王修所杀。

16. 自序云："林子字敬士，田子弟也。"生于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二年(387)，卒于刘宋永初三年(422)，享年三十六。按：《宋书·自序》谓沈林子享年四十六，误(详见拙文《南朝五史校点稽疑》，载《出版工作》1990 年 11 期)。其生平经历与沈田子大体相同：从刘裕北伐鲜卑、攻克长安。永初元年，以佐命功封汉寿县伯。沈林子还长于著述，"所著诗、赋、赞、三言、箴、祭文、乐府、表、牋、书记、白事、启事、论、老子一百二十一首"，并有集七卷。

17. 自序云："子邵嗣。邵字道辉，美风姿，涉猎文史。""拜强弩将军，出为钟离太守。""元嘉二十六年卒，时年四十三。"据此，沈邵生于义熙三年(407)。

18. 自序云："子侃嗣，官至山阳王休祐骠骑中兵参军、南沛太守。侃卒，子整应袭爵，齐受禅，国除。"

19. 沈亮为沈林子第二子，后过继给沈田子为后。沈亮，"字道明，清操好学，善属文。未弱冠，州辟从事，会稽太守孟颉在郡不法，亮纠劾免官"。"二十七年卒官，时年四十七"。据此，沈亮生于东晋安帝元兴三年(404)。《自序》又载其"所著诗、赋、颂、

赞、三言、诔、哀辞、祭告请雨文、乐府、挽歌、连珠、教记、白事、牋表、签、议一百八十九首。"《隋志》著录有南阳太守沈亮文集七卷。

20.自序云:"璞字道真,林子少子也。"元嘉十七年为扬州刺史、始兴王濬主簿。寻除秣陵令。元嘉末迁宣威将军、盱眙太守、淮南太守。元嘉三十年刘骏讨伐元凶,沈璞以"奉迎之晚"遇害。沈璞亦善属文,著有赋、颂、赞、祭文、诔、七、吊、四五言诗、牋、表等。

21.沈约,字休文。生于元嘉十八年,卒于梁天监十二年。享年七十二。生平事迹见《梁书·沈约传》。

22.沈旋,沈约子。曾任中书侍郎、永嘉太守等职。见《梁书·沈约传》。

23.沈众,沈约孙。生平详见《陈书》本传。

24.自序云:"伯玉字德润,虔子子也。温恭有行业,能为文章。"曾任句容令、余姚令、南台御史等职。后废帝元徽二年卒,年五十七。

25.自序云:"弟仲玉,泰始末为宁朔将军、蜀郡太守。益州刺史刘亮卒,仲玉行府州事。""废帝诏以为安成王抚军中兵参军,加建威将军。沈攸之请为征西谘议,未拜,卒。"

26.自序云:孙恩起义被镇压后,"宗人沈预素无士行,为警所疾,至是警闻穆夫预乱,逃藏将免矣,预以告官,警及穆夫、弟仲夫、任夫、预夫、佩夫并遇害,唯穆夫子渊子、云子、田子、林子、虔子获全"。

27.自序云:"(沈)景,河间相,演之、庆之、昙庆、怀文其后也。"又沈景为沈氏家族第一个进入正史的人物。《后汉书·河间孝王开传》云:"开立四十二年薨,子惠王政嗣。政傲佷,不奉法

宪。顺帝以侍御史吴郡沈景有强能称，故擢为河间相。景到国谒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赞拜，景峙不为礼。问王所在。虎贲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服，常人何别！今相谒王，岂相无礼者邪？'王惭而更服，景然后拜。出住宫门外，请王傅责之曰：'前发京师，陛下见受诏，以王不恭，使相检督。诸君空受爵禄，而无训导之议。'因奏治罪。诏书让政而诘责傅。景因捕诸奸人上案其罪，杀戮尤恶者数十人，出冤狱百余人。政遂为改节，悔过自脩。"

28.《晋书·王敦传》附沈充传云："沈充，字士居。少好兵书，颇以雄豪闻于乡里。敦引为参军，充因荐同郡钱凤。"永昌元年，王敦以诛刘隗为名起兵，沈充亦率众响应，后兵败为故将吴儒杀。沈充祖上不详，但可以肯定是沈景之后，因《宋书·沈演之传》称"祖赤黔"云云，沈赤黔，沈充孙也。《述祖德碑》称沈彦为沈充高祖："彦子湘东守文泶，泶子海阳令夔，夔子澜，澜子充。"沈彦，《新唐书·宰相世系》谓沈景之子。其所据不详，姑附记于此。

29.《晋书·忠义·沈劲传》云：劲字世坚，升平中补冠军长史，辅佐冠军将军陈祐防御慕容恪。兴宁三年城陷被杀。追赠东阳太守。

30.《晋书·沈劲传》："子赤黔，为大长秋。"《宋书·沈演之传》："祖赤黔，廷尉卿。"

31.沈敞之为沈庆之兄。《宋书·沈庆之传》："兄子僧荣，敞之之子也。孝建初为安成相。""大明中为兖州刺史。景和中，征为黄门郎，未还，卒。子怀明，太宗泰始初，居父忧，起为建威将军，东征南讨有功，封吴兴县子，食邑四百户。历位黄门侍郎，再为南兖州刺史。元徽初，丁母艰去职。桂阳王休范为逆，起为冠军将军，统水军防固石头。朱雀失守，怀明委军奔走，顷之忧

卒。"《南史·沈庆之传》:"兄敞之为赵伦之征虏参军,监南阳郡,击蛮有功,遂即真。"

32.沈庆之,字弘光。"以勇闻"于刘宋初年。前废帝即位被杀,时年八十。生平见《宋书》本传。又"长子文叔,历中书黄门郎,景和末为侍中"。庆之死时亦"饮药自杀。子秘书郎昭明,亦自缢死。""昭明子昙亮,袭广兴郡公。齐受禅,国除。"沈昭明弟沈昭略、沈昭光,生平见《南齐书·沈文季传》后。《述祖德碑》云:沈庆之为沈膺期之子。不知何据。沈膺期,见《南齐书·沈驎士传》,沈驎士祖父也。

33.沈文季,字仲达,沈庆之子。以"当今将略"著称于宋齐之间。齐末被杀,生平见《南齐书》本传。

34.沈文耀为沈庆之少子。《宋书·沈庆之传》:"少子文耀,年十余岁,善骑射,帝爱之,又封永阳县侯,食邑千户。"

35.沈劭之为沈庆之弟。《宋书·沈庆之传》:"庆之弟劭之,元嘉中为庐陵王绍南中郎行参军,讨建安、揭阳诸贼,病卒。"

36.沈文秀,字仲远,沈劭之子。永明四年客死桑乾。生平见《宋书》本传。沈文炳,文秀弟。《南齐书·刘怀珍传》:"青州刺史沈文秀拒命,明帝遣其弟文炳宣喻,使怀珍领马步三千人随文炳俱行。"

37.沈叔任见《宋书·沈演之传》:"祖赤黔,廷尉卿,父叔任,少有干质。初为扬州主簿,高祖太尉参军、吴、山阴令,治皆有声。朱龄石伐蜀,为龄石建威府司马,加建威将军。平蜀之功,亚于元帅。即本号为西夷校尉、巴西梓潼郡太守、戍涪城。""义熙十四年卒,时年五十。长子融之,蚤卒。"

38.《南史·沈演之传》:"演之兄子坦之,仕齐位都官郎。"

39.《梁书·沈颢传》:"沈颢字处默。""父坦之,齐都官郎。"天

监四年卒。其兄沈昂(又作顒)生平见《南史·沈顗传》:“兄昂一名顒,亦退素,以家贫仕为始安令。”

40.《宋书·沈演之传》:“演之兄融之子畅之,袭宁新县男。大明中为海陵王休茂北中郎谘议参军,为休茂所杀,追赠黄门郎。子晔嗣。齐受禅,国除。”

41.沈演之,字台真,宋初名将。元嘉二十六年暴卒,时年五十三。其子沈睦,至黄门郎、通直散骑常侍。沈勃好为文章,善弹琴,能围棋,而轻薄逐利。沈统,大明中为著作郎。生平并见《宋书·沈演之传》。

42.《南齐书·沈宪传》:“祖说道,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父璞之,北中郎行参军。”沈璞之当与沈演之、沈庆之为堂兄。

43.沈宪,字彦璋,曾任山阴令、广陵太守、辅国将军、散骑常侍,当世称为良吏。生平见《南齐书·良吏传》。

44.沈浚,字叔源,沈宪孙。博学有才干,历任山阴、吴、建康令,入为中书郎、尚书左丞、御史中丞。侯景之乱中遇害。生平见《梁书》本传。

以上,只是初步疏理了沈浒、沈景以后两大支脉的世系情况,但仍很粗略。很多沈氏宗人,诸如刘宋时期的沈昙庆、沈怀文、沈怀远以及他们的后代沈淡、沈渊、沈冲等;沈攸之、沈登之、沈雍之以及他们的后代沈僧照等;齐梁时期的沈峻、沈文阿父子等,都曾名著一时。而且,他们与沈景这一支脉的血缘关系恐怕不会太远。沈约《宋书·自序》明确说过,沈昙庆、沈怀文为沈景后人,而《宋书·沈攸之传》也说沈攸之为沈庆之从兄子。其父沈叔仁大约与沈叔任同辈。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不少。这说明,在东晋南朝,吴兴沈氏确实人才辈出,堪称东南豪族,为其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声八病二题

一、"四声"之目是谁最早提出的?

"四声"之说在转读佛经的直接影响下,肇始于南朝宋齐之间。这一点,学术界似无异议。但是,"四声"之目是谁最早提出的,却是长期以来颇多歧异的论题。择其要者,我以为至少有三说。其一是王融首创说。钟嵘《诗品序》云:"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又《梁书·庾肩吾传》载:"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把王融置于前位,似亦主此说。其二是沈约首创说。王通《中说·天地篇》称李伯药说诗"上陈应刘,下述沈谢,四声八病,刚柔清浊,各有端序。"阮逸注云:"四声韵起自沈约。"其三是周颙、沈约同时创立说。陈寅恪先生在《四声三问》中说,周颙与沈约"一为文惠之东宫掾属,一为竟陵王之西邸宾僚,皆在佛化文学环境陶冶之中,四声说之创始于此二人者,诚非偶然也①。"近半个世纪以来,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渐趋一致,大都承袭了沈约创立四声说的观点。北京大学编《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郭绍虞先生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代表了这种主张。他们认为:"沈约利用了前人声韵研究的成果,从文学的角度,正式确定四声的名称。"

王融是不是首次揭橥四声名目,因没有任何其他旁证材料

作为依据，无法作进一步的探讨。就现存有关史料来看，四声之目的创始似应归功于周颙。周颙，字彦伦，汝南安城人。《南齐书》卷五二《陆厥传》云："汝南周颙善识声韵。"卷四一《周颙传》又载："颙音辞辩丽，出言不穷，宫商朱紫，发口成句。"《南史》卷三四还记载他"著《四声切韵》行于时。"书虽久佚，但从书名可知，这是一部考辨四声的专著。据《南齐书》卷四一载："颙卒官时，会王俭讲《孝经》未毕。"王俭永明三年领国子祭酒，太子少傅，永明七年五月卒。据此，陈寅恪先生以为，周颙卒年在永明七年五月王俭薨逝以前，永明三年王俭领国子祭酒及太子少傅之后。但据我考证，周颙当卒于永明八年冬天之后，永明十一年之前（详见《周颙卒年新探》）。由此可以断定，《四声切韵》成书年代的下限不会超出永明年间。

问题在于，大约在这个时期，沈约也同时或前或后提出了四声之说。据沈约《宋书·自序》，永明五年春沈约被命撰《宋书》，因为有前人著述作为基础，所以在翌年二月毕功表上。该书《谢灵运传论》依据声律要求评骘历代作家，并不无自负地说："自骚人以来，此秘未睹"。《梁书》卷十三载沈约也曾撰有《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寤，而独得胸襟，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南齐书》卷五二载沈约《答陆厥书》仍复坚持这种主张。这就很容易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近人许多论著所以确信沈约创立四声说，所据或在于此。即使是很谨慎的学者如陈寅恪先生也只能据此笼统地得出结论：沈约四声说"当与周颙不甚相先后"，却不能具体指出谁是始创者。

《文镜秘府论·天卷》引隋刘善经《四声指归》曰："宋末以来，始有四声之目，沈氏乃著其谱论，云起自周颙。"这里所说的"谱论"大约是指沈约《四声谱》，在刘善经时代尚有流传。"云起自

周颙"显然不是刘善经所云，而是沈约《四声谱》的话。这条材料告诉我们，在自诩"独得胸襟"之余，沈约又不得不承认，四声之目并非他的创见，而是沿用了周颙的成说。为此，我们还可以参之以其他旁证。唐封演《封氏闻见记》载："周颙好为韵语，因此切字皆有纽，皆有平上去入之异。永明中，沈约文辞清拔，盛解音律，遂撰《四声谱》。"唐释皎然《诗式·明四声》也说到，前人"不闻四声。近自周颙、刘绘流出，宫商畅于诗体，轻重低昂之节，韵合清高，此未损文格。沈休文酷裁八病，碎用四声，故风雅殆尽。"刘善经、封演、皎然上距四声说发明的宋齐时代不是很远，而且他们精通音律，语多征实。他们所说的周颙实为四声之目最早提出者的观点，应当值得注意。

二、八病四问

关于四声八病的发明及其在诗歌创作中的运用，历来是研究中古诗歌、特别是研究齐梁诗歌所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严羽认为："四声设于周颙，八病严于沈约"(《沧浪诗话·诗体》自注)。四声之目始自周颙，已详上文考述，自无问题。但"八病严于沈约"的说法却颇多疑窦。这特别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关于八病的具体解说，如果从《文镜秘府论》的记载算起，至今业已一千多年，其间诸说纷纭，迄无定论，就像中古诗歌研究中的一个哥德巴赫猜想，总是处于猜想阶段，虽然新见迭出，却很难得到普遍的认可；第二，关于八病说的创始者，或者说八病说的产生时代，一说沈约所创，一说后人附会，虽然歧说不多，却也针锋相对，至今没有得到一个统一的认识。不过，关于后一方

面的问题，还不曾有过专门深入的讨论，大多数文章只是捎带一提，并没有提出更多的论据。近年，日本学者清水凯夫先生著《沈约八病真伪考》，专门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所得结论斩截不疑："八病为沈约创始是不言自明的事实。"其后他又在此基础上作《沈约声律论考——探讨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及《沈约韵纽四病考——考察大韵、小韵、傍纽、正纽》[②]，用力甚勤，考论极细。

三篇中尤以第一篇为重要，是清水凯夫先生立论的基始，所以特别引起我的兴趣。但在反复研读之余，我却不能不遗憾地承认，许多原来没有想通的问题还是没有搞懂，这就越发使我相信，"八病严于沈约"或如清水先生所说"八病为沈约创始"的说法很难站得住脚，否则，下列四个疑问该如何回答呢？

一问：永明诗人、特别是沈约何以不言八病？

《南齐书·陆厥传》："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沈约、谢朓、王融、周颙为永明重要作家，他们对自己发明四声说颇多自负。特别是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专以声律为准绳，评骘历代作家优劣得失，并自诩："自骚人以来，此秘未睹。"当陆厥致书问难质疑时，他又再三申辩。据《梁书·沈约传》、《南史·周颙传》及《隋书·经籍志》记载，沈约著有《四声谱》、周颙著有《四声切论》，说明他们发现了四声，有文献可征，确无问题。但是，在他们现存的比较可靠的著述中，却未见提及八病。

《文镜秘府论·西卷·文二十八种病》间或采用刘善经、元兢及沈氏等人的意见。有学者认为，此沈氏当即沈约。恐怕这一

说法过于绝对。文中有时称沈氏为"沈给事",这就不像是沈约,因为他从未出任过此职。但该卷在"鹤膝"条下引"沈东阳著辞曰:"若得其会者,则唇吻流易,失其要者,则喉舌蹇难。事同暗抚失调之琴,夜行坎壈之地。"所谓"沈东阳"云云显然是沈约。紧接这段又引刘氏(善经)云云,中间引述"沈氏曰:'人或谓鹤膝为蜂腰,蜂腰为鹤膝,疑未辨'。"于是他评论道:"然则孰谓公为该博乎!盖是多闻阙疑,慎言寡尤者欤。"从引文来看,这里所谓"沈氏"似指沈约。他提到"蜂腰、鹤膝"二病,声言"疑未辨,"但没有提到"八病"。联系到钟嵘《诗品序》:"平上去入,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也仅提此二病,并且说,避免蜂腰鹤膝这一类声调抑扬对称的诗歌特点,民歌中也是有的。说明这两个概念在梁代以前已经流行,只是具体解释不一,所以连素以"该博"著称的沈约也"疑未辨"。如果沈约提出八病,怎么会"疑未辨"呢?

又《文镜秘府论·天卷·四声论》载沈氏《答甄公论》云:"作五言诗者,善用四声,则讽咏而流靡;能达八体,则陆离而华洁。"同卷又载常景《四声赞》云:"四声发彩,八体含章。"郭绍虞先生《永明声病说》(载《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逯钦立先生《四声考》(载《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郁沅《永明体与诗的声律之美》(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 11 辑)、杨明《蜂腰鹤膝旁纽正辨》(载《文史》第 28 辑)以及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83 年版)并以为八体即八病,从而为沈约曾论及八病之说找到了根据。其实这种根据很难站得住脚。第一,从训诂的角度来看,古往今来,未有将体训为病者。体之本意,为人体(见《说文》《广雅》)。引申为国体、书体、文体等。书体有八体之说,如《汉书·艺文志》:"八体六技。"《说文解字叙》:"秦书有八体",

等等。文体也有八体之说，如《文心雕龙·体性》："若总其归涂，则数穷八体，"是指文章风格，并没有将体字引申为病。《文镜秘府论·西卷·论病》有"八体十病"之说，体与病分论，实"名通而理隔"，不能混为一谈。第二，再从上下文推寻，八体亦与八病了无关系。"陆离而华洁"及"八体含章"均褒义。含章即含美。《易·坤卦·象辞》："含章可贞。"王弼注："含美可正。"如果八体与八病同义，这在逻辑上就自相矛盾了：八病既为诗家所忌，又如何言"能达八体则陆离而华洁"以及"八体含章"呢？

二问：关于八病的文献记载何以越来越详？

在隋唐以前的文献记载中，未见"八病"一词，唯钟嵘《诗品序》提到其中"蜂腰、鹤膝"二名。隋末大儒王通《中说》可能是最早提到八病的文献资料："李伯药见子而论诗，子不答，伯药退谓薛收曰：'吾上陈应刘，下述沈谢，四声八病，刚柔清浊，各有端序。"阮逸注："四声韵起自沈约，八病未详。"据余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辨证》，隋末确有王通其人，唐时实有《中说》其书。这说明，隋末时，八病之目似已在世间流传，但未见具体解说，也未有确指始创者。从现存材料来看，较早将八病的创始归之于沈约的，当推初唐的卢照邻。他在《南阳公集序》中说："八病爰起，沈隐侯永作拘囚。"其后，殷璠《河岳英灵集叙》说："夫能文者，匪谓四声尽要流美，八病咸须避之。"又中唐皎然《诗式》也说："沈休文酷裁八病，碎用四声，故风雅殆尽。"至此，沈约创为八病的说法似已为世人普遍接受。

但是，所谓"八病"具体指哪八种，每一种声病的具体内容又如何，中唐以前的文献记载似乎并不详尽。我们只知道初唐时所编著的《南史·陆厥传》在钟嵘所提出的"蜂腰鹤膝"之外又多出"平头、上尾"二病："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

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又封演《封氏闻见记》也仅指出这四种声病名称：“永明中，沈约文词精拔，盛解音律，遂撰《四声谱》。文章八病，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以为自灵均以来，此秘未睹。”中唐以后，八病的具体名称始见于记载，而且有了详细的解说，最可靠的文献记载要推日僧遍照金刚所著的《文镜秘府论》。可是在该书《西卷》中所记载的已不仅仅是八病，而是二十八病！其前八种是：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这也就是后人所说的“八病”的具体名目。在每一名目下，作者曾给予详尽解说。因为没有注明出处和依据的文献，所以我们无法知道这些解说是齐梁遗说，还是作者汇总众说、敷衍而成。两宋以来，李淑《诗苑类格》、梅尧臣《续金针诗格》、王应麟《困学纪闻》、魏庆之《诗人玉屑》以及《蔡宽夫诗话》等，都或详或略地记载了八病说的内容。宋人所说八病，微有不同，但总的来说，多与《文镜秘府论》相近，似同出一源。明清以来，迄于近现代，对于八病说的理解，分歧越来越大。纪晓岚作《沈氏四声考》综合诸家之说而总以己意，颇为详赡③。刘大白又作《关于“八病”的诸说》，罗列了中外的异说，其中关于平头有三说、上尾有两说、蜂腰有三说、鹤膝有四说、大韵有两说、小韵有两说、旁纽、正纽与古说无异④。如果再加上现代中外学者的理解，关于八病的歧说就更多了。

从上述历史资料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关于八病的文献记载越来越详，分歧也越来越大。如果要循流溯源，又扑朔迷离，莫究其详。这种现象该如何理解呢？

二问：沈约所推崇的作家作品何以多犯八病？

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说：“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

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所谓"子建函京之作"是指曹植《赠丁仪王粲》，"仲宣霸岸之篇"是指王粲《七哀诗》；"子荆零雨之章"是指孙楚《征西官属送于陟阳侯作诗》，"正长朔风之句"是指王讃《杂诗》。就沈约所称引的四联诗句来看，其平仄调配颇有规律可循：

曹植：从军度函谷，驱马过西京。

－－|－|，－||－－

王粲：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

－－|－|，－||－－

孙楚：晨风飘歧路，零雨被秋草。

－－－－|，－|－－|

王讃：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

|－|－|，－||－－

很显然，每联下句都是入律句，可谓"音律调韵"，所以得到沈约的高度赞赏。但是，如果从"八病"的角度来衡量这些诗作，不仅全诗不合者甚多，就是沈约所欣赏的这四联诗亦多犯八病。尚长清在《谈〈文心雕龙·声律篇〉与齐梁时代的声律论》（载《文心雕龙学刊》第一辑）一文中曾对这四首诗的音律作过认真的分析，结果发现：

犯平头例——曹植诗：从驱、山泾、员承、权全、欢中、佐海。王粲诗：西豺、亲朋、出白、路抱、南回、有子、知能、马忍。孙楚诗：晨零、乖惆、能云。王讃诗：胡靡、师谁、宁靡、涓能。

犯上尾例——曹植诗：居城、朝营。王粲诗：象患、悲攀、人间、声迁、人肝。孙楚诗：送道、子夭。王讃诗：鸣吟、乡林。

犯蜂腰例——曹植诗：哉居、能声、生朝、和经。王粲诗：弃去、身蛮、闻声、能完、然肝。孙楚诗：雨草、凶缠、喜绕、人观、此

早、离衢、怅抱、能心。王瓒诗：靡今、事志、来吟、能心。

犯鹤膝例——曹植诗：谷极、居云、惠胜。王粲诗：象去、人声、处去。孙楚诗：路送、缠烦、观衢、心朝。

犯大韵例——王瓒诗：今吟。

犯小韵例——王瓒诗：王商、事志、今吟、涓宣。

犯旁纽例——曹植诗：员云。王粲诗：驱去。孙楚诗：犹夭、吉纠、达大。

如果沈约是八病说的创始者，那么他对上述四诗的声病问题应当有所指正，可惜事实上并没有。他所关注的似乎只是"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即字与字之间、句与句之间的平仄"颠倒相配"(《与陆厥书》)，而对于所谓"八病"似乎并不过分考究。这是什么原因呢？

四问：沈约自己的创作何以多不拘八病？

有学者认为，因为永明以前的诗人不知道所谓"八病"之说，所以，"把八病一一对(上述)四首诗进行硬套可以说是没有意义的"(兴膳宏《〈宋书·谢灵运传论〉综说》，载《中国文艺思想史论丛》第一辑)。如果根据这个逻辑而推论，那么，生活在永明时代、同时又传说是八病说的创始者，沈约总该知道八病的具体内容吧？他的创作总该尽量避免八病吧？笔者就此问题曾对《文选》、《玉台新咏》以及王闿运《八代诗选》卷十二"齐已后新体诗"所收沈约五言四句、八句、十句诗共三十二首作过统计，结果发现，沈约之诗多犯八病。

1.犯平头例：

"平头诗者，五言诗第一字不得与第六字同声，第二字不得与第七字同声。同声者，不得同平上去入四声，犯者名为犯平头"(《文镜秘府论二十八种病》，下同)。

《早行逢故人车中为赠》：残余、宵晨。《应王中丞思远咏月》：方圆、高西、楼园、轩门、房光。《冬节后至丞相第诣世子车中》：廉门、贵况、高珠。《古意》：立戚、衾衣、明宁。《梦见美人》：闻君、既又、立怨、那潺、知援。《咏湖中雁》：群单、刷一、羽举。《游钟山诗应西阳王教》：风带、势气、事眺、南西、春秋、光风、值架、冥条。《夜夜曲》（八句）：星宁、孤寒、灯机、零鸡。《咏柳》：因沾。《脚下履》：转表。《别范安成》：生分。《有所思》：西东、明徜、流因。《泛永康江》：长清、山春。《咏青苔诗》：微轻、根丝、长深、风堂、萦葳。《江南曲》：歌莲、宜舟、令汁。《拟青青河边草》：离床。《效古》：怜雄、暮至、云心。《携手曲》：斜开。《初春》：扶佳、无空。《秋夜》：童女、知要。《咏桃》：风风、歌游、减断。《咏篪》：殷含、勤情、雕轻、梁尘、中诚。

2.犯上尾例：

"上尾诗者，五言诗中，第五字不得与第十字同声，名为上尾。"

《领边绣》：吹枝。《初春》：非有。

3.犯蜂腰例：

"蜂腰诗者，五言诗一句之中，第二字不得与第五字同声，言两头粗、中央细，似蜂腰也。"

《襄阳白铜鞮》：欲息。《早行逢故人车中为赠》：晨归。《夜夜曲》（四句）：光床。《应王中丞思远咏月》：园才、门苔、光哉。《古意》：衣香、知伤。《梦见美人》：觉侧。《春咏》：罗持、心时。《游钟山诗应西阳王教》：地岭、随高、风枝、霞旗。《夜夜曲》（八句）：灯明。《咏柳》：阳章。《领边绣》：声吹、风枝、承垂。《脚下履》：转响。《有所思》：蓟花、书斜。《泛永康江》：源苔。《咏青苔诗》：丝联、堂钱、綦怜。《洛阳道》：阳中、裙开、人来。《江南曲》：

歌潭、莲南、令渡。《效古》：怜枝、雄雌 心移。《携手曲》：衣床、思长。《秋夜》：烟氲、瞳雾、离云、女裙。《咏篪》：情垂、尘移、诚知。

4.犯鹤膝例：

"鹤膝诗者，五言诗第五字不得与第十五字同声，言两头细、中央粗，似鹤膝也。"

《为邻人有怀不至》：来非。《冬节后至丞相第诣世子车中》：满上。《咏湖中雁》：行乡。《脚下履》：席妾（入）。《有所思》：满使（上）。《洛阳道》：中开（平）。《江南曲》：带渡（去）。《初春》：花来（平）。

5.犯大韵例：

"大韵诗者，五言诗若以'新'为韵，上九字中，更不得安'人、津、邻、身、陈'等字，既同其类，名犯大韵。"

《游钟山诗应西阳王教》押青韵，"灵"字系青韵字，当避而不用。《领边绣》押支韵，复用支韵"移"字，犯声病。《咏青苔》押仙先韵，复用仙韵"缘"字，犯声病。《咏桃》押阳唐韵，复用唐韵"当"字，犯声病。

6.犯小韵例：

"小韵诗，除韵以外，而有迭相犯者，名为犯小韵病也。"

《为邻入有怀不至》：言翻（同属元韵）。《脚下履》：飒沓（同属合韵）。《别范安成》：一日（同属质韵）。《携手曲》：舍下（同属马韵）。《应王中丞思远咏月》：一联内两用祃韵"夜"字。《游钟山诗应西阳王教》：一联内两用至韵"地"字。又"愿寸"同属愿韵。《夜夜曲》（八句）：一联内两用庚韵"横"字。《咏桃》：一联内两用韷韵"风"字。

7.犯傍纽例：

"傍纽诗者，五言诗一句之中有'月'字，更不得安'鱼、元、阮、愿'等之字，此即双声。双声即犯傍纽。"

《古意》：月外（同属疑母）。《游钟山诗应西阳王教》：衿垧（同属见母），解涧（同属见母），寸此（同属清母）。《夜夜曲》（八句）：河横（同属匣母）。《咏柳》：结解（同属见母）。《领边绣》：纤新（同属心母）。《脚下履》：趋锵（同属清母），先绣（同属心母）。《有所思》：见家（同属见母），流泪（同属来母）。《泛永康江》：永矣（同属于母），寄国（同属见母）。《咏青苔诗》：萦郁（同属影母）。《江南曲》：歌江（同属见母），但渡（同属定母）。《拟青青河边草》：息想（同属心母），不别（同属帮母）。《效古》：岁栖宿（同属心母）。《秋夜》：烟郁氲（同属影母）。《咏桃》：游夜（同属喻母）。《咏篪》：江管（同属见母）。

8.犯正纽例：

"正纽者，五言诗'壬、衽、任、入'四字为一纽；一句之中已有'壬'字，更不得安'衽、任、入'等字。如此之类，名为犯正纽之病也。"

《泛永康江》：永悠（平声、喻母、尤韵）。

以上所举还仅仅是沈约部分诗作，绳之以八病，几乎"篇篇有之"（胡应麟《诗薮》卷14）。若按照《文镜秘府论》所说，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四病，但须知之，不必须避"，说明前四病尤忌，而在前四病中，"惟上尾、鹤膝最忌，余病亦通"（王应麟《困学纪闻》）。而沈约的诗作，恰恰前四种声病触犯最多，而后四种声病反倒少所犯忌。这种现象难道不值得我们再三思之吗？

研究八病，上述四问显然不能回避。如果客观地分析这些问题，我们只能倾向于一个答案，那就是，八病之说，恐非沈约创始。当然，根据钟嵘《诗品序》，齐梁之际，蜂腰鹤膝等声病之说

确已在世间流传。又据《梁书·王筠传》，王筠读沈约《郊居赋》中"雌霓连蜷"，读霓为五激反（入声），沈约抚掌欣忭，说他曾恐人读霓为五鸡反（平声），认为王筠"知音"，这段记载说明沈约确实特别注意诗文声律的调配。但当时体制尚未尽谐，他不可能如此超前地创造出连用律最严的唐人都难以遵从的八病之说。从上引材料来看，八病之说大约是累积制造而成的。杨慎曾集六朝五言诗为《五言律祖》。他在序中推断道："岂得云切响浮声兴于梁代，平头上尾创自唐年乎？"纪晓岚也认为："齐梁诸史，休文但言四声五言，不言八病。言八病自唐人始"（《沈氏四声考》）。他们的这种看法不是没有一定根据的。隋唐之际，近体诗初兴，加之以诗赋取士，所以人们对于诗歌的声律问题，兴趣越来越浓，考究越来越细。上官仪、长孙无忌等人在齐梁诗歌创作基础上提出"六对"、"八对"之说；隋唐类书如《北堂书钞》、《初学记》、《艺文类聚》等也主要汇总了魏晋南北朝的诗文资料，以备当时士子缀文之需。所有这些，颇能反映出当时谈诗论艺之风的兴盛。八病之说很可能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提出来的。因为有齐梁声病理论作为基始，所以很难把它视为隋唐人的独创，于是人们上溯齐梁，自然而然地攀附到了以创立声律说而闻名于世的沈约。

注　释

① 陈寅恪《四声三问》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② 并见《六朝文学论文集》，清水凯夫著，韩基国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③ 纪昀《沈氏四声考》，畿辅丛书本。

④ 刘大白《关于"八病"的诸说》，收入《白屋说诗》，开明书店1935年版。

周颙卒年新探

在中国古典律诗发展史上，周颙应占有一席之地。其《四声切韵》一书较早提出了四声之目，嘉惠于学林颇巨。梁武帝萧衍不谙四声之说，特意问周颙之子周捨“何谓四声”（见《梁书·沈约传》）。可见在当时人心目中，周颙实是四声的发现者。可惜，关于周颙生卒年，史传没有明确记载，所以歧说不一。《南齐书》本传仅云：“颙卒官时，会王俭讲《孝经》未毕。”王俭于永明三年领国子祭酒，七年五月卒。据此，陈寅恪先生在《四声三问》中推断周颙卒年“当在永明七年五月王俭薨逝之前，永明三年王俭领国子祭酒及太子少傅之后”。日本学者铃木虎雄先生据沈约《与约法师书》中“去冬今岁，人鬼见分”一句考订周颙卒于永明六年冬（见《沈约年谱》）。

但是，《南齐书·刘绘传》、《陆厥传》均载周颙、沈约等人发现四声是在“永明末”。永明共得十一年，永明六年似乎不能称为“永明末”。细读《周颙传》：“文惠太子使颙书玄圃茅斋壁，国子祭酒何胤以倒薤书求就颙换之，颙笑而答曰：‘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这里透露出一条可供继续研讨的线索：何胤任国子祭酒时曾与周颙交往。问题是，何胤什么时候任国子祭酒呢？《梁书》本传说他“（永明）十年转国子祭酒”。恐未确。考《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寻代王俭领国子祭酒，辞不拜。”说明王俭卒后，萧子良曾被任命为国子祭酒，但没有到职。其缘由见《张绪传》：“七年，竟陵王子良领国子祭酒，世祖敕王晏曰：‘吾欲令

司徒辞祭酒以授张绪，物议以为云何？’子良竟不拜，以绪领国子祭酒。”张绪领国子祭酒不久就得病死了。《梁书·何胤传》：“尚书令王俭受诏撰新礼，未就而卒。又使特进张绪续成，绪又卒。属在司徒竟陵王子良。子良以让胤置学士二十人佐胤撰录。”萧纲《征君何先生墓志》：“永明中，王文宪受诏撰礼，未竟而卒。属在司徒文宣王，王以让先生，因广加刊缉。”据此而知，何胤接替国子祭酒职后，马上进入了五礼编修工作。《梁书·徐勉传》载徐勉《上修五礼表》曰：“及文宪薨殂，遗文散逸。后又以事付国子祭酒何胤。经涉九载，犹复未毕。建武四年，胤还东山，齐明帝敕委尚书令徐孝嗣。”《梁书·何胤传》也说何胤于建武四年“奉表不待报而去，隐会稽山。”建武四年(497)上推九年是永明七年(489)。故知何胤接替张绪领国子祭酒并撰录五礼是在永明七年的下半年，至迟在永明八年，因为《南齐书·百官志》明确记载：“永明三年立学，尚书令王俭领祭酒。八年，国子博士何胤单为祭酒。”既然何胤为国子祭酒时，周颙尚在世，那么，周颙至少卒于永明八年以后，当无疑义。复考《南齐书·刘绘传》：“敕助国子祭酒何胤撰治礼义。永明末，京邑人士盛为文章谈义，皆凑竟陵王西邸。绘为后进领袖，机悟多能。时张融、周颙并有言工，融音旨缓韵，颙辞致绮捷。绘之言吐，又顿挫有古气。时人为之语曰：‘刘绘贴宅，别开一门。’鱼复侯子响诛后，豫章王嶷欲求葬之，召绘言其事，使为表。”这里记载三事：协助何胤撰治礼仪，是在永明七年末八年初，考见上文。又据《南齐书·武帝纪》，萧子响于永明八年八月伏诛。可知刘绘代萧嶷上表求葬萧子响事亦在永明八年八月左右。这样看来，中间一事，即“永明末京邑人士盛为文章谈义”云云，当也发生在永明八年前后，不大可能是永明六年之事。如果这个推论可以成立，那么，史传所说“京邑

人士盛为文章谈义，皆凑竟陵王西邸"云云就不像是泛泛而论，很可能是特指永明七年萧子良大集善声沙门于鸡笼山邸、造经呗新声一事。据《高僧传·释僧辩传》载："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司徒竟陵文宣王梦于佛前咏《维摩》一契，便觉韵声流好，有工恒日。明旦即集京师善声沙门……集第作声。"陈寅恪先生《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引此文后说：这是"当时考文审音的一件大事。"《四声三问》亦引此文，但不无遗憾地说：周颙"不及见永明七年竟陵王经呗新声之制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周颙在永明七年末八年初仍在世。他不仅见到了"竟陵王经呗新声之制定"，而且还是其中颇为活跃的人物。

根据现存资料考知，永明七年，萧子良大集善声沙门及文士盛谈文义，其实不止二月二十日这一次。同年十月还有一次更大规模的集会，一直持续了二个多月，参加人数累计千余人。释僧祐《略成实论记》有过这样的记载：

> 齐永明七年十月，文宣王招集京师硕学名僧五百余人，请定林僧柔法师、谢寺慧次法师于普弘寺迭讲，欲使研覆幽微，学通疑执。即坐，仍请祐及安乐智称法师，更集尼众二部名德七百余人，续讲《十诵律志》，令四众净业还白。公每以大乘经渊深，漏道之津涯、正法之枢纽。而近世陵废，莫或敦修，弃本逐末，丧功繁论。故即于律座令柔次等诸论师抄比《成实》，简繁存要，略成九卷，使辞约理举，易以研寻。八年正月二十三日解座，设三业三品，别施奖有功、劝不及。上者得三十余件，中者得二十许种，下者数物而已。即写《略论》百部流通，教使周颙作论序，今录之于后。

释僧祐在永明七年曾参与了萧子良召集的盛会，而且，与萧子良

及其周围的文士多有交往。这些在《高僧传》、《续高僧传》中都曾有过记载。萧子良死后，僧祐曾为子良及其子收集遗文，并作《齐太宰竟陵文宣王法集录序》、《齐竟陵王世子抚军巴陵王杂集序》，可见他们的关系不算疏远。僧祐关于永明七年十月的集会记述当是可信的。这说明，周颙不仅在永明七年参加了竟陵王萧子良召集的考文审音的盛会，而且在永明八年正月还作有《抄成实论序》（此序收在《出三藏记集》，仍保存下来）。因此，周颙至少卒于永明八年以后，僧祐的记载及周颙的序文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至于周颙卒年的下限，可以据沈约《与约法师书》约略考知。此"约法师"是指慧约。据《续高僧传·慧约传》载，刘宋末叶，"周颙为剡令，钦服道素，侧席加礼，于钟山雷次宗旧馆造草堂寺，亦号山茨，屈知寺任。"从此两人交往日益密切。南齐永明年间，慧约与当时京城要人来往频繁，颇为时人所重。史载："约孝通冥感，思归遄反，而二亲丧亡，并及临诀。孺慕婴号，不交人世，积时停乡，以开慈道。后还都又住草堂。少傅沈约，隆昌中外任，携与同行。"在隆昌元年以前，慧约曾回家乡东阳奔丧，"积时停乡"，只有这段时间不在京城。隆昌元年，沈约外任东阳太守，慧约同行，以后，两人就没有再离开过，这在《慧约传》中记载得非常详细。因此我认为，沈约《与约法师书》很可能作于慧约在家乡守丧期间，至迟不会晚于永明十一年。信中说："去冬今岁，人鬼见分。"又"宿草既陈，楸槚将合。"说明周颙卒于冬天。

根据上述材料，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周颙的卒年当在永明八年冬天以后，永明末年慧约还都以前。

主要参考文献

《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
《陈书》《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　　中华书局校点本
司马光:《资治通鉴》　　中华书局,1956 年版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
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黄山书社,1987 年版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三联书店,1955 年版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　　三联书店,1959 年版
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　　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　　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 年版
《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二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版
方立天:《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　　中华书局,1982 年版
汤用彤:《魏晋南北朝佛教史》　　中华书局,1983 年版
《汤用彤学术论文集》　　中华书局,1983 年版
罗宏曾:《魏晋南北朝文化史》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　　中华书局,1983 年版
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
《罗常培纪念论文集》　　商务印书馆,1984 年版
王力:《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一册　　中华书局,1980 年版
王力:《汉语诗律学》　　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 年版

王力:《汉语语音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版
张彦远编:《历代名画记》　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 年版
张舜徽:《中国文献学》　中州书画社,1982 年版
《文苑英华》　中华书局,1966 年版
魏庆之编:《诗人玉屑》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版
《高僧传》《续高僧传》　光绪金陵刻经处刊本
罗常培编:《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　独立出版社,1945 年版。
许嵩:《建康实录》　中华书局,1986 年版
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　四库全书本
周祖谟:《问学集》　中华书局,1966 年版
启功:《诗文声律论稿》　中华书局,1977 年版
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版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
何启民:《中古门第论集》　台湾学生书局,1982 年版
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
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版
曹道衡:《中古文学史论文集》　中华书局,1986 年版
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
牟世金:《刘勰年谱汇考》　巴蜀书社,1988 年版
古田敬一著、李淼译:《中国文学中的对句艺术》　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 年版
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
顾学颉:《顾学颉文学论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版
许学夷:《诗源辨体》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年版

钟嵘:《诗品》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年版
刘大白:《白屋说诗》　中国书店影印开明书店,35 年版
《历代诗话》《历代诗话续编》　中华书局,1981 年,1983 年版
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　中华书局,1984 年版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　中华书局,1980 年版
朱铭盘:《南朝宋会要》《南朝齐会要》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1986 年版
朱铭盘:《南朝梁会要》《南朝陈会要》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1986 年版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　中国书店,1987 年影印上海文瑞楼版
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　中华书局,1984 年版
杜佑:《通典》　中华书局,1984 年版
郑樵:《通志》　中华书局,1987 年版
马端临:《文献通考》　中华书局,1986 年版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　二十五史补编本,中华书局,1955 年版
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年版
《钜宋广韵》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
葛晓音:《八代诗史》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
徐陵编:《玉台新咏笺注》　中华书局,1985 年版
萧统编:《文选》　中华书局,1981 年影印胡克家本
苏晋仁、萧炼子:《宋书乐志校注》　齐鲁书社,1982 年版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年版
《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版
《太平广记》　中华书局,1961 年版

《太平御览》　中华书局，1960年版
《艺文类聚》　中华书局，1982年版
逯钦立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中华书局，1983年版
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中华书局，1958年版
洪顺隆：《六朝诗论》　台湾文津出版社
张彦远编：《法书要录》　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
铃木虎雄：《沈约年谱》　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刘汝霖：《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　中华书局，1987年版
纪昀：《沈氏四声考》　畿辅丛书本
清水凯夫著、韩基国译：《六朝文学论文集》　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兴膳宏著、彭恩华译：《六朝文学论稿》　岳麓书社，1986年版
缪钺：《读史存稿》　三联书店，1963年版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吕德申：《钟嵘诗品校释》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葛路：《中国古代绘画理论发展史》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版
赵翼：《陔余丛考》　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　中华书局，1985年版
浦起龙校释：《史通通释》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后　　记

我有两个幼稚的梦：一是作家梦，二是学者梦。前者自然早已被岁月销蚀得无影无踪，而后者多少还留下一抹痕迹。摊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小书，或许可以给自己少许的慰藉。

六朝文学，我素来喜欢，却一直不敢碰它。说来有些话长。一九七八年初，带着破碎的作家梦，我从"广阔天地"歪歪扭扭地走进了大学课堂。名义上的高中毕业生，实际上，在"史无前例"的十年里到底学到多少东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们这一代人真正意义上的学习生活，实际上是从一九七七年考入大学以后才开始的。弱冠之年才开始问学，这真是令人悲哀的事情。面对现实，我们确实没有必要讳言自身固有的先天不足的明显阙憾。唯其如此，补课的紧迫感就无时不在鞭策着我，不敢有丝毫的怠懈。雨宵月夕，废寝摊书，一晃就过去了十七年的岁月。时间流逝之速，确实令人产生心惊胆颤的感觉。回想起来，当初之所以喜爱六朝文学，多半是受到南开大学中文系老师的影响。那时，我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非常着迷，背诵了许多的名篇佳作。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黄金时代，而《文心雕龙》和《诗品》又是那个时代的两颗耀眼的明珠。所以我的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就以这两部书作为研究对象，尝试撰写了《陶钧文思　贵在虚静——读〈文心雕龙·神思篇〉札记》和《试论钟嵘的"自然英旨"说》，得到了指导老师罗宗强先生和王

达津先生的初步肯定，并且还在系里举办的学生论文评选中获了奖。但是我当时的感觉并不轻松，因为我痛苦地发现，基本功的缺乏，使我有许多美好（今天看来相当空疏）的研究计划无从付诸实际。倘若这样继续做下去，前景并不看好，说得严重一点，这无异于浪费自己的青春年华。

从那以后，我暂时告别了六朝文学，饥不择食地从前辈的论著中揣摩问学的途径。很自然地，就把我引到了中国古典文献学的领域。一九八四年，我负笈南下，考入著名学者姜亮夫先生门下，专门学习中国古典文献学。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还有许许多多以前闻所未闻的科目，如历史地理、历代官制，中国科技史专题等，真让我神往目炫，永铭心版。那些课程，老实说，都还只是浅尝辄止，但它却给我展示了广阔的学术前景。在杭州大学求学期间，我真是为自己庆幸，遇上了那么多循循善诱的好导师，他们的教诲，让我一生受益无穷。在已故业师郭在贻先生的指导下，我完成了硕士论文《关于〈水经注校〉评价与整理方面的一些问题》。这是我所以能够鼓起勇气重返六朝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契机。

一九八六年秋，从杭州大学毕业后，我重新回到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授课之余，我开始研究沈约，设想以此作为基点，将南朝文学挂连起来，作综合研究。这种想法首先得到了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傅旋琮先生的首肯。他又热情地把我引荐给中古文学研究专家曹道衡先生、沈玉成先生。这是我后来报考曹道衡先生博士生的最初机缘。一九八七年底，我初步编就了以沈约为中心的永明文学系年考证稿。嗣后，因其他课题亟待完成，曾一度中断了这方面的研究。到一九八九底才又重理旧业，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完成了十余万字的永明文学综论稿。其

中的甘苦，自不必详述。

这部分综论稿，大多已在报刊上发表，其中《论竟陵八友》在第一届全国青年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的评选中还获得了二等奖。这次有机会结集出版，首先应诚挚地感谢前辈学者刘世德先生的热情推荐。在书稿整理过程中，许医农先生更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那种一丝不苟的认真精神，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这部小书，写作时间前后加起来，不过两年，但是基础工作却准备了十余年的时间。幸运的是，我游学南北，数从名师。他们从材料的甄别、论点的推敲、行文的斟酌、书写的格式，甚至标点符号的运用等，给予我许多具体的指导，披隙导窍，发蒙解惑，使我避免了许多错误，并初步摸索到了一点治学的门径。这部小书实际凝聚了许多学者的心血，这是我永远也不能忘怀的。

在商品大潮的猛烈冲击下，实用哲学成为当今主潮。在这样的背景下，我的学者梦所以还在支撑着，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彻底破灭，导师们的谆谆教诲和甘于寂寞的敬业精神，是我至今得以恪守信念的最重要的力量源泉。

我的作家梦已经永远地留在了贫瘠的山乡；但愿我的学者梦能在清贫的学苑里继续做下去。

刘跃进

一九九五年八月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出版后记

当前，在海内外华人学者当中，一个呼声正在兴起——它在诉说中华文明的光辉历程，它在争辩中国学术文化的独立地位，它在呼喊中国优秀知识传统的复兴与鼎盛，它在日益清晰而明确地向人类表明：我们不但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把中国建设成为经济大国和科技大国，我们还要群策群力，力争使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变成真正的文明大国、思想大国和学术大国。

在这种令人鼓舞的气氛中，三联书店荣幸地得到海内外关心中国学术文化的朋友们的帮助，编辑出版这套《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以为华人学者们上述强劲呼求的一种纪录，一个回应。

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著名专家、教授应本店之邀，组成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完全独立地运作，负责审定书稿，并指导本店编辑部进行必要的工作。每一本专著书尾，均刊印学术委员会推荐此书的专家评语。此种学术质量责任制度，将尽可能保证本丛书的学术品格。对于以季羡林教授为首的本丛书学术委员会的辛勤工作和高度责任心，我们深为钦佩并表谢意。

推动中国学术进步，促进国内学术自由，鼓励学界进取探索，是为三联书店之一贯宗旨。希望在中国日益开放、进步、繁

盛的氛围中，在海内外学术机构、热心人士、学界先进的支持帮助下，更多地出版学术和文化精品！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一九九三年十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
作者=
页数=376
SS号=0
出版日期=